

中国人文社会学期刊 AMI 综合评价核心期刊扩展版  
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  
全国高校精品社科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 东方论坛

## EASTERN FORUM

1988 年创刊 双月刊  
2024 年第 2 期  
(总第 186 期)

### 编辑委员会

主任：胡金焱

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卞建华 蔡颖雯 陈德球 陈洪连 陈瑞华  
董志勇 窦秀艳 方雷 何云峰 侯传文  
胡金焱 黄速建 姜异新 姜振昌 刘东方  
刘京希 刘喜华 刘跃进 吕周聚 马斗成  
孟天运 孙百才 孙继国 谭好哲 王立胜  
王庆金 王绍波 王兆胜 王子今 尉利工  
魏建 吴义勤 肖建红 钟永光 周潇

主编：孙继国

副主编：侯德形

1988 年创刊

2024

# 东方论坛

2

双月刊

总第 186 期

## □ 东方文化 · 中国智慧

《周易》的经世智慧及其时代创新

史少博 · 1 ·

北魏赐客制及其对民族交融的影响

张鹤泉 · 11 ·

周代拜赐礼仪研究三题

于少飞 马金亮 · 24 ·

## □ 新时代中国金融学

南稻北麦与公司违规

——基于水稻理论的实证研究

胡海峰 冯 舰 · 35 ·

行业特定知识转移与分析师预测质量：来自券商机构并购的证据

王 垒 冯明聪 沙一凡 · 55 ·

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的大股东掏空效应

雷梦娇 何 婧 · 72 ·

---

---

## □ 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逻辑

冯志峰 · 87 ·

---

---

## □ 文学研究

跨学科视域与跨文类叙事:《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敦煌文学书写

李 松 杨芷若 · 102 ·

论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论争与批判

——从许杰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一文说起

杨剑龙 · 118 ·

---

---

## □ 文献研究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百年汉籍收藏钩沉

张 云 [俄]马义德( Maiatekii Dmitri ) · 136 ·

福清本《香空宝忏》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同源说

俞伦伦 杨富学 · 149 ·

---

---

# THE EASTERN FORUM

## The Contents of the 2nd Issue for 2024

The Worldly Wisdom of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Its Innovation in the Present Era

..... Shi Shaobo (1)

The Client-granting System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Ethnic Blending

..... Zhang Hequan (11)

Three Issues about the Ritual of Expressing Thanks to Kings in the Zhou Dynasty

..... Yu Shaofei Ma Jinliang (24)

Rice Planting and Corporate Mis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Rice Theory

..... Hu Haifeng Feng Jian (35)

Industry-specific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he Quality of Analyst Forecasts: Evidence from Brokerage

Institu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 Wang Lei Feng Mingcong Sha Yifan (55)

Tunneling under the Asymmetric Allocation of Equity and Control in Rural Commercial Banks

..... Lei Mengjiao He Jing (72)

On the Logic of Build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 Feng Zhifeng (87)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d Gross-Genre Narrative: Writing of Dunhuang Literature

i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 Li Song Yang Zhiruo (102)

Controversy and Criticism of Petite Bourgeoisie Literature and Art: Based on Xu Jie's

"Petty Bourgeoisie and Literature and Art" ..... Yang Jianlong(118)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 Zhang Yun Maiatckii Dmitri(136)

On the Same Origin between the Fuqing Version of *The Xiang Kong Precious Repentance* and the Uighur

Version of *The Manichean Confessions* ..... Yu Lunlun Yang Fuxue(149)

英文翻译：岳玉庆

# 《周易》的经世智慧及其时代创新

史少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6

**摘要:**《周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孕育了中华民族精神,融入了亿万华夏子孙的血脉,世代相继,从未间断,直至当今。我国当代文化既汲取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也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也继承发展了《周易》的思想精华。《周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保合太和”“天下文明”“明罚敕法”等经世思想在当代文化中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体现了新时代的精神。《周易》注重整体性的思想精华,已经在当代文化中得到了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周易》;经世智慧;当代文化;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4)02-0001-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sup>①</sup>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著作之一就是《周易》,蕴含了闪光的优秀思想精华。“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先生说,一部《周易》,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这是因为《周易》这部书,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发生、成长、定型的整个历史。”<sup>②</sup>《周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内容博大精深,被我国历代宫廷官员、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所重视。在我国的大陆,一般认为《周易》分为《易经》《易传》;而在我国的台湾,有些学者把《易经》《易传》,都称为《易经》。《易经》曾经被誉为儒家经典五经之首、十三经之首,也被誉为“大道之源”。《周易》的文化精神,几千年来,已经凝聚于“华夏历史的肌肤之中,浸润于亿万百姓的日常生活。”<sup>③</sup>《周易》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精神,融入了亿万华夏子孙的血脉,世代相继,从未间断。当代的中华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焕发活力的新时代彰显。毫无疑问,《周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保合太和”“天下文明”“明罚敕法”等经世思想已经凝聚、沉淀于当代文化。一方面,当代文化中既延续、凝聚、沉淀、贯穿了《周易》的思想精华,另一方面,《周易》思想精华在当代文化中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代文化正是凝聚、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结合马克思主义而升华,才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才更具有生命力和活力。

**作者简介:**史少博,女,山东德州人,哲学博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周易》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36页。

② 杨亚利:《〈周易〉与中国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4页。

③ 许倬云:《中国的文化精神》,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X页。

## 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德不孤，必有邻’……，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观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sup>①</sup>“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理念和思想就出自于《易传》。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历史上曾经造就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辉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直是激励中华民族不断奋进的力量源泉。《清华学堂章程》记载：1911年，清华学堂开始创建时提出了“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演讲，用《易传》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激励学生奋发前行，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铸入了清华大学的校徽，高高悬挂在清华大礼堂的上方，成为了清华大学师生共同遵守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仅激励着清华人，而且几千年以来，一直激励华夏子孙不断前进、奋发图强。“自强不息”也蕴含了一个国家要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的思想。张岱年先生曾经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概括为中华民族精神。《易传·象》中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sup>②</sup>意思是说：天（自然）运动刚健，应于人道，君子应刚健不息，奋发图强；大地的气势承载养育万物而厚实和顺，应于人道，君子应以博大宽厚的胸怀，包容万事万物。2022年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的院长彭凯平在本科生开学典礼上，以“新时代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激励学生，提出了新时代“自强不息”的三个意识：独立自主的人格意识、坚定不移的利他意识、不断学习的创新意识。彭凯平院长还强调了“厚德载物”的六个特质：基础道德是仁爱，就是不伤害别人；基础道德是公平，就是不欺骗别人；基础道德是忠诚，就是不背叛自己人；基础道德是尊重权威，而不是屈服于威权；基础道德是高尚，而不是堕落；基础道德是自由，而不是压迫。可见，彭凯平院长对“自强不息”三个意识、“厚德载物”六个特质的阐释，是对传统文化的新时代解读。

《周易》中，不仅仅《易传·象》中明确阐释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而且《易经》《易传》中处处蕴含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思想。《周易》中的“易”就有变易之意，八卦、六十四卦“爻者，言乎变者也”，分阴分阳，“观变阴阳而立卦”，“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演绎宇宙的变动不居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易传·系辞》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sup>③</sup>《易传·系辞》还曰：“生生之谓易”<sup>④</sup>，可谓“生生：《周易》的第一要义”。<sup>⑤</sup>《易传·系辞》又曰：“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易传·象》中曰：“有孚惠心，不独富也。”可见，《周易》中也蕴含了中华民族共同走向富强的心愿。《周易》中还处处显示了“德”之重要性，正像《周易·系辞》指出：“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sup>⑥</sup>《易传·文言》还指出：“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241—242页。

②刘大钧、林中军注：《周易传文白话解》，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第36页。

③刘大钧、林中军注：《周易传文白话解》，第126页。

④刘大钧、林中军注：《周易传文白话解》，第102页。

⑤李尚信：《生生：〈周易〉的第一要义》，《光明日报》（理论版）2004年4月13日。

⑥刘大钧、林中军注：《周易传文白话解》，第139页。

“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周易》“修德”“敬业”，阐释了修德对敬业的重要性，告诫人们“敬业”，激励人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易传·文言》又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sup>①</sup>其中蕴含了敬业、诚信之思想。《易传·系辞》还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其意是：如果人得到天的护佑帮助就会顺利，然天对人的帮助，是通过人帮助人实现的，而人得到别人帮助的前提是诚信。一个没有诚信的人，是不会得到别人帮助的。《易传·系辞》还有：“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等，也都蕴含了“诚信”之思想。《周易》还多处阐释了“友善”之思想，例如《易传·系辞》中曰：“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sup>②</sup>《易传·系辞》中还曰：“敦乎仁，故能爱”；“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等，都彰显了“友善”的重要性。当代文化中的“富强”“敬业”“诚信”“友善”，凝聚并且发展了《周易》的“厚德”“诚信”“进德修业”等精华思想，延续着不朽的中华民族精神。一方面，《周易》中“生生不息”“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等，在当代文化中的“富强”理念中得到继承、转化及发展，指引着亿万国民自强、敬业，为振兴中华而努力拼搏。另一方面，“厚德载物”在当代文化中也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不仅成就一个人的光辉业绩，而且也成就一个国家的“富强”。“自强”“厚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公民的个体层面看：一个人，只有“自强”“厚德”两者具备，才能惠己利人。一方面，人必须自强。“自强”就是自立强大，只有自立强大，才不会成为社会和家人的累赘，即“自强”是利己、利他、利社会的前提。另一方面，人必须厚德。“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sup>③</sup>每个人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处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处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处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之中，正像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④</sup>处于各种关系中的人，不仅仅要自强不息，而且还要厚德，才能处理好各种关系，才能更好地立足、更好地发展。从国家层面看：一个国家，只有“自强”“厚德”都做到，才能朋友遍天下，更加不断富强。“富强”离不开“自强”“厚德”，如果只知道“自强”缺乏“厚德”，就容易偏向唯我独大、唯我独尊、唯我是从；如果只有“厚德”没有自强，那就缺乏了“厚德”的基础，也无法施展“厚德”。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更需要我们“自强不息”“独立创新”，可以说自强不息地创新是时代的召唤。新时代，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既离不开“自强不息”、技术创新、文化创新；也离不开“厚德载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全体国民也面临着各种诱惑的考验，“我们切记所有的激情和心中的烦扰不安，总是伴随着各种恶习和弊端，应该尽量避免陷入卑贱和堕落的处境；像是野心勃勃就会得到羞辱，纵情声色就会产生痛苦，懒散怠惰就会潦倒终生。”<sup>⑤</sup>新时代的中华民族，不仅全体公民要“进德修业”“诚信”“友善”，而且国家在世界上，也注重“诚信”“友善”，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容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制度差异，睦邻友好，融合其他国家之长，不断改革、日新月异，走向更加富强，走向更加繁荣，从而促进世界朝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基于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独

① 刘大钧、林中军注：《周易传文白话解》，第149页。

② 刘大钧、林中军注：《周易传文白话解》，第1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39页。

⑤ [古希腊]普鲁塔克：《道德论丛》第2卷，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第1190页。

立自主地创新,并且“厚德载物”,提高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平,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才能使国家走向真正的强大,才能够真正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新时代,《周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华,已经转化成了当代文化,并在当代文化中得到了创新性发展。

## 二、“保合太和”的“和谐”思想

《周易》中处处蕴含阴阳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自我和谐之思想。《周易》中不论是八卦、还是六十四卦,都是阴爻、阳爻数相同而凸显“和谐”,显示“一阴一阳之谓道”,穷尽宇宙世间万物之理。《易传·文言》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易传·彖》曰:“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蕴含了中华民族对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和谐、国与国之间和谐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美好期望。正像比利时的米歇尔·梅耶指出:“‘和’是中国早期的普遍主义的思想形式之一。自西周以来,这一思想滥觞于《易经》。学术界多以为从这部卜筮之书中提炼其哲学思想是很难的。但成书于战国年代的《易传》十篇概括了《易经》思想的精髓。‘保合太和’被概括为《易经》的基本思想。……《易经》之后,儒家和道家都阐述了‘和’的普遍主义思想。儒家倡导仁政,仁政的实质是和,即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sup>①</sup>

在历史的现实中,各种不和谐时常存在,处处存在,人类不断地解决各种矛盾,努力地使各种不和谐趋于和谐。尤其是人类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处处展现了人与人的不和谐、人与社会的不和谐、人自我的不和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资本主义大工业使科技飞速发展,使资本家获得了暴利,而使劳动人民日益贫困、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资本主义越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市场越成为资本家们争夺的对象,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的焦点和爆发战争的燃点,从而造成地球环境的极大破坏。“控制跨国公司不负责任的活动,保护地球环境,控制一部分大国的经济霸权主义,争取建立以尊重所有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平等公平为基础的民主国际经济秩序。——对于和平解决纷争、灾害、难民、贫困、饥饿等人道问题,请积极采取非军事手段进行国际支援活动。”<sup>②</sup>虽然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有很多,而资本主义是造成地球问题、环境问题的最大根源,并且战争是对地球环境、人类生存环境的最大破坏。马克思主义认为以利润为第一的资本主义实践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的唯利是图、为了获利的不择手段,不仅仅给人民群众带了灾难,而且也给地球带来灾难,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今,如果爆发核战、细菌战,人类就有毁灭的危险。“蹂躏他国主权是犯罪的侵略行为、是与社会主义立场无缘的行为,必须受到批判。……现在多国的企业跨国境快速成长,几乎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全体,经济的国际性‘统合’以及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成了问题,又出现了经济国际化的倾向。……多国企业的活动,地球规模性环境破坏更加深刻的同时,也破坏了各国的国民生活安定和国民经济的安定,从而产生了新的矛盾。”<sup>③</sup>各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第一的角逐,造成了国家之间时而产生贸易战,时而爆发使用武器的战争。尤其是使用武器的战争,对地球环境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是奴役、种族灭绝、暴力和剥削

① [比]米歇尔·梅耶:《论道德和政治的无礼》,史忠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10页。

② [日]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日本共产党纲领》(日文版),东京:日本共産党中央委員会出版局,2020年,第46页。

③ [日]不破哲三:《科学的社会主义の運動論》(日文版),东京:新日本出版社,1993年,第299页。

历史的产物。”<sup>①</sup>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现代,美国“唯我独大”、“为我独尊”的霸权主义给全球环境造成了最大威胁。自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西方社会张扬人的理性,凸显个人主义,颂扬人的主体性,热衷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只是看作客体,疯狂地改造自然,满足人的不断膨胀的需要,从而出现了大气污染、地球温度不断上升、有些动物濒临灭绝、水污染、泥石流等环境问题。世界各地相继发生飓风、台风、暴雨、干旱、酷暑、山火等气候灾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统一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一员。并具有创造性,创造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界。自然物也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和目的,并具有自己的主导性,自然的主导性在于通过自组织性实现生态系统的演化,自然系统具有目的性趋向一种有序性,其运动是无需借助于人类的力量的自我运动,这种运动趋向有序。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人类只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人类应该维持自身和自然的相互依赖、和谐共生。整个生态系统中,任何一方的价值都存在于多重关系之中,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协同而形成具有整体性的价值系统。人类如果强暴自然,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为此,恩格斯告诫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要遵循自然的规律,指出:“理性把人拉向右边,非理性的冲动把人拉向左边,而这样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真正的运动就按对角线的方向前进。”<sup>②</sup>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既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又要遵循自然规律,实践是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下有计划、有目的活动,不能不顾自然规律而一味地张扬理性而无限地夸大的主观能动性。恩格斯还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对我们进行报复。”<sup>③</sup>要理解、认识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会遵循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干预近期或长远的后果,从而形成灵与肉、人与自然的和谐。

《周易》中的“和谐”思想,在当代文化中得到了创新性发展,赋予了新时代的内涵。新时代的中国,强调绿色发展,使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更加清新自然,谋求新时代条件下的人与自然和谐,新时代促进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和谐,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马克思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④</sup>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和谐状态,一方面,逐渐消灭异化劳动的根源,使异化劳动逐步走向自由劳动;另一方面,建立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逐渐消灭虚假的联合体,逐渐消除社会与个人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未来社会的和谐目标,是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我国当代文化中的“和谐”追求,正是践行马克思主义和谐思想的进行时,全国人民朝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不断努力着。

当代文化中的“和谐”,不仅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价值观的差异,意识形态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交织与冲突,世界上局部战争接连不断,在国际风云动荡的局势中,应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努力谋求世界各国的“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和平发展。

①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第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998—99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22页。

### 三、“天下文明”思想

一般认为,汉语的“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中,《周易》多次提到了“文明”。《易传》中对乾卦(☰)、大有卦(☲)、同人卦(☲)、贲卦(☲)、革卦(☲)、明夷卦(☲)的诠释,都有“文明”之词出现。《易经》的乾卦(☰)九二爻辞为“见龙在田”,《易传·文言》诠释为乾卦九二爻辞时,其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sup>①</sup> 大有卦(☲)卦辞有“大有元亨”,《易传·彖》诠释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sup>②</sup> 同人卦(☲)的卦辞为“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易传·彖》诠释同人卦辞时,其中有:“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贲卦(☲)卦辞为:“亨。小利有攸往。”《易传·彖》诠释贲卦辞其中有:“文明以止,人文也。”<sup>③</sup> 革卦(☲)的卦辞为“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易传·彖》在诠释革卦辞时,其中曰:“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sup>④</sup> 明夷卦(☲)《彖》曰:“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周易》涉及到“文明”的这些卦中,乾卦(☰)上卦为“天”、下卦为“天”,有明亮、光亮、光明之象;大有卦(☲)、同人卦(☲)、贲卦(☲)、革卦(☲)、明夷卦(☲)这五个卦中都有离(☲),而“离也者,明也。……离,丽也。……离为火,为日,为电。”<sup>⑤</sup> 火、太阳(日)、电都会给人类以光明、温暖。具体分析,乾卦(☰)纯阳卦,有刚健、兴盛之意蕴,凸显了强盛之文明、“万国咸宁”之文明,正如朱熹《周易本义》曰:“盛德之至也,……‘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虽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sup>⑥</sup> 大有卦(☲)彰显“其物大德亨通”之文明、抑恶扬善之文明,正如王弼注、孔颖达疏的《周易正义》曰:“其物大德亨通,……‘火’在天上者,天体高明,火性炎上,是照耀之物而在于天上,是光明之甚,无所不照,亦是包含之义,又为扬善之理也。”<sup>⑦</sup> 朱熹《周易本义》曰:“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天命有善而无恶,故遏恶扬善,所以顺天。”<sup>⑧</sup> 同人卦(☲)强调“合同于人”之文明,《周易正义》曰:“言和同于人,必须宽广,无所不同。用心无私,处非近狭,远至于野,乃得亨进。……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应不以邪,而以中正应之,君子正也。”<sup>⑨</sup> 革卦(☲)凸显了变革之文明,《周易本义》曰:“‘革’,变革也。……又以其内有文明之德,……有所变革,皆大亨而得其正。”<sup>⑩</sup> 可见,《周易》展示了诸多方面的“文明”之景象,“文明”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向往与追求。

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历经了五千多年,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根据道森的看法,文明‘是一个特定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的一个特定的原始过程’的产物。”<sup>⑪</sup> 每个国家都有着独特的、具有民族性的文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明特色,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也各具

① 刘大钧、林中军注:《周易传文白话解》,第153页。

② 刘大钧、林中军注:《周易传文白话解》,第7页。

③ 刘大钧、林中军注:《周易传文白话解》,第12页。

④ 刘大钧、林中军注:《周易传文白话解》,第24页。

⑤ 刘大钧、林中军注:《周易传文白话解》,第163页。

⑥ 朱熹著,柯誉整理:《周易本义》,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0年,第26—28页。

⑦ 王弼注、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7页。

⑧ 朱熹著,柯誉整理:《周易本义》,第62—63页。

⑨ 王弼注、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周易正义》,第72—73页。

⑩ 王弼注、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周易正义》,第143页。

⑪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26页。

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是延续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新时代当代文化中的“文明”,体现着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价值追求。当代文化中的“文明”观念,不仅仅沉积了《周易》的“文明”思想精华,而且也凝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有“文明”思想之精华,并且在新时代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周易》中“天下文明”的思想在当今时代具有新的意义。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两书,分析了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并且指出:“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sup>①</sup>美国麦卡锡主义就是引发文明冲突的表现,“国家恐怖主义”是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本质,其意图是通过中美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攻击中国的意识形态,从而渲染美国的仇恨情绪,其目的是煽动美国社会的“仇华情绪”。当今的世界,风云变幻,时而惊心动魄,新麦卡锡主义又掀起世界的文明的冲突,给世界带来各种危险。当今西方某些国家的“文明冲突论”与中国的“文明和平共处论”都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与各自的传统文化也有关系。比利时的米歇尔·梅耶指出:“中国早期‘和’的普遍主义思想容易孕育出‘文明和平共处论’和‘文明互补论’的思想。……自以为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的一些西方学者很容易滋生出‘文明冲突论’的思想和某些民族是野蛮民族的思想。”<sup>②</sup>按照米歇尔·梅耶的观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出了“文明和平共处论”,例如《周易》中的“保合太和”“天下文明”等思想就蕴含了“文明和平共处论”,米歇尔·梅耶指出:“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与印度尼赫鲁共同提出的国与国之间交往中应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是这种‘文明和平共处论’的体现。我们从华夏传统这种普遍主义中还可以推演出‘文明互补论’,意谓世界上各种文明之间必然有很多差异,但这些差异不应成为‘文明冲突论’的论据,世界上各种文明之间是互补的。”<sup>③</sup>然而,西方的传统文化孕育了“文明冲突论”,米歇尔·梅耶分析:“西方早期的最后一种普遍主义的思潮是影响直至今日的基督教教义。基督教教义以耶稣为榜样,主张把最独一无二的个人纳入世界主义的胸怀;并且认为只有基督教精神有能力把最丰富最独特的个性与具体的普遍性统一起来,全世界所有的人没有任何区分地受到呼吁,被呼吁参与这种具体的普遍性。……然而基督教教义这种普遍主义拥有浓厚的世界末日思想、千年至福思想、个体善与恶的冲突思想、人类内部的文明冲突思想、天与地两个‘城邦’的冲突思想和文明史的轮回思想。这些思想与古希腊的先验形而上学的思想根基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更严重而已。而且这种普遍主义具有强烈的扩张思想。近年来的世界末日论、文明冲突论以及西方国家在世界上的一切作为,说到底,乃是它们的世界观和宗教观的体现。……西方在‘理性’思想支撑下的自由市场经济观念及其实践。自由市场经济观念及其实践下人性恶的一面容易萌发和膨胀。”<sup>④</sup>在未来的时代,如果要避免文明之间的大战,各个核心大国就不应该干涉其他文明,从而避免造成冲突。各国都有自己的不可侵犯之权利,都有自己独特的、独有的文化方式、文明方式。一方面,各国之间由于文化的差异,存在文明的差异与冲突;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文化、文明也有一定的共性,一定意义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第367页。

② [比]米歇尔·梅耶:《论道德和政治的无礼》,史忠义译,第8—9页。

③ [比]米歇尔·梅耶:《论道德和政治的无礼》,史忠义译,第14—15页。

④ [比]米歇尔·梅耶:《论道德和政治的无礼》,史忠义译,第20—22页。

上,不同的文化、文明之间也能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国家既有不可侵之权利,则各国相互爱重,而莫或相侵,此为国际之本务。”<sup>①</sup>

当代文化中所阐释的“文明”是具有包容性的文明,不仅仅继承延续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五千多年文明成果,而且又兼融他国文明之精华。新时代的中华民族赋予了“文明”崭新的内涵,文明呈现出了多彩性、平等性、包容性。当今世界,规避国家之间的文明冲突,成为世界性的课题。“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sup>②</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sup>③</sup>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体现了“天下文明”的美好憧憬以及努力。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新时代文化建设,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以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最求,努力构建最理想的文明状态。社会主义的文明体现了为广大民众谋福利的物质文明,也体现了为了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的精神文明,更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道德文明。中华民族在当代文化的引领下,不断地健全法制、使社会更加公平、公正,人们不断地走向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奔向所向往的理想文明状态。

#### 四、《周易》的“法治”意蕴

《易经》中讼卦(䷐)、噬嗑卦(䷔)、中孚卦(䷼)等都蕴含了法治思想。讼卦(䷐)上卦是乾(☰)为天、下卦是坎(☵)为水,从象的角度分析:“天”上行,“水”下行,无相交而迥异背离不合之象。《周易本义》曰:“天上水下,其行相违,做事谋始,讼端绝矣。”<sup>④</sup>启示人们遵纪守法,防患于未然,遵守规范、规则,重视调解,讲究和睦,尽量避免诉讼事情的发生。噬嗑卦(䷔)上卦是离(☲)为火(明),下卦是震(☳)为动,噬嗑卦(䷔)的互卦即六三爻、九四爻、六五爻组成坎(☵)卦,坎为水、为狱。噬嗑卦的卦辞为:“噬嗑,亨,利用狱。”由此明确了顺从正确的规律,“治狱”可以达到亨通的卦旨。噬嗑卦的《象传》有:“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sup>⑤</sup>阐释了统治者要“明罚”,制定明确严格的法律条例,避免治理的随意性;还要“敕法”,将法律公布于众,让民众有法可依,在法律条文实施的过程中,严格执法,对于犯法者给予相应的处罚。中孚卦(䷼)的上卦是巽卦(☴)为风,下卦是兑卦(☱)为泽,《象传》中说:“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周易正义》曰:“‘君子以议狱缓死’者,中信之世,必非故犯过失为辜,情在可恕,故君子以议其过失之狱,缓舍当死之刑也。”<sup>⑥</sup>阐释了慎

①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4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28—230页。

④ 朱熹著,柯圣仁整理:《周易本义》,第44页。

⑤ 刘大钧、林中军注:《周易传文白话解》,第52页。

⑥ 王弼注、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周易正义》,第243页。

刑之思想,以避免冤假错案的产生,彰显法治的公平、公正。由此可见,《周易》中告诫人们尊法、守法,防患于未然,尽量避免犯法;《周易》又告诉统治者制定法律避免随意性,要“明罚敕法”,并且要慎刑。《周易》中蕴涵了守法的重要性,立法、执法的严谨性。在阶级的社会里,构建社会的文明,离不开法治,只有在法治的保护下,才有可能保障大多数人的自由、公平、公正;构建社会的文明,当然也离不开道德。社会的公正、自由,不仅与道德有关,而且也与法制有关。每一个人的自由必须以不伤害别人为前提,公平公正也有法律作保障。

《易经》中的法治思想,已经渗透凝聚于当代法治文化。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法治”是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公正”为价值导向,指引新时代的中国继续进行法治建设,依法治国,保障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实现。以当代文化为引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关系到国家的兴旺以及长治久安、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和谐、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安康以及幸福,所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意义重大。“法律受到国家强制力的支持,……法律拥有为许多关于责任的具体问题提供答案所需要的制度性资源。”<sup>①</sup>构建当代的法治文化,坚定不移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不移地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与坚持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依法治国、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让做了坏事的人产生侥幸的心理,从而阻止走上违法犯纪的道路。逾期不予处理会使受害人丧失希望,他们的心灵受到打击,这是正义女神未能尽到职责;更会让那些歹徒增强信心和勇气;对于胆大妄为的行为毫不迟疑地给予责罚,可以防治未来的犯罪。还能给受害者最大的安慰。”<sup>②</sup>当今,我们既要看到法制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也要意识到法治建设中的不足和有待于改善之处,逐步使我国的法治体系更加健全完善。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在发展和维护社会的责任概念和实践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sup>③</sup>培育新时代法治文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不能照搬国外的法治建设经验,也不能全盘排斥国外法治建设的经验,并且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法治思想,根据我国的国情与实践,传承传统的优秀法治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要凸显人民的主体地位,法治建设为了人民,坚持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维护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增进人民的权益与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各个领域以及全过程。

## 五、整体性思维

《周易》中将个人、家庭、国家、天下乃至整个宇宙进行系统地认知,将天、地、人作为一个大整体的宇宙系统,又将天、地、人各自作为一个小整体。《周易》用阴爻、阳爻,组成八卦、六十四卦。在六十四卦中以“二二相偶”“非覆即变”的排列演绎着宇宙的变化,彰显着整体性的思维,体现着天、地、人之间的整体性,体现了事物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

人的存在不是孤立地存在,总会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每个人都是一定团体中的人、一定集体之

① [澳]皮特·凯恩:《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罗李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0页。

② [古希腊]普鲁塔克:《道德论丛》第3卷,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5年,第1226页。

③ [澳]皮特·凯恩:《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罗李华译,第44页。

中的人、一定社会中的人、一定国家中的人、一定世界中的人。当今世界,“‘全球化’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是无法逆转的过程。它也是以同样程度和同样方式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过程。”<sup>①</sup>世界人民都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各国之间联系密切、命运与共、休戚相关。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整体,气候问题、能源问题、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早已把世界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周易》的整体性思维,已经在当代文化中得到了创新性发展。一个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世界也是有机的整体,每个整体内部各要素之间都处在普遍的联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且整体内的要素有时也相互对立。整体性思维就就要求我们全面地看问题,有整体观念,防止“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片面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当代中国文化谋求社会的和谐,努力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当代中华文化中,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体现了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当代文化,传承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价值观念、价值理念,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价值、优秀观念、优秀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的产物。当代中华文化,既凝聚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精神,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土壤,汲取其营养而茁壮成长。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幸福为宗旨,采用整体性思维的方式,对国家的前途整体性设计,既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绩,也善于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既注重全体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关注全体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既注重全体人民群众的近期利益,也关注全体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以当代文化引领中华民族,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努力实现伟大的复兴之梦。

责任编辑:侯德彤

## The Worldly Wisdom of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Its Innovation in the Present Era

Shi Shaobo

School of Marxism, Xidian University, Xi'an 710126, China

**Abstract:** *The Book of Chang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arrie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nurturing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ntegrated into the bloodline of billions of Chinese descendants. It has been passed down to the present da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ithout interruption. Our contemporary culture has not only drawn on the achievements of world civilization, but has also inherite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clud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quintessential thought of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ideas from *The Book of Changes* such as "constantly strive for self-improvement", "the virtuous care for all people and all things", "maintain great harmony", "build worldwide civilization" and "carry out severe punishments and keep law order"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reflect the spirit of the new era. The essence of the holistic thought in *The Book of Changes* has been innovatively developed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Key words:** *The Book of Changes*; worldly wisdom; contemporary cultur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① [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页。

# 北魏赐客制及其对民族交融的影响

张鹤泉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拓跋珪恢复代国之时,实行使归顺者能够获得客身份的做法。北魏建国后,道武帝拓跋珪使赐客的规定制度化。北魏国家使“归国”少数民族首领能够成为授客对象;而对“归国”汉人而言,只有上层群体,可以获得“客”身份。北魏国家对客实行了优待的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客能够受封爵位和受任职官,并且,还能获得物质赏赐。尤其对少数民族的客,北魏国家实行赐婚的做法。因为北魏赐客制的实行,使客阶层与拓跋鲜卑统治者建立起牢固的君臣关系,并在“归国”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也就促使“归国”群体的独立性逐渐泯灭。而且,随着孝文帝汉化措施的推行,使代人与汉人的交融不断深化,从而在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取向上日趋一致,因此,北魏实施的赐客制对促进北方民族交融,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推动作用。

**关键词:** 北魏; 赐客制; 民族; 交融;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39.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2-0011-13

北魏国家为吸引邻国汉人和少数民族人“归国”,而实行了赐客制。也就是向归顺北魏的汉人上层和少数民族人首领赐授客身份。应该说,北魏国家实行的这一制度不仅促使邻国汉人与少数民族人的归顺,也使这些归顺者与拓跋鲜卑统治者建立起牢固的君臣关系,并对北方族群的融合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北魏国家实行的赐客制及其相关问题,需要做必要的考察。虽然前人已经对这一问题做了一些探讨,<sup>①</sup>但仍有深入开掘的必要。所以,本文拟对北魏赐客制的相关问题做一些阐释,并透视赐客制对北魏民族交融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得到深化。

## 一、赐客制的实行

北魏实行赐客制是与国家施政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考察赐客制的实行,就需要提及鲜卑拓跋部吸引外族人归顺的做法。实际上,拓跋鲜卑统治者为了扩大统治范围和增加人口数量,很早就采取授予归顺的外族人以客身份的举措。《魏书·薛野賡传》:“(薛野賡)父达头,自姚萇率部落归国。太祖嘉其忠款,赐爵聊城侯,散员大夫,待以上客之礼,赐妻郑氏。”这一记载提到的“上客之礼”,就是

**作者简介:** 张鹤泉,男,河北安新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荣誉副会长,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sup>①</sup> [日]佐久间吉也:《北魏の客礼について》,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编:《东洋史学论集》,东京:清水书院,1953年,第61—73页;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第76—87页;仇鹿鸣:《北魏客制小考》,《史学月刊》2018年第11期。

说薛野賡之父达头获得了上客的身份,因而被国家以礼相待。由此可以看出:一是达头率部落归顺鲜卑拓跋部是在姚萇统治后秦之时。姚萇建后秦在白雀元年(384),而在北魏道武帝登国八年(393)亡故。<sup>①</sup>所以,达头归顺鲜卑拓跋部不会晚于登国八年。二是达头被拓跋珪“待以上客之礼”,显然是对他率部落归顺的最高奖赏。由此可以确定,在拓跋珪恢复代国之时,为归顺的外族人授予客身份的做法已经开始实施。

在皇始元年(396),道武帝拓跋珪“初建台省,置百官,封公侯、将军、刺史、太守”,<sup>②</sup>开始完善国家各项制度。应该说,在道武帝构建国家制度的过程中,也将为归顺外族人授与客身份的做法确定为重要的规定。《魏书·宇文福传》:“(宇文福)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为拥部大人。祖活拔,仕慕容垂,为唐郡内史、辽东公。太祖之平慕容宝,活拔入国,为第一客。”宇文福祖父活拔归顺北魏,在道武帝平定慕容宝之时,也就是皇始二年。<sup>③</sup>而这正是活拔因归顺北魏,被授予第一客身份之年。由此可以明确,皇始二年,道武帝授予活拔第一客的身份,应该是依据制度规定而采取的做法。因此,可以说,北魏为奖赏归顺的外族人而实行授以客身份的做法,随着道武帝对国家制度的完善,而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规定。这也就是北魏国家一直实行的赐客制。

实际上,道武帝拓跋珪实行赐客制后,由于北魏国家需要汲引外族人“归国”,所以,后世皇帝都积极实行这一制度。例如,明元帝泰常二年(417),袁式“归国,为上客,赐爵阳夏子。”<sup>④</sup>太武帝正平元年(451),唐和“诣阙。世祖优宠之,待以上客。”<sup>⑤</sup>段晖与段承根归国,太武帝“颇重之,以为上客。”<sup>⑥</sup>高肇“高祖初,与弟乘信及其乡人韩内、冀富等入国,拜厉威将军、河间子,乘信明威将军,俱待以客礼。”<sup>⑦</sup>而且,北魏还鼓励国家官员选送符合获得客身份者。如慕容白曜“送休宾及宿有名望者十余人,俱入代都为客。”<sup>⑧</sup>

孝文帝改革后,国家仍继续推行赐客制。例如,淳于诞“景明中,自汉中归国。既达京师,陈伐蜀之计,世宗嘉纳之。……后以客例,起家除羽林监。”<sup>⑨</sup>李苗“世宗晏驾,班师。后以客例,除员外散骑侍郎,加襄威将军。”<sup>⑩</sup>而且,至东魏,依然延续这一制度。《北齐书·辛术传》:“(辛术)与尚书左丞宋游道、中书侍郎李绘等并追诣晋阳,俱为上客。”可见赐客制还是东魏国家优待归降者的重要做法。

因为北魏赐客制的长期实行,使这一制度不断完善,规定更为明确。所以,从赐客制实行来看,北魏国家将授予客身份的对象,确定为邻国归顺的外族人,并使获得客身份者,可以获得国家优待,如授予客官爵,赏赐客财物等。北魏国家还依据归顺者不同的地位,使客具有等次区分。《魏书·房法寿传》:“及历城、梁邹降,法寿、崇吉等与崔道固、刘休宾俱至京师。以法寿为上客。崇吉为次客,崔、

①《魏书》卷二《道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5页。

②《魏书》卷二《道武帝纪》,第27页。

③《魏书》卷二《道武帝纪》,第28页。

④《魏书》卷三八《袁式传》,第880页。

⑤《魏书》卷四三《唐和传》,第963页。

⑥《魏书》卷五二《段承根传》,第1158页。

⑦《魏书》卷八三下《外戚下·高肇传》,第1829页。

⑧《魏书》卷四三《刘休宾传》,第966页。

⑨《魏书》卷七一《淳于诞传》,第1593页。

⑩《魏书》卷七一《李苗传》,第1594页。

刘为下客。”也就是将客分为上客、次客、下客三等次,上客也被称为“第一客”。<sup>①</sup>

北魏国家实行的赐客制,实际是延续鲜卑拓跋部优待归顺外族人的传统做法。早在鲜卑拓跋部部落联盟时期,就将一些外族人吸纳到部落组织中。例如,晋人卫操“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sup>②</sup>特别是在什翼犍时,为壮大部落联盟,更积极地招抚外族人。如吕洛拔“曾祖渴侯,昭成时率户五千归国。”<sup>③</sup>拓跋鲜卑部采取这种做法,实际是使部落联盟可以巩固和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然而,对拓跋鲜卑人而言,一般将融入部落组织的归顺者都视为外来人,也就是客,因而,鲜卑拓跋部建国后,一直保持这种传统的理念。所以,北魏国家将周边外族来访的使臣称为“诸方杂客”,<sup>④</sup>或称为“蕃客”。<sup>⑤</sup>可以说北魏国家的这些称谓,实际正是保留拓跋鲜卑人以部落外的人为客的传统理念的体现。

不过,更重要的是,拓跋鲜卑统治者将归顺的外族人作为“客”,是与他们统治具有正统性的观念形成紧密联系的。应该说,在盛乐时期,鲜卑拓跋部就与西晋发生联系。晋怀帝曾封拓跋猗卢为代公;晋愍帝又进他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sup>⑥</sup>显然,鲜卑拓跋部已经与西晋建立臣属关系,成为西晋的藩属。虽然鲜卑拓跋部处于属臣的地位,然而,西晋能以正统王朝发布号令的至上权力,却对鲜卑拓跋部产生重要的影响,使拓跋鲜卑的首领认识到政治统治具有正统性的重要意义。正是由于这种理念的形成,拓跋珪建立北魏,称皇帝后,就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显示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魏书·道武帝纪》:“(天兴元年)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所谓“从土德”,“数用五”,就是将北魏立国纳入五德运次之中,并以“土德”象征国家的统治。而以“土德”象征其统治的原因,是将所建国家作为“继黄帝之后”<sup>⑦</sup>的王朝,所以,北魏也就是具有正统性的国家。至孝文帝时,又使北魏的五德运次,“可依为水德”。<sup>⑧</sup>孝文帝将北魏建国初确定的“土德”改为“水德”,是使北魏的历运接续晋代的“金德”,表明北魏与晋朝有前后相承的关系,进而也就更能突显北魏统治所具有的正统性。也就是说,在当时南、北政权对峙的形势下,只有北魏的统治具有正统性,所以就使在位皇帝能够成为主宰天下的最高统治者。而北魏皇帝对天下主宰的意义,就是表明其统治的范围既包括已经控制的地区,也涵盖尚未被征服的地区,因而所控制地区的居民就视为境内之民,而尚未征服的地区则为境外之民,也就是客民。由于北魏国家将其统治置于正统的地位,所以也就牢固地建立了主、客民区分的观念。这应该是北魏国家为归顺的外族人授予客身份的重要原因。

当然,由于鲜卑拓跋部与中原王朝频繁地接触,所以,对汉人的社会习俗就有较多的认知。实际上,魏晋时期,中原社会群体的主、客区分已经很明显,并且,建立了牢固的主客关系。这种主客关系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因而当时贵族养客的风气很浓厚。如齐国田常“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sup>⑨</sup>至汉代,养客的风气扩大,一些显贵家族为政治需要而养客;另一些显贵家族则为经济活动而

① 《魏书》卷六一《薛安都传》,第 1355 页。

② 《魏书》卷二三《魏操传》,第 599 页。

③ 《魏书》卷三〇《吕洛拔传》,第 732 页。

④ 《魏书》卷七下《孝文帝纪下》,第 167 页。

⑤ 《魏书》卷一〇《孝庄帝纪》,第 262 页。

⑥ 《魏书》卷一《序纪》,第 9 页。

⑦ 《魏书》卷一〇八之一《礼志一》,第 2734 页。

⑧ 《魏书》卷一〇八上《礼志一》,第 2747 页。

⑨ 《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885 页。

养客,并使主客关系逐渐牢固化。至魏晋时期,随着依附关系不断深化,这些适应主人政治、经济上需要的“客”的地位明显下降,具有很强的依附性,所以,客也就沦为特殊的依附群体。应该说,汉族王朝的主客关系具有的这种特点,对北魏实行的赐客制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北魏国家很看重“客”具有与主人不可分离的依附性。尽管北魏国家实行的赐客制,不要求获得客身份者要依附拓跋鲜卑统治者,但却需要对他们统治的绝对服从。换言之,北魏统治者需要利用汉人主客关系中的依附观念,使外族的归顺者与其构建起一种特殊的君臣关系。也就是保证使获得客身份的归顺者可以对拓跋鲜卑统治者的意志做到绝对的服从。北魏国家对客的这种要求,应该受到汉族王朝主客依附关系的很深影响。

总之,拓跋珪恢复代国之时,延续鲜卑拓跋部的传统做法,对归顺的外族人采取了优待的措施,并以使归顺者能够获得客身份的做法作为实行这一措施的保证。北魏建国后,道武帝拓跋珪不断完善国家制度,也使赐客的规定制度化。可以说赐客制的实行,就将拓跋鲜卑统治者置于主宰天下的地位,因而也就成为北魏国家统治具有正统性的体现,并且,也是促使北魏吸纳更多的周边外族人“归国”的重要决策。

## 二、客身份的限定及其受到的优待

如前所述,北魏国家实行的赐客制,是优待归顺外族人的保证,所以,国家也就需要确定获得客身份的条件,并规定优待客的具体措施。

(一) 赐授客身份的限定。北魏国家实行赐客制,需要确定可以获得客身份的对象。然而,从归顺北魏的族群来看,存在汉人和少数民族人的区分,而汉人和少数民族人的社会发展状况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要确定汉人和少数民族人能够获得客身份,也就需要采取不同的限定做法。

从“归国”的少数民族人情况来看,一般都是由酋长率领部落组织前来归顺的。《魏书·道武帝纪》:“(皇兴二年)库狄勤支子沓亦干率其部落内附。”《魏书·明元帝纪》:“(永兴三年)西河胡张贤等率营部内附。”《魏书·太武帝纪上》:“(神䴥元年)上郡休屠胡酋金崖率部内属。”《魏书·文成帝纪》:“(太安四年)车驾度漠,蠕蠕绝迹远遁,其别部乌朱贺颓、库世颓率众来降。”这些记载中提到的“部落”“营部”“部”“众”,虽然在构成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共同之处,都是少数民族人的部落组织。这说明,“归国”的少数民族人,都是以保留部落组织的方式迁徙至北魏境内。由这种归顺方式所决定,部落组织的首领也就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在北魏国家赐授客身份上,也就需要以部落组织的酋长为对象。如南匈奴远属“活拔入魏,为第一客。”<sup>①</sup>活拔正是统领所属部落归顺北魏的酋帅。其实,北魏对少数民族人采取这种授客的方式,是优待归顺少数民族人的一贯做法。例如,闾大肥“蠕蠕人也。太祖时,与其弟大涅倍颐率宗族归国。”<sup>②</sup>宿石“朔方人也,赫连屈子弟文陈之曾孙也。天兴二年,文陈父子归阙,太祖嘉之。”<sup>③</sup>因此,可以明确,北魏国家确定“归国”少数民族人的赐客对象,只选择部落组织的酋长。因为这些归顺的酋长在其部落组织中处于统领地位,因而也就决定了他们获得客身份后,仍然能够

①《北史》卷二五《宇文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9页。

②《魏书》卷三〇《闾大肥传》,第728页。

③《魏书》卷三〇《宿石传》,第724页。

主导“归国”后的部落组织的稳定，并使其完全服从北魏的政治统治。

北魏国家赐授“归国”汉人客身份的做法，则不同于少数民族。实际上，北魏国家为了保证“归国”汉人可以获得客身份，实行了明确的评定标准。这个标准是以建树的功劳为基础的。因为北魏国家将汉人的“归国”，视为一种特殊的功劳。《魏书·张谠传》：“（张）敬伯，自以随父归国之功，赐爵昌安侯。”《魏书·韦阐传》：“（韦欣宗）以归国勋，别赐爵杜县侯。”这些记载中提到的“归国之功”、“归国勋”，都将建树功劳与“归国”，即归顺北魏国家结合在一起。正因如此，北魏国家对“归国”的汉人，要给与很高的奖赏。在这种奖赏中，赐授客身份就是重要内容。例如，薛道异“亦以勋为第一客。”<sup>①</sup>而且，北魏国家对建树“归国”勋的汉人群体的涉及面并不狭窄。也就是不仅有归顺北魏的率领者，也包括随从的归顺者。如毕众爱“随兄归国。以勋为第一客，赐爵钜平侯。”<sup>②</sup>在这些获得客身份的随从者中，不一定都与主导者有血缘联系。《魏书·薛安都传》：“（薛）安都以事窘归国，……皇兴二年，与毕众敬朝于京师，大见礼重，子侄群从并处上客，缘封侯，至于门生，无不收叙焉。”这里提到的“门生”，实际即为依附薛安都的人群。可是，他们也能够获得客身份。这说明，北魏国家赐授客的对象，主要是以主导“归国”的汉人为主体，并附之以追随者及家庭成员。

北魏国家确定“归国”汉族人为授客对象，除了要评定他们“归国”的功劳，还要审视他们原来的社会地位。例如，沈文秀在刘宋“初为郡主簿，稍迁建威将军、青州刺史。”<sup>③</sup>薛安都则为“督徐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平北将军、徐州刺史。”<sup>④</sup>他们归顺北魏后，都被授予上客。这说明，这些归顺的汉人原来所任职官，对他们能够获得上客身份，显然要产生影响。当然，北魏国家确定一些“归国”汉人客身份，还以他们原来在地方的势力作为评定依据。《魏书·房法寿传》：“（房法寿）弱冠，州迎主簿。后以母老，不复应州郡之命。常盗杀猪牛，以共其母。招集壮士，常有百数。……法寿、崇吉等与崔道固、刘休宾俱至京师。以法寿为上客。”《魏书·毕众敬传》：“（毕元宾）少而豪侠，有武干，涉猎书史。……与父同建勋诚。及至京师，俱为上客。”尽管房法寿、毕元宾在地方的势力各不相同，可是，因为他们在地方都有很大影响，所以，归顺北魏后，他们都被赐授上客。由此可见，北魏确定“归国”汉人的客身份，很注意这些人在原来地方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也就是北魏国家使获得客身份者，必须是原来地方的社会上层群体。

然而，“归国”汉人并不限于社会上层群体，还包括众多的社会下层人口。所以会出现众多的下层汉人归顺北魏，大多数都是由“归国”的官员鼓动和驱使的结果。例如，神瑞元年（414），“司马德宗琅邪太守刘朗，率二千余家内属。”<sup>⑤</sup>太和二十二年（498）“萧宝卷奉朝请邓学拥其齐兴郡内属。”<sup>⑥</sup>景明初“萧宝卷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内属。”<sup>⑦</sup>永平三年（510）“萧衍弘化太守杜桂举郡内属。”<sup>⑧</sup>很显然，这些南朝官员归顺北魏，一般都要统领所辖地区居民“归国”。北魏国家则将这些“归国”下层

<sup>①</sup>《北史》卷三九《薛安都传》，第1412页。

<sup>②</sup>《魏书》卷六一《毕众敬传》，第1364页。

<sup>③</sup>《魏书》卷六一《沈文秀传》，第1366页。

<sup>④</sup>《宋书》卷八八《薛安都传》，北京：中华书局，1874年，第3218页。

<sup>⑤</sup>《魏书》卷三《明元帝纪》，第55页。

<sup>⑥</sup>《魏书》卷七下《孝文帝纪下》，第184页。

<sup>⑦</sup>《魏书》卷二一下《献文六王下·彭城王勰传》，第578页。

<sup>⑧</sup>《魏书》卷九《明帝纪》，第223页。

汉人,安置在北魏的郡县。如奚斤既平河南,“以(司马)楚之所率户民分置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郡,以益豫州。”<sup>①</sup>韦珍“又破慧景,拥降民七千余户内徙,表置城阳、刚陵、义阳三郡以处之。”<sup>②</sup>这些“归国”的下层汉人,原来大多数都是国家编户民,可是,北魏国家却并不赐授这些汉人客身份,所以《魏书》《北史》中也就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应该说,北魏国家对南朝“归国”下层汉人,是以完全服从拓跋鲜卑人的统治为前提,而采取不取消他们编户民地位的做法,从而使他们由南朝编户转变为北魏的编户。很明显,北魏国家实行赐授“归国”汉人客身份的做法,是有明确的限定范围,也就是只将原来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汉人上层作为赐授的对象。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魏书》《北史》中,尚有一些归顺北魏的上层汉人没有获得客身份的记载。例如,司马景之“晋汝南王亮之后。太宗时,归阙,爵苍梧公,加征南大将军。”<sup>③</sup>李思穆“太和十七年,携家累自汉中归国,除步兵校尉。”<sup>④</sup>很显然,这些归顺北魏者,都立下“归国”功勋,但却不见有获得客身份的记载。那么北魏国家是否对立有“归国”勋的汉人采取不同的做法?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魏书·杨播传》:“(杨播)自云恒农华阴人也。高祖结,仕慕容氏,卒于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时归国,卒于上谷太守。祖真,河内、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兴末为广平太守,有称绩。”据此可见,杨播曾祖杨珍在道武帝时“归国”,但只记载了他归顺北魏后所任的官职,却没有记载他获得客身份。可是,杨椿追述其先世业绩时却称:“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给田宅,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自尔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绝,禄恤甚多。”<sup>⑤</sup>很显然,在杨珍归顺北魏后,并不是没有获得客身份,而是省略了对这一情况的记载。《魏书》《北史》所以要采取这种省略的记载方式,主要是北魏国家依据汉人“归国”功劳赐授客身份,已经成为制度性的规定,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反复强调赐授客身份的做法。由此可以明确,北魏国家对“归国”的上层汉人,一般都要赐授不同等次的客身份。这应该是与他们“归国”功勋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必须遵守的规定。

(二)客受到的优待。北魏国家确定对归顺者的优待,主要是以上客、中客、下客等次为标准,分别给与不同的赏赐。应该说,北魏国家对客的奖赏是多方面的。

北魏国家对大多数客都要封授爵位。前引《魏书·闾大肥传》:“闾大肥,蠕蠕人也。太祖时,与其弟大涅倍颐率宗族归国。太祖善之,尚华阴公主,赐爵其思子。”可见北魏国家对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要封授爵位。而对归顺北魏的汉人,也是如此。例如,唐玄达“性果毅,有父风。与叔父和归阙,俱为上客,封晋昌公。”<sup>⑥</sup>司马叔璠“长子灵寿,神䴥中,与弟道寿俱来归国。灵寿,冠军将军、温县侯;道寿,宁朔将军、宜阳子。”<sup>⑦</sup>统计《魏书》《北史》记载,北魏国家封授客的最高爵位为公爵。如唐和“诣阙。世祖优宠之,待以上客。高宗以和归诚先朝,拜镇南将军、酒泉公。”<sup>⑧</sup>最低的爵位则为男爵。如胡叟“既先归国,朝廷以其识机,拜虎威将军,赐爵始复男。”<sup>⑨</sup>由于北魏前期,国家实行虚封爵制,所

①《魏书》卷三七《司马楚之传》,第855页。

②《魏书》卷四五《韦阙传》,第1013页。

③《魏书》卷三七《司马景之传》,第860页。

④《魏书》卷三九《李宝传》,第886页。

⑤《魏书》卷五八《杨播传》,第1289页。

⑥《北史》卷二七《唐和传》,第990页。

⑦《魏书》卷三七《司马叔璠传》,第961页。

⑧《魏书》卷四三《唐和传》,第963页。

⑨《魏书》卷五二《胡叟传》,第1151页。

以,这些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客受封的爵位,只能是公、侯、伯、子、男五等虚封爵。这种爵位不能领有食邑,只有等级的区分,所以,也就成为受封爵的客的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至孝文帝时,开始改革爵位制度,使虚封与实封爵并行。可是,北魏国家授予客的爵位,大多数还是虚封爵。然而,北魏国家为加重赏赐,对一些客也开始封授实封爵。如席法友“与叔业同谋归国。景明初,拜冠军将军、豫州刺史、苞信县开国伯,食邑千户。”<sup>①</sup>北魏国家为获得客身份者封授爵位,一方面是要通过爵位将他们的政治地位明确化。但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客纳入到北魏的官本位体系中。可以说北魏国家一直将爵位等级与职官品级结合在一起。北魏前期,国家是通过为受封爵者加授将军号体现其在官本位中的位置;北魏后期,由于后《职员令》的推行,实现了爵品与官品的一体化,所以,受封爵者的政治地位,就在国家官本位体系中能够直接体现。而且,北魏国家为了使一些有爵位的客与国家官僚制度结合,还直接将爵位的封授与职官的任命结合在一起。例如,司马天助“自云司马德宗骠骑将军元显之子。刘裕自立,乃来归阙。除平东将军、青徐二州刺史、东海公。”<sup>②</sup>薛真度“从安都来降,为上客。太和初,赐爵河北侯,加安远将军。为镇远将军、平州刺史,假阳平公。”<sup>③</sup>北魏国家采取这种做法,就更加重了获得爵位的客的政治地位。由此可见,北魏国家为客封授爵位是要展现他们在官本位体系中的地位,进而表明他们是进入国家统治层的重要群体,因此,封授客爵位的做法,也就是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很高优待的体现。

北魏国家对客在政治上的优待,是直接任命他们担任职官,并规定适应其地位的起家官。实际上,从道武帝开始,便任用一些客担任职官。如韩愈“皇始初归国,拜宣威将军、骑都尉。”<sup>④</sup>这种做法至北魏后期仍然实行。《魏书·裴叔业传》:“(裴衍)景明二年,始得归国,授通直郎。”说明宣武帝继续任命“归国”的客担任国家职官。而且,北魏国家使“归国”的客能够担任中央职官,如毛修之投诚,太武帝使他任“吴兵将军,领步兵校尉”;<sup>⑤</sup>也能使客担任地方职官,如司马淮“以太常末,率三千余家归国。时太宗在虎牢,授宁远将军、新蔡公、假相州刺史。”<sup>⑥</sup>而且,北魏国家还使一些客能够担任中央和地方的执事官,所以,他们也就可以行使规定的权力。北魏国家采取这种做法,表明一些任职的客在国家统治机构中已经占有不能忽视的重要地位。

北魏国家还为客规定了适应其身份的起家官。《魏书·淳于诞传》:“(淳于诞)后以客例,起家除羽林监。”《魏书·李苗传》:“(李苗)后以客例,除员外散骑侍郎,加襄威将军。”显然,淳于诞、李苗的起家官,都是“以客例”任职的。后《职员令》规定:羽林监,六品下阶;员外散骑侍郎,七品上阶。<sup>⑦</sup>可见,北魏后期,客的起家官品级高、低不同。但最低品级不低于七品上阶。应该说,北魏国家对客起家官的品级采取了特别的规定,这正是“以客例”的意义。《魏书·道武七王·阳平王熙传》:“(元禹)容貌魁伟。起家司空参军。”《魏书·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元顺)起家为给事中。”《魏书·景穆十二王下·南安王桢传》:“(元熙)起家秘书郎。”后《职员令》规定:司空参军,从四品下阶;

①《魏书》卷七一《席法友传》,第1587页。

②《魏书》卷三七《司马天助传》,第862页。

③《魏书》卷六一《薛安都传》,第1355页。

④《魏书》卷四二《韩秀传》,第952—953页。

⑤《魏书》卷四三《毛修之传》,第960页。

⑥《魏书》卷三七《司马景之传》,第860页。

⑦《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99—3000页。

中给事中,从五品下阶;秘书郎,七品下阶。<sup>①</sup>很显然,北魏宗室阶层的起家官品级也高低不同。但从宗室起家官的最低品级看,应该与客阶层大体相同。由于北魏宗室为皇族,因而社会地位很高,这也决定他们的起家官必然是高品级的。由此可以看出,北魏国家对客阶层的起家官品级,实际做了特殊的优待规定。

北魏国家在经济上对客实行特别的物质赏赐。《魏书·杨椿传》:“(杨)椿临行,诫子孙曰: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给田宅,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自尔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绝,禄恤甚多。至于亲姻知故,吉凶之际,必厚加赠襚;来往宾僚,必以酒肉饮食。”可见北魏国家可以依据杨椿家族的上客身份,赐予土地、田宅、奴婢和牲畜。北魏国家赐授薛安都上客后,“又为起第宅,馆宇崇丽,资给甚厚。”<sup>②</sup>这说明,北魏国家对客的物质赏赐是非常丰厚的。然而,北魏国家对客的物质赏赐却没有固定的规定,一般要根据客的具体情况实行奖赏,因而,就使他们获得赏赐的种类和数量存在差别。

当然,北魏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客,还特别给与赐婚的赏赐。前引《魏书·薛野賡传》:“薛野賡,代人也,父达头,自姚萇率部落归国。太祖嘉其忠款,赐爵聊城侯,散员大夫,待以上客之礼,赐妻郑氏。”前人考证,匈奴有薛氏。<sup>③</sup>因此,薛野賡之父达头所率归顺的部落,应该为匈奴的别部。由此可以看出,道武帝时,就开始对少数民族的客实行赐婚的做法。实际上,北魏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客赐婚,并不是特例。《魏书·宿石传》:“天兴二年,文陈父子归阙,太祖嘉之,以宗女妻焉”。文陈为宿石先世。宿氏则为宿勤氏之省称。应该说,宿勤氏一为慕容鲜卑固有之姓氏;另一为匈奴赫连氏所改之宿勤氏。<sup>④</sup>依据文陈父子的活动状况判定,当属匈奴赫连氏。《魏书·高崇传》:“(高崇)父潜,显祖初归国,赐爵开阳男,居辽东,诏以沮渠牧犍女赐潜为妻,封武威公主。”高潜出自辽东高氏。而辽东高氏为高句丽族。<sup>⑤</sup>《魏书·闾大肥传》:“(闾大肥)蠕蠕人也。太祖时,与其弟大涅倍颐率宗族归国。太祖善之,尚华阴公主。”这些记载说明,北魏国家对获得客身份的匈奴赫连部人、高句丽人、蠕蠕人都实行了赐婚的做法。显然,北魏对少数民族的客赐婚的做法,已经比较普遍。北魏国家采取的这种举措,应该是对他们的特殊优待,因而也就有益于保证拓跋鲜卑人与“归国”少数民族人的紧密联系。

综上可见,北魏国家对少数民族人和汉族客身份的确定,采取不同的做法。这种区分的做法,适应了少数民族人和汉族社会组织的不同状况,因而,也就成为确认客身份的行之有效的举措。对少数民族人而言,北魏国家将授客对象确定为归顺部落的首领;而对汉族来说,则为“归国”的社会上层群体。而且,北魏国家对客实行了优待的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客能够受封爵位和受任职官,并且,还能获得物质赏赐。尤其对少数民族人的客,北魏国家实行赐婚的做法,以此表示抚慰和亲善。应该说,北魏国家通过为归顺者赐授客身份做法,而使他们能够继续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这些客也就成为在北方社会中具有影响的特殊上层群体。

①《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99—3001页。

②《魏书》卷六一《薛安都传》,第1354页。

③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④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67页。

⑤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159页。

### 三、赐客制对民族融合的促进

北魏国家实行赐客制的直接目的,是要吸引邻国的少数民族人和汉人“归国”。然而,由于赐客制的实施,却形成了特殊的人口流动,使数量不等的少数民族人和汉人迁入北魏境内,因而,也就影响了北方族群的交往互融,以下分别论列之。

(一)“归国”少数民族人的客融入代人阶层。如前所述,拓跋鲜卑统治者采取吸引周边少数民族人“归国”的做法,从拓跋珪统治代国时已经开始。北魏建国后,道武帝依然推行促进少数民族人“归国”的措施。而且,这一做法为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所延续,成为北魏国家的重要决策。统计《魏书》《北史》帝纪中的记载,从道武帝至宣武帝时,少数民族人因“归国”而迁至北魏境内的次数不下三十余次。例如,天兴二年,“西河胡帅护诺于、丁零帅翟同、蜀帅韩奢,并相率内附。”<sup>①</sup>永兴三年,“河东蜀民黄思、郭综等,率营部七百余家内属。”<sup>②</sup>延和二年“陇西休屠王弘祖率众内属。”<sup>③</sup>延兴元年“大阳蛮酋桓诞率户内属,拜征南将军,封襄阳王。”<sup>④</sup>永平三年,“高车别帅可略汗等率众一千七百内属。”<sup>⑤</sup>而且,迁至北魏境内的少数民族人族属众多,先后有鲜卑(宇文部、慕容部、段部、尉迟部)、南匈奴(西河胡、河西胡、河东胡)、蜀(河东蜀)、高车(敕力键所率部)、羌(冯翊羌)、氐(徐駿奴等所率部)、休屠(金厘所率部)、屠各(上郡屠各、陇西休屠)、吐谷浑(伏念、鶻鳩梨、崇娥等所率部)、蠕蠕(尔绵他拔、乌朱贺颓、库世颓所率部)、蛮(大阳蛮、汉川蛮、光城蛮、襄阳蛮)、高车(可略汗等所率部)归顺北魏。

这些“归国”的少数民族人,一般由酋长率领部落迁至北魏境内。而且,所率部落的人数多少不一,最少的百余人、最多万余人。例如,永兴元年,“蠕蠕斛律宗党吐瓶于等百余人内属。”<sup>⑥</sup>神瑞元年,“河西胡酋刘遮、刘退孤率部落等万余家渡河内属。”<sup>⑦</sup>太平真君五年“晋王伏罗大破慕利延,慕利延走奔白兰。慕利延从弟伏念、长史鶻鳩梨、部大崇娥等率其部一万三千落内附。”<sup>⑧</sup>北魏国家将“归国”少数民族人的部落,一小部分安置在边地郡县。如酋帅强奴子等“各率户归附,于是置广业、固道二郡以居之。”<sup>⑨</sup>但大多数部落被迁至平城京畿。

其实,平城京畿是道武帝开始营建的。天兴元年,道武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sup>⑩</sup>确定了京畿范围,并“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徙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万余口,以充京师。”<sup>⑪</sup>山东六州民吏为归顺的幽州、冀州、平州、营州、兗州、豫州的汉人;徙何,即为慕容鲜卑部人;<sup>⑫</sup>高丽则为高句丽人;杂夷,据前人考证,包括扶余、库莫奚、乌丸等族。<sup>⑬</sup>他们都成为京畿

① 《魏书》卷二《道武帝纪》,第36页。

② 《魏书》卷三《明元帝纪》,第51页。

③ 《魏书》卷四上《太武帝纪上》,第83页。

④ 《魏书》卷七上《孝文帝纪上》,第136页。

⑤ 《魏书》卷八《宣武帝纪》,第209页。

⑥ 《魏书》卷三《明元帝纪》,第91页。

⑦ 《魏书》卷三《明元帝纪》,第54页。

⑧ 《魏书》卷四下《太武帝下》,第98页。

⑨ 《魏书》卷五一《皮豹子传》,第1152—1153页。

⑩ 《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第2850页。

⑪ 《魏书》卷二《道武帝纪》,第32页。

⑫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229页。

⑬ 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第230页

内之民。道武帝在京畿内“置八部帅以监之”。<sup>①</sup>明元帝“泰常二年夏，置六部大人官，有天部，地部，东、西、南、北部，皆以诸公为之。”<sup>②</sup>可见六部大人为道武帝所设八部帅的发展，所以，京畿之民也称“六部民”。<sup>③</sup>其中一部分就是迁移至京畿的少数民族人。而这些少数民族人，都保留原来的部落组织。《魏书·道武帝纪》：“(天赐元年)令各辩宗党，保举才行，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这一记载提到的“诸部”，应该包括“归国”的少数民族人的部落组织。

北魏国家将大部分“归国”少数民族人迁至平城京畿，是由北魏前期的政治形势决定的。也就是要保证京畿的稳定，必须要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魏书·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载元澄上表称：“省非急之作，配以强兵，如此则深根固本、强干弱枝之义也。”《魏书·阳尼传》载阳固上表：“揽权衡，亲宗室，强干弱枝，以立万世之计。”虽然这都是北魏后期国家官员的看法，但却反映“强干弱枝”，一直都是北魏国家的重要决策。实行这种决策的目的，正是要保证京畿有牢固统治的基础，从而能够有力地控制京畿外地区。

北魏国家要保证“强干弱枝”政策的实行，就要使京畿内有人数众多的军队。这些军队被称为“六部兵”，<sup>④</sup>实际主要是由拓跋鲜卑人组成的部落兵。正是由这种部落兵制的特点所决定，北魏国家也从“归国”少数民族人中补充兵员。《魏书·宇文福传》：“高祖指麾将士，敕福领高车羽林五百骑出贼南面，夺其桥道，遏绝归路。”很显然，在国家禁卫军中，就有高车人。前《职员令》中，有高车虎贲将军、高车羽林郎将、高车虎贲司马、高车虎贲将、高车羽林郎、高车虎贲的设置。<sup>⑤</sup>可见高车人也是国家禁军的重要来源。而且，这些居于京畿的“归国”少数民族人，还要为军队服杂役。据前人考证，北魏初期服徭役者是军事统治下的特殊户口，它来源于被征服的诸族俘虏和居民，他们是北魏前期随军服役的基本人口。<sup>⑥</sup>《魏书·高闾传》载高闾上表称：“七月发六部兵六万人，各备戎作之具，敕台北诸屯仓库，随近作米，俱送北镇。”可见六部兵还要从事军备、军粮转运的事务。但这些事务一般是由军队中的少数民族人承担的。由此可见，北魏国家使京畿内“归国”的少数民族人，不仅要从事生产活动，更重要的是，要参与军事活动，因而就与拓跋鲜卑人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归国”少数民族与拓跋鲜卑族在生产、军事活动上的一致性，正是他们能够相互交融的基础。

实际上，从道武帝经营京畿开始，在云代地区，便逐渐形成了特殊的代人阶层。据康乐考证：这个集团形成于四世纪末的平城及临近地区，至五世纪初仍有所扩充。其成员大多数为北亚游牧民族，然而也包括少数的汉人及其它少数民族。……至少包含有鲜卑、匈奴、柔然、乌桓、高车等族。然而不管他们原先来自那个民族，属于那个部落，自拓跋珪定都平城后，他们即以“代人”之身份活跃于北方政治舞台上，云代地区是他们唯一的“家乡”。<sup>⑦</sup>应该说，因为北魏国家使大多数“归国”的少数民族首领参与管理政治、军事事务，因而他们很快便融入了代人阶层。《魏书·费于传》：“费于，代人也。祖峻，仕赫连昌，为宁东将军。泰常末，率众来降，拜龙骧将军，赐爵犍为公。”《魏书·吕洛拔传》：“吕洛拔，

①《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第2850页。

②《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2995页。

③《魏书》卷三《明元帝纪》，第61页。

④《魏书》卷五四《高闾传》，第1201页。

⑤《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93—2991页。

⑥张维训：《北魏前期徭役问题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⑦康乐：《代人集团的形成与发展——拓跋魏的国家基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季刊历史卷·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457页。

代人也。曾祖渴侯,昭成时率户五千归国。祖肥,濮阳太守。父匹知,世祖时,为西部长、荥阳公。”很明显,费于、吕洛拔都是“归国”少数民族的后人。他们因承先世之功绩而成为代人阶层中的一员。此外,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归国”的闾毗、刘罗辰、薛野賡等人,也都转变为代人。这说明,在北魏的代人阶层中,“归国”的少数民族人还是占有相当数量的。

因为代人阶层的主体是拓跋鲜卑勋贵,所以,融入这一阶层的“归国”少数民族首领就需要通晓拓跋鲜卑人的语言,熟悉拓跋鲜卑人的习俗,并且一些人还要与拓跋鲜卑贵族建立姻亲关系。如闾毗“本蠕蠕人,世祖时自其国来降”,<sup>①</sup>刘罗辰“父眷,为北部大人,帅部落归国”,<sup>②</sup>他们都因为是皇帝的外戚而成为代人。因此,尽管代人阶层中的族属不同,可是他们都已经拓跋鲜卑化了。正因如此,随着平城京畿内的“归国”少数民族首领融入代人阶层中,所以也就促使“归国”少数民族人与拓跋鲜卑人逐渐实现同化。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迁都洛阳,又推动了代人与汉人的交融。孝文帝下诏明令“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sup>③</sup>因此,南迁的代人都成了洛阳人,也就是以洛阳为籍贯。例如,山伟“河南洛阳人也,其先代人。”<sup>④</sup>侯刚“河南洛阳人,其先代人也。”<sup>⑤</sup>孝文帝规定这些代人以河南洛阳为籍贯,是要改变少数民族人无籍贯的现状。但更重要的是,要促使代人向汉人世族的转变。而要实现这种转变,为代人确定籍贯是重要的因素。因为对汉族大族而言,实际已经是一个固化的社会阶层。其重要的特征是,汉族大族与其籍贯及出身乡里是密切结合的。如李冲“陇西人,孰煌公宝少子也。”<sup>⑥</sup>郑羲“荥阳开封人,魏将作大匠浑之八世孙也。”<sup>⑦</sup>陇西李氏、荥阳郑氏都是北方的一流大族,所以陇西、荥阳可以明确体现李冲、郑羲的特殊地位。正因如此,北魏的一些汉族官员非常重视其籍贯。例如,受到皇帝宠幸的王睿为表明其身份的高贵,便“自云太原晋阳人也。”<sup>⑧</sup>这些情况说明,孝文帝为南迁代人确定籍贯,也就成为使代人向世族化转变的重要措施。因此,可以说道武帝开始将“归国”的少数民族人首领纳入代人阶层,进而促进了这些少数民族人与拓跋鲜卑人的同化;而孝文帝为南迁代人确定籍贯,则进一步推动代人向世族化的演进。而这一演变的实现,实际都与北魏国家为“归国”少数民族首领赐授客身份的做法有密切关系,因而,可以明确,赐客制的实行,显然是推动这种演进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

(二)“归国”汉人客阶层对北方族群交融的促进。应该说,拓跋珪恢复代国后,就实行招诱邻国汉人归顺鲜卑拓跋部的措施。如汉人张恂“随兄充归国,参代王军事。……太祖深器异,厚加礼焉。”<sup>⑨</sup>北魏建国后,由于大力推行赐客制,因而对邻国汉人归顺北魏,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所以,在太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多有在后燕、后秦、北凉、刘宋等政权任职的汉人官员归顺北魏。例如,封懿“仕慕

①《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闾毗传》,第1916页。

②《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上·刘罗辰传》,第1613页。

③《魏书》卷七上《孝文帝纪》,第178页。

④《魏书》卷八一《山伟传》,第1792页。

⑤《魏书》卷九三《恩幸·侯刚传》,第2004页。

⑥《魏书》卷五三《李冲传》,第1179页。

⑦《魏书》卷五六《郑羲传》,第1237页。

⑧《魏书》卷九三《恩幸·王睿传》,第1988页。

⑨《魏书》卷八八《良吏·张恂传》,第1900页。

容宝,位至中书令、民部尚书。宝败,归阙。”<sup>①</sup>刁雍“泰常二年,姚泓灭,与司马休之等归国。”<sup>②</sup>太武帝统一北方后,“归国”汉人的数量不断增多,而且,以南朝汉人居多。《魏书·薛安都传》:“(薛)安都以事窘归国,……皇兴二年,与毕众敬朝于京师。”薛安都在刘宋朝任徐州刺史;毕众敬则任泰山太守、冗从仆射。他们都在献文帝时归顺北魏。统计《魏书》《北史》记载,从拓跋珪开始,至北魏后期归顺北魏的上层汉人有封懿、司马准、司马灵寿、司马道寿、刁雍、王慧龙、袁式、刘朗、李思穆、薛辩、韩炳、尧暄、韦欣宗、辛绍先、胡叟、宋钦、宋舒、杨珍、薛安都、毕众敬、张谠、张敬伯、张幸、刘藻、李嶷、裴叔业、裴粲、裴衍、夏侯道迁、席法友、淳于诞、高澄、梁劭、温子升、张恂、张充、王继宗、邓学、华候、陈仲儒、公孙表、李神俊,共计41人。不过,这些“归国”的上层汉人,只是见于文献记载者,实际人数要远远多于统计数字。

如前所述,北魏国家对“归国”的上层汉人都要赐授客身份,并将其中一部分人吸纳进国家官僚机构中。可以说,从道武帝开始,至北魏后期,“归国”上层汉人,大多数都受到国家的重用。统计《魏书》《北史》记载,从北魏建国至北魏后期,“归国”上层汉人担任的中央职官有:给事黄门侍郎、步兵校尉、南部主书、尚书郎、散骑常侍等。担任的地方职官则有:相州刺史、青州刺史、雍州刺史、豫州刺史、洛城镇将、彭城内史、上谷太守、济阳太守等。而且,一些“归国”汉人任职后,可以参与国家重要事务。如张恂归国后,“皇始初,拜中书侍郎,帷幄密谋,颇预参议。”<sup>③</sup>并且,这些担任官职的“归国”汉人,大多数人都忠于职守。如汉人赵柔“沮渠牧犍时,为金部郎。世祖平凉州,内徙京师。高宗践阼,拜为著作郎。后以历效有绩,出为河内太守,甚著仁惠。”<sup>④</sup>应该说,北魏国家任用“归国”汉人具有重要政治目的。也就是要使“归国”汉人明确拓跋鲜卑人所建政权具有的正统性,并展示国家的用人政策所具有的包容性,因而,在这种正统观的支配下,就使进入北魏官僚机构的“归国”汉人可以完全认同并贯彻拓跋鲜卑统治者的施政方针,而且,还能够与在官僚机构中占主导地位的代人官员密切合作。可以说,这种合作正是“归国”汉人与代人交往互融的基础。正因如此,“归国”上层汉人在为北魏政权服务的过程中,也就与北方族群形成共同的文化认知。例如,阴仲达“少以文学知名。世祖平凉州,内徙代都。司徒崔浩启仲达与段承根云,二人俱凉土才华,同修国史。除秘书著作郎。”<sup>⑤</sup>江强“太延五年,凉州平,内徙代京。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sup>⑥</sup>陈仲儒“自江南归国,颇闲乐事,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sup>⑦</sup>而“归国”汉人与北方族群文化认知的趋同,也就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交往互融。因此,对“归国”上层汉人而言,他们获得的“客”身份,由此出现改变。《魏书·唐和传》:“(唐玄达)与叔父和归阙,具为上客。拜安西将军、晋昌公。……子崇,字继祖,袭爵。盛乐太守。崇弟兴业,定阳、阐熙二郡太守。”《魏书·房发寿传》:“(房)法寿、崇吉等与崔道固、刘休宾俱至京师。以法寿为上客。……子伯祖,袭,例降为伯。历齐郡内史。……子翼,袭。宣威将军、大城戍主。永安中,青州太傅开府从事中郎。”《魏书·毕众敬传》:“(毕元宾)与父同建勋

①《魏书》卷三二《封懿传》,第760页。

②《魏书》卷三八《刁雍传》,第865页。

③《魏书》卷八八《良吏·张恂传》,第1900页。

④《魏书》卷五二《赵柔传》,第1162页。

⑤《魏书》卷五二《阴仲达传》,第1163页。

⑥《魏书》卷九一《术艺·江式传》,第1960页。

⑦《魏书》卷一〇九《乐志》,第2833页。

诚。及至京师,俱为上客……子义允,袭祖爵东平公,例降为侯。陵江将军、给事中。卒。子僧安,袭。”这些记载说明,北魏国家使获得客身份者的后代只继承他们的爵位,并没有承袭他们的客身份。可见,北魏实行的赐客制,只是及身而止的规定,因而采取以“归国”汉人上层为“客”的做法,也就是赐授一种过渡性的身份。由此可以看出,汉人上层“归国”后获得客身份,只是认同拓跋鲜卑人统治具有正统性的象征,一旦与北魏境内族群相互交融,原来的客身份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归国”汉人客身份的消失,实际正是与北方族群实现交融的重要表现。由此来看,北魏国家实行的赐客制,对消除“归国”汉人与北方族群的隔阂所起到的作用,显然是不能低估的。换言之,北魏国家实行赐授“归国”汉人客身份的举措,实际也就成为推动北方民族交融的重要助力。

概而言之,从拓跋珪开始实行招诱外族人为国家政权服务的政策,北魏后世皇帝也不断推行这一决策,从而使“归国”的少数民族首领与“归国”汉人上层,都成为国家的“客”。而且,北魏国家使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客”融入代人阶层;使多数汉人的“客”可以被纳入国家官僚机构,因而也就使这些“客”成为认同北魏统治的正统性、并服从其统治的特殊阶层。由于客阶层在“归国”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也就促使族群区分的观念逐渐泯灭。并且,随着孝文帝推行汉化措施,使代人与汉人的交融不断深化,从而在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取向上日趋一致。应该说,北魏实行的赐客制对促进北方民族的交融,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推动的作用。

责任编辑: 侯德彤

## The Client-granting System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Its Influence on Ethnic Blending

Zhang Hequan

Institute of Ancient Book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When Tuoba Gui restored the state of Dai, the practice of making the subservient obtain the client status was implemente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Daowu Emperor Tuoba Gui institutionalized the rule of granting clients. The Northern Wei State enabled the "returned" minority leaders to become clients, and for the "returned" Han people, only the upper class could obtain the "client" status. The Northern Wei State implemente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measures for clients so that clients of minority ethnic groups and Han people could receive titles and official positions, and they could also obtain material rewards. Especially for the minority clients, the Northern Wei State implemented the practice of granting marriages. Becau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lient-granting system in Northern Wei, the client class and Tuoba Xianbei rulers established a firm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erors and subjects, and occupied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returned" group, thu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returned" group was gradually eliminated. Moreover,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Emperor Xiaowen's sinicization measures,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people of Dai and Han people continued to deepen, leading to a convergenc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s. Therefore, the system of granting clients implemented by Northern Wei undoubtedly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and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northern ethnic groups.

**Key words:** Northern Wei Dynasty; client-granting system; ethnic group; blending; influence

# 周代拜赐礼仪研究三题

于少飞<sup>1</sup> 马金亮<sup>2</sup>

1. 鲁东大学 文学院; 2. 鲁东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山东 烟台 264025

**摘要:** 周代拜赐礼仪包含受赐者的施拜情况和施拜后的相应礼节等, 是君臣关系和尊卑意识在礼仪领域中的重要反映。西周赏赐铭文记载了一些看似有别于“拜稽首”的“变例”。实际上, “拜手页手”“拜手稽手”及单言“稽首”, 皆与“拜稽首”同实异名, 而“拜手”主要用于受赐者答谢“右者”。关于受赐者行拜礼之后的“受令册佩以出”, “佩”当视作名词, 指代命服。铭文载妇人拜谢天后行稽首礼, 而《礼记·少仪》记妇人遇君赐当肃拜。由于妇人发饰繁重而难以叩头至地, 故无稽首之拜, 仅有用于吉事的“极地”(拜手至地)重拜。铭文盖套用男子拜赐礼用语而作模糊处理, 《少仪》所载盖为晚周礼家之说, 皆与西周妇人拜礼实情不符。

**关键词:** 周代; 拜赐; 拜稽首; 佩以出; 妇人拜赐

**中图分类号:** K877.3; K2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2-0024-11

西周铭文和传世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周王室赏赐活动的记载, 这些记载是周代赏赐制度的直接反映。赏赐制度是先秦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 它与当时的封建制度、册命制度、祭祀制度和外交制度等密切相关, 是周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sup>①</sup>。周代拜赐礼仪是与赏赐制度密切配合的一套礼仪制度, 它包括受赐者在受赐现场的施拜情况和施拜后的相关礼节等内容, 反映出社会秩序中的君臣关系和尊卑意识。目前学术界关于周代拜赐礼仪已取得不少成果<sup>②</sup>, 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 对周代拜赐礼仪进行再讨论。不当之处, 敬请方家指正。

## 一、周代拜赐礼仪的“变例”

据胡新生先生统计, 《殷周金文集成》所收西周金文中涉及拜礼者约为 115 例(铭文重复者不计),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三国经学佚籍整理与研究”(23YJC720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于少飞, 女, 山东莱阳人, 文学博士, 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儒家经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马金亮, 男,

山东沂水人, 鲁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礼学文献整理与思想研究。

① 关于周代赏赐问题, 清人朱为弼曾根据典籍和金文材料撰成《补周王锡命礼》等 7 篇以存古礼, 详见朱为弼:《蕉声馆文集》卷一, 民国八年(1919 年)朱景迈刊本,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01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另可参阅齐思和:《周代锡命礼考》, 《中国史探研》,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年;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6 年; 张懋容:《金文所见西周召赐制度考》, 《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等。

② 详见胡新生:《周代拜礼的演进》, 《文史哲》2011 年第 3 期; [捷] 石安瑞:《由铜器铭文的编纂角度看西周金文中“拜手稽首”的性质》, 《青铜器与金文》第 1 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 朱凤瀚:《也论西周金文中的“拜手稽首”》, 《青铜器与金文》第 3 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 潘玉坤:《金文语法札记五则》, 《中国文字研究》第 5 辑,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杨明月:《颂器铭文与西周册命礼新探——“受令册佩以出”再释》, 《中华文化论坛》2015 年第 2 期; 黄益飞:《金文所见拜礼与〈周礼〉九拜》, 《南方文物》2016 年第 3 期等。

其中常见的“拜稽首”87例,“拜手稽首”19例,“拜稽”2例,总计108例;余外“稽首”4例,“拜手”1例,“三拜稽首”1例,铭文残泐、“首”前文字不明者1例<sup>①</sup>。学界多认同孔颖达“凡为稽首者,皆先为拜手,乃成稽首,故《尚书》‘拜手稽首’连言之”<sup>②</sup>的观点,视“拜稽首”和“拜手稽首”为一礼。“拜稽首”或“拜手稽首”即是西周时期通行的拜赐之礼,如《集成》04241 井侯簋铭文所记“(井)拜稽首,鲁天子”,《集成》04225 无翼簋铭文所记“无翼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鲁休令(命)”等等。西周传世文献有关拜赐之礼的记载和金文大致相合,如《诗经·大雅·江汉》记召虎受周王册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综此可知,“拜稽首”(“拜手稽首”)是当时通行的最高礼节,是西周拜赐礼仪中的“常例”<sup>③</sup>。不过西周铭文中也存在一些有关拜赐礼仪的“特殊”记载,如“拜手页手”“拜手稽手”及单言“拜手”“稽首”等,这些可视为拜赐礼仪中的“变例”。这些“变例”到底是一种误写,还是与“拜稽首”存在礼敬程度的区别?下文分两部分论述。

### (一)“拜手页手”等变例

今存西周铭文中的特殊拜赐之礼,凡4例:

《集成》04327 卯簋铭文:“卯拜手页手,敢对扬嬖白休。”

《集成》04328 不嬖簋铭文:“不嬖拜稽手休。”

《集成》04207 遷簋铭文:“遷拜稽首敢对扬穆王休。”

昊生钟铭文:“昊生拜稽手敢对扬王休。”<sup>④</sup>

关于“拜手页手”“拜手稽手”“拜稽手”“拜稽首”,学者们大都认为是“拜稽首”和“拜手稽首”的误写。对此,陈梦家先生认为“拜稽首”即“拜手稽首”,但“拜稽手”“拜稽手”皆拜手至地,等同于“拜手”,所表达的礼节要轻于“拜稽首”。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据陈先生考证,卯簋铭文中的授赐者“荣白”是周的同姓卿士,不嬖簋铭文中的授赐者“白氏”是秦庄公,这两则确实是答侯伯之赐。但据西周赏赐铭文可知,诸侯公室册命赏赐臣工的情形与周王室册命赏赐诸侯及其臣工的情形是可以比拟的,即如陈先生在解读卯簋铭文时所说:“此为荣白廷见卯而下命书的记录,廷见时有右者荣季,于受命者任以职事,且重加赏锡,与王者廷见之礼相若。”<sup>⑤</sup>再如师叔簋铭文(《集成》04311)所载“白龢父若曰”,与“王若曰”的形式相同,且内容包含职务任命、赏赐之物以及“敬夙夜用事”等,与周王册命铭文所含内容基本一致。准此,臣拜侯伯赐与拜天子赐所行之礼理应是相同的。所以上述铭文中的“拜手页手”“拜稽手”都是“拜稽首”,并非因为所拜对象为侯伯,所以才仅拜手至地而头不至地。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又,为方便起见,下文简称此书为“《集成》”,并将其中的“𠙴”皆录作“稽”,“殷”皆录作“簋”。

②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二,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794页。

③ 西周铭文中的“拜稽首”多为臣拜天子或诸侯、诸侯拜天子,即孔颖达所谓“臣拜君”之礼。还有一处“拜稽首”用于谢罪的例子,即召鼎铭文(《集成》02838)记匡偷盗召禾,被召诉至东宫,匡最后稽首以谢罪。孙诒让《周礼正义》释此“稽首”为谢罪之礼,黄益飞认为此即“九拜”之“顿首”礼。此外,传世文献如《尚书》中亦有王与臣互拜稽首的例子,这是因为臣(如周公等人)地位尊贵,也属特例。关于东周时期流行的拜礼,胡新生先生认为春秋时期以“再拜稽首”为最高拜礼,至春秋后期又出现了行两次“再拜稽首”的“升成拜”等复杂形式。

④ 转引自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95页。

⑤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224、223、319、223页。

## (二) “拜手”与“稽首”

西周铭文中唯一1例“拜手”的例子——柞钟铭文(《集成》00133-00139),颇为特别。其铭文曰:

唯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仲大(太)师右(佑)柞,柞赐载、朱黄(衡)、鑑(銮),嗣(司)五邑甸人事,柞拜手对扬仲大(太)师休,用乍(作)大鑑(林)钟。

作器者柞受王册命时,仲大师为其“右”,柞于是作钟以记此事。陈梦家先生也认为此“拜手”是受命者对所命侯伯而言,其礼也轻于稽首。

“右”在册命仪式中主要负责引导、陪同和延进受册命者,可理解为主持册命礼仪的人。据杨宽先生考证,“右”都是由公卿大臣担任<sup>①</sup>,所以柞向仲大师行拜手之礼是合理的。《仪礼·觐礼》《聘礼》载王派卿大夫慰劳或赏赐他国使者时,宾与傧之间也仅行“再拜”之礼<sup>②</sup>。可知铭文中的“拜手”实际上并非拜赐之礼,而是受赐者以拜手礼拜谢傧者。所以这里并非如陈梦家先生所说,因臣对侯伯行礼则仅拜手而不稽首。

西周铭文中尚有5例单言“稽首”的例子:

《集成》02833 禹鼎铭文:“禹稽首对扬武公不显耿光。”

《集成》04258 害簋铭文:“害稽首,对扬王休命。”

《集成》04321 虢簋铭文:“虢稽首,对扬天子休令。”

《集成》04342 师虢簋铭文:“虢稽首,敢对扬天子休。”

《集成》04213 殷敦簋盖铭文:“殷敦用执、用璧,用稽首其右子都、史孟。”

如前所述,孔颖达认为“凡为稽首者,皆先为拜手,乃成稽首”,即将“稽首”“拜稽首”和“拜手稽首”三者视为一礼。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列出3则单言“稽首”的例子,即害簋、禹鼎、师虢簋铭文,并认为:“称‘稽首’的三器,其中禹鼎是对侯伯而言,则稽首而不拜也是轻于拜手稽首。”<sup>③</sup>即认为单言“稽首”所表达的礼节也要轻于“拜手稽首”。胡新生先生也持这一观点,并举例云:

殷敦簋盖(《集成》04213)所说“稽首”系器主对“史孟”所施,不是施于天子,证明“稽首”与“拜手稽首”确有礼敬程度的不同。另外三条见于害簋(《集成》04258)、虢簋(《集成》04321)和师虢簋(《集成》04342),所说“稽首”皆施于天子。后两器铭文体例与常规不同,器主又非周之同姓,所言“稽首”似亦不合常例;害簋记天子册命而单称“稽首”,更为特殊。这三器铭文似皆出自撰文较为随意的史官之手。<sup>④</sup>

① 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3页。

② 段玉裁即认为,宾与傧互行再拜稽首之礼都是因为尊国宾、尊君客:“《聘礼》郊劳,宾用束锦傧劳者,劳者再拜稽首受,注云:尊国宾也。又,受饔饩傧大夫,大夫北面当楣再拜稽首受币。注云:尊君客也。下文皆云宾再拜稽首送币,又下文大夫饩宾,宾再拜稽首受。是亦犹上文尊国宾、尊君客之再拜稽首也。”详见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卷六《释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9页。但笔者认为,宾与傧互赠礼物,皆是代表本国国君所赠,所以受赠时,双方皆行再拜稽首之礼,此拜实际上是拜君之赐。经文中记载单独迎宾或送傧时,双方仅行“再拜”之礼而不稽首,这是符合宾与傧者身份的拜礼,也即段玉裁所谓“凡致者,拜手”。

③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224页。

④ 详见胡新生:《周代拜礼的演进》,《文史哲》2011年第3期。

胡先生认为殿赦簋盖铭文中的“稽首”并非施于天子,其礼当轻于“拜稽首”,而害簋、訇簋和师訇簋铭文中的“稽首”虽施于天子,但不合常理,应是撰写者失误所致。但笔者认为“稽首”即“拜稽首”,二者在礼敬程度上并无区别。理由有两点:

第一,殿赦簋盖铭文载殿赦受子牙赐金十钩,殿赦“稽首其右(佑)子都、史孟”,即受赐者拜谢傧者,与上述作“拜手”于仲大师的情况基本一致<sup>①</sup>,则殿赦拜谢子都和史孟本不应行稽首之礼,而应行“拜手”之礼。

第二,“稽首”之仪为拜头至地,礼非轻,传世文献中亦未有“稽首”施于礼轻的情况。段玉裁释《尚书正义》“凡为稽首者,皆先为拜手,乃后为稽首”一语时,也认为经文中虽单言“稽首”,但其前也必有“拜手”的动作<sup>②</sup>。胡先生在《周代拜礼的演进》一文中举《孟子·万章下》中子思“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一事为例,认为子思先“稽首”后“再拜”,足证稽首本身不可能包含拜手。但笔者认为,该句下文孟子答万章“国君养贤之法”时云:“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sup>③</sup>即与前述子思之礼相对举,可知子思“稽首再拜而不受”其实即是“再拜稽首而不受”。而况“稽首”已是拜头至地,表示“服之甚也”<sup>④</sup>,何以“稽首”之后再行“拜手”之礼?黄益飞还举尚孟铭文(《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06229)中既载“尚拜稽首”<sup>⑤</sup>,又举“(尚)既稽首”的例子,以证“稽首”即“拜稽首”。所言甚是。

基于以上讨论,笔者认为殿赦簋盖铭文中的“稽首”应该是“拜手”之误用,西周时期的“稽首”“拜稽首”和“拜手稽首”其实是一礼,陈梦家先生所举禹鼎铭文中稽首对武公,胡新生先生所举害簋、訇簋和师訇簋铭文中稽首对天子,都是合乎礼仪的。关于胡先生所言訇簋和师訇簋铭文体例特殊的情况,笔者搜集到西周铭文中类似于这两则铭文,即在文末交代时间或者事件发生背景的还有大师虡簋铭文(《集成》04251—04252),亦言“虡拜稽首”对扬天子之休。此外,虢季子白盘铭文(《集成》10173)更在开头便云“惟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作)宝盘”,然后述铸器内容,最后云“子子孙孙,万年无疆”。这些都说明铭文在铸刻之时可能会因某些原因而作内容顺序的调整,但应该不会直接影响到具体礼节的记载,所以这两则铭文应该不是撰文者随意所致。

## 二、“受令册佩以出”新释

西周铭文中记载的受命仪式大致包含拜手稽首、受令册佩以出、反入堇章、对扬王休诸项。这其中,经学者考证确定是拜赐后行为的是“受令册佩以出”和“反入堇章”,尽管大多数铭文也并未记载这两种拜后之礼。

“反入堇章”于西周铭文中仅3见,即颂鼎铭文(《集成》00827—00829)、善夫山鼎铭文(《集成》

① 吴雪飞举《仪礼·觐礼》王派使者迎宾、宾“再拜稽首”受命以及霸伯孟铭文中霸伯拜稽首受命的记录,来证明殿赦簋盖铭文中的“稽首”即相见时所行拜稽首之礼。详见吴雪飞:《殿赦簋盖铭文与周代聘礼》,《陕西历史博物馆论丛》第25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② 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卷六,第137—138页。

③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十,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45页。

④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二十六,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57页。

⑤ 吴镇峰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00825)和四十三年速鼎铭文(《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sup>①</sup>0747—0756),而且皆是紧接在“受令册佩以出”之后出现。关于其含义,学界多依据《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sup>②</sup>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觐”<sup>③</sup>的记载,推断“入”当读其本意,“董”为“觐”,“章”为“璋”,整句话理解为:王臣受册佩以出之后,以璋入觐,以表明归属<sup>④</sup>。

关于“受令册佩以出”的句读和释义,学界历来观点不一。据笔者所能搜集到的铭文信息,明确记载受令册仪式的仅有4例:

颂鼎铭文:受令册佩以出

善夫山鼎铭文:受册佩以出

四十二年速鼎铭文:受册釐以出(《新收》0745—0746)

四十三年速鼎铭文:受册佩以出

传世文献中亦有类似记载,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述晋侯受天子赐命后“受策以出”,昭公三年载晋侯册命赏赐郑伯,“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等等。这说明周代册命赏赐仪式之后,受赐者拜稽首之后确实有“受册”的行为。

学界关于“受令册佩以出”的争议其实主要在于“佩”字的含义。笔者结合前述潘玉坤先生《金文语法札记五则》一文的总结和近几年新出的成果,归纳为以下3种观点。

1.“受命,册佩以出。”于省吾先生在《双剑謬吉金文选》中如此断句,并谓“册”之形“盖如佩玉之有组绶,故得佩以出入也”<sup>⑤</sup>。马承源先生在《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中也如此断句,认为“佩”当作动词讲,“册佩”意为带着书有王命的简册<sup>⑥</sup>。

2.“受令册佩,以出。”郭沫若先生《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认为“受令册佩”当一读,“册”与“佩”皆为名词,佩指所赐之朱珩<sup>⑦</sup>。杨明《颂器铭文与西周册命礼新探——“受令册佩以出”再释》一文断为“受令、佩以出”,实际上与“受令册佩,以出”的结构是一样的,但他释“佩”为王所赐命服。

3.“受令册,佩以出。”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如此断句,释“佩”为动词,云“令册乃可以佩戴的竹简”<sup>⑧</sup>,潘玉坤先生赞同此说。朱凤瀚先生在《也论西周金文中的“拜手稽首”》中断句同,但释“佩以出”为佩戴着王所赐礼服。

以上观点皆释“命”“令”“册”为“命书”,但对于“佩”的理解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作名词,指代朱黄(珩)或命服;二是作动词,意为佩戴,或佩戴命服,或佩戴命书。究竟哪一种观点最合理,笔

① 钟柏生等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下文简称“《新收》”。

②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卷十八,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70页。

③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十六,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26页。

④ 陈梦家、张光裕、陈汉平诸位先生皆持此观点。郭沫若先生认为“反入董章”当读作“返纳瑾璋”,虽然字词释义不同,但整体意思也是说臣受命书以出之后,返入进献瑾璋。

⑤ 于省吾:《双剑謬吉金文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40页。

⑥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03页。又,秦永龙先生虽断为“受令册佩以出”,但认为“册”“佩”皆为动词,释为受册命之后“捧册佩珩”以出,其实和这种断法是相同的。详见秦永龙编著:《西周金文选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⑦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⑧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408页。

者认为应该弄明白这句话在铭文中所使用的具体语境和“佩”字的含义。

### (一) “受令册佩以出”在铭文中出现的语境

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将王册命臣下的情况分为王亲命和史官代宣王命两种情况<sup>①</sup>，以下将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臣受王册命时的受册之礼：

1. 王亲命臣下。这种册命方式有史懋壶铭文(《集成》09714)“王才镐京湿宫亲令史懋”类的“亲令/命”和君夫簋盖铭文(《集成》04178)“王命君夫曰”类的“王命/令曰”等诸多形式。按照常理推断，王亲命下属一般为口头册命，未必会有册命文书。对照这类铭文，也确实没有发现受赐者受王亲赐命而“受册以出”的描述。

2. 史官代宣王命。这种册命方式有豆闭簋铭文(《集成》04276)“王乎内史册命豆闭，王曰”和利鼎铭文(《集成》02804)“王乎(呼)乍(作)命内史册命利曰”等形式。上文提到的善夫山鼎和颂鼎铭文都属于这种情况：

王乎史奉册令(命)山，王曰：“命女(汝)官嗣(司)欵(饮)献人于冕，用乍(作)宪司贮，毋敢不善。赐女(汝)玄衣、黹屯(纯)、赤芾、朱黄(衡)、縑(銮)旂。”山拜稽首，受册佩以出，反入董章。  
(善夫山鼎铭文)

尹氏受(授)王令(命)书，王乎史虢生(甥)册令(命)颂。王曰：“颂，令女(汝)嗣(司)成周贮(廬)廿家，监嗣(司)新造，贮(廬)用宫御。赐女(汝)玄衣、黹屯(纯)、赤芾、朱黄(衡)、縑(銮)旂、攸(鑑)勒，用事。”颂拜稽首，受令册佩以出，反入董章。(颂鼎铭文)

善夫山鼎铭文载“王乎史奉册命山”，后面的“王曰”及其后之语皆为“册”之内容。相比之下，颂鼎铭文多了一句“尹氏授王命书”，可知参与册命的有两种史官，一种为书写命书之史官(即尹氏)，一种为宣读命书之史官(即史虢)。册命时，由书写命书之人将命书授于王，王呼宣读命书之人宣读册命内容，这在很多铭文中都有体现。准此，史官代宣王命的情况下一定有册命书，受赐者一定要“受书以出”，多数册命赏赐铭文只是省略这一环节，而并非没有此礼。

潘玉坤先生以《左传》两处“受策以出”并未言及“佩”，得出“佩”即与命书相关的观点，并认为“佩以出”即佩带命书，善夫山鼎铭文中的“受册佩以出”与《左传》的“受策以出”虽然都是记录受册命者接受册命书从现场退出，但差别在于前者可分解为“受册，佩之以出”。然而关于“佩以出”的记载，除了善夫山鼎和颂鼎铭文，还有四十三年速鼎铭文中的“受册佩以出”：

史彊受王令(命)书，王乎(呼)尹氏册令(命)速。……王曰：“速，易(赐)女(汝)矩鬯一卣、玄袞衣、赤舄、駒车……，敬夙夕毋灋(废)朕令(命)。速拜稽首，受册佩以出，反入董圭。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三则铭文既记载了王之册命，又详细记载了王所赐命服。相比之下，四十二年

<sup>①</sup>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400页。

速鼎铭文载王册命及其他赏赐,未及命服,速便“受册釐以出”<sup>①</sup>,未言“佩以出”。

尽管与铭文中言及命书却不一定有“受册以出”的记载一样,大多数记载王赐命服,如走马休盘(《集成》10170)、七年趙曹鼎(《集成》02783)等铭文中并没有“佩以出”的记载。但通过上面的比较分析,笔者发现两个问题:一是在史官代宣王命的情况下,若有赐服,则记录或不记录“受册佩以出”;二是若无赐服,则不记录或仅记录“受册以出”。如此这几则铭文中“佩以出”的记载并非巧合,而是与命服的赏赐直接相关,则基本上可以否定以“佩”为带着命书离开的观点。

## (二)“佩”的含义

探讨“佩”与命服的关系,必须理清“佩”字的基本含义。《说文解字》云:“佩,大带佩也,从人凡巾。佩必有巾,故从巾,巾谓之饰。”段玉裁注曰:“‘大带佩’者,谓佩必系于大带也。”<sup>②</sup>则“大带佩”即“系于大带之佩”的意思。《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在解释“佩”所列的第一个义项即“古时系在衣带上的装饰品”。而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仅释“佩”为“大带也”,无“佩”字<sup>③</sup>。现存甲骨文中未见“佩”字,金文有数例,如癞簋铭文(《集成》04170)有“易(赐)佩”之语,有学者指出“佩本为大带之名”<sup>④</sup>。潘玉坤先生据此认为《说文》“大带佩也”中的“佩”极有可能是衍文,所言甚是。则“佩”的本义即大带,郭沫若先生所释的“朱珩”以及朱凤瀚先生所释的“礼服”皆从此说演申而来,而动词用法“佩带”则是“佩”字的引申之义,《诗经·卫风·芄兰》“芄兰之支,童子佩觿”即为其例<sup>⑤</sup>。

虽然“佩”既可作名词,也可作动词,但西周铭文和传世文献都没有记载受赐者接受命服便立刻服用的情况。《礼记·玉藻》云:“君赐车马,乘以拜,赐衣服,服以拜。赐,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孔颖达疏曰:“谓受君赐,赐至则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赐,往至君所又拜,敬重君恩故也。”<sup>⑥</sup>以次日服命服拜至君所来解释经文中的“服以拜”,可见孔氏也认为君所赐命服是不可当日即服的。以此推知,即使是朱黄(珩)也不可立即佩戴,所以“佩”不应作动词讲。

关于“佩”作名词讲,潘玉坤先生指出,若“受册佩”为读,“佩”就须是名词,而其确切涵义却不得而知,所以“册”“佩”并列并不合适。杨明明在《颂器铭文与西周册命礼新探——“受令册佩以出”再释》中反对这种观点,并以《仪礼·觐礼》“天子赐侯氏车服”中侯氏的受赐之礼为例,再结合清人胡培翬《仪礼正义》“服盛于箧,故云箧服”<sup>⑦</sup>的观点,指出“册命完毕,太史将王之命书放在命服之上,诸侯拜受盛有命书及命服的箱子”,所以“佩”是名词,指代王赐命服。

观《觐礼》所载侯氏受王赐车服时的拜赐之礼:

①“釐”字在四十二年速鼎铭文中共出现4次:1.尹氏受王釐书;2.王乎史減册釐速;3.朕亲令釐女矩鬯一卣;4.速拜稽首,受册釐以出。明显可以看出,釐即是“赐”,第2和3作动词讲,意为赏赐,第1和4作名词讲,意为赏赐之物。又,《说文解字》释“賚”为赐,杨明明认为“釐”即是“賚”。

②许慎撰,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642页。

③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1页。释慧琳《一切经音义》、[日]释法空《篆隶万象名义》等也作如此解释。

④周法高主编:《金文话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4989页。

⑤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卷三,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26页。

⑥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三〇,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83页。

⑦胡培翬撰,段熙仲点校:《仪礼正义》卷二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304页。

路先设西上,路下四亚之,重赐无数,在车南。诸公奉筐服,加命书于其上,升自西阶,东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两阶之间,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书于服上,侯氏受。<sup>①</sup>

授命前诸公奉筐服,并将命书置于其上,大史宣读命书之后,亦将命书置于筐服之上,可知此处侯氏所受确实是“命书”加“命服”。在这种情况下,杨明明所理解的“‘令册’与‘佩’皆为‘受’之宾语,命书及命服皆为当面授予,退出之后领取其他赐品”是合理的。如此则“受册令佩以出”即受王之命书与所赐命服而出。

但必须清楚的是,命服虽然重要,但大多数记载赐服的西周铭文并未言及受赐者“受佩以出”,传世文献中也仅此1例强调史官将命书放置于命服之上的记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天子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册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等,晋侯三辞后从命,受策以出。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谓此大辂之服为“金路”“哀服”,戎辂之服为“革路”“韦弁服”<sup>②</sup>,即相当于王赐侯氏之车服,“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即相当于《觐礼》中的“诸公”,所以这一册命赏赐仪式与《觐礼》所载基本相同。但《左传》仅言晋侯“受策以出”,可见即使有命服之赐,也不一定如《觐礼》所载,受赐者会当面受“服”,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仅受“命书”,命服与其他赏赐一起受。这应是铭文中有时言及“受令册”却不言“受佩”的原因所在。

### 三、妇人拜赐礼仪刍议

现存西周铭文中有两件名为“尹姞鬲”的铭文(《集成》00754,00755)颇为特别,记载了天后赏赐妇人,妇人拜谢天后赏赐的情况<sup>③</sup>。这两器同铭,曰:

穆公乍(作)尹姞宗室于繇林,唯六月既生霸乙卯,休天君弗望(忘)穆公圣彝明胤事先王,各于尹姞宗室繇林,君蔑尹姞历,赐玉五品、马四匹,拜稽首,对扬天君休,用乍(作)宝鼎。

记载穆公为其妻尹姞建造宗室,天君不忘穆公曾服事先王的功劳,亲临尹姞的宗室,赐其玉和马。此外,公姞鬲铭文(《集成》00753)曰:

唯十又二月既生霸,子仲渔曼池,天君蔑公姞历,事(使)赐公姞鱼三百,拜稽首,对扬天君休,用乍(作)鼎。

① 郑玄注,贾公彥疏:《仪礼注疏》卷二十七,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091—1092页。

② 沈钦韩撰,郝兆宽、陈屹点校:《春秋左氏传补注》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61页。

③ 西周铭文中记载了很多王后赏赐臣下贵族及其妻子的情况。谢乃和先生将金文所载西周诸王后的主要事迹按照人物进行了分类,十分详尽。详可参阅谢乃和:《金文中所见西周王后事迹考》,《华夏考古》2008年第3期。

记述子仲渔于池,天君命他以三百鱼赐给公姞。陈梦家先生考证尹姞和公姞为一人,此天君应为康王王后<sup>①</sup>,所论合理。尹姞作为穆公之妻,即为命妇,依此铭文所记,王后赏赐命妇,命妇拜赐时也要行稽首之礼。

但传世文献所见妇人拜法名目,于《周礼》《礼记》中仅有“肃拜”“手拜”“稽颡”,《仪礼·士昏礼》中有一处“扢地”<sup>②</sup>之拜,《左传·文公七年》中有一处“顿首”<sup>③</sup>之拜,其余皆单言“拜”,而古今学者多认为此“拜”皆为“肃拜”。总而言之,传世文献中并无妇人“拜稽首”的记载。且《礼记·少仪》中明确记载:“妇人吉拜,虽有君赐,肃拜。”孔颖达释云:“此一节论妇人拜仪。妇人吉礼不手拜,但肃拜。肃拜如今妇人拜也。吉事及君赐悉然也。”<sup>④</sup>准此,妇人遇君(王)赐当肃拜,据此推断其拜谢君后(天后)之赐理应也是行肃拜之礼,这与铭文所载颇有出入。

黄益飞也提到了这一矛盾,并解释说:“盖肃拜乃妇人常拜,于周王、天君等行拜稽首之礼者,皆因对方地位尊贵,需更加敬意以隆盛其礼之故。”<sup>⑤</sup>但即是如此,何以《少仪》却云妇人虽有君赐而行常礼?此说似未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矛盾。

笔者认为解释这一矛盾前首先要明白,虽然“三礼”《左传》诸文献所记妇人之拜多是东周之礼,但男子最高拜礼由西周时期的“拜稽首”演变为春秋时期的“再拜稽首”,再到后期的“升成拜”诸礼,呈现出日益复杂且礼敬程度不断提高的发展趋势,所以妇人之拜不应该由稽首简化为肃拜。如此,西周铭文与传世文献的矛盾就只有以下有两种可能足以解释。

第一,传世文献没有记载而金文载妇人“拜稽首”,可能是铭文内容的格式化,即尹姞鬲、公姞鬲铭文套用了男子拜稽首谢王赐的铭文形式。因为绝大多数提到“拜稽首”之类的铭文例句,前面都带主语,只有极少数不提拜者名号,其中就包括这两则铭文,按照通例应该记“尹姞拜稽首”“公姞拜稽首”,所以这里很有可能是因为套用男性通行的拜礼用语。

究其原因,盖因“妇人无爵,从夫之爵”<sup>⑥</sup>,妇人因夫而受赐,所以古人对妇人拜赐之事不甚重视。谢乃和先生在《新见女性册命金文媛鼎及相关史实考论》一文中综合了羌鼎(《集成》02673)、媛鼎(《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0230)、次尊(《集成》05994)、螭鼎(《集成》02765)等女性册命铭文后总结道:“女性贵族的册命仪式很简单。究其根源,女性册命礼相对简略当与女性贵族在周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关。”<sup>⑦</sup>西周铭文对于女性册命仪式尚且简略,女性拜赐仪式便更加不受重视,所以铭文撰写者对女性拜赐之礼作了模糊处理。

①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第135页。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版)也持此说。也有学者考证“天君”是太后或太王太后,详见黄盛璋:《孟新考》,《人文杂志》1982年第5期;曹兆兰:《金文与殷周女性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韩雪:《尹姞器及相关问题研究》,《殷都学刊》2021年第2期。但不论“天君”为何人,都是王室后宫中的重要人物。

② 郑玄注,贾公彥疏:《仪礼注疏》卷六,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970页。

③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九,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845页。

④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三十五,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13页。

⑤ 黄益飞:《金文所见拜礼与〈周礼〉九拜》,《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⑥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二十六,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456页。

⑦ 谢乃和:《新见女性册命金文媛鼎及相关史实考论》,《史学集刊》2022年第2期。

第二,据王锷先生考证,《少仪》大致成篇于战国前期<sup>①</sup>,则其所载妇人之拜可能是晚周礼家之说,因而不符合西周妇人拜礼实情。

判断这两种可能是否合理的关键在于两点:第一,妇人是否有“稽首”之拜;第二,妇人能否以肃拜来拜君后之赐。关于第一个问题,古代礼书中常见的妇拜形式只有肃拜、手拜、稽颡三种<sup>②</sup>。关于肃拜,历代学者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其是否要跪。一部分学者从郑玄之说,认为肃拜不跪,“但俯下手”<sup>③</sup>。另一部分学者如朱熹等人认为肃拜亦跪“但首不至地”<sup>④</sup>。可以看出肃拜无论是否跪地,其头皆不至于地,究其原因,即如钱玄先生所说:“妇人有头饰……头过分向下,或至地,则首饰发结松散。”<sup>⑤</sup>

综上可知,传世文献所记妇人之拜,为丧主时的“稽颡”和唯一一例“顿首”皆非正常拜礼,因为此时妇人已无正常头饰(处在髽、丧服状态),故可拜头于地。而除此之外,妇人无论行肃拜、手拜还是扢地之礼,其头皆不至地。而肃拜与手拜、扢地二拜仍有区别,即肃拜时仅俯下手,手未及地,而手拜和扢地皆拜手至地,较之肃拜所表达的敬意更重,所以古今学者多认为肃拜为妇人之常拜,“犹拜手为男子之常也”<sup>⑥</sup>。而扢地之拜,郑玄以为“犹男子稽首”。贾公彥疏云:“妇人肃拜为正,今云扢地则妇人之重拜也,犹男子之稽首,亦拜中之重,故以相况也。”<sup>⑦</sup>孔颖达云:“《昏礼》‘拜扢地’,以其新来为妇,尽礼于舅姑故也。”<sup>⑧</sup>也认为“扢地”是一种重礼。

妇人拜天后之赐理应行重拜,清人赵翼即云:“妇之于舅姑,及命妇之于君后,自有不可以常礼为敬者。”<sup>⑨</sup>稽首为男子之重拜,因而可以拜君赐,但妇人因头饰之繁重不便拜头至地,故而没有稽首之拜,所以“手拜”“扢地”等拜手至地之礼对于妇人来说即是重拜。“手拜”用于丧事,“扢地”显然用于吉事,故可用来拜天后赐。而“肃拜”为妇人之常拜,犹男子之拜手,正如男子不可以拜手之礼拜君赐一样,女子亦不可以肃拜拜君后之赐。所以从礼敬程度来看,妇人跪而拜手至地这一礼节,较之肃拜更适合用于拜君后之赐。

综上可知,妇人拜天(君)后当跪而拜手至地,头不至地。尹姞鬲、公姞鬲铭文盖因其与男子稽首礼相类,故套用了男子拜赐礼的用语而作了模糊处理。而《少仪》所载妇人遇君赐肃拜可能是晚周礼家之说,并不符合西周妇人拜礼实情。

周代拜赐礼仪十分复杂,包含了受赐者的施拜情况和施拜后的一系列礼节等问题。西周赏赐铭

① 王锷:《〈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11页。

② 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女拜有多种,黄以周甚至认为妇人也有九拜。详见黄以周撰,王文锦点校:《礼书通故》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77页。但所谓俛拜、不俛拜等,都不是按照施拜方法来划分的。

③ 郑玄注,贾公彥疏:《周礼注疏》卷二十五,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10页。

④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九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35页。

⑤ 钱玄:《三礼通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31页。

⑥ 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卷六,第142页。

⑦ 郑玄注,贾公彥疏:《仪礼注疏》卷六,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970页。

⑧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三十五,详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13页。又,《少仪》下文“还,又拜如初”,也说明“扢地”是一种特殊场合下的重拜。凌廷堪也说:“凡妇人重拜则扢地。”详见凌廷堪撰,彭林校点:《礼经释例》卷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⑨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60页。

文所记载的一些有别于“拜稽首”(“拜手稽首”的拜礼形式,其中“拜手页手”“拜手稽手”等都是“拜稽首”,单言“稽首”实际上与“拜稽首”也是同一礼。而“拜手”礼仅用于受赐者答谢“右者”,而非答谢赏赐之人。册命赏赐铭文记受赐者在行拜礼之后还要“受令册佩以出”,这句话只出现在同时记载命书与命服的铭文之中,“佩”当为名词,指代命服。铭文还记载了妇人拜谢天后赏赐时需行稽首之礼,然而《礼记·少仪》记妇人遇君赐当肃拜。妇人因发饰繁重而不可叩头至地,所以无稽首之拜,但有“极地”这类拜手至地且用于吉事的重拜,故可用于拜天后赏赐。铭文可能因为不重视女性拜赐之礼,所以套用了男子拜赐礼的用语而作模糊处理,而《少仪》所载更可能是晚周礼家之说,二者皆不符合西周妇人拜礼实情。

责任编辑:潘文竹

## Three Issues about the Ritual of Expressing Thanks to Kings in the Zhou Dynasty

Yu Shaofei<sup>1</sup> Ma Jinliang<sup>2</sup>

1.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25, China

**Abstract:** The ritual of expressing thanks in the Zhou Dynasty includes the practice of expressing thanks and the rites thereafter conducted by the recipient, which was an important refl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ings and ministers, and the sense of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in terms of etiquette. The reward-granting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recorded some variations of "bai qi shou". Actually, "bai shou ye shou", "bai shou qi shou" and "qi shou" were the same as "bai qi shou" in essence, and "bai shou" was used for the recipient to thank the "you zhe". After expressing thanks, the recipient must perform a ritual called "shou ce ling pei yi chu", and "pei" was a noun referring to the official uniform. The inscription stated that women should perform the "qi shou" ritual to thank the reward of the queen, while *Shao Yi* of *The Book of Rites* recorded that women were supposed to perform "su bai" in the same situation. Women could not kowtow to the ground because of heavy hair and ornaments, so they did not need to perform the "qi shou" ritual. But they had to do the "qi di" ritual, which was used for blessed events. The inscription might have used the words describing men's ritual and caused some blurring effect, and *Shao Yi* might refer to rituals in the late Zhou Dynasty. So they neither conformed to the actual thanks-expressing ceremony performed by women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Key words:** Zhou Dynasty; expressing thanks for rewards received; *bai qi shou*; *pei yi chu*; expressing thanks by women after receiving rewards

# 南稻北麦与公司违规

——基于水稻理论的实证研究

胡海峰<sup>1</sup> 冯 舰<sup>2</sup>

1.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2. 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利用2003—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数据,研究了水稻种植与公司违规之间的联系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随着CEO籍贯地种植水稻的比例提高,公司违规的概率也相应增大,稻作经济所带来的低社会信任度和风险偏好文化是其传导机制。儒家文化影响力与稻作文化在影响公司违规方面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CEO学历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稻作文化对公司违规的正向影响。基于舞弊三角理论,检验了在不同压力与机会要素下,水稻种植的异质性影响,发现CEO籍贯地水稻种植比例在经营压力小、违规机会大的公司能够对公司违规起到更大影响。

**关键词:**公司违规;南稻北麦;文化差异;CEO特征;集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F326.11; F83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4)02-0035-20

## 一、引言

长久以来,学者们对于影响公司违规的因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文献表明,包括董事会特征、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政策以及外部环境中的监管环境、中介监督环境、行业竞争环境等在内的多种内外部治理因素都会对公司违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sup>①</sup>。然而,越来越完善的治理体系纵然有助于抑制公司违规,但违规行为归根结底是公司决策者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冒险行为,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巨大。现有的文献已经表明,公司高管的人口学特征、性格心理和个人经历等都会影响公司违规,例如Rijssenbilt和Commandeur的研究就表明具有自恋人格倾向的CEO更容易实施欺诈<sup>②</sup>。

在一个人性格心理的形成过程中,其所处的文化背景毫无疑问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是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资本市场韧性的影响因素、测度与提升路径研究”(21AJL0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格局下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金融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21&ZD1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海峰,男,北京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金融制度、公司融资理论与政策研究;冯舰,男,四川广安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司金融研究。

① Alexander C. R., Cohen M. A., "Why Do Corporations Become Criminals? Ownership, Hidden Actions, and Crime as an Agency Cost",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1999, 5(1): 1-34; Fama E. F., Jensen M. C.,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26(2): 301-325.

② Rijssenbilt A., Commandeur H., "Narcissus Enters the Courtroom: CEO Narcissism and Fraud",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3, 117(2): 413-429.

一个群体或者社会所共享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习俗,它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对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sup>①</sup>。因此,在研究影响企业违规的因素时,将高管的文化背景视为同质是不明智的。在中国的语境下,南北文化差异作为最显著的文化背景分歧长期受到学者的关注。既有的文献多采用直接设置南北方虚拟变量的办法研究南北文化差异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较少讨论南北文化差异形成的根源。Talhelm 等则通过在中国的实地调查,提出了“水稻理论”,认为南北方的稻麦种植差异是南北文化和心理差异的重要来源<sup>②</sup>。种植水稻需要相互协调配合,因此稻区形成了集体主义,种植小麦则往往仅靠个人力量,因此在麦区形成了个人主义。这样的观点得到了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使用“南稻北麦”的种植方式差异来解释南北方社会经济文化差异问题的文献日益增多<sup>③</sup>。

本文沿袭这一思路,主要关注和解决两个方面问题:(1)稻麦种植差异导致的南北文化差异,是否会对企业违规行为产生影响? (2)如果产生影响,那么“南稻北麦”影响公司违规行为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本文的研究表明,籍贯地水稻种植面积占比较高的 CEO 所在企业进行违规的可能性更大,这主要是通过影响 CEO 的社会信任和风险偏好两种文化机制传导的。本文还发现儒家文化影响力与稻作文化之间在影响公司违规方面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CEO 学历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稻作文化对公司违规的正向影响,在面临不同的财务经营压力和不同的违规机会时,水稻种植比例对公司违规的影响力也存在一定异质性。

本文的主要边际贡献如下:第一,现有的公司违规研究多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监管环境等方面入手,有关文化的文献也多是进行国际比较或者关注宗教、信任等文化现象对公司违规的影响。本文基于南北水稻种植格局的自然演化差异,来刻画南北地域文化和观念的差异,并且联系到了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来探讨南北文化差异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既是对 Talhelm 等、Zhu 等、丁从明等以及张博和范辰辰关于南稻北麦种植方式影响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的直接补充,也进一步拓展了公司违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第二,本文以 CEO 的个人特征为切入点,研究 CEO 的文化背景对于公司违规的影响,可以为公司选择合适的 CEO 提供一定参考,为监管部门提供新的思路,进而有助于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第三,本文从文化的角度解释经济现象,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非正式制度影响社会经济的途径和机理。尤其是在中国目前还处于法律制度不完善的现状下,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起到了替代和补充,研究中国语境下的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经济行为也是为理解社会经济和制定正式制度提供参考。

① Hofstede G. H.,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0.

②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et al.,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2014, 344(6184): 603–608.

③ Zhu J., Ang J. B., Fredriksson P. G., "The Agricultural Roots of Chine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18: 126–147; 丁从明、周颖、梁甄桥:《南稻北麦、协作与信任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 张博、范辰辰:《稻作与创业:中国企业家精神南北差异的文化起源》,《财贸经济》2021年第6期。

## 二、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

### (一) 我国的南稻北麦种植格局

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中国北方与南方的作物种植状况有着显著的差异,南方种植水稻的比例显著高于北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最早数据,本文计算出了1999年各省市水稻播种面积占粮食播种总面积的比例(见图1)。在南方的省市中,江西是种植水稻比例最高的省份,达86.96%,紧随其后的是湖南与广东,比例都超过75%,即使是比例较小的西南山地省份,也都不低于20%。反观中国北方,青海、甘肃、山西三个省份几乎不种植水稻,作为粮仓的东北三省,水稻播种比例也都未达20%,南北的种植作物差异一目了然。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这样的种植格局在20年之后的2019年仍然没有大的改变。

之所以形成如今的水稻种植格局,自然条件、人口分布及流动、政治因素都有一定影响,但无可否认南北不同的气候特点起决定性作用<sup>①</sup>。水稻喜高温、多湿,以秦岭淮河线为界,北属暖温带季风气候,降水量偏低,农耕经济以小麦为代表的旱作为主;南属亚热带或热带湿润气候,湿润多雨,农耕经济以稻作为主。“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最晚在西汉就已经基本确定,虽然在此后的二千年间历经反复变动,南方的稻作农业不断北渐,但可以看到,时至今日此种植格局仍是中国农业的重要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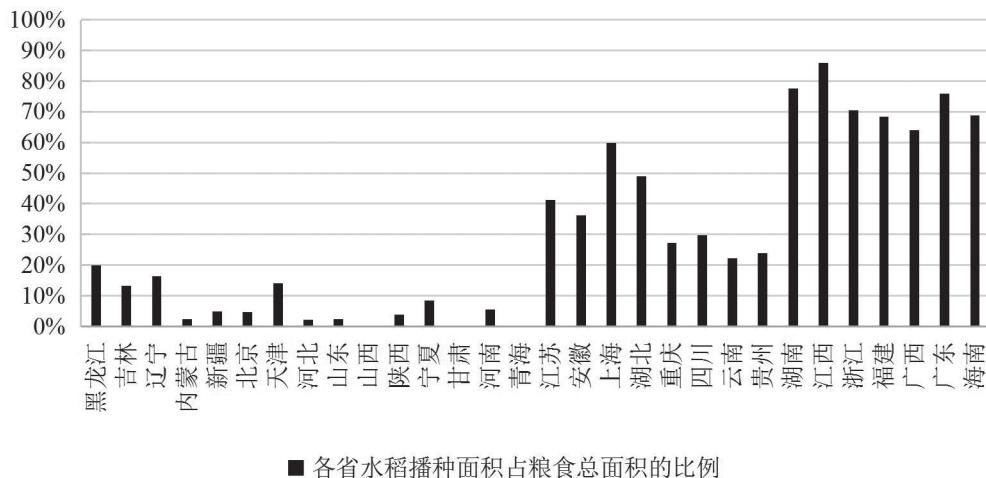


图1 1999年各省水稻播种面积占粮食总面积的比例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 (二) 水稻理论——稻作与集体主义文化

1. 水稻理论。关于个性的地理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国家之间、同一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都可能出现性格差异,而“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对立则被Triandis等跨文化心理学家认为是最重要的文化分歧<sup>②</sup>。集体主义强调顺从、等级、合作、忠诚、团结和相互依赖与帮助,而个人主义则强调自

① 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0页。

② Triandis H. C.,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01, 69(6): 907–924.

由、独立、自主选择与成就<sup>①</sup>。一个多年来被广泛认可且关注的文化差异现象是,西方人更加具有个人主义特质,而东亚人则更加集体主义<sup>②</sup>。为了解释这种明显的文化差异,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理论。Inglehart 的现代化理论认为,越是富裕、现代化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地区,人们就会变得越倾向于个人主义,但这在解释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时遇到了困难; Fincher 等提出的传染病理论则认为,传染病的盛行使得与陌生人交往变得更加危险,从而形成了该地区长半径信任的缺失和集体主义的盛行<sup>③</sup>。与此不同的是,生存方式理论从先民的生产经营模式出发对文化的形成进行了解释。一方面,生态和环境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某一区域的人民在早期所能选择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不同的生存方式要求人们建立不同的相互关系。过去大部分的生存方式研究都比较了农耕与畜牧所带来的心理和文化差异,农耕的生存方式比狩猎需要更多的有效合作和相互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畜牧业的独立性与流动性使得放牧文化更偏向个人主义,而农耕方式的稳定性和高劳动需求则使得农耕文化更倾向于集体主义<sup>④</sup>。

在原来的生存方式理论框架下,中国常被视为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然而,将中华文明笼统地视作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单一文明的做法,忽略了中国内部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农耕方式和文化心理模式的事实。Talhelm 等通过对来自 28 个省市的 1162 名汉族大学生进行实验调查,对中国南北方作物种植差异与南北方不同心理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据此提出了“水稻理论”<sup>⑤</sup>。他们认为,北方人更加具有个人主义特质,南方人则会倾向于集体主义,而这正是由于“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所导致的。种植水稻需要复杂的灌溉系统,由于其具有一定竞争性,所以各户使用的时间段和用水量都需要相互之间的协调。此外,种植水稻所需的劳动力比种植小麦要多得多,因此农忙时节稻农往往需要互相借用劳动力,甚至提前协调种植时间,让每个家庭在不同的时间收获,以满足劳动力的需要。然而种植小麦并不需要相互配合,也不需要如此大的劳动量,故而小麦文化塑造出了北方的独立文化与个人主义,而水稻文化则孕育了南方的相互依赖与集体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水稻理论立足于文化层面,适用于水稻种植区的所有居民而不仅仅是直接种植水稻的稻农,这种水稻文化或小麦文化即使在当地大部分人已经不再耕种水稻或小麦后也会继续存在。

## 2. 集体主义。水稻理论将稻作经济与集体主义联系起来,但考虑到“集体主义”在被中国与西方

① Brewer M. B., Chen Y., "Where (Who) Are Collectives in Collectivism? Toward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7, 114(1): 133–151; Snibbe A. C., Markus H. R.,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gency, and Cho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5, 88(4): 703.

② 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et al.,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1, 108(2): 291–310.

③ Inglehart R., "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 Valu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0, 23(1): 215–228; Fincher C. L., Thornhill R., Murray D. R., et al., "Pathogen Prevalence Predicts Human Cross-Cultural Variability in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008, 275(1640): 1279–1285.

④ Berry J. W.,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in Subsistence-Level Societ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7, 7(4, Pt.1): 415–418.

⑤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et al.,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2014, 344(6184): 603–608.

提及时内涵往往不甚相同,本文有必要对“集体主义”进行一定的解释。

直观上来看,集体主义意味着为了集体的利益愿意牺牲部分个人利益,但其中“集体”的意义却指向模糊。Hofstede 首次提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划分时就指出,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个人将自己以外的人分为内群体(in-groups)和外群体(out-groups),人们从出生起就得到强大的内群体的庇护,个人反过来也绝对忠诚于所在的内群体<sup>①</sup>。因此,集体主义的内核是把内群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所谓“集体高于个人”里的“集体”指的是紧密联系的内群体。那么关于内群体和外群体的界定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也是相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争论点。

内外群体的界限在不同的文化中是不同的。身处相同的地区、村庄、国家,或者共享相同的信念、态度和价值等都可能成为内群体的分类标准,最常见的是大家庭,其它形式的内群体还包括拉丁美洲的“同僚”以及日本的师门等。从水稻理论的逻辑来看,种植水稻需要邻里相互配合使用同一套灌溉体系,相互借用劳动力以应付农忙时节,因此由种植水稻而产生的内群体就是因具有共同利益而充分协调与联系,互相帮助与关心的邻里群体,而不是一个笼统的地区或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

3. 对水稻理论的评价。水稻理论被提出后,受到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袁益从集中灌溉面积和集中灌溉设备入手,发现水稻区集中灌溉设备拥有概率更高、集中灌溉面积更大,进而促成了人际交往合作,最终产生集体主义文化<sup>②</sup>。这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水稻理论,同时也说明种植水稻所产生的内群体就是这些集中灌溉的邻里社群。

然而,在得到对其工作的肯定的同时,水稻理论也引来了一些质疑。例如, Ruan 等认为 Talhelm 等的实证方法有样本偏差、测量误差、模型设定错误等一系列问题<sup>③</sup>; Roberts 也认为其研究没有控制各省之间的历史关系,忽略了数据非独立的问题<sup>④</sup>。尽管该理论还在经历理论和实证上的检验,但必须承认的是,水稻理论的提出,开辟出了研究中国文化的新思路,为我们理解南北文化差异提供了新方向。

### (三)CEO 稻作文化对公司违规的影响

根据高层梯队理论,CEO 作为企业战略决策者,其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和价值观等心理结构影响着企业经营策略的实施,从而影响企业行为。就理论推测而言,本文认为稻作文化可能通过影响 CEO 的社会信任和风险偏好两种文化机制影响公司违规。

1. 影响机制之一:社会信任。一个低信任社会的主要表现为“窄信任半径(narrow trust radius)”,即对于家庭和亲密社交圈之外的群体缺乏信任<sup>⑤</sup>。在种植水稻的区域,由于大型灌溉系统的公共品属性,种植过程中会产生对于用水时间和用量的协调,收获时期由于劳动量过大也会形成“换工”现象,所以人们在不断的联系与接触之后会形成相对紧密的内群体集体主义,往往对村内人和族人给予高

① Hofstede G. H.,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0.

② 袁益:《文化差异与中国农村人口流动意愿——基于“稻米理论”的视角》,《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10期。

③ Ruan J., Xie Z., Zhang X., "Does Rice Farming Shape Individualism and Innovation?", *Food Policy*, 2015, 56: 51-58.

④ Roberts S. G., "Commentary: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s. Wheat Agricultu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5, 6: 1-4.

⑤ Fukuyama F.,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度信任,而对于圈外的陌生人则采取普遍的不信任态度,导致社会信任的缺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北方小麦由于播种期和收割期都极短,而同村或邻村的农忙时期几乎相同,因此很难在村庄内部进行协调。但是由于北方小麦通常自东向西逐渐成熟,河南、山东的麦民们待自家收割完成后便赶赴山西、河北等地作为雇工收割小麦<sup>①</sup>,异地小农的市场化雇佣关系得以建立,因此相互信任不再局限于血缘、地缘,而是形成了基于货币关系的一般性信任。同时也有研究表明,拥有个人主义特质的人对与陌生人交往更感兴趣,并且更加愿意信任他人<sup>②</sup>。丁从明等通过CFPS的家庭数据实证表明了,在南方水稻区,家庭与村庄内部更高的协作需求诱发出了亲友近邻间的短半径受限制信任模式<sup>③</sup>。而社会信任是一个地区传统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会作为一种共享的价值观代代相传,由种植水稻而产生的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持久存在于稻区人民的观念中,因此成长于稻区的CEO很可能具有更低的对外信任度。

然而,社会信任在促进社会成员合作、降低交易费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关社会信任如何影响公司违规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一方面,社会信任能够作为一种道德约束,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Guiso等的研究表明,社会信任会使公司高管更加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为违规找借口<sup>④</sup>。另一方面,社会信任能够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合作提高交易效率,从而降低企业进行违规的动机,降低企业违规概率。社会信任能够抑制公司违规这一观点,在经验研究中也得到了大量的验证<sup>⑤</sup>。

综上,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 成长在水稻种植地区的人们社会信任水平较低,普遍不信任陌生人,这种稻区文化使得成长在稻区的CEO所在的企业违规概率更高。

2. 影响机制之二: 风险态度。从水稻理论的视角来看,种植水稻需要邻里之间的大量协调与配合,由稻作经济而产生了紧密联系的内群体集体主义。Weber和Hsee提出的“软垫假说”首次将集体主义与风险态度联系在一起,认为集体主义社会和个人主义社会对风险有着不同的态度<sup>⑥</sup>。在集体主义社会中,紧密联系的内群体为成员提供了应对非预期损失的相互保险,以缓冲灾难带来的财富损失,因此对于同样的情况,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所感知到的风险比个人主义文化成员要更小。Statman通过对23个国家的4000多名学生进行研究,发现集体主义与风险容忍相联系,个人主义与风险规避相联系<sup>⑦</sup>; Tanaka等通过在越南的实验也发现,社会“安全网”体系的存在使得北方集体农庄的人们风险厌恶的程度较低,而个人主义盛行下的南方人则表现出更强的不确定性规避,在一定

① 史建云:《浅述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② Triandis H. C., "The Self and Social Behavior in Differing Cultural Contexts",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9, 96(3): 506.

③ 丁从明、周颖、梁甄桥:《南稻北麦、协作与信任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

④ Guiso L., Sapienza P., Zingales L., "The Value of Corporate Cul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5, 117(1): 60–76.

⑤ 林斌、陈颖、舒伟等:《社会信任与公司违规》,《中国会计评论》2016年第3期。

⑥ Weber E. U., Hsee C. K., "Models and Mosaics: Investigating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Risk Perception and Risk Preference",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999, 6(4): 611–617.

⑦ Statman M., "The Cultures of Risk Tolerance", *Santa Clara, CA: Working Paper*, 2010.

程度上进一步证实了集体主义与风险偏好的“软垫假说”<sup>①</sup>。因此,由稻作经济而产生的集体主义文化通过家庭、村庄代代相传,影响了稻作区人们对于风险的认知,滋生了对风险的偏好。

与此同时,CEO 的风险偏好与企业的违规行为之间有一定的匹配性。一方面,风险偏好型的 CEO 倾向于采用高杠杆、高风险的战略,一旦企业盈利能力受到经济环境或行业状况等的威胁,财务状况就会恶化<sup>②</sup>。另一方面,恶化的财务状况加上资本市场对于负面信息的放大效应,高管职业发展前景和薪资水平会受到影响,甚至面临被解雇;同时,高管的业绩压力不仅来自于行业内的横向比较,也来自于与自己历史业绩的纵向比较<sup>③</sup>。因此高管在维护个人的职业发展利益和平滑业绩等压力之下,会产生违规欺诈的动机。当风险偏好的高管认为违规的预期收益大于风险时,就会铤而走险,选择进行违规。已有不少文献实证表明了 CEO 风险偏好与企业违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sup>④</sup>。

综上,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 种植水稻所形成的内群体,为其成员提供了相互保险,导致稻区人们风险容忍度更高,从而成长在稻区的 CEO 所在的企业违规概率可能更高。

### 三、研究设计

#### (一)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将研究样本选定在 2003 年到 2018 年的中国上市企业,在数据整理过程中,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剔除金融行业的公司;(2)剔除 B 股公司;(3)剔除研究所需的数据有缺失的公司。最终,本文得到 7140 个样本观测值。本文使用的公司违规数据和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水稻种植方式数据依据农业农村部和各省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来,为了消除极端值对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在 1% 水平上进行 Winsorize 处理。

#### (二) 主要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公司违规行为(*Fraud*)。根据国泰安数据库,将虚构利润、虚列资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推迟披露、重大遗漏、披露不实(其他)、欺诈上市、出资违规、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占用公司资产、内幕交易、违规买卖股票、操纵股价、违规担保、一般会计处理不当等行为视为公司违规行为。当上市公司在研究期间被稽查出从事至少一次公司违规行为时, *Fraud* 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2. 解释变量:CEO 籍贯地水稻种植比例(*Rice*)。现有试图从“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来解释社会经济问题的文献使用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变量。例如,“水稻理论”的提出者 Talhelm 等和质疑者

① Tanaka T., Camerer C. F., Nguyen Q., "Risk and Time Preferences: Linking Experimental and Household Survey Data from Vietna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0, 100(1): 557–571.

② Malmendier U., Tate G., Yan J., "Overconfidence and Early-Life Experiences: The Effect of Managerial Traits on Corporate Financial Polici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11, 66(5): 1687–1733.

③ Labianca G., Fairbank J. F., Andrevski G., et al., "Striving toward the Future: Aspiration–Performance Discrepancies and Planned Organizational Change", *Strategic Organization*, 2009, 7(4): 433–466.

④ 李世辉、卿水娟、贺勇等:《审计收费、CEO 风险偏好与企业违规》,《审计研究》2021 年第 3 期。

Ruan 等都直接使用样本省份属于稻作区还是麦作区作为研究变量<sup>①</sup>；丁从明等则使用 CFPS 微观数据库,根据个体对“您家是否种植水稻或小麦”等问题的回答确定每个个体种植的作物类型,研究了种植方式对社会合作信任的影响<sup>②</sup>；Zhu 等直接使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全球农业生态区(GAZE)提供的中国各地水稻适应度和小麦适宜度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发现相比种植小麦的区域,种植水稻的区域产出的专利更少<sup>③</sup>；张博和范辰辰则使用了当地水稻播种面积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比例作为当地种植方式的代理,研究了中国南北企业家精神差异的根源所在<sup>④</sup>。

在委托代理的框架下,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分离,CEO 成为企业中负责日常经营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拥有管理和代理公司事务的极大权力,主持制定企业财务、经营等各方面的战略决策。而根据高层梯队理论<sup>⑤</sup>,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和价值观等心理结构影响着 CEO 的经营决策与实施,从而影响企业行为。因此,本文借鉴张博和范辰辰的方法,使用各企业 CEO 籍贯地水稻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作为水稻种植方式 Rice,相比作物种植适宜度更能真实地反应种植格局。籍贯地数据匹配至地市级,具体方法如下:(1)若报告籍贯地精确到地级市以下,则仅确认至地级市层面。例如,报告籍贯地为“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则确认至“山东省临沂市”。(2)若报告籍贯地精确到地级市,则使用该地级市数据,如“辽宁省抚顺市”。(3)若报告籍贯地仅精确至省级,则使用农业农村部提供的该省总体水稻种植比例数据进行匹配。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当中,稻作与麦作的选择会受到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业现代化、机械化逐步在全国推进,也可能会改变原有的作物种植比例与方式。因此,本文尽可能地选择了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最早省级数据,即 1999 年数据。各地市的数据来源于 2000 年各省市、地市的统计年鉴,同时个别地市数据缺失的使用该省的总体数据进行补充。例如,没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的地市级水稻种植比例,则使用广西的总体水稻种植比例进行补足。考虑到历史的因素,本文还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汉代的稻作/旱作区对主要解释变量进行替换。

3. 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参考以往文献,对三类可能影响公司违规的变量进行了控制。

第一类是公司特征和财务变量。不同规模的公司的违规行为具有异质性,规模较大的公司为了保持自己的声誉倾向于发布真实的信息,因此添加公司规模(Size)；杠杆率衡量了公司面临的风险,高杠杆率的公司往往面临的银行和机构投资者的监督更大,因此添加公司杠杆(Leverage)；此外,本文还控制了资产报酬率(ROA)、托宾 Q 比率(Tobin Q)、现金资产比(Cash)等。

第二类是公司治理变量。董事会规模会影响公司内部治理效率,规模过大导致治理失败,从

①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et al.,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2014, 344(6184): 603–608; Ruan J., Xie Z., Zhang X., "Does Rice Farming Shape Individualism and Innovation?", *Food Policy*, 2015, 56: 51–58.

② 丁从明、周颖、梁甄桥:《南稻北麦、协作与信任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2期。

③ Zhu J., Ang J. B., Fredriksson P. G., "The Agricultural Roots of Chine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18: 126–147.

④ 张博、范辰辰:《稻作与创业:中国企业家精神南北差异的文化起源》,《财贸经济》2021年第6期。

⑤ Hambrick D. C., 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193–206.

而影响公司违规行为,因此添加董事会规模(*Boardsize*) ;两职合一的结构赋予高管更大的权力,提高了高管为私利进行公司违规的能力,因此添加两职合一(*Dual*) ;此外,本文还添加了股权集中度(*Concen*)等。

第三类是社会经济环境变量。本文在地区层面上考虑了企业所处的环境,控制了法制环境(*Law*)、市场化程度(*Mar*)、人均GDP(*GDPpercapita*),其中前两个控制变量取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sup>①</sup>中“维护市场的法制环境”单项数据和总市场化指数数据,人均GDP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另外,本文构建了两组虚拟变量以控制行业和年份的影响。本文主要变量的说明如下:

表1 变量选择及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公司违规行为	<i>Fraud</i>	公司当年被发现有违规事件为1,否则为0
解释变量	CEO籍贯地水稻种植比例	<i>Rice</i>	CEO籍贯地1999年水稻播种面积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比例
	公司杠杆	<i>Leverage</i>	总负债与总资产比值
	公司规模	<i>Size</i>	公司资产总额取对数
	托宾Q比率	<i>Tobin Q</i>	公司市值与资产重置成本之比
	现金资产比	<i>Cash</i>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总和与总资产比值
	资产报酬率	<i>ROA</i>	净利润与总资产比值
控制变量	两职合一	<i>Dual</i>	公司CEO与董事长为同一人取1,否则取0
	董事会规模	<i>Boardsize</i>	董事会总人数
	股权集中度	<i>Concen</i>	公司前3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法制环境	<i>Law</i>	衡量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有效司法保护的程度
	市场化程度	<i>Mar</i>	衡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大小
	人均GDP	<i>GDPpercapita</i>	各省各年以人民币计的人均GDP的对数值

### (三)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说,将待检验的回归模型设定为

$$Fraud_{i,t} = \beta_0 + \beta_1 Rice_{i,t} + \sum \beta_k gcontrols_{i,t} + \mu_{year} + \mu_{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1)$$

*Fraud<sub>i,t</sub>* 表示公司*i*在*t*年的违规情况, *Rice<sub>i,t</sub>* 表示公司*i*在*t*年的CEO籍贯地的水稻种植比例, *controls<sub>i,t</sub>*、*μ<sub>year</sub>*、*μ<sub>industry</sub>* 分别代表控制变量、年份效应、行业效应, *ε<sub>i,t</sub>* 为随机误差项,该模型采用Probit回归估计模型。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主要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中的上市企业发生公司违规行为的均值为12.6%,也表明公司违规问题的确值得进一步研究;从水稻种植比例来看,样本均值为43.6%左右,标

<sup>①</sup>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由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于2008年开始发布,并于2016年进行了调整,导致2016年前后数据不可比,但各省份相对位次基本稳定,因此本文选用调整前所发布的2010年数据作为2003—2018年各省份的省份属性变量。

准误约为 0.3, 种植比例最高的地市为广东中山市, 达 92.7%; 青海、山西、甘肃和西藏种植比例最低, 均不足 1%, 表明不同区域的水稻种植状况差别很大。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也显示水稻种植比例与公司违规行为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限于篇幅不在此处展示。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Fraud</i>	7140	0.126	0.331	0.000	1.000
<i>Rice</i>	7140	0.436	0.304	0.000	0.927
<i>ROA</i>	7140	0.049	0.052	-0.095	0.231
<i>Boardsize</i>	7140	9.001	1.964	4.000	19.000
<i>Dual</i>	7140	0.381	0.486	0.000	1.000
<i>Leverage</i>	7140	1.707	1.934	0.126	15.097
<i>Concen</i>	7140	49.643	15.647	17.158	88.024
<i>TobinQ</i>	7140	1.989	1.230	0.927	7.884
<i>Cash</i>	7140	0.162	0.126	0.010	0.632
<i>Size</i>	7140	22.103	1.390	19.490	26.240
<i>Law</i>	7140	6.449	3.458	-0.700	11.550
<i>Mar</i>	7140	6.860	1.509	0.440	8.740
<i>GDPpercapita</i>	7140	10.726	0.635	8.218	11.851

## (二) 基准回归分析

表 3 列(1)、列(2)报告了水稻种植比例与公司违规之间的实证性检验结果。列(1)使用了 CEO 籍贯地水稻种植比例作为主要解释变量, 不控制公司和地区层面的其它变量, 控制行业与年份效应, 得到水稻种植比例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则是在之前的基础上加入了公司与地区层面的各个控制变量, 结果表明 CEO 籍贯地水稻种植比例仍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水稻种植比例的回归系数是 0.28, 经过计算其平均边际效应为 0.052, 意味着 CEO 籍贯地水稻种植比例每提高 10%, 企业进行违规的概率就增大 0.52%。本文的假设得到初步验证。考虑到本文所用数据为企业层面面板数据, 列(3)在列(2)的基础上增加了企业固定效应。然而回归结果显示, 控制企业个体效应之后样本量损失近三分之二, 大部分在列(2)中显著的变量失去显著性, 而常数项绝对值变得异常大, 不能较好反应变量真实关系, 因此, 本文在之后的回归中不对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进行控制。

## (三) IV-Probit 回归

尽管基准回归方程中加入了一些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 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法制环境和市场化程度, 但不可避免会有另外的宏观因素既与水稻种植面积占比相关, 又会影响企业的违规行为。因此, 为了解决内生性的问题, 为因果关系提供更强有力的证明, 本文还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处理。

本文将工具变量选定为 1999 年企业 CEO 籍贯地的平均温度(*Tem*, °C)、降雨量(*Pre*, cm)和日照长度(*Sunlight*, 千小时), 数据来源于 2000 年各省和各地市的统计年鉴。一方面, 一个地方种植水稻还是小麦, 尽管也会受到人口迁移、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但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该地的生态和气候更适合哪一种作物生长。南方纬度低, 温度较高, 太阳光照条件好, 降水丰沛, 河网密集, 灌溉水源充足, 正好适合喜高温湿润的水稻生长; 小麦的生长则必须经过低温, 才能促进花芽形成和花器发

育,纬度高温度低,昼夜温差大的北方正好适合小麦的生长。本文所选的时间 1999 年并没有明显的气候异常,可以认为其数据能代表当地的相对气候特点,因此本文所选的三个工具变量与水稻的种植比例是高度相关的,并且总体来看,温度越高、降雨量越大、日照时间越长的地区,种植水稻的比例应该越高,这也与我国水稻种植从东南向西北大体递减的事实相符。另一方面,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 CEO 籍贯地气候特征与企业违规行为存在相关性。

表 3 的列(4)报告了第一阶段的回归,验证了降雨量、温度和日照时长与水稻种植的相关性,列(5)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再一次符合本文的理论假说,且系数与基准模型相比有所增加。

表 3 实证性检验

变量	基准回归			工具变量法	
	(1) <i>Fraud</i>	(2) <i>Fraud</i>	(3) <i>Fraud</i>	(4) <i>Fraud</i>	(5) <i>Fraud</i>
<i>Rice</i>	0.151** (0.069)	0.280*** (0.074)	0.135 (0.264)		0.306*** (0.086)
<i>ROA</i>		-2.479*** (0.510)	-2.037** (0.874)	0.024 (0.039)	-2.476*** (0.480)
<i>Boardsize</i>		0.007 (0.011)	0.077** (0.032)	0.003*** (0.001)	0.007 (0.012)
<i>Dual</i>		0.119*** (0.045)	0.008 (0.136)	0.011*** (0.004)	0.119*** (0.046)
<i>Leverage</i>		0.018* (0.010)	-0.009 (0.016)	0.002** (0.001)	0.018* (0.010)
<i>Concen</i>		-0.004*** (0.001)	0.004 (0.005)	0.000 (0.000)	-0.004*** (0.001)
<i>Tobin Q</i>		-0.031 (0.021)	0.020 (0.040)	0.006*** (0.002)	-0.031 (0.021)
<i>Cash</i>		-0.443** (0.180)	-0.079 (0.384)	-0.052*** (0.015)	-0.442** (0.185)
<i>Size</i>		-0.121*** (0.021)	0.127 (0.084)	0.001 (0.002)	-0.12*** (0.022)
<i>Law</i>		-0.073*** (0.016)	1.647 (2.055)	-0.002 (0.001)	-0.074*** (0.017)
<i>Mar</i>		0.028 (0.039)	-0.650 (0.440)	0.004 (0.003)	0.027 (0.040)
<i>GDPpercapita</i>		0.205** (0.082)	0.516** (0.233)	0.005 (0.007)	0.209** (0.085)
<i>Pre</i>				0.004*** (0.000)	
<i>Tem</i>				0.016*** (0.001)	
<i>Sunlight</i>				0.013** (0.006)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效应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i>Con</i>	-1.510*** (0.383)	-0.650 (0.843)	-14.885 (12.307)	-0.543*** (0.071)	-0.698 (0.908)
样本量	7048	7048	2663	7048	7048
调整 <i>R</i> <sup>2</sup>	0.072	0.109	0.208	0.796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下同。

## 五、稳健性检验

### (一) 加入可能的遗漏变量: 宗族

宗族势力的大小与种植方式高度相关。南方水稻区宗族势力通常较强,因为灌溉系统的建造和修葺等都要求氏族内的团结协作,而北方小麦区一方面因为种植小麦不需要较多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因为几千年来不断受到少数民族的冲击,人口流动较大,所以宗族势力不如南方。宗族势力带来对大家庭的绝对忠诚的同时,也导致了强大的亲属和裙带关系网络的发展以及社会信任的普遍缺乏,而这同样会对企业违规行为造成影响<sup>①</sup>。因此,宗族势力会是一个可能的遗漏变量。

本文借鉴阮荣平和郑风田<sup>②</sup>的研究,使用2005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中有关宗族组织的数据进行研究。关于宗族组织,问卷将其分为三类:“1. 没有家族网络或组织; 2. 有以姓氏为纽带的亲族网络,但没有正式的组织; 3. 有以宗祠/祠堂为活动中心的家族组织”。本文将这三类组织状况依次赋值为1、2、3。通过加总平均各省样本的回答得到宗族势力强度(*Clan*)。回归结果表明如表4列(1)所示,本文的基本结论依然成立,水稻种植比例的系数仍在1%水平上为正,绝对值略有下降。同时,宗族势力也与企业违规在10%水平上正相关,这与本文之前的分析相符。

### (二) 替换关键解释变量

1. 使用汉代稻作区划分种植方式。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也不可能避免地受到了现代化、机械化的巨大影响,原有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种植方式在此进程中遭遇冲击,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关键解释变量“1999年水稻种植比例”有可能反应的是已经受到了农业现代化影响之后的种植状况。然而,“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之所以能够对企业违规造成一定的影响,正是因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不同作物所需的不同合作关系塑造了不同的地区文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在代理历史种植格局方面可能存在缺陷,拟替换关键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鲁西奇指出,我国的稻作经济带、旱作经济带和游畜牧经济带至晚在汉代就已经形成,同属季风气候的稻作区与旱作区大致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与今天的南北分界线基本吻合<sup>③</sup>。因此,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使用汉代的稻作区旱作区数据(*Ricehan*)替换关键解释变量,汉代时属于稻作区则取1,否则取0。结果表明, *Ricehan* 的系数0.142,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经计算,边际效应为0.026,意味着其他条件不变时,籍贯地属于稻作区的CEO所在企业比不属稻作区CEO所在企业进行违规的概率高2.6%。

2. 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稻作比例。为了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使用CFPS2014中计算出来的各省稻作比例进行回归分析。本文将CFPS2014中“您家是否种植水稻或小麦”作为种植方式的关键变量,其中水稻记作1,小麦记作0,各省取平均值得到 *Ricecfps*。结果表明, *Ricecfps* 的系数为0.232,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经计算其边际效应为0.043,意味着其他条件不变时,CEO籍贯地种植水稻的比例每增加10%,企业进行违规的概率就增大0.43%。

### (三) 改变样本容量

1. 剔除东北三省的企业样本。在中国总体上“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之下,东北三省的情况较为

① Fukuyama F.,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② 阮荣平、郑风田:《市场化进程中的宗族网络与乡村企业》,《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1期。

③ 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第121页。

特殊。其地处中国的最北边,纬度高气温低日照短,但是却是整个北方地区水稻种植比例最高的区域。其现状大部分是历史原因所造成的。东北地区原先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历史上主要从事渔业和牧业,农耕的程度较低。在清同治年间开始的“闯关东”人口大迁徙中,大量华北地区的汉族涌入东北,随之而来的还有关内的小麦种植等旱地种植技术,至此才根本上改变了东北的主要生存方式。而东北地区的水稻种植则要更晚,是近代的朝鲜移民在东北的旱作农业基础上引入的朝鲜的寒地稻作。因此,可以发现,无论是小麦还是水稻,其在东北地区的种植历史都不算长,对当地文化和心理的影响可能有限,因此本文将 CEO 籍贯地是东三省的企业样本剔除进行一次回归。表 4 的列(4)结果表明,水稻种植比例的系数相比基础回归有轻微上升,仍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2. 剔除直辖市的企业样本。由于直辖市相对于其他省份,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和经济、政治、文化优势,可能对实证结果造成影响,因此,本文删除处于直辖市的企业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4 列(5)回归结果表明,原有的结论不改变,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也没有较大的变化。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i>Fraud</i>	(2) <i>Fraud</i>	(3) <i>Fraud</i>	(4) <i>Fraud</i>	(5) <i>Fraud</i>
<i>Rice</i>	0.237*** (0.082)			0.299*** (0.075)	0.300*** (0.082)
<i>Clan</i>	0.181* (0.103)				
<i>Ricehan</i>		0.142*** (0.055)			
<i>Ricecfps</i>			0.232** (0.1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i>	-0.275 (0.889)	-0.072 (0.898)	-0.667 (0.867)	-0.585 (0.860)	-2.839*** (1.099)
样本量	6354	6475	6851	6638	5760
调整 <i>R</i> <sup>2</sup>	0.116	0.107	0.112	0.107	0.109

#### (四) 内生性问题的再讨论

1. Heckman 二阶段法。当高风险的公司更倾向于雇佣来自稻区的 CEO 时,基准回归中得到的结论可能有所偏误,Heckman 二阶段法能够解决此问题,具体形式如下:

$$Pr(CEO_{i,t}) = \Phi(\gamma Z_{i,t}) = \beta_0 + \beta_1 FirmRice_i + \beta_2 Tran_{i,t} + \sum \beta_k \bullet controls_{i,t} + \mu_{year} + \mu_{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2)$$

$$Fraud_{i,t} = \beta_0 + \beta_1 Rice_i + \rho \sigma \hat{\lambda}(\gamma Z_{i,t}) + \sum \beta_k \bullet controls_{i,t} + \mu_{year} + \mu_{industry} + \varepsilon_{i,t} \quad (3)$$

在第一阶段的选择方程中, *CEO*<sub>*i,t*</sub> 表示 CEO 的籍贯地是否属于稻区,是则取 1,否则取 0; *FirmRice*<sub>*i,t*</sub> 表示公司所在地是否为稻区,是则为 1,否则为 0; *Tran*<sub>*i,t*</sub> 表示公司所在省的交通发展状况,用 *t* 年 *i* 公司所在省的总客运量(百亿人次)来衡量,数据来源于各年统计年鉴。处于稻区的公司可能会倾向于选择稻区的 CEO,而交通的发展则加强了人才的流动,从而减轻了公司选择 CEO 的地理限制,从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来看, *FirmRice*<sub>*i,t*</sub> 与 *CEO*<sub>*i,t*</sub> 显著正相关, *Tran*<sub>*i,t*</sub> 与 *CEO*<sub>*i,t*</sub> 显著负相关,与预期相符。

在第二阶段的方程中,  $\rho\sigma\hat{\lambda}(\gamma Z_{i,t})$  表示逆米尔斯比率, 表 5 的回归结果显示, 主要解释变量 *Rice* 在 5% 水平上仍然显著为正, 进一步验证了 CEO 籍贯地种植水稻的传统会增大其所在公司的违规概率。

2. 安慰剂检验。如果不考虑 CEO 籍贯地如何分布, 这种效应都存在, 那么本文的结果将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作为回应, 本文随机打乱每个 CEO 的家乡作为安慰剂测试, 将随机失序后的自变量定义为 *random\_rice*, 然后在基础模型中重复回归, 经过 1000 次随机失序后, 绘制 *random\_rice* 估计系数的 *t* 值分布图。如图 2 所示, *random\_rice* 系数的 *t* 值大部分在 0 左右, 没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本文的结果不是由非可观察因素驱动的。

表 5 Heckman 二阶段法

变量	First <i>CEO</i> <i>Rice</i>	Second <i>Fraud</i>
<i>FirmRice</i>	1.984*** (0.055)	
<i>Tran</i>	-0.911*** (0.203)	
<i>Rice</i>		0.178** (0.087)
<i>IMR</i>		-0.132** (0.05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i>Con</i>	0.399 (0.900)	-1.159 (0.894)
样本量	6988	6914
调整 <i>R</i> <sup>2</sup>	0.423	0.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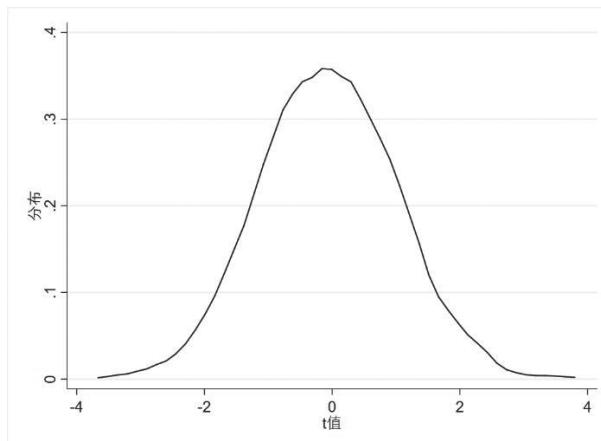


图 2 安慰剂检验

## 六、影响机制检验

一个地区种植水稻还是小麦,为什么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呢?水稻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可能的分析思路。种植两种不同的作物需要不同的劳动量、设施等,从而在长达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会造就人际交往合作的不同需要和方式,也就孕育了不同的文化。种植水稻需要的劳动量几乎是小麦的两倍,因而稻作区的农户常常需要错期播种以保证收割时有其他农户的帮忙;水稻的种植依靠复杂的灌溉体系,其修建和维护都需要村民们的协同工作,并且由于一家的用水时间和用量也会对其他家产生影响,因此协商和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与此相对比的是,小麦的种植就有较大的独立性,需要的合作较少。通过本文之前的分析,CEO 的信任水平和风险态度都有可能是水稻种植影响公司违规的机制。

本文使用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计算各省的社会信任和风险态度两个文化维度。对于 CGSS 中的问题“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的?”,本文将“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五种回答,分别赋值为 1、2、3、4、5,并计算出各省的社会信任平均值,作为 CEO 籍贯地的社会信任水平(*Trust*),其值越大代表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对于 CGSS 中的问题“您是否同意:如果有多余的钱,我会投资到有风险但回报高的项目上”,本文将“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五种回答,分别赋值为 1、2、3、4、5,并计算出各省的风险态度平均值,作为 CEO 籍贯地的风险态度(*Risk*),其值越大代表越偏好风险。

接下来本文使用逐步回归法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具体模型如下:

$$Fraud = \varphi_1 + \beta_1 Rice + \mu Z + \varepsilon_1 \quad (4)$$

$$Trust = \varphi_2 + \beta_2 Rice + \mu Z + \varepsilon_2 \quad (5)$$

$$Fraud = \varphi_3 + \beta_3 Rice + \beta_4 Trust + \mu Z + \varepsilon_3 \quad (6)$$

和

$$Fraud = \varphi_1 + \beta_1 Rice + \mu Z + \varepsilon_1 \quad (7)$$

$$Risk = \varphi_4 + \beta_5 Rice + \mu Z + \varepsilon_4 \quad (8)$$

$$Fraud = \varphi_5 + \beta_6 Rice + \beta_7 Risk + \mu Z + \varepsilon_5 \quad (9)$$

表 6 报告了影响机制分析的结果。对于社会信任文化的中介效应,列(2)将社会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水稻种植方式与社会信任的关系强弱,结果表明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水稻种植与低社会信任相联系,符合我们的理论推导,列(3)将社会信任加入基准回归方程,结果显示,社会信任的估计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水稻种植比例的系数由 0.28 下降至 0.189,因此验证了 H1。

对于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列(4)将风险态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水稻种植方式与风险态度的关系,结果表明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水稻种植与高风险偏好相联系,符合我们的理论推导,列(5)将风险态度加入基准回归方程,发现一方面,风险态度的估计系数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正,另一方面,水稻种植比例的系数由 0.28 下降至 0.25,因此验证了 H2。

表6 影响机制研究

变量	基准		社会信任		风险态度	
	(1) <i>Fraud</i>	(2) <i>Trust</i>	(3) <i>Fraud</i>	(4) <i>Risk</i>	(5) <i>Fraud</i>	
<i>Rice</i>	0.280*** (0.074)	-0.267*** (0.006)	0.189** (0.086)	0.296*** (0.015)	0.250*** (0.077)	
<i>Trust</i>			-0.335** (0.164)			
<i>Risk</i>					0.119* (0.06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i>	-0.650 (0.843)	4.587*** (0.068)	0.973 (1.108)	3.130*** (0.145)	-0.986 (0.865)	
样本量	7048	7140	7048	7140	7048	
调整 <i>R</i> <sup>2</sup>	0.109		0.109		0.109	

## 七、拓展性研究

### (一) 儒家文化的调节作用

中国地域广袤,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在不同的区域不尽相同。举例来说,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伦理规范“三纲五常”中有“夫为妻纲”之说,将妻子视为丈夫的从属,体现了男女性别的不平等,但是这种不平等在各地程度不一。相比南方,北方的大男子主义和性别歧视更加严重,北方女性在家庭决策权和劳动参与积极性方面也与性别文化更平等的南方女性有着显著的差距<sup>①</sup>。丁从明等的研究则表明,相对小麦区,水稻区的女性有更高的家庭决策地位和外部劳动参与率,而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种植水稻需要的细致与灵活使女性的比较优势得以凸显,进而提高了女性的议价能力<sup>②</sup>。因此,本文认为种植水稻与儒家文化的影响力之间在共同塑造地区文化时可能存在某种相互影响的联系。另一方面,儒家文化所包含的“义利”的价值观和“至诚”的道德观等,都对违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综上,本文认为儒家文化影响可能能够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需要对其进行检验。

本文沿着曲阜作为孔子诞生地能够较纯正地反映儒家文化效应的思路,用 Arcgis 计算出 CEO 籍贯地距离山东曲阜——孔子文化发源地的直线地理距离,构造出儒家文化影响力变量(*Confucianism*, 100km)。理论上,距离曲阜越近,受儒家文化影响可能越大,故该变量数值越小表示儒家文化影响力越大。为了检验其可能的调节作用,本文将儒家文化影响力和水稻种植比例进行中心化后相乘,一并加入回归模型当中。结果显示,一方面, *Confucianism*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CEO 籍贯地受儒家文化影响力越小,其所在公司越容易违规,这与文献中的结论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水稻种植比例与儒家文化影响力的交乘项的系数在 1% 水平上也显著为正,这表明在种植水稻的地区,儒家文化影响力的羸弱与缺乏会进一步增大该地区成长的 CEO 所在公司的违规概率,儒家文化与稻

① Gao H., Lin Y., Ma Y., "Sex Discrimination and Female Top Manager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6, 138(4): 683–702.

② 丁从明、董诗涵、杨悦瑶:《南稻北麦、家庭分工与女性社会地位》,《世界经济》2020年第7期。

作文化之间在影响公司违规方面有一定的相互替代关系。

## (二)CEO 学历的调节作用

CEO 的受教育程度关乎其认知水平、思维模式以及价值观等,进而也会影响 CEO 的决策能力,而学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受教育水平。CEO 学历越高,其处理信息能力和学习能力往往越强,能够更加准确地预判决策的执行结果,降低失误率。此外,有研究发现,随着管理者学历的提高,其价值观的形成会更多地受到社会责任的影响,越是高学历的管理团队越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因此,可以看出,CEO 受教育水平与 CEO 所处的文化环境一样,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CEO 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此两者如何相互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根据国泰安数据库,CEO 的学历数据表示为:1= 中专及中专以下,2= 大专,3= 本科,4= 硕士研究生,5= 博士研究生,6= 其他(以其他形式公布的学历,如荣誉博士、函授等),7=MBA/EMBA。由于“其他”与“MBA/EMBA”的学历水平不易评估,因此本文删除这部分样本。首先,本文按照“本科及以下”和“本科以上”将样本分为较低学历组和较高学历组分别回归。结果显示,较低学历组中 *Rice* 的系数几乎是较高学历组的两倍,显著性也高于较高学历组,这表明水稻文化对学历较低的 CEO 作用更大。接着,本文使用了学历与籍贯地水稻种植比例的交乘项,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7 中列(4),发现其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水稻文化对于公司违规的正向影响作用。同时,列(4)的结果还表明,CEO 的受教育水平与公司违规概率负相关。

表 7 调节作用分析

变量	儒家文化		CEO 学历	
	(1)		(3)	
	<i>Fraud</i>	较高 <i>Fraud</i>	较低 <i>Fraud</i>	(4) <i>Fraud</i>
<i>Rice</i>	0.194** (0.081)	0.280** (0.130)	0.527*** (0.131)	0.821*** (0.253)
<i>Confucianism</i>	0.014*** (0.005)			
<i>Rice</i> × <i>Confucianism</i>	0.050*** (0.018)			
<i>Degree</i>			-0.050** (0.020)	
<i>Rice</i> × <i>Degree</i>			-0.111* (0.06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i>	-0.304 (0.858)	0.124 (1.501)	-0.084 (1.404)	-0.306 (0.962)
样本量	7048	2673	2706	5602
调整 <i>R</i> <sup>2</sup>	0.111	0.135	0.183	0.126

## (三)基于舞弊三角理论的异质性分析

Albrecht 提出的著名的企业舞弊三角理论认为,企业舞弊的产生是由压力(Pressure)、机会

(Opportunity)和自我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三要素组成<sup>①</sup>。压力要素指的是行为动机,比如经营或财务上的困境或对资本的急迫需求等;机会要素是指可进行企业舞弊而又能掩盖起来不被发现或能逃避惩罚的时机,比如信息不对称,审计制度不健全,缺乏惩罚措施或者缺乏发现舞弊行为的内部控制等;自我合理化要素指的是企业舞弊者必须找到某个理由,使企业舞弊行为与其本人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相吻合,无论这一解释本身是否真正合理。

本文的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CEO籍贯地水稻种植比例,是通过“稻作经济→稻作文化→CEO心理→企业行为”这一逻辑链条对企业违规造成影响的,历史上种植水稻所必须的邻里之间相互协调等因素造就了内群体集体主义等文化,从而影响了来自于稻区的CEO的信任水平和风险偏好等,进而才影响了CEO对于违规行为的态度。由此可见,水稻种植作用于三角理论中的自我合理化要素。那么,当三要素当中的压力与机会要素不同的时候,作为自我合理化要素的水稻种植比例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就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 压力要素。本文选择了杠杆率和资产回报率两个指标来代表公司的财务和经营状况,以此来衡量公司所可能面临的违规动机。杠杆率衡量了公司举债经营的程度,过高的杠杆率意味着较高的风险,一旦受到经济环境或行业状况恶化的威胁,就会产生财务困境,受到债权人等的质疑;资产回报率则衡量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其值越高表示公司利用资产的能力越强;恶化的财务状况加上资本市场对于负面信息的放大效应,高管职业发展前景和薪资水平会受到影响,甚至面临被解雇,所以过高的杠杆率和过低的资产回报率会增大CEO的违规压力。

本文将全部样本根据杠杆率/资产回报率是否高于所在行业平均值进行分组,结果报告在表8 Panel A。可以看到,对舞弊压力较小的企业(低杠杆、高资产回报率),CEO籍贯地水稻种植比例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绝对值明显大于基准回归的系数绝对值,而在舞弊压力较大的企业,其显著性更弱且绝对值更小。这表明,CEO所带有的稻区文化与公司违规在公司违规压力不强的时候更加相关,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三角理论中的压力因素的影响可能强于自我合理化因素的影响。

2. 机会因素。CEO是否兼任公司董事长影响了公司的内部控制、违规能力等,公司所在地的法律环境则影响了实施违规可能面临惩罚的概率以及惩罚力度等,这两者是从内外部机会要素影响CEO的违规行为。在机会要素不同的情况下,影响CEO心理文化的稻作文化可能起到不一样的作用,因此本文针对其做异质性分析,结果报告在表8 Panel B中。

本文对CEO是否兼任董事长和公司所在地的法律环境是否高于平均值对全部样本进行分类。结果表明,在舞弊机会较大的公司(两职合一、所在地法律环境较差),CEO籍贯地水稻种植比例系数明显高于基准回归,并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反之,在舞弊机会较小的公司(非两职合一、所在地法律环境较好),主要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都有所降低,说明影响CEO自我合理化因素的稻区文化在违规机会较大时作用更大。

<sup>①</sup> Albrecht W. S., *Fraud Examination*, Mason, OH: Thompson, 2003.

表8 异质性分析

Panel A: 压力要素异质性		杠杆率		ROA	
变量		高于平均	低于平均	高于平均	低于平均
		<i>Fraud</i>	<i>Fraud</i>	<i>Fraud</i>	<i>Fraud</i>
<i>Rice</i>		0.028 (0.156)	0.358*** (0.089)	0.346*** (0.120)	0.201** (0.09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i>		0.735 (1.865)	-0.920 (1.029)	0.368 (1.343)	-1.568 (1.124)
样本量		1375	5527	2951	3879
调整 $R^2$		0.141	0.116	0.123	0.113

Panel B: 机会要素异质性		两职合一		法律环境	
变量		董事长	非董事长	高于平均	低于平均
		<i>Fraud</i>	<i>Fraud</i>	<i>Fraud</i>	<i>Fraud</i>
<i>Rice</i>		0.454*** (0.120)	0.185* (0.099)	0.263** (0.119)	0.325*** (0.1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i>		-2.400* (1.434)	0.329 (1.139)	0.101 (2.334)	-1.601 (1.326)
样本量		2554	4203	3339	3283
调整 $R^2$		0.131	0.111	0.125	0.118

## 八、结论与启示

南稻北麦的种植方式差异是中国历经数千年历史而最终稳定下来的农业格局,也是中国农耕文明时代最主要的特征,不仅影响了南北方的饮食习惯,同样也塑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地域文化,而这些不同的思维与文化可能会对包括公司治理在内的一系列经济行为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对2003—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研究,使用Probit模型,发现公司CEO籍贯地种植水稻的比例越高,违规的概率也相应增大。CEO籍贯地的水稻播种面积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比例每提升10%,企业进行违规的概率就增大0.52%。同时,本文检验了水稻种植比例影响公司违规的机制,发现种植水稻所引起的社会信任缺失和对风险的偏好是CEO进行公司违规的重要机制。此外,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本文还发现CEO籍贯地的儒家文化影响力和高管学历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儒家文化影响力的羸弱与缺乏会进一步增大水稻种植对公司违规的影响,高管学历也起到了一定的负向调节作用。基于舞弊三角理论,本文还检验了在不同压力与机会要素下,水稻种植的异质性影响,发现了CEO籍贯地水稻种植比例在舞弊压力小、机会大的公司能够对公司违规起到更大的影响。

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是我国数千年来形成的农耕文明的重要特征,其本身及其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南北思维方式和文化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客观事实,需要得到承认和尊重。本文通过研究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实际上是研究了南北的文化差异对于公司违规的影响,能够得到以下启示:第一,企业在聘用CEO时不应该忽略其文化背景,应选择有与企业发展阶段相符的文化心理的

CEO。例如,当企业内部控制松散、财务经营状况堪忧时,聘请偏好风险的CEO可能会增大从事违规的概率;而当企业内部治理体系良好,风险偏好型CEO则可能有助于企业创新,实现企业价值。第二,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固然对公司违规有一定影响,但法律、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等正式制度仍然是影响公司违规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企业应该不断完善内部治理体系,通过对各类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的关注,及时约束企业可能出现的违规行为;国家也应该制定并严格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大企业违规的成本代价,从内外两方面共同抑制企业违规行为。此外,正式制度应与非正式制度相互配合,例如,稻区文化下的CEO由于缺少对社会的广泛信任,更容易进行违规,那么就更需要能够有效保护企业利益的法律环境,为商业活动减少不必要的不确定性,促进合作格局的形成,弥补社会信任的缺失,降低企业的违规动机。

与此同时,本文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本文没有解决公司违规的实证研究中面临的部分可观测的难题,即违规样本并不是实际上实施违规的全部样本,而仅仅是实施并被发现之后的违规样本。本文的公司违规数据来自于国泰安,实际上是将实施违规与被发现违规混同,会造成对公司违规的低估。另外,本文着重解释了水稻理论并以其为基础,但是水稻理论至今仍然受到不少质疑,其准确性还有待继续检验。

责任编辑:孙继国 朱晴晴

## Rice Planting and Corporate Mis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Rice Theory

Hu Haifeng<sup>1</sup> Feng Jian<sup>2</sup>

1.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of misconduct by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over the period of 2003-18,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ot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ice-farming and corporate misconduct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proportion of rice grown in the CEOs' hometowns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likelihood of corporate misconduct and that the low social trust and high risk-preference cultures brought by rice-farming economy are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he cultural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and rice-farming culture have some sub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in corporate misconduct. The higher degrees of the CEOs can inhibi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rice-farming culture on corporate misconduct to some degree. Based on the Fraud Triangle Theory, this study also test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nfluence that rice farming undergoes while facing different operating pressure and misconduct opportunities, and find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rice grown in the CEOs' hometowns plays a greater role in companies with low operating pressure and greater misconduct opportunities.

**Key words:** corporate misconduct; southern rice and northern wheat; cultural difference; CEO characteristics; collectivism

# 行业特定知识转移与分析师预测质量： 来自券商机构并购的证据

王 垒 冯明聪 沙一凡

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当前频发的“研报门”事件使得如何提升分析师预测质量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并购作为券商获取外部知识资源的有效途径,是分析师提高业务水平的重要手段。为此,借助券商机构并购事件构建多时点DID模型,基于知识转移视角探究了行业特定知识对于分析师预测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券商机构并购能够有效改善分析师预测质量,降低分析师预测偏误和预测分歧;且这一改善效应在吸收合并与控股合并的并购事件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客户公司地理距离邻近、分析师知识差距较大以及工作年限较短时,并购后分析师预测质量的改善效果越明显。基于知识转移的视角,明晰了分析师预测质量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对于监管机构制定和完善有关券商并购重组的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券商机构并购;知识转移;分析师预测质量;行业专长

中图分类号: F271; F8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2-0055-17

## 一、引言

优化信息生态环境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的题中应有之义,证券公司作为专业的市场研究机构,提升研报质量成为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的重要手段。近年来,资本市场中频发的分析师报告内容与企业实际经营状况不符的“研报门”事件,引发投资者对分析师预测报告有效性的质疑。作为知识密集型行业,券商的专业程度和服务水平取决于从业者的能力高低<sup>①</sup>,其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专业化发展之路,培养专业化人才队伍,形成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的行业格局<sup>②</sup>。为满足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分析师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国内券商在“打造航母级头部券商”的号召下,掀起新一轮并购浪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机构共同持股下的上市公司ESG‘漂绿’治理效应及机制研究”(23BGL108)、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ESG评级分歧与公司债券市场反应信息效应、影响机制与功能治理”(ZR2023MG013)以及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tsqn20230608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垒,男,山东淄博人,工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司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冯明聪,男,山东聊城人,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司金融研究;沙一凡(通讯作者),女,山东德州人,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公司金融和金融治理研究。

① 谢光华、郝颖、李思乐:《行业集中度、分析师行业专长与预测准确性》,《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年第2期。

② 易会满:《坚持稳中求进 优化发展生态 推动证券行业高质量发展新进步》,2021年5月21日,<http://www.csrc.gov.cn/csrc/c100028/cec41f02a7e044a06a431cf4402b58614/content.shtml>

潮,2020年《支持证券基金行业实施组织管理创新》的出台,进一步强调要鼓励证券机构实施市场化并购重组,促进行业快速发展。尽管并购是券商快速扩大规模的重要手段<sup>①</sup>,但并购后的两家券商能否形成资源“1+1>2”的整合效应,才是突破行业内生性增长瓶颈<sup>②</sup>、实现我国证券业做优做强、提升服务能力的关键。

高素质的人才和优质的服务是证券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从业者和资本市场的信息中介,券商分析师往往通过实地调研、与高管建立密切关系等方式挖掘企业未披露的私有信息<sup>③</sup>,并依托自身特定行业经验对相关信息进行专业解读,实现对企业未来股价收益的精准预测<sup>④</sup>。然而,分析师盈余预测与公司未来发展趋势相符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析师在行业内积累的多元化知识与经验所形成的专业能力<sup>⑤</sup>。作为消除组织边界、驱动知识转移的方式,并购所引发的知识转移在帮助企业获取先进的管理能力与多元化知识<sup>⑥</sup>、提升企业整体投入产出效率<sup>⑦</sup>、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却也可能会引发组织文化冲突对彼此转移知识的员工造成理解障碍,或仅仅转移简单且重复性知识造成知识重叠以致知识转移的质量难以保证<sup>⑧</sup>,导致组织运行效率低下。那么,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券商并购所带来的规模扩大能否有效转化为服务能力的增强,提升分析师预测质量?进一步地,这一改善效应是否源于并购后券商分析师之间的行业特定知识资源的转移?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从知识转移视角,拓展学术界有关分析师预测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引导券商行业做优做强以推动资本市场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为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基于知识转移视角,以2010—2015年所发生的券商并购事件作为外生冲击,并依据券商分析师所服务客户的市场份额划分其行业专长高低,将并购后不具备行业专长的分析师预测的上市公司作为处理组,其余公司为对照组,基于多时点DID模型研究券商行业知识转移对分析师预测偏误和分歧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性工作如下:首先,基于券商机构并购事件实现了对知识转移量化研究的突破。以往有关知识转移的研究普遍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所获取的截面、静态数据,而本文则创新性地借助券商并购事件这一外生冲击,为知识转移提供了理想的检验场景,借助并购前后分析师对客户公司预测质量的变化实现了对知识转移动态、持续过程的刻画,为探究组织间知识转移的影响效应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次,从知识转移视角拓展了分析师预测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研究大都从理性决策<sup>⑨</sup>、行为偏差<sup>⑩</sup>、利益冲突<sup>⑪</sup>等角度出发,

① 蔡庆丰、陈熠辉:《开发区层级与域内企业并购》,《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6期。

② 余怒涛、袁博、张华玉:《连锁股东能降低并购超额商誉吗?》,《财务研究》2022年第5期。

③ 杨国超、刘琪:《中国债券市场信用评级制度有效性研究》,《经济研究》2022年第10期。

④ 谭松涛、崔小勇:《上市公司调研能否提高分析师预测精度》,《世界经济》2015年第4期。

⑤ 谢光华、郝颖、李思乐:《行业集中度、分析师行业专长与预测准确性》,《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年第2期。

⑥ 郑素丽、朱俊霖、常晓然:《基于元分析技术的跨国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研究——前因、结果与边界条件》,《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年第17期。

⑦ 王宛秋、张潇天:《谁更易在跨界技术并购中获益?》,《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5期。

⑧ 孟凡臣、谷洲洋:《并购整合、社会资本与知识转移:基于吉利并购沃尔沃的案例研究》,《管理学刊》2021年第5期。

⑨ Lee Charles M.C., Eric C. So., "Uncovering Expected Returns: Information in Analyst Coverage Proxie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7, 124(2): 331–348.

⑩ Xue H., "Independent and Affiliated Analysts: Disciplining and Herding",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7, 92(4): 243–267.

⑪ Firth M., "The client is King: Do Mutual Fund Relationships Bias Analyst Recommendat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3, 51(1): 165–200.

忽视了分析师特定行业知识水平对自身预测质量的影响。然而,作为专业的市场研究者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从业者,分析师预测质量的高低本质上取决于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能力。而本文从知识转移的角度出发,丰富了分析师预测质量影响因素研究,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最后,挖掘了券商并购后通过知识转移改善分析师预测质量的作用机制。本研究通过区分影响知识转移的主体和客体因素分析知识转移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影响机制,更精确地识别知识在不同分析师之间所发挥的作用,不仅有助于明晰券商间知识转移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还可以为证监会制定有关券商并购重组的政策提供参考。

## 二、文献综述

### (一) 分析师预测质量的相关研究

作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信息中介,具有专业知识的券商分析师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价值投资、改善信息透明度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够借助实地调研<sup>①</sup>等方式与企业管理层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以获取更多的未公开信息,并结合自身专业知识对企业前瞻性信息予以分析,在进行专业解读企业信息的同时积累个人行业经验,实现自身预测质量的改善。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分析师能够广泛收集上市公司信息<sup>②</sup>,并结合行业发展状况和经济走势,对企业未来盈余的变化趋势进行专业的分析和合理预期,并做出精准的盈余预测<sup>③</sup>,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与此同时,由于同行业企业经营环境、生产产品的相似性,使得分析师能够凭借自身行业专长对特定行业内企业信息进行专业解读<sup>④</sup>,根据所处行业特点获取更多行业关键性经营指标信息,随着行业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使分析师筛选的信息更接近于企业真实经营状况并且信息质量更高<sup>⑤</sup>,也意味着分析师拥有的公开信息更多、信息趋同度更高<sup>⑥</sup>,其甄别和处理信息的成本也会逐步降低<sup>⑦</sup>,进而提升决策效率,改善分析师预测质量。

### (二) 企业并购与知识转移的相关研究

知识是企业内最具有战略价值的资源,企业往往通过并购获取外部知识资源以保持竞争优势,其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于知识转移。对于并购与知识转移相关研究,目前学者在企业并购隐性

① 谭松涛、崔小勇:《上市公司调研能否提高分析师预测精度》,《世界经济》2015年第4期。

② 谢光华、郝颖、李思乐:《行业集中度、分析师行业专长与预测准确性》,《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年第2期。

③ 刘永泽、高嵩:《信息披露质量、分析师行业专长与预测准确性——来自我国深市A股的经验证据》,《会计研究》2014年第12期。

④ 翟淑萍、黄宏斌、毕晓方:《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投资者情绪与企业研发投入》,《科学学研究》2017年第6期。

⑤ Graaf J., "Can Sell-Side Analysts Compete Using Public Information? Analysts as Frame-Makers Revisited", *European Accounting Review*, 2023, 32(1): 141–167.

⑥ 杨青、吉贊、王亚男:《高铁能提升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度吗?——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金融研究》2019年第3期。

⑦ Franco G.D., Kothari S.P., Verdi R.S., "The Benefit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Comparability",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1, 49(4): 895–931.

知识逆向转移<sup>①</sup>、技术兼容性<sup>②</sup>、组织兼容性<sup>③</sup>与跨国知识转移等使用问卷调查<sup>④</sup>进行研究,并指出企业通过实施并购获取对方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的知识,但主要的目的是获取不易编码的隐性知识。在并购整合过程中,双方逐渐建立信任基础,将拥有的隐性知识更容易转移给对方从而使企业获取深层次的知识资源,所转移的知识的种类与内容会更加多元化<sup>⑤</sup>。而在此过程中,知识转移的效果受到并购双方的环境、主体和关系因素的影响。第一,知识转移与环境因素有关。并购双方的文化距离越大,双方的组织结构、管理机制差异就越大,因此,双方就越有可能具有不同的知识储备<sup>⑥</sup>,能够促进双方资源互补<sup>⑦</sup>,形成知识互补效应,从而提升并购知识转移绩效。第二,知识转移与主体因素有关。一方面,并购方通过并购能够获取被并购方的知识并将其内化,进而为企业创造价值,其自身的知识储备和知识吸收能力<sup>⑧</sup>都会影响并购知识转移的绩效水平。第三,知识转移与关系因素有关。并购双方之间的知识关联性越高,就越有利于被并购方在知识转移中向并购方转移知识,也越有利于并购方认识到接受被并购方知识的潜在好处,从而提升知识转移的效率<sup>⑨</sup>。总之,知识转移是企业通过并购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企业双方通过有效的沟通,化解知识转移过程中由并购双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制度距离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sup>⑩</sup>,营造有利于知识转移的氛围,进而将知识整合、利用和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sup>⑪</sup>。

### (三) 文献述评

纵观已有研究,现有文献仍存在以下缺口:第一,尽管现有研究采用问卷、访谈等方法获取截面数据对知识转移进行了测度,但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截面数据的静态特征导致了无法精准捕捉知识转移的动态变化。第二,已有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影响因素的挖掘和分析,但知识作为分析师的重要资源,现有文献忽视了知识转移对分析师预测质量产生的影响,导致无法充分发挥行业内分析师专业知识的作用。第三,目前大部分学者集中于并购与知识转移的宏观层面分析,忽视了并购过程中知识型人员对知识转移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从而无法深刻理解知识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改善作用。

① 苏屹、郭稳、张傲然:《基于大数据技术的企业并购隐性知识逆向转移》,《科研管理》2022年第9期。

② 王向阳、齐莹、郗玉娟:《技术兼容性、惯例兼容性与跨国并购知识转移》,《科学学研究》2018年第11期。

③ 王向阳、齐莹、金慧琦:《组织兼容性、跨国并购知识转移与企业国际化》,《科学学研究》2020年第10期。

④ 苏超、周蕊:《问卷调查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图书馆学研究》2012年第12期。

⑤ Vrontis D., Thrassou A., Santoro G., et al., "Ambidexterity, External Knowledge and Performance in Knowledge-Intensive Firms",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7, 42(2): 1-15.

⑥ Castro R., Moreira A.C., "Mapping Internal Knowledge Transfers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23, 13(1): 16.

⑦ Jasimuddin S. M., Li J., Perdikis N.,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ole of Knowledge Characteristics and Tools on Knowledge Transfer in China-based Multinationals", *Journal of Glob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9, 27(1): 165-195.

⑧ Wang X., Wang J., Zhang R., "The Optimal Feasible Knowledge Transfer Path in a Knowledge Creation Driven Team", *Data & Knowledge Engineering*, 2019, 119: 105-122.

⑨ Corral D. Z., Graciela, Lindsay N., et al., "Knowledge Quality,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Study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SM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9, 53: 145-164.

⑩ Xu J., He M., Jiang Y., "A Novel Framework of Knowledge Transfer System f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Based on Knowledge Graph and Transfer Learning",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022, 199: 116964.

⑪ 王宛秋、张潇天:《谁更易在跨界技术并购中获益?》,《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5期。

### 三、研究假设

组织行为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并购能够通过消除组织边界使并购双方进行更好的业务共享与双元共治从而实现价值共创<sup>①</sup>，实现企业运行效率的提升。一方面，并购实现了组织内部的业务共享。由于单个组织内的知识无法高效利用，还可能会对组织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sup>②</sup>，而并购后所带来的知识资源以及业务资源，能够消除组织边界以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资源，借助于知识管理，通过分享彼此业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以提升业务质量，发挥知识最大效用，进而提升整个组织运营效率，为企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另一方面，并购有利于组织内部双元共治。组织并购驱动组织跨界融合重塑组织治理模式，通过运用双方共同接受的管理方法，确保彼此高效管理运营机制，同时精准识别组织双方的利益关系，共同参与业务流程、组织结构的有效调整，从而确保组织共同进行持续高效治理，促进企业长远发展。因此，券商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通过并购消除组织边界，打破券商之间的“隔阂”，通过业务共享与双元共治实现优势知识资源与技能的有效转移，不断提高券商整体服务水平。

券商并购通过打破组织边界，能够促进知识转移，其过程主要体现在知识获取和知识配置两个方面。一方面，券商并购获取互补性知识以提升业务能力。券商业务的发展需要知识、人员、技术等资源的不断支撑，然而由于资源的稀缺性<sup>③</sup>，导致无法充分发挥券商潜在优势，券商通过并购形成一体逐渐建立信任基础，双方相互传递知识的意愿增加，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知识获取，尤其是隐性知识的获取，更容易地获得知识互补性资源，对于具有行业专长的分析师，其所积累的行业经验更为丰富，从而增加知识资源的多样性，迅速占领新行业前沿，提高分析师业务能力。另一方面，券商并购能够合理配置知识资源以提升分析师决策效率。券商并购使组织边界消失为内外部信息提供了平台与载体，打破了知识流、信息流和资源流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中的配置与利用<sup>④</sup>，使不同券商之间进行更好的资源配置。分析师知识的合理配置与管理有助于实现知识存量的扩大和知识创新能力的提高，使组织能够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这种知识的有效配置增加了分析师可利用的知识资源，将不同分析师的丰富知识经验与企业信息相结合，尤其是具有行业专长的分析师利用特有知识经验，将其具备的知识转移给他人，在所擅长的行业对企业信息发表独到见解，充分运用企业财务报告中被其他分析师所忽略的信息，挖掘出更多有价值行业内私有信息，以改善分析师预测质量。

H1：券商并购改善分析师预测偏误并降低预测分歧。

① Xi Y. J., Wang X. Y., Zhu Y. X., "Organizational Unlearning and Knowledge Transfer in Cross-Border M&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Knowledge Integration from a Routine-Based View",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20, 24(4): 841–860.

② 张琦、刘人境、杨晶玉：《知识转移绩效影响因素分析》，《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2期。

③ Bolade S., "A Complementarity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Resources",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2022, 13(2): 1300–1320.

④ Davidson N., Major C. H., "Boundary Crossings: Cooperative Learn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Problem-Based Learning", *Journal on Excellence in College Teaching*, 2014: 25(3&4): 7–55.

## 四、研究设计

###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证监会官网所发布的公告及主要财经报纸的报道,收集得到 25 宗券商并购事件<sup>①</sup>。考虑到本文需要根据券商双方分析师所预测客户公司的市场份额划分行业专长,因此在剔除无法划分行业专长的并购事件后,最终选取 2010 年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14 年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14 年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2015 年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重组为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四宗并购事件作为外生冲击。为更好地刻画知识转移的动态特征,本文基于上述四宗并购事件,关注每个券商并购事件发生当年以及前后三年分析师预测质量的变化,即以 2007—2018 年券商客户作为研究样本,并进行如下筛选:剔除金融类行业公司样本;剔除 ST、\*ST 的公司样本;剔除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为避免异常值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 Winsorize 处理。其中,分析师预测偏差和分歧数据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并通过手工计算得到,其余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

### (二) 变量定义

####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通过分析师预测偏误(*FE*)和分歧(*FD*)<sup>②</sup>对分析师预测质量进行衡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FE = \frac{|Mean(FEPS) - MEPS|}{PRICE} \quad (1)$$

$$FD = \frac{SD(FEPS)}{PRICE} \quad (2)$$

其中, *Mean(FEPS)* 为每个证券分析师季度最近一次每股盈余预测的均值; *MEPS* 为实际每股盈余; *SD(FEPS)* 为所有分析师当年最近一次每股盈余预测的标准差; *PRICE* 为公司期初股票价格。为避免量化单位的影响,在回归分析中将因变量扩大 100 倍处理。

#### 2. 解释变量

本文基于所筛选的四宗券商并购事件作为外生冲击,依据券商行业市场份额划分行业专长,进而对具有不同行业专长券商所服务的客户进行分组,构建相应的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具体而言:(1)确定划分标准:对于每一宗券商并购事件,本文通过券商所在行业的市场份额来衡量

① 纵观我国券商发展历史,从分业经营到市场化并购,共经历了四轮券商并购浪潮,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第一阶段(1995—2001):为鼓励券商从“混业经营”向“分业经营”转变,引发第一次并购潮,这一阶段出现了东方证券收购抚顺证券、国泰证券与君安证券合并等并购事件。第二阶段(2004—2006):为实现“综合治理”的目的,部分优质券商被国家政策性投资公司和其他优质券商托管,引发证券行业第二次并购潮,这一阶段出现了华泰证券收购亚洲证券、光大证券收购天一证券等并购事件。第三阶段(2008—2010):为避免同一股东旗下证券公司间的关联交易与同业竞争,“一参一控”引发第三次并购潮,出现新时代证券收购上海远东证券、华泰证券收购华泰联合证券等并购事件。第四阶段(2012 至今):出于提升券商综合实力的目的,引发“市场化”并购潮,出现国泰君安收购上海证券、申银万国证券与宏源证券并购重组等事件。经过梳理,本文共收集得到 25 宗券商并购事件。

② 褚剑、秦璇、方军雄:《中国式融资融券制度安排与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管理世界》2019 年第 1 期。

其是否具有该行业的专业知识,这是因为券商分析师往往同时对不同行业的企业展开预测,其在各行业具有的知识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而在竞争性市场中专业能力相对更强的券商往往会影响到更多客户的青睐。因此,本文根据券商在并购前一年所处的行业以其市场份额进行排名。若券商在行业内比其他券商排名在前,则视为该券商在行业内具有专长,反之则不具有专长。(2)区分实验组与对照组:对于每一宗券商并购事件,本文依据券商在前一年的相关行业专长,将其所服务的客户公司划分为实验组与控制组。若并购后的券商对其并购前不具备行业专长的客户公司预测质量得到改善,则意味着并购中存在知识转移,否则不存在<sup>①</sup>。因此,本文区分并购方相比于被并购方不具有行业专长所预测的行业客户为处理组,其他客户公司为对照组。(3)构建解释变量(*Transfer*):依据上述标准,将实验组客户公司*Transfer*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如下控制变量<sup>②</sup>:企业规模(*SIZE*)、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IP*)、股权集中指标(*SHR*)、两职合一(*DUAL*)、四大审计(*BIG4*)、账面市值比(*MB*)、营业收入增长率(*ORG*)、杠杆率(*LEV*)、普通股获利率(*ASA*)、市盈率(*PE*)、托宾Q值(*TQ*)。此外,本文还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券商并购固定效应。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分析师预测偏误	<i>FE</i>	见公式(1)
	分析师预测分歧	<i>FD</i>	见公式(2)
解释变量	处理变量	<i>Transfer</i>	券商并购后,经过具有行业专长券商所预测的公司为1,否则为0
	企业规模	<i>SIZE</i>	企业季度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i>IIP</i>	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股权集中指标	<i>SHR</i>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两职合一	<i>DUAL</i>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如果是为1,否则为0
	四大审计	<i>BIG4</i>	审计师是否来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如果是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	账面市值比	<i>MB</i>	企业季度末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比值
	营业收入增长率	<i>ORG</i>	(本季度营业收入 - 上季度营业收入) / 上季度营业收入
	杠杆率	<i>LEV</i>	企业季度末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
	普通股获利率	<i>ASA</i>	企业每股派息税后 / 今收盘价本期值
	市盈率	<i>PE</i>	当期收盘价 / (净利润 / 实收资本)
	托宾Q值	<i>TQ</i>	企业市值 / 资产总计

### (三)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2010—2015年四宗券商并购事件这一外生冲击构建多时点DID模型,探究券商并购

① 举例来说,在国泰君安并购重组上海证券事件中,上海证券在行业代码为D的“能源与水生产和供应行业”具有行业专长,而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在合并前不具备该行业的专长。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在两个证券公司合并后,上海证券公司在能源与水生产和供应行业的知识是否能够转移到国泰君安证券公司,从而改善国泰君安证券公司分析师对于D行业客户的预测质量?因此,为检验在合并后是否发生知识转移,本文将合并后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所服务的行业D的客户公司,如深圳能源公司,划分为实验组,其他行业客户为对照组。

② Zuo Y., Hu Y., Liu X., et al., "Corporate Misconduct and Analyst Forecasting Accuracy: Evidence from China",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22, 58(10): 3006–3022; 刘茵伟、张群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非线性影响——基于中国债券市场数据的研究》,《东方论坛》2023年第1期。

前后行业特定知识转移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影响,具体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FE_{it} / FD_{it} = \alpha_0 + \alpha_i Transfer_{it} + Controls + \delta_c + \gamma_j + \varphi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FE$  和  $FD$  代表分析师预测偏误和分歧。 $Transfer$  代表券商并购后被并购券商相比于券商是否在处理组客户所在行业具有行业专长,如果为是,则该项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下标  $i$ 、 $c$ 、 $j$ 、 $t$  分别表示企业、并购事件、行业、季度。 $\alpha_0$  为常数项; 系数  $\alpha_i$  表示具有不同行业专长的券商并购对券商中分析师预测质量的影响;  $Controls$  代表所有控制变量。与此同时,本文控制了券商并购固定效应( $\delta_c$ )、行业固定效应( $\gamma_j$ ),以避免券商并购事件、行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还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 $\varphi_t$ ),以控制随时间变化因素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影响。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

## 五、实证结果分析

###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师预测偏误( $FE$ )和分歧( $FD$ )的均值分别为 3.4025 和 1.8241,分析师预测偏误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 19.8105 和 0.0751,分析师预测分歧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 12.0049 和 0.0577,说明不同分析师的预测质量存在较大差异。在研究样本中,处理变量( $Transfer$ )均值为 0.1576,即 15.76%,说明券商并购中经过行业知识转移的分析师所预测企业的数量约为 1/6。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IIP$ )的均值为 0.4875,说明企业治理结构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量占比约为半数,外部治理监督效果好。账面市值比( $MB$ )的均值为 0.5722,说明企业的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占比较大。市盈率( $PE$ )的均值为 57.3905,说明企业在未来发展中具有较好的成长性。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FE$	16076	3.4025	3.1441	0.0751	2.5004	19.8105
$FD$	16076	1.8241	2.0159	0.0577	1.1406	12.0049
$Transfer$	16076	0.1576	0.3644	0	0	1
$SIZE$	16076	22.4446	1.3191	20.1938	22.2427	26.4297
$IIP$	16076	0.4875	0.2571	0.0068	0.5281	0.9499
$SHR$	16076	0.3607	0.1503	0.0909	0.3465	0.7500
$DUAL$	16076	0.2759	0.4470	0	0	1
$BIG4$	16076	0.0821	0.2745	0	0	1
$MB$	16076	0.5722	0.2417	0.1301	0.5543	1.1086
$ORG$	16076	0.1569	0.5121	-0.7183	0.0649	2.6693
$LEV$	16076	0.4039	0.2011	0.0456	0.3931	0.8395
$ASA$	16076	0.0030	0.0068	0	0	0.0345
$PE$	16076	57.3905	83.1676	5.7589	34.0807	608.8180
$TQ$	16076	2.2113	1.2980	0.9020	1.8041	7.6868

### (二) 基准回归

表 3 给出券商并购后是否发生行业知识转移与分析师预测偏误和分歧的回归结果,第(1)(2)列为仅控制券商并购事件固定效应、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分析师预测偏误和分歧均显著为负。第(3)(4)列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分析师预测偏误和分歧

在 1% 和 5% 水平上显著为负,券商并购后发生行业知识转移对分析师预测偏误(*FE*)和分析师预测分歧(*FD*)具有明显的改善效果,即券商并购之后,该券商中不具有行业专长的分析师通过互动与学习具有行业专长的被并购券商中的分析师,不同分析师之间进行相互学习彼此具有的行业专长,从而提高分析师所具有的知识与经验,因此分析师在对客户公司进行分析预测时,通过运用自身学习到的知识进行更加精准的预测以提高精准度并降低分歧, H1 得到验证。

表 3 券商并购对分析师预测质量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i>FE</i>	(2) <i>FD</i>	(3) <i>FE</i>	(4) <i>FD</i>
<i>Transfer</i>	-0.3668*** (0.1231)	-0.2426** (0.1019)	-0.3278*** (0.1119)	-0.2093** (0.0959)
<i>SIZE</i>			0.2853*** (0.0425)	0.2391*** (0.0313)
<i>IIP</i>			-0.8341*** (0.1516)	-0.7063*** (0.1130)
<i>SHR</i>			0.0468 (0.2567)	-0.0815 (0.1965)
<i>DUAL</i>			-0.1063 (0.0668)	0.0060 (0.0500)
<i>BIG4</i>			-0.2326 (0.1578)	-0.3528*** (0.1313)
<i>MB</i>			4.0573*** (0.3005)	2.1573*** (0.2313)
<i>ORG</i>			-0.1770*** (0.0494)	-0.0702** (0.0301)
<i>LEV</i>			-0.0207 (0.2266)	-0.0306 (0.1671)
<i>ASA</i>			-41.8692*** (4.8814)	-10.5665*** (3.1439)
<i>PE</i>			-0.0002 (0.0003)	0.0010*** (0.0002)
<i>TQ</i>			0.1184*** (0.0359)	0.0787*** (0.0284)
<i>-cons</i>	0.8329** (0.3791)	0.3055 (0.2656)	-7.1628*** (0.9549)	-5.7601*** (0.6904)
并购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R</i> <sup>2</sup>	0.2819	0.1129	0.3676	0.1818
<i>adj.R</i> <sup>2</sup>	0.2794	0.1098	0.3650	0.1784
<i>F</i>	68.7279***	21.9819***	77.7388***	29.0976***
<i>N</i>	16076	16076	16076	16076

注: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下显著。下同。

### (三) 异质性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券商通过并购的方式发生知识转移从而改善分析师预测质量,然而现实中券商并购的方式主要有吸收合并、新设合并和控股合并这三种并购方式<sup>①</sup>。由于不同的并购方式对券商后续

<sup>①</sup> 王咏梅、邓舒文:《事务所合并可以提高审计质量吗?——基于中国审计市场的研究》,《管理世界》2010 年第 12 期。

组织结构、文化、管理体制的整合存在差异可能使券商中的分析师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知识转移过程中,分析师对于知识吸收的效果可能存在不同从而影响分析师预测质量。因此,本文通过区分吸收合并、新设合并和控股合并三种方式,分析不同的并购方式是否会影响不同分析师知识转移从而影响分析师预测质量。

表4的(1)和(2)列是选择吸收合并的券商,可以看出解释变量 *Transfer*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采取吸收合并的券商对分析师预测质量具有较大的影响即分析师预测偏误和分歧得到了较好的改善。这可能是因为并购方具有较大的规模,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比较完善并且并购方对组织结构与人力资源进行了较好的整合,并且券商经过并购后使券商规模进一步扩大,从而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并购券商具有较强的组织治理能力,推动券商之间进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取长补短,通过较为完善的治理使企业的各种资源进行转移与吸收,尤其是对于知识这种无形资源,会更加容易发挥协同作用。表4的(3)和(4)列是选择控股合并的券商,可以看出解释变量 *Transfer*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说明采取控股合并的券商对分析师预测质量具有较大的影响即分析师预测偏误和分歧得到较好的改善。这可能是因为券商并购之后,双方仍然保持着独立法人资格,自身能够在业务上进行选择,其分析师在不同的券商中对客户公司进行预测,双方由于存在彼此竞争与合作关系从而促进双方交流互动和知识学习,使得分析师通过借助他人行业专长提高自身行业知识。表4的(5)和(6)列是选择新设合并的券商,可以看出解释变量 *Transfer* 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采取新设合并的券商对分析师预测质量没有较大的影响即分析师预测偏误和分歧没有得到较好的改善。这可能是因为对于新设合并的券商,往往属于是双方实力较为强大的券商,在企业文化与组织管理具有较大的差异,在并购之后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磨合,可能会对分析师的业务能力没有影响。另外,券商新设之后分析师在新的环境下与其他分析师交流互动的过程中由于环境陌生、与新同事交际较少,难以在思维上产生碰撞,从而使双方更不愿意进行知识与经验的分享,难以达到“1+1>2”的效果。综上所述,相比于新设合并,选择吸收合并和控股合并的券商能够显著提高分析师预测质量。

表4 不同并购方式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影响

变量	吸收合并		控股合并		新设合并	
	(1) FE	(2) FD	(3) FE	(4) FD	(5) FE	(6) FD
<i>Transfer</i>	-0.3845*** (0.1241)	-0.2463** (0.1008)	-0.4267* (0.2263)	-0.2859* (0.1702)	-0.5247 (0.5898)	-0.3826 (0.44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_cons</i>	-3.5406*** (0.8979)	-5.1644*** (0.6869)	-7.5686*** (1.1658)	-5.2338*** (0.7724)	-4.0708 (2.7694)	-5.2376** (2.1314)
并购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R</i> <sup>2</sup>	0.3354	0.1963	0.3877	0.1659	0.4418	0.2602
<i>adj.R</i> <sup>2</sup>	0.3286	0.1882	0.3841	0.1610	0.4072	0.2144
<i>F</i>	45.8630***	20.9179***	48.9889***	16.5445***	25.6341***	12.5631***
<i>N</i>	6255	6255	9014	9014	807	807

#### (四) 稳健性检验

##### 1. 平行趋势检验

多时点 DID 设计的潜在假设是券商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券商并购事件发生之前无系统性差异。如果实验组和对照组无法满足共同趋势的要求,那么券商并购前分析师预测质量的趋势差异将会导致估计结果的偏差。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将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检验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分析师预测质量在券商并购前是否具有平行趋势。本文通过改变券商并购时间的方法来检验平行趋势<sup>①</sup>。具体而言,将券商并购的实施时间分别提前 1—3 年,构建 3 个“伪券商并购虚拟变量”,然后纳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理论上,如果实验组和对照组符合平行趋势的要求,则此时分析师预测偏误(FE)和分歧(FD)不再显著;如果该变量依旧保持显著为负,则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可能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也即券商并购行业知识转移对分析师预测质量无显著治理效应。表 5 报告了平行趋势检验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券商并购实施前 1—3 年内,分析师预测偏误(FE)和分歧(FD)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估计系数均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在券商并购实施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分析师预测质量的变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的要求,本文的研究结论稳健。

表 5 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	提前 1 年		提前 2 年		提前 3 年	
	(1) FE	(2) FD	(3) FE	(4) FD	(5) FE	(6) FD
Transfer	-0.0321 (0.0967)	0.0154 (0.0757)	-0.0190 (0.1159)	0.1229 (0.0879)	-0.1465 (0.1070)	0.1416 (0.08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i>	-5.5544*** (0.7391)	-5.2559*** (0.4592)	-4.7539*** (0.8371)	-5.3679*** (0.5840)	-5.8646*** (1.1443)	-6.3222*** (0.9145)
并购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R</i> <sup>2</sup>	0.3849	0.1947	0.3905	0.1966	0.3993	0.2117
<i>adj.R</i> <sup>2</sup>	0.3823	0.1913	0.3874	0.1925	0.3956	0.2068
<i>F</i>	88.8437***	29.3124***	81.6423***	27.4590***	79.6745***	31.7381***
<i>N</i>	15251	15251	12152	12152	9804	9804

##### 2. 安慰剂检验

本文通过随机生成伪处理组虚拟变量和伪并购时间虚拟变量进行安慰剂检验<sup>②</sup>,具体做法为从所有样本中随机选取与原处理组相同数量的样本,并随机生成券商并购实施时间,构建客户与并购时间均随机的新处理组。基于此,重新估计基准回归模型,并随机重复 500 次实验,结果如图 1 和 2 所示。可以看出,散点大部分集中在 0 附近,且远离两条虚线的交点真实值,多数散点都位于虚线以上,同时说明在 10% 的水平上不显著。这意味着券商并购知识转移能够促进分析师预测偏误和分歧的改善效应没有受到其他未被观测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结果稳健。

① 张克中、欧阳洁、李文健:《缘何“减税难降负”:信息技术、征税能力与企业逃税》,《经济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② 白俊红、张艺璇、卞元超:《创新驱动政策是否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2022 年第 6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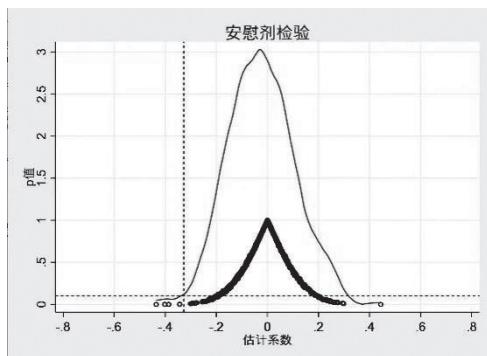


图1 分析师预测偏误安慰剂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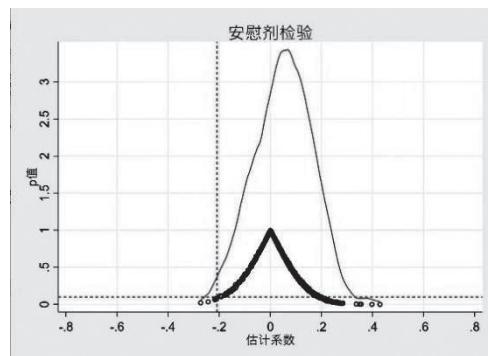


图2 分析师预测分歧安慰剂检验

### 3.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 PSM-DID )

虽然券商并购作为外生冲击事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但券商并购所选择的目标可能并非是完全随机选取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本文并购评估的“噪音”。同时,考虑到行业差异和公司自身的异质性,实验组和对照组在企业特征方面的差异也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的偏差。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为每一个实验组企业寻找与其最为相似的对照组企业,然后再利用匹配后的样本进行模型估计。表6汇报了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的回归结果。第(1)(2)列的结果表明,在消除企业特征差异后,分析师预测偏误(FE)和分歧(FD)均显著为负,研究结论稳健。

### 4. 排除干扰性因素

考虑到本文的研究样本区间正处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很多政策和冲击都可能会对分析师预测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干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梳理研究期间的有关券商重要政策变革,对分析师预测质量存在潜在影响的政策改革举措主要是2012年调研新规的出台。“2012年调研新规”是指在“研报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中国证监会在2012年提出要求上市公司在调研后的两天内公开披露调研人员具体身份和交流内容等信息。这一政策的颁布无疑显著改善了调研活动的透明度,同时也为外界提供了更加透明的各种信息。随着2012年调研新规的出台,分析师通过调研所披露的信息加以利用,从而提高了分析师预测精准度。本文认为,2012年调研新规的出台会对券商中分析师预测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调研新规在2012年首次颁布,所以本文剔除了2012年以及之前的研究样本,从而缓解该政策发布对本文实证研究的干扰。表6中第(3)(4)列的结果表明,在剔除2012年“调研新规”政策的干扰后,券商行业知识转移对分析师预测偏误和分歧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为负,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

表6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排除干扰性因素检验

变量	(1) FE	(2) FD	(3) FE	(4) FD
Transfer	-0.3529** (0.1486)	-0.2456** (0.1156)	-0.3668*** (0.1299)	-0.2477** (0.112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续表 6

变量	(1)	(2)	(3)	(4)
	FE	FD	FE	FD
<i>cons</i>	-5.3164*** (1.2783)	-6.0397*** (0.9356)	-2.1758** (1.0328)	-2.8120*** (0.7509)
并购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R</i> <sup>2</sup>	0.3734	0.1961	0.3566	0.1750
<i>adj.R</i> <sup>2</sup>	0.3661	0.1868	0.3540	0.1717
<i>F</i>	44.3427***	16.3721***	71.2908***	51.4600***
<i>N</i>	5776	5776	13720	13720

### 5. 其他稳健性检验

其一, 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本文以分析师乐观偏差(*Opt*)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师乐观偏差计算方法如下: 分析师某年某次对某股票预测的每股盈余减去该年股票的实际每股盈余的差值, 除以期初股票价格<sup>①</sup>。并重新进行回归, 具体结果见表 7 第(1)列, 可以看出 *Transfer* 变量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当券商并购发生知识转移时, 分析师乐观偏差将会降低, 研究结论稳健。其二, 增加控制变量。本文进一步在回归中对权益乘数(*QY*)进行控制, 具体结果见表 7 第(2) (3)列中, 分析师预测偏误和分歧均显著为负, 研究结果稳健。

表 7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i>Opt</i>	FE	FD
<i>Transfer</i>	-0.5515*** (0.1561)	-0.3241*** (0.1120)	-0.2077** (0.0959)
<i>QY</i>		0.0667* (0.0402)	0.0285 (0.017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i>	-6.6700*** (1.1948)	-7.1085*** (0.9527)	-5.7369*** (0.6906)
并购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i>R</i> <sup>2</sup>	0.2607	0.3686	0.1823
<i>adj.R</i> <sup>2</sup>	0.2576	0.3660	0.1788
<i>F</i>	52.3341***	75.1811***	29.2819***
<i>N</i>	16076	16076	16076

## 六、进一步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 券商并购显著改善分析师预测质量, 这一改善效应本质上源于券商并购后所引致的特定行业的知识转移。作为知识密集型活动, 知识转移的效果往往受到转移知识主体的自身特征和影响知识转移的客观条件的影响。因此, 本文进一步从地理距离、知识差距和分析师工作年限三个角度出发, 对券商并购前后分析师预测质量改善的潜在知识转移机制进行验证。

① 褚剑、秦璇、方军雄:《中国式融资融券制度安排与分析师盈利预测乐观偏差》,《管理世界》2019年第1期。

### (一) 地理距离

作为导致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原因,地理距离的增加不利于信息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传递<sup>①</sup>,进而影响知识转移的效果。当客户公司地理距离较远时,券商并购后信息的流动往往面临更大阻碍,整合知识资源的难度更大,更易于造成信息失真,加剧分析师信息不对称程度,不利于分析师预测质量的改善。而当并购前两家券商所服务客户地理距离邻近时,客户公司的相似性更易于并购后券商双方对信息、知识的理解与传递,便于技术、知识资源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从而更有效的改善分析师预测质量。那么,若并购促进了特定专业知识在分析师之间的传递,则并购前券商所服务客户地理距离越邻近分析师预测质量的改善效果应该越好。因此,本文参考 He 等<sup>②</sup>的研究,根据并购前两家券商所服务的同行业客户公司间的地理距离均值进行分组,若小于均值,则 *Near* 取值为 1,否则为 0,并在(3)式的基础上引入交互项 *Transfer* × *Near*,构建模型(4):

$$FE_{it} / FD_{it} = \alpha_0 + \alpha_1 Transfer_{it} + \alpha_2 Near_{it} + \alpha_3 Transfer_{it} \times Near_{it} + Controls + \delta_c + \gamma_j + \varphi_t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其中,第(1)(2)列中交互项 *Transfer* × *Near*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地理距离远近分组回归。表 8 中第(3)(4)列为地理距离较近样本的回归结果, *Transfer* 的系数均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第(5)(6)列为地理距离较远样本的回归结果, *Transfer* 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地理距离较远对分析师预测质量改善效果较差。该结果表明不同的地理距离对发生知识转移的效果不同,地理距离较近对分析师预测质量改善效果较好,地理距离较远对分析师预测质量改善效果较差。当客户之间的地理距离越邻近,其企业文化会有所相同,双方分析师之间的沟通效果也较强,因此分析师在进行学习其他分析师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时会较易发生转移,因此分析师预测质量的改善程度比地理距离较远的客户的分析师预测质量改善效果较强。

表 8 地理距离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地理距离近		地理距离远	
	(1) FE	(2) FD	(3) FE	(4) FD	(5) FE	(6) FD
<i>Transfer</i> × <i>Near</i>	-0.5110*** (0.1222)	-0.3509*** (0.1058)				
<i>Transfer</i>	-0.2185* (0.1155)	-0.1342 (0.0995)	-0.3598** (0.1420)	-0.2887** (0.1190)	-0.2500 (0.1680)	-0.0626 (0.1369)
<i>Near</i>	0.1106** (0.0512)	0.0792** (0.038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i>	-7.1979*** (0.9553)	-5.7865*** (0.6887)	-6.6988*** (1.1159)	-5.3118*** (0.7775)	-7.7346*** (1.2265)	-6.5004*** (0.9226)
并购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R</i> <sup>2</sup>	0.3682	0.1825	0.3756	0.1876	0.3636	0.1875
<i>adj.R</i> <sup>2</sup>	0.3655	0.1791	0.3714	0.1821	0.3569	0.1788
<i>F</i>	69.8691***	34.6762***	57.1626***	19.1540***	29.2692***	12.2743***
<i>N</i>	16076	16076	9814	9814	6262	6262

① 陈光华、王烨、杨国梁:《地理距离阻碍跨区域产学研合作绩效了吗?》,《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1期。

② He X.J., Kothari S.P., Xiao T.S., et al., "Industry-specific Knowledge Transfer in Audit Firms: Evidence from Audit Firm Mergers in China",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22, 97(3): 249–277.

## (二) 知识差距

知识差距是影响知识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sup>①</sup>, 当分析师之间存在较大的知识差距时, 会促进双方分析师的交流学习, 从而达到知识转移的效果, 这种知识差距的存在能够使分析师更快吸收他人的专业知识, 并基于所学对企业进行更精准预测。与之相反, 当分析师之间知识差距相对较小时, 表明分析师知识结构越相似, 分析师从对方身上获取的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就越低, 阻碍分析师之间知识转移的有效性。因此, 本文根据行业内并购券商与被并购券商排名差距的均值进行分组, 若排名差距大于均值, 则  $KD$  取值为 1, 否则为 0, 并在(3)式的基础上引入交互项  $Transfer \times KD$ , 构建模型(5):

$$FE_{it} / FD_{it} = \alpha_0 + \alpha_1 Transfer_{it} + \alpha_2 KD_{it} + \alpha_3 Transfer_{it} \times KD_{it} + Controls + \delta_c + \gamma_j + \varphi_t + \varepsilon_{it} \quad (5)$$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可以看出, 第(1)(2)列中  $Transfer \times KD$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另外本文根据知识差距大小分组回归。表 9 中第(3)(4)列为知识差距大的样本回归结果,  $Transfer$  的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 第(5)(6)列为知识差距小的样本回归结果,  $Transfer$  的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知识差距较大时分析师预测质量改善效果更好。该结果说明对于并购后券商内部知识差距较大的分析师而言, 由于双方专业知识、资源背景以及知识结构相似度差异较大, 进而更易于在组织边界消除后向对方学习更多的知识, 取长补短, 提高自身专业知识水平, 对企业未来盈余进行更为精准的预测。

表 9 知识差距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知识差距大		知识差距小	
	(1) FE	(2) FD	(3) FE	(4) FD	(5) FE	(6) FD
$Transfer \times KD$	-0.3745*** (0.1399)	-0.2463* (0.1442)				
$Transfer$	-0.1747* (0.1024)	-0.1000 (0.1187)	-0.6926*** (0.2413)	-0.5283*** (0.1746)	-0.1608 (0.1091)	-0.1217 (0.1347)
$KD$	0.1544** (0.0661)	0.0142 (0.088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_cons$	-8.4524*** (0.9804)	-5.6669*** (0.6932)	-8.4702*** (1.6942)	-8.0111*** (1.0280)	-4.7847*** (1.0577)	-5.1509*** (0.8980)
并购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3432	0.1822	0.3956	0.1667	0.3297	0.2127
$adj. R^2$	0.3412	0.1787	0.3914	0.1609	0.3253	0.2051
$F$	87.5841***	25.2142***	44.1583***	13.5313***	49.0396***	19.4410***
$N$	16076	16076	9108	9108	6968	6968

## (三) 分析师工作年限

分析师在行业内会积累丰富的工作经验, 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 分析师具有的行业知识更加丰富, 相比与工作年限较短的分析师, 经验较为丰富的分析师会将知识转移给工作年限较短的分析师<sup>②</sup>。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员工具有较长的工作年限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 这是因为员工在工作期间

① 周密、赵文红、宋红媛:《基于知识特性的知识距离对知识转移影响研究》,《科学学研究》2015 年第 7 期。

② 所静、李祥飞、张再生等:《工作年限对知识型员工组织承诺的影响作用研究——基于内外在薪酬的调节作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2 期。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与知识。工作年限越长的分析师往往拥有更多的实践经验,与企业客户之间的沟通也更为频繁,其掌握的行业专业知识也就越丰富。当不同的券商并购之后,如果不同分析师会通过相互交流学习获取行业专业知识,即工作年限较短的分析师通过向执业年限较长的分析师进行学习,那么并购后分析师预测质量的改善效果应在执业年限较短的分析师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因此,本文根据分析师工作年限的均值进行分组,若分析师工作年限小于均值,则  $Exper$  取值为 1,否则为 0,并在(3)式的基础上引入交互项  $Transfer \times Exper$ ,构建模型(6):

$$FE_{it} / FD_{it} = \alpha_0 + \alpha_1 Transfer_{it} + \alpha_2 Exper_{it} + \alpha_3 Transfer_{it} \times Exper_{it} + Controls + \delta_c + \gamma_j + \varphi_t + \varepsilon_{it} \quad (6)$$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可以看出,第(1)(2)列中  $Transfer \times Exper$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另外本文根据分析师工作年限长短分组回归。表 10 中第(3)(4)列为工作年限较短的样本回归结果,  $Transfer$  的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第(5)(6)列为工作年限较长的样本回归结果,分析师预测偏误与分歧均不显著。该结果表明分析师执业年限长短会影响券商并购后知识转移的效果,在券商并购并进行组织结构等方面整合过程中,由于行业特定知识更易于从工作年限较长的分析师向工作年限较短的分析师转移,使得并购后工作年限较短的分析师预测质量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进一步证实了并购过程中的知识转移机制。

表 10 分析师工作年限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工作年限短		工作年限长	
	(1) FE	(2) FD	(3) FE	(4) FD	(5) FE	(6) FD
$Transfer \times Exper$	-0.3301** (0.1469)	-0.7840*** (0.1041)				
$Transfer$	-0.2205 (0.1587)	0.1630 (0.1179)	-0.5213*** (0.1590)	-0.3663*** (0.1354)	-0.0927 (0.1385)	-0.0019 (0.1182)
$Exper$	0.2954*** (0.0772)	0.3755*** (0.045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	-8.6236*** (0.9864)	-3.4741*** (0.6319)	-8.1438*** (1.2544)	-6.4663*** (0.8683)	-5.9656*** (1.0920)	-4.6922*** (0.8654)
并购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3440	0.1223	0.3781	0.1802	0.3596	0.1942
$adj.R^2$	0.3419	0.1213	0.3739	0.1747	0.3527	0.1856
$F$	81.9765***	44.7239***	69.4381***	21.9213***	44.7216***	22.2641***
$N$	16076	16076	9916	9916	6160	6160

## 七、结论与启示

作为资本市场中重要的信息中介机构,提升分析师预测质量成为压实证券机构责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因此,本文立足于“打造航母级券商”的现实背景,基于知识转移视角,借助券商机构并购事件构建多时点 DID 模型。实证检验了行业特定知识转移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券商并购能够有效改善分析师预测质量。具体而言,券商并购能够通过消除组织边界,促使行业专业知识在不同券商之间的转移,显著降低分析师预测偏误和预测分歧。(2)券商并购

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改善作用会因合并方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相比于新设合并,选择吸收合并或控股合并的券商能够有效提升分析师预测质量,且前者的改善效果更为显著。(3)券商并购所带来的分析师预测质量改善本质上源于分析师之间的特定行业知识转移。本文发现,当并购前双方的客户公司地理距离越近、知识差距越大以及分析师工作年限越短时,并购后分析师预测质量的改善效果则越明显。本研究从知识转移视角明晰了券商并购对分析师预测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为引导我国证券行业做优做强提供参考。

本文启示与建议如下:一方面,对于证券公司而言,要将专业知识能力作为安身立命之本,致力于打造高水平、专业化团队。具体而言,证券公司既要在深耕自身特色领域,提升细分领域的专业能力;也要紧抓“打造航母级券商”的契机,在借助并购迅速扩大自身规模、弥补服务短板的基础上,注重并购后组织的架构重组和资源整合过程。因此,在选择并购标的时,券商要应根据自身情况综合考量地理距离、知识差距以及分析师工作年限等,选择与自身情况相符的标的公司,通过知识转移发挥“1+1>2”的效果,真正将外延扩张转化为内生增长动力,提升分析师预测水平。另一方面,对于监管部门而言,要对券商并购过程进行监督和引导,鼓励有条件的行业机构实施市场化并购重组,协助券商做好并购后的资源整合工作,尤其要加强对同类型证券机构的监管,防范券商利用并购进行不正当竞争,真正实现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与此同时,监管部门还可以通过创新监管模式等途径,清除证券公司并购的制度阻碍,坚持自律管理与行政监管的差异化定位,在不违背原则性要求的前提下,给予券商更大的管理自主权,提升并购后的资源整合效果,进而通过证券业并购重组打造航母级头部券商,更好的服务于我国实体经济建设。

责任编辑: 孙继国 朱晴晴

## Industry-specific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he Quality of Analyst Forecasts: Evidence from Brokerage Institu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Wang Lei Feng Mingcong Sha Yifan

School of Economic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research report gate" incidents makes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nalyst forecast a hot topic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s an effective way for brokerage companies to obtain external knowledge resources, merger and acquisition (M&A)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analysts to improve their business level. To this end, this paper builds a multi-time point DID model with the help of M&A events of brokerage institutions,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ndustry-specific knowledge on the quality of analysts' foreca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transf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of brokerage firm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nalysts' forecasts and reduce the bias and divergence of their forecasts; and this improvement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merger events like absorption mergers and holding mergers. Further research finds that when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of the customer company is short, the knowledge gap of the analyst is large, and the working life is short,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the analyst forecast quality after the merger is more obvio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transfer,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analysts' forecast quality, whi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regulators to formulate and improve the policies related to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brokerage institutions.

**Key words:** brokerage institution merger and acquisition; knowledge transfer; quality of analyst forecasts; industry expertise

# 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的大股东掏空效应

雷梦娇<sup>1</sup> 何婧<sup>2</sup>

1. 西安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陕西 西安 710199; 2.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省联社的存在改变了农村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但省联社参与治理下的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掏空行为尚待研究。省联社通过省政府的行政赋权,剥夺了原属于农村商业银行股东的部分控制权,造成了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这一独特的公司治理模式。研究发现,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同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程度越强,意味着省联社对农村商业银行的控制力越强,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掏空就越强,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这种影响则不显著。针对股权结构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不会对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掏空行为产生影响;而股权制衡度越高,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掏空效应越强;此外,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内对农村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省联社模式对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应分地区具体问题具体看待,省联社改革应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研究结论对“一省一策”推进省联社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撑,对保护农村商业银行中小股东利益形成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大股东掏空;市场化程度;省联社改革

**中图分类号:** F832.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2-0072-15

## 一、引言

省联社对农村商业银行的行政干预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省联社的存在虽能有效缓解农村商业银行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但其自身职能定位不清、权责不匹配,制约着农村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进程。省联社改革是农信系统领域内的焦点问题,事关农村金融系统稳定大局。自2022年1月银保监会召开工作会议指出要“一省一策”加快推进农信社改革后,各省的省联社改革方案陆续出台。浙江、河南、甘肃、山西等地均采用组建农商联合银行的方式,而辽宁、四川等地选择组建省级农商行。省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股权和控制权的非对称配置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及政策选择”(7217312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与实践研究”(22&ZD12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金融监管地方化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机理及其监管研究”(719731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雷梦娇,女,山西文水人,经济学博士,西安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农村金融研究;何婧(通讯作者),女,江西兴国人,经济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金融研究。

联社改革对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完善公司治理是农村商业银行行稳致远的关键。大股东掏空一直以来是农村商业银行频频暴雷的重要导火索。例如,河南新财富集团就曾以参股河南省境内多家农村商业银行的方式,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巨额资金,致使河南省内四家村镇银行发生兑付危机。大股东掏空行为不仅危害银行的社会声誉,也会威胁到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安全。遏制大股东掏空、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所在。农村商业银行虽形式上具有完整的公司治理结构,但实际上却“形似而神不似”。究其原因,省联社的行政干预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农村商业银行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省联社通过省政府的行政赋权,参与治理辖区内的农村商业银行,剥夺了原属于大股东的多项权利,包括高管任命、薪酬制度等方面,从而造成了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内部股权和控制权的非对称配置<sup>①</sup>。

省联社参与治理对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省联社会对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掏空发挥抑制效应。这是由于省联社肩负着对全省农村商业银行进行“管理、指导、协调、服务”的职能,其行政属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另一方面,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会对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损失的权利产生补偿效应。省联社通过行政赋权强制性剥夺了大股东的部分权利后,大股东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掏空中小股东利益来弥补让渡权利的损失。省联社抑制效应和大股东补偿效应的相对强弱决定了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情况,而地区市场化程度能够反映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本文正是探究省联社参与下的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对大股东掏空效应的影响。

现有文献在研究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时,通常将省联社作为外部行政干预手段<sup>②</sup>,抑或从农村商业银行内部股权结构角度入手<sup>③</sup>,均未能将省联社嵌入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框架内,深入研究省联社、高管、大股东、小股东共同参与治理下农村商业银行公司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在现有股权和控制权分离对大股东掏空影响的文献中,认为两权分离程度越大就越有利于大股东的掏空<sup>④</sup>。但需指出的是,现阶段有关股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研究对象均为上市企业,两权分离程度也仅仅针对股东内部之间投票权的分配不均。而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来源于省联社的外部行政性干涉,控制权的博弈双方是省联社和农村商业银行的股东,因此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掏空问题亟需单独研究。

本文正是研究了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的大股东掏空效应。实证研究表明,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同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会显著增强大股东掏空,但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则并不显著。基于股权结构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不会对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掏空产生影响;而股权制衡度越高,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内,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农村商业

① 何婧、雷梦娇:《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的普惠金融效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② 张正平、夏海、毛学峰:《省联社干预对农信机构信贷行为和盈利能力的影响——基于省联社官网信息的文本分析与实证检验》,《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9期。

③ 何婧、何广文:《农村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其经营风险、经营绩效关系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第12期;刘丹、张兵:《股权结构与农村商业银行二元绩效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2期。

④ 苏启林、朱文:《上市公司家族控制与企业价值》,《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

银行的大股东掏空效应就越强；此外，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内对农村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不同于以往分析省联社对农村商业银行影响时将省联社作为外部行政性干预力量的研究，本文将从农村商业银行的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出发，精确刻画省联社和股东之间的权力博弈。具体地，本文将深入研究省联社通过行政赋权剥夺大股东部分权利后，所造就的农村商业银行中极富中国特色的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现象，如何对农村商业银行的第二类代理问题产生影响；第二，本文从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视角出发研究其对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时，进一步考虑到了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省联社对辖域内农村商业银行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差异。将地区市场化程度纳入理论分析框架，不仅为研究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异质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丰富了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我国农信系统发展过程中体制机制深层次问题的凸显，省联社行政式管理和农村商业银行商业化运营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省联社改革迫在眉睫。本文的研究对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推动省联社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对如何健全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抑制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掏空、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 二、理论假设

农村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具有特殊性。省联社通过省政府的行政赋权获得了本属于农村商业银行股东的多项权力，包括股东选择、高管选聘、薪酬设定、分红派息，甚至于信贷审批等事宜，造成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sup>①</sup>。这种非对称配置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基于股东之间的控制权分配不均衡，如双重股权结构，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根源于省联社的行政赋权，表现为省联社和股东两方之间的权力博弈。具体是指省联社通过省政府的行政授权，以零持股比例获得了农村商业银行股东的部分控制权，使得股东实际拥有的控制权小于股权本该对应的控制权，造成了农村商业银行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层面的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

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大股东掏空效应的先决条件是大股东的掏空意愿和省联社对大股东掏空的态度。从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掏空意愿来看，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的掏空动机较强，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农村商业银行属于商业性银行，商业银行具有的高杠杆性、强外部性和有限责任等特点，可以确保股东在与债务人共担风险的同时获得额外收益，而在政府支持下的存款保险制度可以保护存款人权益，为大股东掏空行为带来的风险兜底；第二，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的公司治理模式，使得农村商业银行股东的控制权受到省联社一定程度上的侵占，大股东会通过非正常的权利行使渠道来弥补让渡的部分控制权，而大股东掏空行为正是一种重要的补偿方式。与之相反，省联社对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掏空的抑制态度是明确的。省联社肩负对辖区内农村商业银行的“管理、指导、协调、服务”之责，且农信系统的风险处置责任通常位于省联社的主要任务之首。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掏空行为会严重扰乱农信系统内部的稳定与发展，不仅会背离农村

<sup>①</sup> 何婧、雷梦娇：《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的普惠金融效应》，《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商业银行服务“三农”的初衷和使命,也极易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省联社对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会进行约束和监督。但省联社并非农村商业银行完全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机构,其约束与监督并不具有行政意义上的强制性,由此,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会进行不同程度上的“软抵抗”,致使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大股东掏空影响产生不确定性。

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掏空效应的强弱取决于省联社和大股东权力博弈的结果。当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越高,省联社剥夺农村商业银行股东的控制权越大时,省联社能够发挥自身抑制大股东掏空的话语权越大。但与此同时,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由于被剥夺的权利更多,也会更倾向于通过关联交易等手段变相转移农村商业银行的资金,以弥补损失的控制权收益。因此,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取决于省联社抑制效应和大股东补偿效应的相对强弱,当省联社的抑制效应大于大股东的补偿效应时,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会削弱大股东的掏空;而当省联社的抑制效应小于大股东的补偿效应时,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会增强大股东的掏空。

地区市场化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省联社抑制效应和大股东补偿效应的相对大小。我们构建大股东的掏空函数  $Y(m, x)$ ,其中  $m$  代表市场化程度,  $x$  代表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程度,  $m$  服从  $[0, m_0]$  上的均匀分布,  $x$  服从  $[0, 1]$  上的均匀分布。构建大股东对掏空的补偿效应函数  $B(m, x)$ ,其中  $\partial B / \partial m > 0$ ,  $\partial B / \partial x > 0$ ,省联社对掏空的抑制效应函数  $S(m, x)$ ,其中  $\partial S / \partial m < 0$ ,  $\partial S / \partial x > 0$ ,故大股东的掏空函数  $Y(m, x) = B(m, x) - S(m, x)$ 。为简化分析,我们设置符合条件的具体函数形式如公式(1)、公式(2)所示。

$$B(m, x) = mx + m \quad (1)$$

$$S(m, x) = \frac{1}{4}m_0X^2 - m \quad (2)$$

接着,将公式(1)与公式(2)相减,可以得到  $Y(m, x)$ ,如下:

$$Y(m, x) = B(m, x) - S(m, x) = mx - \frac{1}{4}m_0X^2 + 2m \quad (3)$$

最后,将  $Y(m, x)$  对  $x$  进行求导,可得到如下结果:

$$\partial Y / \partial x = M - \frac{1}{2}m_0X \quad (4)$$

对公式(4)进行分析,由于  $m$  服从  $[0, m_0]$  上的均匀分布,  $x$  服从  $[0, 1]$  上的均匀分布,因此可以得到,当  $m > \frac{1}{2}m_0$  时,  $\partial Y / \partial x$  必然为正,当  $m < \frac{1}{2}m_0$  时,  $\partial Y / \partial x$  的正负性不确定。因此,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内,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自主性更大,省联社的话语权相对较弱,更多的充当服务职能,省联社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效应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大股东的补偿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故此时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会增强大股东的掏空效应。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内,农村商业银行同省联社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省联社的话语权相对较强,可以发挥更多的管理职能,而随着省联社发挥抑制效应的增强,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的补偿效应也会相应增加,故此时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大股东掏空无显著影响。

综上,提出本文的假设: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会受到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制约。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会显著增强大股东的掏空;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则对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 三、研究设计

#### (一) 样本与数据

为研究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本文手工整理了2010—2020年来自CSMAR、Wind、Bankscope和各农村商业银行官网年报公布的财务数据,涉及农村商业银行的董事会结构、资产负债、信贷规模等方面,共计获得89家农村商业银行的共377条观测值。其中,有43家农村商业银行公布了关联交易规模,样本涵盖了全国范围内的四川、安徽、山东、广东、江苏、江西、浙江、湖北、福建9省。由于各农村商业银行年报公布时间的不连续性、公布内容的不一致性、统计口径的差异性等问题,本文最后共计保留125条观测值进行实证研究。为控制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涉及到的连续性变量均进行了1%和99%水平上的缩尾处理。

#### (二) 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大股东的掏空效应。大股东掏空是公司治理领域内的重要研究课题<sup>①</sup>,现有关于上市公司掏空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金股利、关联交易等方面<sup>②</sup>。其中,现金股利是否构成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国内外学界意见并不一致<sup>③</sup>,而关联交易是重要的大股东用来实施掏空的手段,且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一致认可<sup>④</sup>。因此,本文借鉴侯青川等<sup>⑤</sup>、刘少波和马超<sup>⑥</sup>、黄泽悦等<sup>⑦</sup>的研究,综合数据可得性角度,用关联交易余额占净资产的比例来度量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的掏空程度。

2. 核心解释变量: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程度。在传统公司治理框架中,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的制衡机制构成了所有者对公司控制权实现的基础路径。其中,董事会治理是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能够引导监督经理人员管控银行的运行发展。Iliev和Roth的研究证明了董事会中董事类型在传递和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重要作用<sup>⑧</sup>。本文借鉴马新啸等<sup>⑨</sup>、柳学信等<sup>⑩</sup>、刘汉民等<sup>⑪</sup>对董事会治理的研究,从农村商业银行的董事会治理视角出发,用董事会中省

① Johnson S.,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et al., "Tunnel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2): 22-27.

② 李婉丽、吕怀立、陈丽英:《不同性质控股股东“掏空”方式选择研究》,《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

③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et al., "Agency Problems and Dividend Polic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0, 55(1): 1-33; 黄娟娟、沈艺峰:《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究竟迎合了谁的需要——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会计研究》2007年第8期。

④ Gordon E. A., Henry E., Palia D.,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Advances in Financial Economics*, 2004, 9: 1-27; 郑国坚:《基于效率观和掏空观的关联交易与盈余质量关系研究》,《会计研究》2009年第10期。

⑤ 侯青川、靳庆鲁、苏玲等:《放松卖空管制与大股东“掏空”》,《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3期。

⑥ 刘少波、马超:《经理人异质性与大股东掏空抑制》,《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

⑦ 黄泽悦、罗进辉、李向昕:《中小股东“人多势众”的治理效应——基于年度股东大会出席人数的考察》,《管理世界》2022年第4期。

⑧ Iliev P., Roth L., "Do Directors Drive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Working Paper*, 2020.

⑨ 马新啸、汤泰勤、蔡贵龙:《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去僵尸化——来自国有上市公司董事会“混合”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21年第3期。

⑩ 柳学信、孔晓旭、王凯:《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董事会异议——基于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投票的证据》,《金融研究》2020年第5期。

⑪ 刘汉民、齐宇、解晓婷:《股权和控制权配置:从对等到非对等的逻辑——基于央属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

联社委派董事和股东委派股权董事的数量规模对比来衡量农村商业银行内部省联社和股东的话语权强弱,以明晰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的掏空效应。具体地,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程度 = 省联社委派董事数 / 董事会总人数,该指标能够直观地反映农村商业银行股东的控制权被剥夺程度。

3. 其他变量:本文借鉴樊纲和王小鲁的研究,采用樊纲指数来衡量市场化程度<sup>①</sup>。根据样本中市场化程度的中位数水平划分为市场化程度高和市场化程度低两个子样本。控制变量选取参考了现有关于农村商业银行实证研究的文献<sup>②</sup>,从农村商业银行自身资产人员规模、风险盈利水平等特征出发,具体包括银行规模、拨备覆盖率、资产负债率、存贷比、机构员工数、资产收益率和不良贷款率。与此同时,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带来的潜在影响,本文进一步控制了省级层面的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水平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具体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1。

根据表1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在农村商业银行公布的信息中,关联交易占比的最小值为1.5%,最大值为88.2%,标准差为0.160,说明不同农村商业银行关联交易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研究农村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影响因素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程度的均值为0.265,最低可至0.125,最高可达0.400,换言之,省联社委派的董事数量最多可以达到董事会总人数的40%,平均占比达26.5%,这说明省联社对农村商业银行的干预程度总体较高,不同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程度差异明显。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均值为9.944,最大值为11.930,最小值为7.482。

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关联交易占比	关联交易余额 / 净资产	125	0.223	0.160	0.015	0.882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	省联社委派董事数 / 董事会总人数	125	0.265	0.064	0.125	0.400
市场化程度	樊纲指数	125	9.944	1.057	7.482	11.930
银行规模	总资产的对数值	125	15.470	1.322	12.750	18.080
拨备覆盖率	贷款损失准备 / 不良贷款余额	125	2.861	1.714	0.782	8.595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125	0.921	0.025	0.848	1.000
存贷比	贷款余额 / 存款余额	125	0.681	0.092	0.439	0.950
机构员工数	银行员工数的对数值	125	7.095	1.055	4.990	9.059
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 / 总资产	125	0.009	0.004	0.001	0.016
不良贷款率	不良贷款余额 / 贷款余额	125	0.022	0.014	0.005	0.072
经济发展程度	人均GDP的对数	125	11.500	0.724	10.020	12.840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 地区生产总值	125	5.473	4.409	0.340	16.270
金融发展水平	区域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 地区生产总值	125	1.265	0.438	0.643	2.733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 / 地区生产总值	125	0.142	0.064	0.065	0.315

### (三) 实证模型

对于面板回归模型的选择,本文首先进行了豪斯曼检验,检验结果显示P值大于0.1,表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效果要优于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本文构建随机效应模型检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掏空效应的影响:

① 樊纲、王小鲁:《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4年度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② 吴本健、谭睿琦、荣奕源:《农村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对县域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农信社改革农商行的准自然实验研究》,《农村金融研究》2023年第10期;刘朝阳、陈丹妮:《农商行(农信社)机构效率研究——基于广东的实证研究》,《农村金融研究》2020年第9期。

$$Tun_{it} = \alpha_0 + \beta_1 X_{it} + \beta_2 Control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5)$$

在公式(5)中,  $i=1, \dots, n$  表示农村商业银行的个体,  $t$  表示时间。被解释变量  $Tun_{it}$  代表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掏空效应大小, 通过农村商业银行关联交易占净资产的比重进行度量。核心解释变量  $X_{it}$  为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程度, 用省联社委派董事数与董事会总人数之比进行度量, 以期从董事会数量结构的角度剖析省联社和股东的控制权配置程度。 $Controls_{it}$  表示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农村商业银行特征变量和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两个维度,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

## 四、实证回归结果

### (一) 拟合曲线分析

为了对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与大股东掏空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直观观测, 本文绘制了不同市场化程度下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同大股东掏空的拟合曲线<sup>①</sup>。结果显示, 总样本下的拟合曲线斜率较为平缓, 说明在不施加外部约束条件时, 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内, 拟合曲线明显向上倾斜, 即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程度和关联交易占比显著正相关; 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内, 拟合曲线向下倾斜的趋势并不明显, 即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程度和关联交易占比在统计意义上并不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按照市场化程度对样本进行分类的必要性, 同时也进一步从侧面说明了, 总样本中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和关联交易占比相关性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受到了市场化程度的制约。

### (二) 基准回归结果

表2报告了基于模型(5)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农村商业银行自身特征和区域特征后, 总样本中,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 即对农村商业银行关联交易规模占比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内,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会显著促进大股东掏空, 此时大股东对掏空的补偿效应显著大于省联社对掏空的抑制效应。但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 此时大股东对掏空的补偿效应和省联社对掏空的抑制效应大小难分伯仲。综上, 本文的理论假设得以印证, 即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会受到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制约,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会显著促进大股东掏空, 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并不显著。

对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主要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情况进行分析。首先, 在农村商业银行自身特征层面, 银行规模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越大, 内部管理越规范, 大股东掏空程度越小。拨备覆盖率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拨备覆盖率越高, 大股东掏空程度越小。存贷比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存贷比越高, 大股东掏空程度越大。其次, 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层面, 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估计系数在1%的

<sup>①</sup> 限于篇幅限制, 拟合曲线未在文中列出, 备索。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大股东的补偿效应越大,掏空的能力也就越强。此外,第一产业占比越高的地区,大股东的掏空程度也会随之增加。

表2 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市场化程度和大股东掏空

变量	关联交易规模占比		
	(1) 总样本	(2) 市场化程度高	(3) 市场化程度低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	-0.128 (0.229)	0.544** (0.250)	-0.339 (0.370)
银行规模	-0.038 (0.044)	-0.100** (0.048)	-0.012 (0.070)
拨备覆盖率	-0.027** (0.011)	-0.025*** (0.009)	-0.024 (0.024)
资产负债率	-0.064 (0.576)	-0.864 (0.545)	0.468 (0.945)
存贷比	0.122 (0.159)	0.491*** (0.176)	0.126 (0.295)
机构员工数	0.050 (0.054)	0.021 (0.057)	0.034 (0.085)
资产收益率	-0.504 (5.275)	0.059 (4.327)	3.334 (10.590)
不良贷款率	2.457 (1.611)	-2.906 (2.899)	1.276 (2.253)
经济发展程度	0.102* (0.054)	0.261*** (0.058)	0.262** (0.102)
产业结构	0.012 (0.011)	0.025** (0.011)	0.028 (0.017)
金融发展水平	-0.048 (0.042)	0.001 (0.044)	-0.085 (0.082)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0.292 (0.473)	-1.297 (0.803)	-0.030 (0.763)
常数项	-0.638 (0.941)	-1.001 (0.875)	-3.231* (1.683)
观测值	125	63	62
$R^2$	0.276	0.641	0.28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后表同。

### (三) 稳健性检验

#### 1. 更换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通过更换模型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我们共搜集到 92 家农村商业银行从 2010 年到 2020 年共计 377 条公开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但其中只有 43 家农村商业银行共计 125 条数据中公布了农村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规模。为了克服样本内农村商业银行关联交易占比自选择问题造成的样本选择性偏差,本文参考仲秋雁和石晓峰<sup>①</sup>、李小荣和刘行的研究<sup>②</sup>,构建如下 Heckman 两阶段模型检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掏空效应的影响:

① 仲秋雁、石晓峰:《媒体监督对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基于 Heckman 两阶段模型的实证检验》,《管理世界》2016 年第 12 期。

② 李小荣、刘行:《CEO vs CFO: 性别与股价崩盘风险》,《世界经济》2012 年第 12 期。

$$Pr(IfTun_{it} = 1) = \alpha_0 + \beta_1 Controls_{it} + \beta_2 OtherIfTun_{it} + \varepsilon_{it} \quad (6)$$

$$Tun_{it} = \alpha_0 + \beta_1 X_{it} + \beta_2 Controls_{it} + \beta_3 \hat{\lambda} + \varepsilon_{it} \quad (7)$$

在公式(6)中,  $i=1, \dots, n$  表示农村商业银行的个体,  $t$  表示时间, 被解释变量  $IfTun_{it}$  代表样本内的农村商业银行选择是否公布关联交易余额, 解释变量中的  $OtherIfTun_{it}$  为第一阶段模型中的“排除性约束”变量, 本文选择用同年份、同省份内其他农村商业银行中, 公布关联交易余额的农村商业银行数量占比来衡量。该变量作为“排除性约束”变量是恰当的, 因为同年份、同省份内其他农村商业银行选择是否公布关联交易余额会影响到该农村商业银行是否选择公布关联交易情况, 但不会影响到该农村商业银行具体的关联交易余额。 $Controls_{it}$  表示控制变量, 主要包含了农村商业银行自身的特征变量和地区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两个维度,  $\varepsilon_{it}$  为随机误差项。

在公式(7)中,  $i=1, \dots, n$  表示农村商业银行的个体,  $t$  表示时间, 被解释变量  $Tun_{it}$  代表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掏空水平, 具体是指农村商业银行关联交易规模占比这个指标。核心解释变量  $X_{it}$  为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程度, 用省联社委派董事数与董事会总人数之比这个指标来衡量, 以期从董事会数量结构的角度测度省联社和股东的控制权配置程度。 $\hat{\lambda}$  为第一阶段公式(6)中计算出的逆米尔斯比率, 用于克服样本选择的偏差问题, 其余变量同公式(6)一致。

表3报告了基于Heckman模型两阶段法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到, 在控制了农村商业银行自身特征和区域特征后, 在不区分样本时,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不会影响到农村商业银行是否公布关联交易规模。分样本来看,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农村商业银行选择是否公布关联交易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与农村商业银行选择是否公布关联交易无显著关联。与此同时, “排除性约束”变量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说明同年份、同省份内其他农村商业银行选择公布关联交易余额的数量越多, 越会促进农村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公开度。

表3 Heckman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是否公布关联交易余额		
	(1) 总样本	(2) 市场化程度高	(3) 市场化程度低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	-0.467 (1.764)	7.317** (2.895)	-3.389 (2.434)
同年同省份内其他农商行是否公布关联交易	11.680*** (1.227)	39.250*** (9.355)	10.540*** (1.7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700 (8.028)	1.114 (12.850)	-12.030 (11.380)
观测值	377	191	186
$R^2$	0.566	0.737	0.624

表4报告了基于Heckman模型两阶段法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 在不区分地区市场化程度时, 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大股东掏空程度没有显著影响。当区分了市场化程度后,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增为正, 且估计系数0.548与表2第(2)列中的基准回归系数0.544没有显著差异; 而

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并不显著。与此同时,逆米尔斯比率的各项系数均不显著,证实了前文的基准回归模型中不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即前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综上,表4的估计结果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

表4 Heckman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关联交易规模占比		
	(1) 总样本	(2) 市场化程度高	(3) 市场化程度低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	-0.137 (0.233)	0.548** (0.249)	-0.321 (0.38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661 (0.951)	-1.016 (0.870)	-3.255* (1.703)
逆米尔斯比率	0.006 (0.025)	-0.027 (0.022)	-0.008 (0.042)
观测值	125	63	62
R <sup>2</sup>	0.277	0.651	0.283

## 2. 更换自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其次,本文通过更换自变量的度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在传统公司治理框架下,独立董事制度作为保护公司中小股东权益防止被大股东侵占的重要机制,能够有效监督大股东的私利行为。因此,本文想要进一步检验在农村商业银行特殊的公司治理模式下,独立董事是否能够发挥同等作用。与之对应,本文将自变量的度量指标进行替换,即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程度 = 省联社委派董事数 / (董事会总人数 - 独立董事数),并重新进行实证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第(1)列和第(3)列分别为不区分市场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两种情况,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依然是不显著的。而第(2)列当市场化程度较高时,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估计系数0.264相比表2第(2)列中的估计系数0.544变小。这不仅进一步支持了前文结果的稳健性,同时可以说明在农村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模式下,独立董事制度并不能起到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作用,反而会对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私利行为起到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大多是由大股东推荐任命,因此独立董事会默许甚至助长大股东的掏空行为。

表5 更换自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关联交易规模占比		
	(1) 总样本	(2) 市场化程度高	(3) 市场化程度低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	-0.074 (0.121)	0.264** (0.128)	-0.203 (0.19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25	63	62
R <sup>2</sup>	0.277	0.637	0.285

## 3. 更换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进一步地,本文通过更换因变量的度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方式。首先,将关联交易占比的衡量指标由“关联交易余额 / 净资产”替换为“关联交易余额 / 总资产”。结果如表6的第(1) — (3)列所示,第(1)列总样本和第(3)列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内,股权和控制权非对

称配置的估计系数依然不显著；第(2)列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内，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其次，将大股东掏空行为的衡量指标由关联交易占比替换为关联交易规模，即关联交易余额+1后取自然对数。结果如表6的第(4)–(6)列所示，第(4)列总样本和第(6)列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内，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的估计系数依然不显著，第(5)列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内，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再次证明了前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6 更换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关联交易占比: 关联交易余额 / 总资产			关联交易规模: $\ln(\text{关联交易余额} + 1)$		
	(1) 总样本	(2) 市场化高	(3) 市场化低	(4) 总样本	(5) 市场化高	(6) 市场化低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	-0.013 (0.018)	0.045** (0.020)	-0.032 (0.029)	-0.950 (1.229)	3.330* (1.806)	-1.954 (1.67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25	63	62	125	63	62
$R^2$	0.275	0.639	0.329	0.794	0.845	0.867

#### 4. 更换分样本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最后，本文通过更换分样本变量的度量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樊纲市场化指数具体可以细分为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因此，为更详细地说明市场化程度的具体类型对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大股东掏空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将市场化总指数分别替换为上述五个细分指标进行回归。由于总样本和市场化程度较低情况下的估计结果均不显著，因此本文主要汇报在市场化程度较高情况下的细分指标估计结果。具体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到，除了第(1)列中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之外，第(2)–(6)列中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对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大股东掏空效应产生影响的市场化程度，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这五个方面共同作用下的影响结果，而非单独某一方面的影响起支配作用。

表7 更换分样本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关联交易规模占比——市场化程度高					
	(1) 市场化总指数	(2) 政府与市场关系	(3) 非国有经济发展	(4) 产品市场发育程度	(5) 要素市场发育程度	(6) 市场中介组织环境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	0.544** (0.250)	-0.042 (0.323)	0.408 (0.376)	-0.126 (0.353)	0.261 (0.276)	-0.074 (0.28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3	62	62	62	62	62
$R^2$	0.641	0.411	0.484	0.324	0.577	0.490

## 五、进一步分析

### (一) 基于股权性质的拓展性检验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机制，股权结构包括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三个方面。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会受到股

权结构的影响。省联社并非农村商业银行完全意义上的行政控制机构,不能构成影响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行为的制度性约束力量。因此,随着股东权利意识的觉醒,拥有所有权的农村商业银行股东并不赋予省联社不受约束的控制权,不同股权结构下的农村商业银行股东会就省联社对控制权的剥夺展开程度不一的反抗,从而最终影响到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大股东掏空。

在股权性质方面,本文将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性质分为国有股权、民营股权和同业股权三大类,理论上讲,同业股权由于归属于同一省联社管理,因此会倾向于服从省联社抑制大股东掏空的目标指令。国有股权同政府的联系程度相对也较为紧密,因此越会倾向于履行政府的政治目标,自身的营利性动力相对较弱,因此,同业股权和国有股权下的大股东掏空动机没有民营股权强烈。本文将股权性质与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的交乘项纳入到基准回归模型当中,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主要观察第(2)列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交乘项系数。可以看到,第(2)列中交乘项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国有股权和同业股权相较于其他类型股权,并不会对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与大股东掏空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这就说明了在农村商业银行中,股权性质不会构成影响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因素,股东类型对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大股东的掏空效应在不同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内均无影响。

表8 基于股权性质的拓展性检验

变量	关联交易规模占比		
	(1)	(2)	(3)
总样本	市场化程度高	市场化程度低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 × 国有股权	0.122 (1.078)	-1.292 (1.309)	0.029 (1.537)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 × 同业股权	0.703 (0.589)	1.971 (5.413)	1.748** (0.82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25	63	62

## (二) 基于股权集中度的拓展性检验

在股权集中度方面,传统公司治理理论框架认为,股权集中度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存在两种效应,分别是“壕沟防御效应”和“利益协同效应”<sup>①</sup>。一方面,集中的股权结构增强了大股东掏空公司的能力,大股东可以通过向公司委派高级管理人员或对公司实施关联交易以实现私人控制权收益;另一方面,随着持股比例的逐步提高,大股东的利益倾向于同公司的整体利益保持一致,会削弱大股东获取公司私人控制权的动机。在现实中,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相对分散,为更好地检验农村商业银行股权集中度对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大股东掏空的调节作用,本文设置股权集中度这个虚拟变量,以期揭示在农村商业银行中,股权集中度究竟是发挥“壕沟防御效应”还是“利益协同效应”。本文根据农村商业银行中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多少,将股权集中度分为高低两个区间。

将股权集中度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的交乘项纳入基准回归模型当中,估计结果如表9所示。可以看到,第(1)—(3)列的交乘项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股权集中度对农村商业银行中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的大股东掏空不存在显著影响,即股权集中度既不会发挥“壕沟防御效应”增

<sup>①</sup> Jensen M. C., 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6, 3(4): 305–360.

强大股东掏空,也不会发挥“利益协同效应”削弱大股东掏空。这是由于在农村商业银行中,省联社的存在剥夺了大股东的部分控制权后,股权集中度增加所带来的大股东控制权提升程度相对较小,进而无法对大股东的掏空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表9 基于股权集中度的拓展性检验

变量	关联交易规模占比		
	(1) 总样本	(2) 市场化程度高	(3) 市场化程度低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 × 股权集中度	-0.070 (0.567)	1.971 (5.413)	0.601 (0.83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25	63	62
$R^2$	0.281	0.665	0.340

### (三)基于股权制衡度的拓展性检验

在股权制衡度方面,股权制衡度对公司治理效果具有积极意义。理论上,当股权制衡度越高时,越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股东的掏空<sup>①</sup>,但也有研究认为,当股权制衡度提高时,其他股东有可能同大股东进行合谋,共同享受剥削收益<sup>②</sup>。本文设置股权制衡度的虚拟变量实证检验股权制衡度对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大股东掏空的调节作用,将第二大股东和第三大股东的持股量之和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量进行比较,将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与股权制衡度做交乘项放入原回归中,观察交叉项前的系数,根据表10的实证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第(2)列回归结果中,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股权制衡度能显著增强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的掏空,即股权制衡度会提升大股东对掏空的补偿效应。结论证明针对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内的农村商业银行,提高股权制衡度并不能起到缓解农村商业银行第二类公司代理问题的作用,相反会加重第二类代理问题,这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导致的,第一个方面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股权制衡度的提升使得大股东的控制权除了要被省联社剥夺一部分外,剩余部分还要受到其他股东的制衡,进一步提升了大股东的补偿效应,因此会增强大股东的掏空程度。第二个方面是随着其他股东对大股东制衡能力的增强,会倾向于选择和大股东合谋,共同掏空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大股东的掏空程度变得更为严重。

表10 基于股权制衡度的拓展性检验

变量	关联交易规模占比		
	(1) 总样本	(2) 市场化程度高	(3) 市场化程度低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 × 股权制衡度	-0.645 (0.650)	2.062*** (0.690)	-1.933* (1.09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25	63	62
$R^2$	0.284	0.697	0.334

① Pagano M., Röell A., "The Choice of Stock Ownership Structure: Agency Costs, Monitoring and the Decision to Go Public",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 113(1): 187–225; 陈德萍、陈永圣:《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2007 ~ 2009年中小企业板块的实证检验》,《会计研究》2011年第1期。

② Maury B., Pajuste A.,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 Firm Value",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5, 29(7): 1813–1834.

#### (四) 基于贷款集中度的拓展性检验

农村商业银行的借款人往往与银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某些企业既是银行的大股东,也是银行的大客户。因此,贷款集中度的大小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应大股东权利的满足程度,从另一个侧面反应大股东掏空的大小。本部分主要采用两种方式来衡量贷款集中度:第一种方式命名为贷款集中度一,根据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的数值进行二分位,大于中位数的定义为1,否则定义为0;第二种方式命名为股权集中度二,根据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的数值进行二分位,大于中位数的定义为1,否则定义为0。将贷款集中度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进行回归,得到结果见表11所示。可以看到,在回归结果中,第(2)列、第(5)列的回归结果均正向显著,也就是说,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贷款集中度的影响也会受到市场化程度的制约,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内,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程度越高,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集中度就越高,不仅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提高,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也会明显提高。

表11 基于贷款集中度的拓展性检验

变量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1) 总样本	(2) 市场化高	(3) 市场化低	(4) 总样本	(5) 市场化高	(6) 市场化低
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	0.008 (0.039)	0.121* (0.062)	-0.023 (0.050)	0.279 (0.358)	1.150*** (0.317)	0.514 (0.62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4	51	43	63	35	28
R <sup>2</sup>	0.441	0.536	0.420	0.718	0.693	0.785

##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了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对大股东掏空效应的影响,通过构建包含市场化程度的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大股东掏空的理论模型,从公司内部董事会数量结构的角度实证检验了省联社和股东之间的权力配比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对大股东掏空作用的异质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会显著增强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掏空,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则影响不显著,市场化程度能够反应在不同地区大股东对掏空补偿效应和省联社对掏空监督效应的相对强弱。基于股权结构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对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的大股东掏空行为不存在显著性影响,而股权制衡度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内会显著增强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下的大股东掏空,这是由于一方面股权制衡度的提高增加了同大股东合谋掏空小股东的动机,另一方面大股东权利受到制衡时,会对损失的权利产生更为严重的补偿心理,进一步加重大股东的掏空程度。此外,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也会对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集中度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

首先,有助于深入对省联社改革问题的理解。随着2022年各省的省联社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如何在平衡各方利益条件下选择符合各省实际情况的改革路径成为当务之急。本文的实证结果从理论上证明了应辩证地看待省联社的作用,在不同市场化程度下省联社能够发挥不同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应循序渐进引导省联社退出农村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

地区,省联社模式的存在与否仍然值得商榷。因此,应遵循因地制宜、“一省一策”的方针,循序渐进推进省联社改革。

其次,本研究结论有助于为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掏空的影响因素提供参考。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掏空严重威胁我国农村金融系统的安全和稳定,规范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行为刻不容缓。然而受制于农村商业银行数据的可得性,现有研究均未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实证研究大股东掏空的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农村商业银行独特的公司治理体制,是构成农村商业银行大股东掏空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内,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称配置能够显著增强大股东掏空程度。因此,规范农村商业银行的大股东行为,需要考虑从农村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体制出发,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内,减轻省联社的管理力度,从而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而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内,省联社的管理力度依然需要斟酌。

最后,本研究结论也有助于增加对健全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制衡度作用的理解。公司研究普遍认为股权制衡度的提升能够有效抑制大股东掏空。而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则证明,农村商业银行股权制衡度的提高反而会增强大股东的掏空效应。说明在农村商业银行中,为防止股权制衡度过大造成同大股东合谋掏空的情况发生,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制衡度应该保持在合适范围内,才能更好发挥股东治理的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 孙继国 朱晴晴

## Tunneling under the Asymmetric Allocation of Equity and Control in Rural Commercial Banks

Lei Mengjiao<sup>1</sup> He Jing<sup>2</sup>

1.School of Economics,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Xi'an 710199,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provincial associations has changed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but the tunneling behavior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those provincial associations has yet to be studied. The provincial associations, through administrative empowerment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deprive part of the control rights that originally belong to the shareholders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resulting in a unique corporate governance model of asymmetric allocation of equity and control in rural commercial banks. Study finds that the impact of asymmetric allocation of equity and control on tunneling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is closely related to marketization. In more highly marketized areas, a stronger asymmetric allocation of equity and control implies stronger control of the provincial associations over rural commercial banks, and stronger tunneling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whereas this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in less marketized areas.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equity structure shows that the nature of equity and equity concentration do not have an impact on tunneling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under the asymmetric allocation of equity and control. In contrast,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equity restriction, the stronger the tunneling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under the asymmetric allocation of equity and control in more marketized areas. In addition, asymmetric allocation of equity and contro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loan concentration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within regions with high marketiz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suggest that the impact of the provincial association model on the tunneling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be viewed on a region-specific basis, and the reform of provincial associations should be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rather than a one-size-fits-all approach.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one province, one policy"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provincial associations, and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on how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small and medium shareholders of rural commercial banks.

**Key words:** rural commercial bank; asymmetric allocation of equity and control; tunneling; marketization; reform of provincial association

#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逻辑

冯志峰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108

**摘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概念要点,进而把握其核心要义、构成要素与评价要求,探求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行路径。本文旨在立足国内外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础,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严格遵循“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国际通用与各地适用、动态分析与静态剖析、技术可行与数据可比、数量指标与质量指标”六个相统一的构建原则,提炼设计出一套科学系统、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强化评价衡量标准、优化评价监测机制、转化评价结果运用,才能稳中有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关键词:**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指标设计原则;评价指标核算;评价结果应用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4)02-0087-15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更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自18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建成现代化强国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奋斗目标。实现国家现代化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展开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前我国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①</sup>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概念的内涵,它包括哪些构成要素,如何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以下简称“评价指标体系”)来进行科学测度,引导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进程中“大道走得对、大势观得准、大局定得稳、大事谋得实、大众过得好”,形成对内政局稳定、人民团结,对外一呼百应、携手共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良好发展态势。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独有难题与解决之道研究”(23ADJ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冯志峰,男,江西东乡人,法学博士,中共江西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发展研究。

<sup>①</sup>《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4页。

## 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基础

如何科学测量现代化国家建设进度,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之进行过众多的深入研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现代化国家建设评价的衡量标准界定、指标体系设计与指标核算应用,为本研究打牢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 (一) 现代化强国的评价衡量标准

关于世界现代化的统一定义,尽管相关文献汗牛充栋,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一般而言,世界现代化是18世纪以来人类命运的一种前沿变化和国际竞争,它包括现代文明的形成、发展、转型和国际互动,文明要素的创新、选择、传播和退出,以及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化”<sup>①</sup>,主要指一个社会(国家、民族、地区)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农业结构向工业结构的转型过程。由于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发展基础、发展状况和发展目标不尽相同,衡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标准不同,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评价体系。这些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第一次现代化指数、第二次现代化指数、综合现代化指数<sup>②</sup>和全球竞争力指数、知识经济指数、硅谷指数、国家创新指数等。这些评价指标体系一致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大主要可以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个维度来进行科学衡量,以综合反映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状况。在此基础上,许多学者还注重从专题方面对现代化国家建设标准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等提出,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确保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基础,更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关键所在。<sup>③</sup>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等认为,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是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持续进步和不可逆化的过程,其突出特征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sup>④</sup>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强调,工业化是现代化的起源,作为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化必将涉及社会阶级或阶层的深刻变化,这就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带来的阶层的变化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更为注重社会治理相关指标体系的设计和应用,才能更为深刻、准确地反映现代化进程。<sup>⑤</sup>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等提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必须重视文化现代化的建设,才能奠定现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石。<sup>⑥</sup>以美国布莱克等为代表的学者,则对现代化的主要模式及运用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各国现代化的模式选择应在遵循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在取长补短中更为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建设。<sup>⑦</sup>与之相比较,国内学者从系统角度探索现代化国家的构成性要素,认为现代化强国必定是“劳动、权力、资本、创新四个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①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1世纪现代化的特征与前途》,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页。

②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求索现代化中国方案:现代化八问》,《半月谈》2017年第22期。

③ W.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Thir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④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⑤ 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Analysis of the Writings of Marx, Durkheim and Max Web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⑥ Alex Inkeles, *Exploring individual modern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⑦ Cyril Edwin Black, *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 A Read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76.

的社会系统”<sup>①</sup>。也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强国必须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都很强的有机整体,主要表现为“国家要统一、经济要发达、政治要文明、科技要领先、军力要强大、文化要繁荣、社会要和谐、外交要有效”<sup>②</sup>的建设标准,对内具有全民认同的合法性,对外具有一呼百应的正当性,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强大、世人公认的现代化强国。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全面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尊重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重视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成败得失中总结经验,既充分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又避开现行现代化国家所走过的弯路,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

## (二) 现代化强国的评价指标体系

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在国内外学术界与实务界经历了一个较为长期的交流交锋交融的发展演变过程。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教授就提出了经典现代化评价的“人均 GDP、农业增加值、服务业增加值、农业劳动力、城市化率、医疗服务业率、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大学普及率”10 个评价指标体系<sup>③</sup>,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化评估方法的科学运用。通常而言,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常用标准是综合国力,即衡量一个国家基本国情和基本资源最重要的综合性指标,主要包括“经济资源、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知识技术、政府资源、军事实力、国际资源”<sup>④</sup>。也有许多学者注重以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某个关键领域为纲来构建现代化强国指标体系,以求达到纲举目张、事半功倍的评价效果。例如,美国政治学者阿什利·泰利斯将现代化强国定义为创新能力和军事能力两者相互作用的产物,并以此为主要架构设计出一套评价指标体系。<sup>⑤</sup>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华尔兹把现代化强国定义为各种能力的分布与集合,更为注重对各国军事和外交实力的测度<sup>⑥</sup>,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导向。美国学者克劳斯·克诺尔则认为现代化强国主要体现为经济能力、行政竞争性和战争动员能力,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更表现为在战场上取胜的能力<sup>⑦</sup>,也就是所谓的“打得赢、统得住”。《全球竞争力报告》将影响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八大因素归结为:国内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影响、金融实力、基础建设、企业管理能力、科技实力、人力资源<sup>⑧</sup>,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有效性。美国兰德公司泰利斯等学者,首次提出了在后工业化时代衡量国家实力的方法,在传统方法基础上吸纳新兴数字技术<sup>⑨</sup>,可以更为精准地测度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程度。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选择“人均国民收入、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增加值比例、服务业增加值比例、城市人口比例、医生比例、婴

① 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 年,第 66 页。

② 冯志峰:《探索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 年第 3 期。

③ [ 美 ] 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6 页。

④ 易昌良:《预见未来:2049 年中国综合国力研究》,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年,第 36 页。

⑤ Ashley J. , Tellis and Michael Wills, e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in an Era of Uncertainty*,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5.

⑥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1979.

⑦ Klaus Knorr, *The War Potential of N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⑧ Klaus Schwab Saadia Zahidi,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4.

⑨ [ 法 ] 让-卢普·萨曼:《兰德公司:美国战略学知识的重构》,张倩格、陈渝睿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60 页。

儿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大学普及率”<sup>①</sup> 这 10 项指标作为第一次现代化的评价指标,实质上是对西方国家现代化核算方法的创造性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时我国评价测量的需要。综上可知,这些世界现代化指数没有科学体现生态、外交、治理等领域的现代化水平,只是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部分内容,而未能科学系统地反映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全貌。

以上评价指标体系虽然体现出相当的科学性,但由于归纳得不一定恰当,也并不全面,同时有些观点实际上是互相渗透、相辅相成的,导致其评估结果未能做到科学、系统,精准。由于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维角度、多种层次、多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就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研究,进而提炼出具有共识性的评价指标体系。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旨在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质量、从中国质量到中国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中国设计的“三连跳飞跃”,就更需要构建科学系统、简便务实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导全国人民朝着共同目标接续奋斗、顽强拼搏,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 (三) 现代化强国的评价指数核算

在现代化国家建设评价体系的指数核算领域中,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是依据指标可量化程度,将之分为定性标准和定量标准。从国际通用标准来加以科学判断,定性标准通常包括“箱根模型”“列维模型”,定量标准一般包括“布莱克标准”“英格尔斯标准”等,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建设。

在定性评价方面,1960 年日本、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等 30 多位专家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箱根模型”,立足经典现代化 8 项标准提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相当的国际水准,但较为笼统、不够精准。1966 年,美国社会学家列维教授对“现代化社会”与“非现代化社会”进行了比较,归纳总结了现代化社会的 8 个特征<sup>②</sup>,有利于监测现代化建设进程,但仍停留于现代化要素共性的提炼,缺乏操作性。1966 年,布莱克教授用 10 项指标分别从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流动水平角度来有效测度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但在度量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问题上缺乏关键性的可度量指标。“英格尔斯标准”更多关注人的因素,但缺少生态、环保、信息等方面指标,且指标之间有交叉重复,未能体现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简便、可信可行的核算要求。我国有学者认为,应该将国民生产总值(GDP)、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人类发展指数(HDI)统筹起来全面评估分析后,提炼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指标核算体系,更有利于推进高质量发展。<sup>③</sup> 这种核算方式有利于更为科学地测量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更好地做到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在定量评价方面,克劳福德·哲曼提出了国家实力指数方程,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与拥有核武器能力成正比,突出强调了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的特殊重要性。<sup>④</sup> 维·福克斯提出的非线性国力方程,

①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1 世纪现代化的特征与前途》,第 16 页。

② Marion J. Levy Jr.,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 A Setting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③ 汪青松、陈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内涵、特征与评价指标体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 年第 3 期。

④ F. Clifford German, "A Tentative Evaluation of World Powe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 no.1 (1960): 138–144.

通过对人口规模( $P$ )、能源生产( $Z$ )、钢产量( $Z_1$ )的核算来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发展实力与战斗力。<sup>①</sup>雷·克莱因提出的国力方程,则充分糅合了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体现出较为全面系统的特点。<sup>②</sup>国内现代化标准体系的探讨,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指标》课题组的社会指标体系,提出了包括科技、政治、文化、道德、精神、法制等多方面因素,连续出版物《中国现代化报告》对中国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跟踪研究,在较大程度上持续创新了现代化评价指数的核算方法。徐菱涓通过研究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开展对国防指标的科学评估,这就必须根据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主要特征,构建一个系统化的、既能测度国防经济发展水平又能评价国防经济运行情况和发展潜力的指标体系。<sup>③</sup>张广宇和韩文琦从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互动关系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明确提出国防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具有“目的一致性、实现互补性、发展同步性”特征。<sup>④</sup>李军鹏从理论层面探求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要素及核算要求,但该研究专注于理论层面的分析,提出的对策建议缺乏操作性。<sup>⑤</sup>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尽管各国在探索如何测量、推动与建成现代化强国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依然无法形成一套学术界公认的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由此可知,探索性提出一套既科学系统又简便实用、易于操作的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依然是一个具有共性的哥德巴赫猜想式难题。这主要是因为,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与构建工作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瓶颈”。传统的方法是将各国的主要指标按排序法(Rank-Ordered Scores)排列,并没有给出指标的实际差距和相对变化,这种方法还属于半定量方法的范畴。这就需要发展出一种更为科学、简便实用的定量计算方法,以便能够更为全面、动态、客观地监测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更为及时有效地纠正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的偏差,形成科学有效地防错纠偏机制,更为稳妥有序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众所周知,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现代化强国评价的核心问题,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理论和实践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构建科学简便、务实管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科学评价体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立足古今中外国家建设的成败得失,结合当今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衡量标准可归纳为“政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民族长盛不衰,人民长享幸福”四个维度,其主要构成要素包括“党的领导、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家美丽、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军力强大、国家统一”十大方面,主要体现为“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六大系统。本文在综合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索性地建构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以期更好地服从服务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需要。

① 胡鞍钢、门洪华:《中美日俄印综合国力的国际比较(1980—1998年)》,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第五卷2002年》(上),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② Ray S. Cline, *World Power Assessment 1977: A Calculus of Strategic Drift*,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77.

③ 徐菱涓、李东:《当代国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④ 张广宇、韩文琦:《新中国国防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互动论析》,《军事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

⑤ 李军鹏:《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初探》,《人民论坛(国家治理)》2022年第1期。

##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目标,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评价指标设计就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宏伟目标。测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需要建构一套科学系统、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sup>①</sup>,进而把实事求是的科学性与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考核的“指挥棒”作用。

### (一) 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最为基本的就是要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出发点与预期目标的落脚点之间,找到一条稳中求进、又好又快的前进路径,团结带领人民求真务实、顽强奋斗,实现政党强大、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基于这种目标定位,评价指标体系就要统筹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引领下,找准现实问题一个又一个加以解决、一个又一个环节持续推进,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达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为此,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要统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发展方法与发展阶段,引导各地在推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

### (二) 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相统一

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最为关键的就是把握科学性原则,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理论,以科学理论引领创新发展,以创新发展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只有积极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的有机统一,才能深化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进而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使评价体系的测度指标更为精准地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本质属性、实践要求、发展状况与创新路径。为此,评价指标的选取必须有科学依据,在遵循一定的学理逻辑基础上,对各项指标的计算、含义、来源均须有十分明确的规定。与此同时,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指标与其他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稳定性和相对独立性要符合科学统计的要求,力求在科学测度的基础上得出科学评价结果,更好地服务地方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的实际需要。

### (三) 全国通用与各地适用相统一

评价指标体系要做到简便易行、务实管用,就要遵循全国通用与各地适用相统一的原则,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外通用指标来总体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全貌。一方面,在选取指标时要充分尊重国内外通行的评价方法所选取的通用指标,既要体现“人类目标”,又要彰显“各国特点”,并且有利于开展国内外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纵向和横向比较,以便更好地测度一个地方发展状况;另一方面,要根据各行各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和新动能,使每一个评价维度最好选取少量几个可提

<sup>①</sup>《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9页。

取、可度量、可见效、可信程度高的最具代表性的关键指标,做到少而精、精管用,最大限度地促进评价测度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相契合、相贯通,充分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间主要指标的有机衔接与持续递进关系。

#### (四) 动态分析与静态剖析相统一

要实现对一个地方发展状况的有效评价,就必须选取一个时间节点或一个时期来明确测度区间,才能顺利推进评价考核工作。在被选取的时间节点上反映实际情况的指标,可以称之为静态指标,对其构成要素进行横向剖析,就可以直观地反映一个地方某个特定时期的发展进度,总体把握其发展基础与发展成效。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任何一种发展实际上都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动态过程,任何一项指标必定会对不同时期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动态发展过程,体现为评价指标就是动态指标,对之进行分析可以把握一个地方的发展态势与发展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动态与静态,实际上都是一种人为的相对划分,旨在更好地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状况作出更为科学的合理评价。这就要求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时候,切实做到动态性和静态性相结合,从前瞻性与连续性相结合的维度来统筹考核评价历史数据、现实数据和未来数据,既考虑客观条件和现实可能性,又着眼发展潜力和主观能动性,使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与我国现代化强国建设“两步走”战略目标相衔接,更好地服务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民族复兴的客观需要。

#### (五) 技术可行与数据可比相统一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既要契合实际发展情况,又必须符合科学统计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只有兼具可行性和可比性,才能将考核评价工作落到实处、体现成效。可行性,主要指选取的指标具有较为翔实的历史数据资料为基础,并且可采集、可量化、可测度,确保能够科学、方便、有效地提取。同时,选取的评价指标内涵明确、指向明晰,代表性较强,各指标之间在含义上不交叉,内容上不重复,体现出相对的独立性。可比性,主要指选取的指标既注意与全国和其他地区的横向可比,又注意与历史和未来的纵向可比,确保选取的指标是采用以科学完备的统计方法为支撑的客观指标所构成的体系,能做到科学量化、规范统一、真实可信、核算简便,体现出测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客观性。在此基础上,评估指标体系就可以通过“量化”指标的评估排序来反映各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展的实际情况,精准找出各地现代化建设所体现出的比较优势,精准定位、扬长避短,更好地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殷殷期盼变成现实中的良辰美景。

#### (六) 数量指标与质量指标相统一

数量指标,即定量指标,是反映社会经济现象总规模水平和工作总量的统计指标,一般用绝对数表示。质量指标,即定性指标,是反映总体相对水平或平均水平的统计指标,一般用相对数或平均数表示。本文中政治现代化子系统、社会治理子系统包含的三级指标有些为定性指标,一般均设定为正向指标,与此同时借助层次分析等级评价理论对定性指标进行相应的量化处理,力求促进质化与量化的有机统一。

在开展实际评价工作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评价指标体系还要遵循“运用数据但不能迷信数

据”的原则,深刻认识到“古德哈特定律”所体现的“数量悖论”,即“当人们习惯于控制而不是理解事物时,数字可能是最危险的。但数字是唯一有效的我们能够加以科学评估测度的有效工具。”<sup>①</sup>因为在实际工作生活中,当决策者试图以一个事物的客观测度指标作为指针来执行评估职能时,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旦被人们理性预期到,就会千方百计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种方法来对之加以修饰,使考核评价有可能堕入“测不准”定律的陷阱之中,导致评价指标体系的整体功能失效。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评价指标体系时,必须充分评估各方利益主体对之可能采取的各种反应,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有效应对策略,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评价考核结果的真实性、可靠性和科学性。

###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效如何,取决于人民群众的认同程度。为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测量,必须能够客观精准地呈现人民群众的认同度,才具有科学性。作为一个非常复杂的运行系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包含的内容和情况十分繁杂,发展情况也瞬息多变,其构成元素呈现出内容繁多、相互交织的鲜明特点。近年来,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在现代化建设指标体系方面也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诸多颇具启发价值的宝贵经验。这就有力地印证了历史学家们信奉的观点:“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这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新问题,必须作出新分析,探求新答案。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的新问题,发现对过去都有一种新的同情,这是和他们的先辈所不同的。”<sup>②</sup>为此,参照上述国内外评价指标体系所涉及的相关内容,本文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新进展,参照国内外评价指标体系设计,通过体系化、分层化和模块化来建构其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框架,力求充分体现出更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考核评价功能。

#### (一) 指标选取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sup>③</sup>由此可知,确立什么样的工作标准,就决定着会有什么样的工作成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导向,就必须统筹正向指标(要达到什么)与反向指标(不能做什么),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相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位次),硬指标和软指标(质化指标和量化指标),总体指标与明细指标,区别于传统的现代化国家评价指标体系侧重于考核经济发展的“量”和“速”,注重反映各地各行各业发展的“质”和“效”,才能有效解决当前指标评价体系存在的“效益指标体系与质量指标体系建设不平衡、指标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标体系需要与评价方法供给不平衡”三大问题,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合理、集成高效、多元兼容、务实管用的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绘出“路线图”“施工图”“效果图”,指出“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以可操作、可衡量、可检验的测量

① [英]古德哈特:《古德哈特货币经济学文集》上卷,康以同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60页。

② [奥地利]约瑟夫·熊彼特:《十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凯恩斯》,贾拥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

③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页。

结果引导各地科学、合理、有序、高效的配置各种稀缺资源,以高质量的“标尺”引领和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

## (二) 指标体系结构

现代化强国标准的制定,必须既反映现代化本质,符合国际通用标准,又与时俱进创新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揭示现代化强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治理、国防等关键指标体系所反映出来的鲜明特征。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总体架构,本文根据“统分结合、有总有分,衔接自如、主次分明”的指标选取要求,将评价指标体系相应划分为经济现代化指标、政治现代化指标、文化现代化指标、社会现代化指标、生态现代化指标、国防现代化指标等六个一级指标,然后根据指标性质划分出19个二级指标,进而再根据指标功能细分出50个三级指标(指标构成情况见表1),能够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规律,不断提升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针对性、适应性和实效性。

表1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简明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序号	三级指标	单位	权重 (%)	目标值	实际完成 比值	绩效评估 值	属性
A. 经济现代化指标 (25%)	A1. 经济发展 (9%)	1	A11. 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率	%	4				预期性
		2	A12. 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	%	4				预期性
		3	A13. 进出口增长率	%	1				预期性
	A2. 创新驱动 (6%)	4	A21. 全社会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	%	2				预期性
		5	A22.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	2				预期性
		6	A23.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2				预期性
		7	A31. 人均(GDP)增长率	%	3				预期性
	A3. 生活质量 (10%)	8	A32. 债务率(政府债务/综合财力)	%	2				预期性
		9	A33. 恩格尔系数	%	2				预期性
		10	A34.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	3				预期性
B. 政治现代化指标 (15%)	B1. 党的领导 (4%)	11	B11. 党员数量比例	%	2				预期性
		12	B13. 党政网络影响力指数	%	2				预期性
		13	B21. 人民自身民主权利满意度	%	2				预期性
	B2. 人民民主 (6%)	14	B22. 基层民主参选率	%	2				预期性
		15	B23. 每万人口拥有律师数	人	2				预期性
		16	B31. 政府透明度指数	%	3				预期性
	B3. 依法治国 (5%)	17	B33. 企业经营环境指数	%	2				预期性
		18	C11. 文化投资比例	%	2				预期性
		19	C12. 文化就业比例	%	2				预期性
C. 文化现代化指标 (15%)	C2. 文化传播 (6%)	20	C21. 世界文化遗产份额	%	2				预期性
		21	C22. 电视普及率	%	2				预期性
		22	C23. 移动电话普及率	%	2				预期性
	C3. 文化消费 (5%)	23	C32. 文化消费比例	%	2				预期性
		24	C33. 人均文化商品出口	元	3				预期性

续表1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序号	三级指标	单位	权重 (%)	目标值	实际完成比值	绩效评估值	属性
D. 社会现代化指标 (15%)	D1. 贫富差距 (4%)	25	D11. 城市高低收入比	%	1			预期性	
		26	D12. 城乡居民收入比	%	1			预期性	
		27	D13. 农村高低收入比	%	1			预期性	
		28	D22. 人均预期寿命	年	1			预期性	
	D2. 教育水平 (2%)	29	D31. 教育经费占GDP比重	%	1			预期性	
		30	D32. 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张	1			预期性	
	D3. 就业情况 (2%)	31	D41. 城镇调查失业率	%	1			预期性	
		32	D43.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1			约束性	
	D4. 社会治理 (3%)	33	D51. 犯罪率	%	1			预期性	
		34	D52.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	1			预期性	
		35	D53. 常住人口城镇比率	%	1			预期性	
	D5. 社会安全 (4%)	36	D61.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亿吨	1			约束性	
		37	D62. 能源综合生产能力	亿吨	2			约束性	
		38	D63. 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	%	1			约束性	
E. 生态现代化指标 (15%)	E1. 污染控制 (4%)	39	E12. 污水处理率	%	2			约束性	
		40	E13.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	%	2			约束性	
		41	E21. 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	%	2			约束性	
	E2. 节能降耗 (6%)	42	E22. 单位GDP水耗	%	2			约束性	
		43	E23. 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	2			约束性	
		44	E31. 耕地保有量	亩	3			约束性	
F. 国防现代化指数 (15%)	E3. 资源利用 (5%)	45	E33. 森林覆盖率	%	2			预期性	
		46	F11. 军费支出占GDP的比重	%	3			预期性	
		47	F12. 武器出口占GDP的比重	%	3			预期性	
	F1. 军备力量 (9%)	88	F13. 军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	%	3			预期性	
		49	F21. 国家建交数量在世界的排名	位	3			预期性	
	F2. 和平发展 (6%)	50	F22. 国家缴纳联合国会费金额排名	位	3			预期性	
合计					100				

1. 经济现代化指标。强大的经济实力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强国的主要体现,是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众所周知,“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也要遵循这一规律。”<sup>①</sup>这个规律体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就是必须极其重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以质量变化、效率变化和动态变化为出发点的现代经济体系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支撑,是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物质基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推动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发动机。因为,科技成果是现代化的动力源泉,科技发展是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化既依赖于科技进步,又对科技发展形成巨大的需求拉动,引发新的科技革命。此即为“社会一

<sup>①</sup> 习近平:《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38—239页。

且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sup>①</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人均实际收入。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均GDP指标,可以较为全面地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基于此,经济现代化指标可以分为经济发展、创新驱动、生活质量三个二级指标,下设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进出口增长率、全社会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附加值占GDP比重、人均(GDP)增长率、债务率(政府债务/综合财力)、恩格尔系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10个三级指标。经济现代化指标所占比重为25%,其中A1.经济发展类指标所占比重为9%,A2.创新驱动类指标所占比重为6%,A3.生活质量类指标所占比重为10%。国民生产总值从总量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国力,人均GDP体现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质量,可以更为鲜明地突出经济基础的根本性作用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评价考核导向。

2.政治现代化指标。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标志。因为政治文明是一个社会总体文明的主干,是一个社会持续推进现代化的关键支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必须具备的两翼,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有力支撑和根本保障。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必要之举。基于此,政治现代化指标可以分为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三个二级指标,下设党员数量比例、党政网络影响力指数、人民自身民主权利满意度、基层民主参选率、每万人口拥有律师数、政府透明度指数、企业经营环境指数等7个三级指标。政治现代化指标所占比重为15%,其中B1党的领导类指标所占比重为4%,B2人民民主类指标所占比重为6%,B3依法治国类指标所占比重为5%。由此,可以较为有力地反映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与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状况。

3.文化现代化指标。文化现代化和文化软实力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有利于我们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使民族综合素质不断提高,民族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民族品牌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不断增强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基于此,文化现代化指标可划分为文化产业、文化传播、文化消费3个二级指标,下设文化投资比例、文化就业比例、世界文化遗产份额、电视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文化消费比例、人均文化商品出口等7个三级指标。文化现代化指标所占比重为15%,其中C1文化生产类指标所占比重为4%,C2文化传播类指标所占比重为6%,C3文化消费类指标所占比重为5%,有利于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文化现代化发展状况。

4.社会现代化指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应建立在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社会和谐是现代化强国不可或缺的关键指标。“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统称,不仅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治理,还包括政府治理、政党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源头治理等,是继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四化”之后的制度现代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五化”。改善民生、促进民富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为建设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48页。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社会现代化作为一种物质富足、科技创新、精神富有与生态美丽的科学发展过程,是通过许多方面的社会变革而实现的,如社会分工与整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等。社会治理得到有效改善,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等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基于此,社会现代化指标可以分为贫富差距、医疗卫生、教育水平、就业情况、社会治理、社会安全5个二级指标,下设城市高低收入比、城乡居民收入比、农村高低收入比、人均预期寿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城镇调查失业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犯罪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常住人口城镇比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能源综合生产能力、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等。社会现代化类指标所占比重为15%,其中D1贫富差距类指标所占比重为4%,D2教育水平类指标所占比重为2%,D3就业情况类指标所占比重为2%,D4社会治理类指标所占比重为3%,D5社会安全类指标所占比重为4%,能够较为系统全面地准确反映社会现代化治理进展情况。

5. 生态现代化指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决不能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竭泽而渔的蠢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科学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态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以发挥生态优势促进现代化,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高质量发展,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扎根生效。“美丽中国”主要体现在生态文明的提升和进步上,基本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均衡型、生态健康型的美好社会。基于此,生态现代化指标可以分为污染控制、节能降耗、资源利用3个二级指标,下设污水处理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单位GDP水耗、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耕地保有量、森林覆盖率等三级指标。生态现代化指标所占比重为15%,其中E1污染控制类指标所占比重为4%,节能降耗类指标所占比重为6%,资源利用类所占比重为5%,有利于做优农业、做美农村、做富农民,较为科学地反映出生态环境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突出载体职能。

6. 国防现代化指标。国防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强大至关重要的标志,反映了该国对内制止国家分裂、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对外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全球和平实力,是极其重要的国家战略资产。测量或评价一个国家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必须根据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主要特征来开展,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面加强军事治理,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构建现代军事治理体系,以高水平治理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sup>①</sup> 基于此,国防现代化指标可以分为军事力量、和平发展2个二级指标,下设军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武器出口占GDP的比重、军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国家建交数量在世界的排名、国家缴纳联合国会费金额排名等5个三级指标。国防现代化指标所占比重为15%,其中F1军备力量所占比重为9%,F2和平发展类指标所占比重为6%,可以科学地反映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国防安全之间的有机联系,更好地将中国自身发展科学地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坐标系中,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为世界发展创造新动力新机

<sup>①</sup>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5页。

遇。由此可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发展战略、经济政策、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充分发挥评价指标体系考核的指挥棒作用。为此,我们要积极引导各地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优、做强,推动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确保“全体人民在共商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实现政治建设高站位、经济发展高质量、文化事业高品牌、社会治理高水平、生态环境高标准、人民生活高品质”<sup>①</sup>,让人民生活得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好。

### (三) 指标测算方法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科学与否,取决于其评价指标计算与当地实际发展情况的吻合程度。为提高指标核算的适用性,就必须严格评价指标测算方法,规范指标计算步骤过程中的权重赋值、个别核算和加权求和,确保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统一性、简便性和有效性。

第一,在权重赋值这个环节,主要采用主观赋值法和客观赋权法来设定各指标的相应权重。本着客观为主、主观为辅的原则,尽量选取数据简约、内容简要、计算简单、抓取简便的“硬指标”,以保证评价指标体系数值计算结果的可信度和精确性。对于实在无法采用客观指标予以衡量的核算指标项目,就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本质属性和指标特性,依据专家经验值从主观上为指标设定权重,采用无量纲化处理来确保这些“软指标”的权重系数在合理范围内“波动”,使评价指标体系核算能够在具有可比性基础上,确保指标体系核算的“误差”降至最低。

第二,在指标计算这个环节,主要是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构成特点,在各地党委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权威数据来源基础上,按照指标所属类别计算出或选取每个三级指标的实际值。通常是对评价指标体系的每个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和权重系数的乘积,来计算出各个指标反映的实际完成情况。然后,以类似方法计算出评价指标体系二级指标的实际值,就可以较为清晰地观察到该级指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过程中的相应作用。

第三,在指标加权求和这个环节,将评价指标体系二级指标的实际值累计相加得出的和,乘以一级指标所对应的指标系数,就可以得到一级指标的评价指标值。再将评价指标体系 6 个一级指标的绩效评估值加权汇总求和,就能得到一个国家现代化强国评价的整体指标数值。通过对各地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数据的比较研究,就可以有效测度各地现代化强国建设水平的实际进展情况,在总结成败得失的基础上探索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科学路径。

##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实践要求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中华民族百年追求与梦想,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既要着眼于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来科学建构评价指标体系,更要考虑到各项指标在实际工作中提取的可能性、可靠性、可信性和可行性,使建构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极强的政治性、科学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才能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开展。为此,应在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评价标

<sup>①</sup> 冯志峰:《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规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第 36 页。

准的基础上,按照科学测度标准的规范要求,建立健全相应的现代化强国建设进度监测机制,辩证分析一个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的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前任基础与现任业绩、发展成果与发展成本、显绩与潜绩、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及时监测、适时诊断、评价预报、及时预警、防范化解。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的数据库建设,依托国家统一信息平台实施宏观调控,在宏观政策“稳”的基础上确保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在微观政策“活”的基础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主动战、攻坚战、持久战的过程中把握“强”的标准与要求,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支撑。

### (一) 强化评价衡量标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明确目标方向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主要是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结合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以“三个聚焦”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在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一要聚焦“共同富裕”,始终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系统思维、整体观念衡量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二要聚焦“发展特色”,对设区市、县(市、区)基本架构相同、指标有所区别、数量有所不等的指标体系,既考虑到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也兼顾到发展速度较快的地区,统筹兼顾、协调联动,促进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融合,最大限度彰显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公平性;三要聚焦“守正创新”,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通过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企业创新的制度环境、采用技术创新和能源转换等方法降低能源消耗、提高外贸科技含量等发展新举措,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立在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之上。

### (二) 优化评价监测机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健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监测机制,旨在健全完善需求科学生成、各方协同、快速响应、有效落实的评价机制,通过开展建设情况的动态监测、动态评估,来加强实际工作的监管,充分发挥评价指标体系的链路顺畅高效、评估科学精准的整体效能,蹚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全过程专业化评估新路子,确保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评价考核工作取得实效。一是确保监测的准确性。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制度建设、项目建设、队伍建设等多方面构建完备的数据质量保障防控体系,层层负责、抓好落实,依法真实报送数据,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评价工作全流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云端化、融合化,切实有效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质量。二是务求监测的规范性。切实加强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强核算基础指标监测分析,及时做好评价指标运行预警预判,推动形成科学系统有效的监测机制,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评价考核工作在科学规范的轨道上运行,及时发现并消除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隐患,从制度层面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发展导向。三是坚持监测的严肃性。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统计制度的规定,按时、如实地填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监测评价考核数据,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整体和局部、守正与创新、当前和长远、重点和一般、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开展系统地数据分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实践经验、创新工作方法、提供科学有力的制度保障。

### (三) 转化评价结果应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激发内生动力

运用指标进行科学评估是实现目标管理的有效工具,探索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

系更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有效举措和有用之策,其关键就在于做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考核评价结果的“转化”运用。首先,根据权威数据来源,计算出或选取每个三级指标的实际值,按照每个指标的实际完成值和权重系数的乘积来计算出实际完成情况。其次,将一级指标所属的各三级指标计算出来的绩效值累计相加得出的和,乘以一级指标系数,就可以得到一级指标的绩效评估值;第三,将6个一级指标的绩效评估值相加,就能得到现代化强国建设评价指数。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评价指标核算的结果,按照导向性、公正性、可行性和可比性原则,就可以充分发挥科学考核的“晴雨表”“指挥棒”和“助推器”重要作用,引导各地创新发展、突破发展瓶颈、化解风险矛盾,力促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和要素跟着项目走,进而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进行转变。严格对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妥善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渐进性和飞跃性、前进性和曲折性等关系,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查摆问题、奖优罚劣,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考核评价的科学性、权威性、针对性、有效性和公信力,着力推动形成表彰先进、鞭策后进、激发内生动力、层层传导压力的全面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良好氛围,持续推动各地形成政府调控有力、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序、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抓实抓牢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大任务举措,持续畅通经济循环,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sup>①</sup>,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责任编辑:侯德彤

## On the Logic of Build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Feng Zhife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rxism, Jiangxi Party School of CPC, Nanchang 330108, China

**Abstract:** To fully build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e first prerequisite is to define what it is and then to clarify its core meaning and components, and on this basis to explore the path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founda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s of strong modern countries. It also strictly follows the six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of unifying "goal orientation and problem orientatio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inter national and local application, dynamic and static analysis, technical feasibility and data comparability" according to China's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trends and reality. We have thu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 scientific, systematic and effect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the new era. To fully implement thi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evaluation measurement standards, optimize the evaluation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transform the application of evaluation results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dex design principle; evaluation index calculation; application of evaluation results

<sup>①</sup>《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9页。

# 跨学科视域与跨文类叙事：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敦煌文学书写

李 松 杨芷若

武汉大学 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自19世纪末,海外汉学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工作,21世纪以来走向成熟和深化。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该书有关敦煌文学书写的问题值得重视。通过阐述选取文献的缘由、撰写的思路以及向文学本位回归的特色,可以提炼出作者书写敦煌文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即跨学科视域和跨文类叙事研究。考察该书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可以为国内的书写实践提供路径参考。中国文学史编纂应该立足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参与全球国际对话并构建科学的文学史理论,撰写真正内在于中国文学文化同时又融入世界潮流的文学史著述。

**关键词:**《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敦煌文学;梅维恒;史密德

**中图分类号:**I206.2; I209; K20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4)02-0102-16

## 引 言

国外学界大致于19世纪末开始编纂中国文学史,其中的代表作如俄国王西里(V.P.Vasiliev)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日本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1897年)、笛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1898年)、英国秀耀春(Francis Huberty James)的《中国文学》(1899年)等。20世纪初各国更多著述纷纷涌现,例如英国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中国文学史》(1901年)以及德国顾路柏(Grube Wilhelm)的《中国文学史》(1902年)等。受西方现代性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本土学者也随之展开了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较早的著作包括林传甲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所编的讲义《中国文学史》与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逐渐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书写文学史的实践中,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Victor H.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01年)出版以来,在海内外引发了热烈反响,并在15年后由新星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与以往的中国文学史不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内容与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的历史流变及其理论范式构建”(22&ZD2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松,男,湖南湘乡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海外汉学研究;杨芷若,女,湖北恩施人,武汉大学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助理,主要从事海外汉学研究。

形式上都有诸多突破和创新,梅维恒认为,本书要“带着对所有困难的充分自我意识,将最新的学术成果聚拢在一个框架之中”,并兼采年代与主题的编排方式,“以超越时间与文类的全新棱镜来审视中国文学”<sup>①</sup>,从而帮助读者看到中国文学的多样面相,看到它的微妙以及持久的生命力。深入分析这本北美的中国文学史代表作,能从中得到关于文学史书写思路与方法的启示。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自面世之后,国内外学者从多维度对其进行了分析与探讨,纵观当前对于相关论题的研究现状与成果,主要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为总结反思型,通过对海外汉学家所著的文学史的总结分析,反思对国内文学史书写具有启发意义与必要参照。如黄云霞从国内学界高度关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等海外中国文学史的现象出发,谈到述史定位、时序结构和文体意识等有关普通文学史著述的常识问题,据此希望国内学者不要被西式标准局限,而应回到中国文学自身的独特形态思考问题<sup>②</sup>。郭中华强调要以“大文学”的观念考察各类文学作品和其他相关的艺术形式,在突出文学自身演绎进程的同时彰显中国文学代代相传的内在特征<sup>③</sup>。李静、何敏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出发分析本书实现文本与历史交流互动的方法,指出其超越文学研究而注重文化研究的创新之处<sup>④</sup>。第二类为批判评价型,主要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编排结构、研究视角及论述风格等内容进行客观分析,指出本书的创新与不足。国外学界以柯马丁(Martin Kern)和何谷理(Robert E. Hegel)合撰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方式及其局限》<sup>⑤</sup>为代表,该文对本书的编撰结构、知识性错误以及不加思考地使用传统标签与范畴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论证。国内学界,韩高年辩证批判本书所存在的明显不足,特别是在文学文体归类方面的自相矛盾和叙事方面的碎片化问题<sup>⑥</sup>;张震英、黄阳华指出本书受他者视域和西方定式思维影响产生了认知局限<sup>⑦</sup>;张明强举例论证本书存在内容杂糅和史实错误的问题<sup>⑧</sup>;徐志啸认为本书由于涉及问题与现象太多导致论述不够深刻<sup>⑨</sup>。这些研究从客观分析出发,既批判了《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局限与不足,又总结了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的特色,推进了当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第三类则为对比分析型,将《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同期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作对比分析,从二者的创新探索中寻求对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良好示范和借鉴。如李学昭从新的理论、体例和批评三方面探索了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可能<sup>⑩</sup>;周睿也从编者学养、读者受众、文化视野、历史细节等多方面考察了二者的中国文学史观<sup>⑪</sup>。上述成果有助于今后中国文学史写作的重新出发与跨越式发展。目前学界对于《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成果较为可观,但主

①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年,《引言》第4页。

② 黄云霞:《“历史”著述与“文学史”书写——从近年引进的几部海外版“中国文学史”谈起》,《东南学术》2015年第1期。

③ 郭中华:《别样视角下的中国文学研究——论〈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观》,《郑州师范教育》2018年第5期。

④ 李静、何敏:《文史对话:〈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新历史性》,《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⑤ [美]柯马丁、何谷理著:《〈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编撰方式及其局限》,卢絮译,《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1期。

⑥ 韩高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评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文艺研究》2017年第9期。

⑦ 张震英、黄阳华:《欧美学术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为视角》,《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5期。

⑧ 张明强:《〈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及其中译本评议》,《国际汉学》2018年第1期。

⑨ 徐志啸:《别具一格: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国际汉学》2021年第1期。

⑩ 李学昭:《从两部海外中国文学史看新的文学史如何可能》,《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⑪ 周睿:《他者视野下的两部域外中国文学史书写——〈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对比研究》,《国际汉学》2020年第2期。

要还是集中在文学史编写模式的整体把握,对其中所提到的重要话题与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围绕该书的第48章敦煌文学专题,具体分析编者将敦煌文献从历史学考量回归到文学性剖析所做出的尝试和努力,从而论证论述该书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创新性特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立足跨文化交流的语境,以独具一格的编撰方式整合了多层次的材料,向非汉语世界的广大读者展示了数千年来中国文学“流变的轮廓以及万花筒般的转化”<sup>①</sup>。将欧美学术的思维与传统融会贯通汇聚于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实践,实现跨语言、跨文化的互动。本文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关于敦煌文学的书写方法为参照,从文献的选择、书写的实践、方法的总结三个层面具体阐释其广阔多元的视野,为未来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实践探讨可能的路径,为文学史学科发展与建设提出可供参考的方向。

## 一、敦煌文学书写的问题意识

葛兆光认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变化有四个特征,其中谈到“空间放大”时指出,“不再局限于汉族中国或者核心王朝的那个范围,而是把历史视野扩大到满、蒙、回、藏、朝鲜甚至整个亚洲和世界。在这一点上大家都知道,敦煌文书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这样的刺激。”他谈到“史料增多”时认为,甲骨文、敦煌文书、居延汉简、大内档案以及日本和韩国保存的中国文献使得我们对档案和史料的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sup>②</sup>他的上述观点都提到了敦煌文献重要的史料价值。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过分庞杂使得研究者应接不暇,新的研究成果呈指数级爆炸增长使得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工作令人无所措手。在社会史、新文化史、后现代主义思潮等多种因素的冲击下,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在研究视野和范式产生了新的变化。面对全新的挑战,梅维恒等学者怀有对所有困难的充分自我意识,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体例、框架、史料、论证上进行新的突破。他们从中国文学的文字、语言和思想基础出发,逐步展开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论的通代性观照,兼顾民间文学及国别地区关系。纵观所选取的主题,可以发现相较于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本书注意到了海外学界不够重视的话题,避免了研究对象的设定偏于狭隘的弊病,特别是将敦煌文学单列为一章的编排方式与众不同。下面分析该书如此处理的背后缘由与问题意识。

### (一) 编撰理念决定文献选择

梅维恒明确确定了该书的文化史叙述线索:“以文化为线索,而不是以儒家思想、佛教思想、道教思想,或者以知识分子为线索。我将中国文化视为复杂的、多层面的,编这本书所遵循的主线,是‘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由多样成分构成’。而在过去甚至现在,很多人依然带有偏见地认为,儒家思想、佛教或道教等思想是中国文学史的脉络。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立场。”<sup>③</sup>上述看法体现了思想创新与理论个性,体现了文学史观念的自觉。他试图纠正文学史书写过强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与一元论脉络,弱化精英意识和上层文化等级叙事,主张多元主义视角和眼光向下立场。

受全书编写主旨的导向,敦煌文学的相关内容需要作为单独一章重点论述。梅维恒在引言部分

①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引言》第6页。

② 石志杭、陈雪整理:《葛兆光:什么才是好的学术书?》,《光明日报》2021年5月15日,第11版。

③ 崔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主编:鲁迅是世界级的作家》,2016年8月1日,<http://cul.qq.com/a/20160801/025929.html>。

就开门见山地列出了应当贯穿全书的四大主题:其一,(广义上的)思想和宗教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其二,精英与民众之关系对中国文学的重要性;其三,存世文献中体现出的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其四,语言(包括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全国语言与地方语言)在决定文本性质方面的角色。关于敦煌文学的书写正好契合以上研究重点。负责该章的作者史密德(Neil Schmid)是梅维恒的博士。关于宗教和思想在中国文学演进过程中扮演何种重要角色的问题,他以在莫高窟发现的抄本为典型指出,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不仅“确立了位于中国边境且将中国和中亚连接起来的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和莫高窟作为佛教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而且“阅读这些书面文字为我们提供了何谓有文明、何谓中国人的定义”<sup>①</sup>。显然,编者关注到了敦煌文献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并在之后的叙述着重分析其价值所在。抄本发现于中华帝国的边陲,反映了中国历史和审美趣味漫长的时空变迁,也保留着与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统一性。

上述提到的精英与民众之关系问题是本书的重点。史密德认为,从敦煌文学中的许多作品在其他地方早已失传的事实可以推断出,文人士大夫对其评价不高,甚至在汇编文学作品时直接将其排除在外,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独一无二的敦煌文学仍是处于不断变化中、兼具宗教性与世俗性的百姓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可以感受到不那么受精英权威的审美趣味影响的民间文学的充沛生命力<sup>②</sup>。余下的两个主题同样能在第48章对于敦煌文学的书写中得到体现。一方面,虽然在藏经洞中发现的抄本绝大多数是中文写成的佛经,但也有大量吐蕃文、契丹文、粟特文、梵文以及回鹘文的佛经,这为中古时代语言和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无比珍贵的资料。另一方面,佛教俗讲的语境和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为民间文学的产生提供了口头环境。“虽然很难确定敦煌文献读者的准确性质,但很明显的是,其中的许多作品跨越了受过教育和未受教育者之间的沟壑。文体和语言元素将许多敦煌文学定义为民间文学:句法和字词中口语元素无处不在、程式化用语、大量重复以及明显的都与当时文言文学的风格大相径庭。”<sup>③</sup>在这一点上,敦煌文献所提供的资料佐证了文体和语言元素在界定文本性质时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梅维恒在建构文学史论述框架时为敦煌文学列出专章,认识到敦煌文献在研究中国乃至世界文化时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必须要承认的是,敦煌文学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既有独一无二的地方性,又显示出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特性,为中古时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无可比拟的珍贵证据。明确敦煌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性并回归到文学本位的立场对其予以详细的叙述,也是多元化文学史书写的必由之路。

## (二)主编梅维恒的敦煌学研究背景

除了本书在编写之初框架预设的制约之外,之所以选择书写敦煌文学也与主编梅维恒本人在该领域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本书主编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的梅维恒教授作为北美研究敦煌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语言与文学、敦煌文献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以敦煌文献开始了最初的学术生涯,在当时主要研究古代白话和通俗文化,并于1976年完成了博士论

①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第1069、1070页。

②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第1072页。

③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第1071页。

文《敦煌通俗叙事文学》<sup>①</sup>,1988年出版了《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及其印度起源》<sup>②</sup>,1989年出版了《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俗讲和戏剧产生的贡献之研究》<sup>③</sup>。这三部涉猎同一主题的专著与其他论文,为梅维恒在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广泛的研究兴趣也使得他在进一步整体把握中国文学与文化时形成了开阔的视野。除敦煌变文之外,他对中国的语言、宗教和跨文化交流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不仅在《佛教与东晋白话文的兴起:民族语言的形成》<sup>④</sup>一文中论述了佛教如何帮助白话文合法化的问题,揭示了佛教的传入与传播对培育中国书面白话文起到的重要作用;而且对庄子和道教文献进行研究,并于1983年编辑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庄子试论》<sup>⑤</sup>,使中西方文学与思想的沟通更为紧密。他甚至还引领了塔里木干尸的相关研究,在与印欧人研究权威马尔罗教授(J. P. Mallory)合撰的《塔里木干尸:古代中国和来自西方的最早民族之谜》中特别展示了中国与外国民族的跨文化交流<sup>⑥</sup>。梅维恒认为:“现在海外汉学中一些最有前途的领域都是跨学科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这些项目把各种各样领域中的学术研究放在一起,在宽泛的基础上,再在某个主题上进行合作。”<sup>⑦</sup>跨学科是汉学的客观存在,也是本质属性,由此而发展交叉学科研究是创新的必然选择。梅维恒本人的学术研究践行了这一理念。

基于个人长期的学术积淀,梅维恒的文学观广阔而多元。他不以儒家、道教、佛教思想或是知识分子作为中国文学史的脉络,而是以文化为线索,并将中国文化视为复杂的、多层面的、由多样成分构成的,在具体的考察过程中考虑到多方面的文化与文明,尝试呈现中国文学的完整画面。就像他的学生的评价所说:“今天,人们经常试图在跨学科研究的标题下模拟世界主义,但对维克多来说,这一点也不时髦:他只是对知识和突破界限有着永不满足的胃口。事实上,跨越边界一直是我们导师的主要学术模式,这种模式不断质疑这些边界在地理上和类别上的位置。尽管维克多从不使用流行术语,但他总是探讨涉及多元文化主义、混杂性、相异性和底层等方面的现象和问题,同时将他的作品建立在艰苦的语文学分析的基础上。维克多展示了语文学在研究21世纪的关注点方面的成功,这种方法通常被视为19世纪的遗物。”<sup>⑧</sup>内涵丰富的敦煌文学是他跨越学科边界醉心探讨的对象。

来自于工人阶级家庭的梅维恒对民间生活有着敏锐的关注度。“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文化只是一种‘美学’,只与美学家有关。我认为,它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比如说,农民是怎么想的。这并非意味着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后者通常关注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感受。不过,我所

① Victor H. Mair, *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② Victor H. Mair, *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③ Victor H. Mair, *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the Rise of Vernacular Fiction and Drama i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9.

④ Victor H. Mair, "Buddh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ritten Vernacular in East Asia: The Making of National Languag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94, 53(3):707–751.

⑤ Victor H. Mair, *Experimental Essays on Chuang-tz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3.

⑥ Boucher D., Schmid N., Sen T., "The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of Professor Victor H. Mair: A Retrospective Survey", *Asia Major* 19, 2006(1/2): 9.

⑦ 张玉瑶:《汉学家梅维恒:总读按朝代分的文学史是很无趣的》,《北京晚报》2016年9月30日。

⑧ Boucher D., Schmid N., Sen T., "The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of Professor Victor H. Mair: A Retrospective Survey", *Asia Major* 19, 2006(1/2): 1.

理解的中国文学史,以及我所理解的中国文明,要包括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部分的文化和文明,要呈现的是一幅完整的画面。”他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想法与感受都囊括进思考的范围,形成了独特的平民文学立场,这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直接的关系。梅维恒说:“首先,我来自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我的父亲曾在工厂工作。其次,我以研究敦煌文献开始了最初的学术生涯,当时主要从事古白话研究和通俗文化研究,也可以说是早期民间文学。敦煌文献中,大约 5% 的内容来自社会精英,95% 的内容来自非社会精英——我认为要理解中国文学历史和发展,不能够忽视这 95% 的人。”故而他十分看重记录了生动民间生活与俗文化范畴的敦煌文献。需要说明的是,如上所述,由于文献的便利与研究的积淀,梅维恒有很多理由强化敦煌文学的内容,但是他说:“作为敦煌学专家,我应该在这本书中多加些关于敦煌的内容,但我并没有。加入这一章节是合适的,但我并没有过分强调这部分内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以一本书的篇幅包含 55 章的厚重内容,这就要求梅维恒“必须严格、公正、小心翼翼地决定每部分内容的比例”。他告诫史密德:“不要过于强调他所擅长的敦煌文学的内容。我希望为了解中国文学史的读者负责,为他们提供一本全面的、比例适当的书。”<sup>①</sup>

综合上述主观方面的影响,可以发现《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将敦煌文学单列为一章不仅与梅维恒个人的学术理念与研究兴趣密不可分,而且紧紧扣住了本书的主要议题,充分考虑其在中国文学史的独特地位。以其作为论述的重要话题之一,足以彰显本书在文学史内容编排的独特思路。正如季羨林对梅维恒的评价:“在学者平常不注意的地方,他能提出崭新的解释,在学者平常不能联系的地方,他能联系起来,而且似乎是天衣无缝。有的联系简直近乎石破天惊的程度,不由得你不点头称是。”<sup>②</sup>如此选题与叙述,作为本文接下来的分析要点,为书写文学史的实践带来许多启迪。此外,梅维恒所列举的四大议题之于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这一章的论述中也可见一斑,进一步证明了文学史是文学本身的历史,应当尽可能揭示那些交织互动的关系,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描绘文学自身的发展历程。

## 二、敦煌文献的文学性

有的学者提到敦煌遗书通常习惯性地从文献学角度进行考量,有的文学史著作(除如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等专门性著作以外)很少将敦煌文学纳入其中,或是仅一笔带过。例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1996 年)和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 年),这两本来自中国本土的文学史在经历 1980 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探讨之后,受到逐渐形成的文学史叙述的主流模式之影响,皆按照朝代更替将中国文学划分为不同篇章,只在唐传奇的部分捎带提及出自敦煌文献的俗讲变文,除大致介绍文体分类和重要篇目外未曾过多着墨。美国汉学界的另一部代表性作品《剑桥中国文学史》也同样如此,全书仅在上卷第 4 章“敦煌叙事文学”和下卷第 5 章“早期的叙事诗、变文和诸宫调”两小节中,简要谈论了韵散结合的敦煌叙事文本,主要着眼于出土文献的具体文本内容。与之不同的是,《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将敦煌文学单独列为一章,纳入到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进程之

① 崔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主编:鲁迅是世界级的作家》,2016 年 8 月 1 日, <http://cul.qq.com/a/20160801/025929.html>.

② 季羨林:《绘画与表演:中国绘画叙事及其起源研究》序,见 [美]梅维恒著,王邦维、荣新江、钱文忠译:《绘画与表演:中国绘画叙事及其起源研究》,上海:中西书局,2011 年,第 1 页。

中,首先总结它的内在特征,然后分别以散文、诗歌、讲唱文学为题进行详细的论述,以总分式结构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文学性分析。如此选题的缘由已在前面进行了说明,接下来笔者将具体论述该书如何推动其向文学本位回归以及如何呈现多元化文学史的写作立场。

### (一)敦煌文献的内在特征

敦煌文学的书写主要集中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7编“民间及周边文学”内的第48章,作者史密德在乔治城大学攻读本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2018年成为了中国敦煌研究院第一位全职外国研究员,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敦煌莫高窟的手稿与材料以及文化的认知方法。在本章中,史密德首先对敦煌及其出土文献做了简要的介绍,然后回归到文学本位立场,就敦煌文学的特征与内容进行具体阐述,深入展现敦煌文学的丰富内涵。

探究作者如何使敦煌文学实现从文献学分析到文学本位的转向,首先应关注“敦煌文学”的概念定义,即何为敦煌文学。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百年来的敦煌文学研究,成为了一个最基本又最难回答的问题。20世纪初,王国维以《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1920年)<sup>①</sup>一文拉开了研究的序幕,但当时的开创者们并未给予他们的研究对象一个总名。直到1929年,郑振铎首倡“敦煌俗文学”称号,才肯定了敦煌俗文学的文学史意义。此后延续至20世纪三四十代,人们对于敦煌文学的认识都局限在敦煌俗文学的范畴之内。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俗文学”一语已不足以概括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全部文学作品,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来为这些作品总名,即“敦煌文学”。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王利器、周绍良等学者即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到这一概念,只是当时并未引起注意。直到被称为“起着中国敦煌文学简史作用的著作”的张锡厚《敦煌文学》(1980年)<sup>②</sup>的出版,这个概念逐渐流行,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敦煌文学的认识不断加深,特别是颜廷亮《敦煌文学》(1989年)和《敦煌文学概论》(1993年)的问世,敦煌文学的研究范围被进一步拓宽,标志着敦煌文学理论体系的创建<sup>③</sup>。与此同时,颜先生还在不断地探索和改进对于敦煌文学的定义,并在2013年出版的《敦煌文学千年史》中重新作了论述:“所谓敦煌文学,指的是主要保存并主要仅存于敦煌遗书中的,以唐、五代、宋初为主要创作时代,以敦煌地区为主要创作地区的文学作品。”<sup>④</sup>不过,即便三个“主要”的使用已经对敦煌文学的时间、内容和区域做了一定扩展,对于敦煌文学的概念界定工作却仍未完成。

既然从传统的文献学视野出发难以对敦煌文学作出精确的定义,史密德另辟蹊径,不囿于对敦煌文学的公式化定义与界定,而是以现有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在史料考据、义理辨析、版本校勘等传统治学方法的基础上,对敦煌文献进行文学性分析。具体表现为辩证探讨与之相关的几组“关系”问题,由此总结得到敦煌文学的内在特征。在书中,他首先肯定敦煌出土文献作为中国考古史上最伟大发现之一的重要地位,并在之后的论述中总结出敦煌文学的三大特性。

第一,宗教性与世俗性。在论及敦煌文学中宗教文学与世俗文学的关系时,史密德分别从内容

<sup>①</sup> 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见张涌泉、陈浩编:《浙江与敦煌学: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sup>②</sup> 张锡厚:《敦煌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sup>③</sup> 张广才:《近百年敦煌文学整理研究综述》,《湖北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sup>④</sup> 颜廷亮:《敦煌文学千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和形式上讨论二者的紧密联系。一方面,在内容上均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抄本中绝大多数是中文写成的佛经……其他宗教作品包括儒教、道教和民间宗教文本,以及摩尼教和景教作品。非宗教经文抄本也大量存在,包括了各种当地的经济和法律文书、寺庙日常生活的记录、官方和私人通信,以及具民间特质的文学和纯文学。”<sup>①</sup>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可以明显划分为两类主体。一种是在寺庙求学的世俗学生(学仕郎)的抄写和书法练习,“它们成为中古时代教育过程生动无比的一份记录,并且因为对民间文学的保存而极为珍贵”<sup>②</sup>,成为了世俗文学的典型范例。另一种则是宗教性和技术性更高的文本,它们通常由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僧人、沙弥和职业抄写者来抄写,为后世了解特定时期佛经的流行趋向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研究对象,特别是记录了僧人俗讲时叙事和仪式的抄本,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民间听众的文学素养。这种宽广视野的认知成功将应用性极强的宗教文章也纳入到敦煌文学的概念之中,充分体现了本书多元化和跨学科的写作特色。

第二,口语化。此处再一次涉及到语言与文体的关系问题,前文已经提到,语言在决定文本性质的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敦煌文学的范围内表现得尤为明显。“由社会某一特定人群创作并指向这一特定人群的敦煌文本可谓中古时期最大型的民间文学集……中国的民间文学通常根据听众来进行一般化定义,根据形式来进行具体化定义。佛教的‘方便’之说——即根据听众水平调整讲经的难易水平——使得文体和形式上的弹性变成一种必要,并对中国的文学和语言产生了深远影响。”<sup>③</sup>大量的敦煌文献或是通过脚注和页边注,或是通过补记描述提供了证明,一些书面文本曾在宗教场合或社会场合被用于口头表演,特别是考虑到了更多听众的需要,使得敦煌文学中口语元素几乎随处可见。不论是常用直接对话和直接引语的戏剧(比如《茶酒论》《降魔变文》),还是基于白话对话和禅宗学说的语录(如《庞居士语录》《六祖坛经》),都可以证明口语形式在当时民间社会的流行与成功。

第三,非正典性。这一特性的形成与敦煌文学作为“抄本”的成书特色脱不开关系。敦煌民间文学大多佚名,作者可考的少之又少,而抄本上的大量题跋却能准确地显示抄写活动的相关信息,例如宗教文本的抄写本通常是为了积累功德,世俗学生的抄写本则多为书法练习或学习训练。这些材料大多不是精英审美取向下的崇高文学作品,却也能反映某些文本在大众百姓之间的流行程度,以及在抄写过程中发生的字词、形式甚至文类的变异情况,进一步反映了敦煌文学非正典的民间特质。

史密德眼光独到地抓住了敦煌文学作为“抄本”的成书特点,对其做了文献学上的组织与整理,同时进行文学性分析,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将对其内容的平铺直叙转化为以上几组关系问题的辩证讨论,从而总结出敦煌文学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兼具宗教性与世俗性的百姓文化的内在特征,超越了传统文献学的视野,推动了敦煌文献向文学本位的回归。

## (二)敦煌文学的文类形式

敦煌文学作为一门以资料为核心的综合性学科离不开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各类文献的组织与整理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参考,但文学终归还是文学,敦煌文学的研究也应当回归到文学的本位上。就这一点而言,《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第48章有所突破,在第一部分以超越文献学的

①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第1069页。

②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第1070页。

③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第1070—1071页。

研究视野总结了敦煌抄本的内在特征之后,于剩下的篇幅展开了关于形式和文类的讨论。史密德也特别提到,形式和文类在西方通常是用于区别文学作品的特质,但敦煌文学的各类作品却由于边界模糊而难以明晰地界定开来,只是考虑到“敦煌文本的实际语境和功能是位于学者的分类与编辑愿望之上的”<sup>①</sup>,于是认定文类概念在敦煌文本中具有可操作性,故较为笼统地以散文、诗歌、讲唱文学为题对敦煌文学进行了关于形式、语言和内容的讨论,以期敦煌文学的研究回归到文学本身。

在散文文类中,该书以大量史实材料为例,介绍了敦煌文学中各具特色的传记类叙事作品以及“话”这一白话和半白话散文叙事类作品。在叙述前者时,作者将其分为世俗传记与宗教传记两种。世俗传记既包括作为大众教育文本的各种典范人物传记,又包括讲述重要家族支脉谱系的“家传”(家族传记),二者所采用的格式和价值观虽然一致,但在目的上却各有侧重,即人物传记利用历史人物和道德楷模来说明教化道理,而家族传记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某个家族的权威和地位宣告合法性。宗教传记也包括专门细节化宗教信仰与虔诚效用“应验故事”(miracletales)和讲述印度信徒因果事迹的缘起故事两类作品,它们都在传记语境中讲述因果报应,用各种轶事来证实佛教的效力并促进其传播,但在文体语言和内容功能方面存在着根本区别。而在叙述后者时,作者认为这类敦煌文本中的文类标记“话”更多指的是故事之意,是后世宋元“话本”(短篇小说)和“平话”的先驱,并以《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话》等白话文故事展示了其中有关情节、人物和故事整体的戏剧化特质。

敦煌文作为敦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涉及内容过于广泛而难以对其概念作出准确定论。众说纷纭之中,李明伟在过去讨论的基础上提出,敦煌文主要是指敦煌遗书非佛藏杂著文字中那些具有文学色彩的散文。颜廷亮与张彦珍认为:“散见于敦煌遗书中的表、疏、书、启、状、牒、传记、祭文、碑铭、论、录等,有许多都具有文学色彩。它们状物、抒情、达志、论理,虽大都是治实之作,却相当生动、深刻地反映了当年瓜沙地区乃至整个河西的社会生活面貌和人民群众具有特色的精神生活。这些具有文学色彩的文字,便是敦煌文。也可以称之为敦煌散文。”<sup>②</sup>总之,敦煌文应当指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兼具文学色彩与实用价值的散文作品,在确定其研究范畴时,需要重视其丰富内涵与多样体裁,而不能完全囿于《文选》的分类法,将各种文体的所有篇什都笼统地纳入敦煌散文的研究范畴<sup>③</sup>。史密德在介绍敦煌散文时重点关注了该类文学作品的实用价值。选择传记类叙述作品强调了其在世俗与宗教两个语境中发挥的教育意义,即便大都由简单的文言或半白话写就,也能够反映出当时敦煌地区涵盖了广泛社会阶层的真实社会风貌与文化交融情况。而选择“话”这类叙事作品则考虑到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虽然不具有当时表演文学的典型特质,与话本小说存在明显不同,但其作为中古时期该文类的孤例,仍为进一步考察后世的叙事文类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材料。史密德对这两类文学作品的重点书写展现了其跨地域性和文化交融性的特征,强调了敦煌散文在文学史意义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其他时代、地区的散文不可比拟的显著优势。

在介绍诗歌时,该书首先肯定敦煌抄本记录的各类诗歌对整个中古时期中国诗歌研究起到的不可思议的促进作用,因为这些实例足以证明当时诗歌的流行程度及其在社会中产生的多重影响。而

①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第1072页。

② 颜廷亮、张彦珍:《西陲文学遗珍——敦煌文学通俗谈》,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

③ 张锡厚:《敦煌文学源流》,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141页。

后分别介绍敦煌文献保存下来的赋、词、曲、赞等多种类型的作品,展现了数量庞大的敦煌诗歌的形式多样性与内容丰富性。在具体的论述中,史密德触及到敦煌文学诗歌研究的几个重要议题。

第一,通俗、叙事的敦煌赋是敦煌文学的一大特色。敦煌写本中的赋除了有大量来自《文选》的名篇以外,还有诗人撰写的文赋及流传于民间的通俗故事赋两类作品,其作为具有对话和叙事双重格式的民间散文诗实例,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敦煌赋广泛使用俗语和不规则句子,与唐代盛行的、严格要求格律和对偶的律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别是以历史为题材、以叙事为格式并大量使用对话的俗赋具有不容忽视的特色。

第二,“曲子词”为中古时期诗歌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文人词的结集和经典化造成了早期较为口语化的词的失传,也使词这一诗歌类型的民间性和表演性的起源身份变得模糊不清。幸运的是,敦煌写本中发现了大量这类词。它们以多元的风格以及主题,澄清了词的早期发展阶段,并为清晰说明词所赖以产生的民间环境,提供了文献记载。”<sup>①</sup>敦煌出土的各种早期词作修正了一些过去的说法,使今人对于词的起源与发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特别是敦煌曲子词提供了词这一诗歌类型在8世纪早期的原始形态,见证了其早期口头风格与书面形式相结合的显著特征。虽然敦煌曲子词的总数仍未确定,但其基于固定押韵和声律程式而形成的特定词调或曲调,还是能说明词当发展自民间歌曲的悠久传统,大多数都是为了配合当时流行“燕乐”的公共表演而创作。

第三,涉及宗教与世俗两大主题的文学作品大大丰富了敦煌文学的内涵。文中提到许多敦煌曲子可以松散地归为“赞”或“赞颂”的文类,这一独特类型包含了赞颂杰出个体的肖像赞(“像赞”“描真赞”“真容赞”)、描述宗教实践与信仰的“梵呗”以及记录仪式表演的礼赞文,将这些赞歌纳入敦煌文学的研究范畴,不仅提供了新的材料,更能清楚地凸显佛教对于当时文学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

第四,以王梵志诗为代表的佛教诗提供了研究唐代白话文学的珍贵材料。虽然敦煌诗歌的艺术成就远不如传世的唐人诗歌,且由于白话特质被排除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之外,但敦煌文献中发现的这些作品却能展现当时白话文学的历史风貌,从而有助于理解其他唐代诗人对于白话的使用<sup>②</sup>。

在这一节中,史密德将通常被细分为“诗赋”与“歌辞”两类的敦煌文学作品合并为一体书写,重申了此类材料对于研究当时民间社会乃至中古以后诗歌发展情形的深刻意义。颜廷亮对诗赋类敦煌文学的描述是:“虽然该类作品所使用的体式,古已有之,唐五代宋初也极为盛行,但由于其中保存有大量仅见于敦煌遗书的敦煌本地作品和中原等地诗人、赋家的作品,就中原等地作家的作品内还有诸如韦庄的《秦妇吟》、王梵志的白话诗之类久佚名作,因而也是为历来的研究者们所注意的。”<sup>③</sup>史密德在论述时也着重强调这些珍贵文献的存世揭开了过去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几处神秘面纱,包含了赋、曲、词、赞、诗等丰富内涵的敦煌诗歌既补充了许多以前未知的作品,又为部分传世诗作提供了变体,为唐代诗歌的研究奉献了无比珍贵的材料,展现了中古时期诗歌独特的形式风格、艺术手法、语言特色以及主题价值。

颜廷亮对“说唱类”敦煌文学的定义是:“这是通过说唱故事的方式与接受对象见面的一类作

①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第1079—1080页。

②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第1086页。

③ 颜廷亮:《敦煌文学概说》,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7—8页。

品。”<sup>①</sup>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将此类作品统称为“变文”,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逐渐发现这样统称的方式不利于科学准确地认识该类作品,于是便有了“说唱文学”或“讲唱文学”这样的类名出现。《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观点与之相同,一开始就言明过去学界将“变文”一词作为敦煌民间文学总称做法的不恰当性,指出各类讲唱文学都应当作为文学整体发展过程中的独立元素。然后分别从形式、内容与功能等多元角度介绍了缘起故事、讲经文、“词文”、变文这四种独特的讲唱文学实例,说明了讲唱形式以及白话俗语的广泛使用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在介绍讲唱文学的具体类型时,史密德一再强调的核心观点是文本与其表演语境的密切相关性。四种类别的讲唱文学虽然具有高度相似的文本、修辞和主题特征,但若从用途和表演的层面进行考察便能很快发现其中的不同之处:缘起故事和讲经文有着共同的表演语境——俗讲,通常会在季节性场合和官方场合举行,前者表演有关因果报应的道德故事,后者则一般以某部经书为中心来宣传佛教;词文则以韵文为特征,主要是被吟诵而非根据特定调子唱出来,被部分学者认为与我国古代民间歌谣有着密切联系;剩下的变文则被一些散见各处的轶事证据证明,通常由世俗伶人在世俗环境下表演。通过叙事文学内部的比较,可见不同文类之间的区别,但同时也能证明它们的共性——作为表演之用的民间文学,这些民间文学作品也因此成为了中国说书和表演传统的最早书面实例,在接下来几个世纪塑造民间说书和白话文学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影响。

史密德在书写本节时反复强调对表演性语境的理解,从侧面展现了敦煌文学在艺术风貌上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即“在千姿百态中以俗为主、以朴见长”<sup>②</sup>。出于教化群众和佛教传播的现实需要,同时考虑到接受者的欣赏水平和欣赏习惯,讲唱的主体在面向社会民众表演时选择了韵散相间的白话文形式,其影响超越了文体层面,进入到叙事的概念角色层面,即为了便于理解和加深认识,大都写得朴实无华、真实自然。自此为中国叙事文学打开一道多元主义的大门,对后来中国表演文学、叙事文学以及长短篇小说的塑造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史密德回归文学本位阐述讲唱文学的深刻内涵,对于理解来自边陲地区的文学先声与中国文学整体之间的复杂互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强调敦煌文学内容本身,是因为其为中古时代社会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依据;强调文本所提供的语境,则是因为其对于理解接下来历朝文学的流变而言至关重要。回归到文学本位就是要紧紧围绕文学创作本身来展示文学发展流变的过程,这才是文学史的核心内容。柴剑虹认为:“在新的时期,我们应该从文学史观出发,将敦煌文学作品分类汇集后真正置于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考察;从文化史观出发,将敦煌文学作品真正置于敦煌历史文化的人文环境中研究;从文本的内容与形式着手,去探讨敦煌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声律特点等,真正实现让敦煌文学研究‘回归文学’的目的。”<sup>③</sup>《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48章就从抄本自身出发,概述了敦煌文学的内在特征,并以其提供的各种早已失传的文类文体和具体文本为证,对敦煌文献所呈现出的多种文学类别作了具体的阐释,在立足文学本位的基础上展现其丰富内涵,为理解唐五代时期的社会与文化展开了一幅多彩的

① 颜廷亮:《敦煌文学概说》,第6页。

② 颜廷亮:《敦煌文学概说》,第13页。

③ 柴剑虹:《转型期敦煌文学研究的新课题》,见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画卷,同时也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复杂发展路径开启了新的视窗。

### 三、敦煌文学的研究方法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推动敦煌文学研究向文学本位回归的努力,不仅体现了史密德对于文学以及文学史概念的广义理解和多元化书写视野,而且正好契合开拓传统文学史视域的新世纪主张,着重展现了敦煌文学作为独特中华瑰宝的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故而本文以其所采用的创新方法为参照,试图发掘能为今后中国文学史书写提供借鉴的价值。

#### (一) 跨学科视域

在书写敦煌文学的内容时,史密德运用了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为中国文学史涵盖内容的完整性提出了新的建构思路,展现出了一种跨学科的文学史观。“‘文学史’具有两种含义:其一是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其二是呈现为文学历史发展过程的叙述。作为文本形态的文学史著述,是编撰者基于文学客观历史的选择性呈现。”<sup>①</sup>后者主要考察作家、文学流派以及文体风格的发展历史,重在准确地探求和记述文学事实,以各种文学事实为基础,立足文学内容与特征本身,归纳文学发展的一般法则,是随着文学史研究水平的进步而形成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强调文学史是文学本身的历史,并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描述文学自身的演进过程,采用跨学科考察正是考虑到了多重文化因素对于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一方面,梅维恒在引言中率先表明自身立场:“一般来说,本书将中国文学视为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存在,因为文学从社会中得到滋养和流传。文学不是自在自为之物,而是社会政治力量和文化事实之无尽序列的产物。每一章都尽可能多地揭示这些交织互动关系。”<sup>②</sup>确定了文学的广阔视野后,就在全书的架构上充分考虑跨学科、多样化的关系互动。这些考量在将敦煌文学作为单独一章时体现得淋漓尽致,切实将敦煌文学置于整体文化背景中,分类展现它的发展脉络、深刻影响以及与中华文化的交织关系。另一方面,史密德认为,“敦煌文学从社会角度而言扎根于具体的时间空间,它的宏阔范围正代表了(兼具俗世与宗教,以及跨社会阶层的)中古文化的异质性和可渗透边界”<sup>③</sup>,再次重申本书的多元化视域,从社会、宗教、文化、地理等多个角度考察了敦煌文学虽身处帝国边陲,却依旧在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学史中闪耀出的熠熠星光。这种文学史观也与袁行霈的理念不谋而合:“我们不但不排斥而且十分注意文学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借助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学、心理学等邻近学科的成果,参考它们的方法,会给文学史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在学科的交叉点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sup>④</sup>《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书写敦煌文学时采取了文献学的研究视野,以现有的文献资料成果作为研究的基础,将其组织运用到具体的文学考察之中,在分析敦煌文学的历史时拓宽了资料来源的范围,将发掘出的宗教文书、家族传记、绘画题跋等蕴含相关内容的史料都

① 李松:《主持人语》,《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②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引言》第5页。

③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第1094页。

④ 袁行霈:《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新编〈中国文学史〉总绪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纳入到讲述敦煌文学的过程之中,使之对文学的广义理解与更加宽泛的知识网络连接起来,将敦煌文学真正置于敦煌广阔的人文历史背景之下,体现了独特的跨学科视域。

事实上,《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这种独特视域的运用也不拘于敦煌文学一处,除了文献学的研究视角以外,还灵活关联了许多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例如,在第1章“语言和文字”中,本书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汉语的起源与特征和汉字的历史与文化内蕴出发,具体论述白话与文言之间的区别所塑造的雅俗之分,以及文人在掌握了精深的汉字之后创造出的诸文学形式进一步加持文人主导的社会政治秩序等问题,考察了汉字、汉语二元性对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sup>①</sup>。而在第25章“诗与画”中,该书探讨了古代中国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诗与画的相互影响<sup>②</sup>,以时间为线索,以艺术学为视野,依次论述了从汉代“画赞”到唐代“题画诗”、再到宋朝“文人画”以及最终形成的普遍美学标准——“三绝”。诗歌、绘画、书法三种笔的艺术同臻妙境,共同成为了文人士大夫表情达意的重要媒介,从艺术审美的角度阐释了其对于文学的塑造与影响。

以上实例均是《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跨学科视域的典型写照,从文学史编纂角度考虑到学科发展的现状,整合了多个研究领域的现有成果,丰富了文学史编写的材料来源。更重要的是,从文学自身角度来看,本书将文学发展置于整个文化大背景中,关注到多方面文化事实对于文学传统形成的推动与促进,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包容性,体现出中国文学的悠久、充盈与活力,同时也扩大了文学的研究范畴,打通了人文学科各科的研究路径,为新文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启示。

## (二)跨文类叙事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敦煌文学书写除了采取跨学科方法,还运用了跨文类叙事研究的路径。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郑阿财在谈到对敦煌文学研究的展望时曾说:“敦煌文学研究基本特质是建构在文献学的基础上,然而敦煌文学如变文、俗赋等以故事主题为主的叙事文学,若能在方法上,吸取文学研究新兴的叙事学研究方法,将同一主题进行跨文类的比较研究,特别是结合史传、笔记、话本、戏曲等雅、俗文学作品,一体考察,将不失为可行的研究方法。”<sup>③</sup>虽然《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还并未完全达到郑先生所提倡的高度,但能够将这种研究思路纳入到敦煌文学的书写之中,对于实现从文献学考察到文学本位的回归而言已是非常大的跨越。

跨文类叙事研究源自叙事学在后经典阶段的新发展趋势,即开辟不断出现的新研究领域。在经典叙事学阶段,文学叙事一般多集中在“小说叙事”(narrative fiction)当中,而在后经典语境下,叙事范畴得到扩张,研究方法也日益多样。就大的方面而言,出现了“超越文学叙事”的呼声,开辟了社会叙事学、图像叙事学等诸多领域;从小的方面来看,文学叙事内部也形成了“跨文类”的新趋势,即从单一的小说叙事研究中脱离出文学叙事研究的多重分支,包括传记叙事学和戏剧叙事学等<sup>④</sup>。这种跨文类研究不是要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文类叙事理论,而是要运用已有的、相对而言成熟的叙事学理论去分析新的研究对象,即本质上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扩展到其他研究领域的新尝试,并在该

①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第19—54页。

②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第516页。

③ 郑阿财:《敦煌文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未来》,《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3期。

④ 尚必武:《“跨文类”的叙事研究与诗歌叙事学的建构》,《国外文学》2012年第2期。

过程中进一步补充与更新现有理论<sup>①</sup>。通过这样的研究路径,可以为研究对象提供新的对比与参考,进一步丰富文学的研究领域,推进文学艺术的长足发展。史密德分别对应验故事与缘起故事、变文与缘起故事两组对象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有效示例。虽然应验故事和缘起故事都是在传记语境中讲述因果报应,但二者在形式、内容和功能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区别,各自形成了单独的文类。在文体形式上,前者完全由散文写就,而缘起故事则使用了佛经常见的讲唱格式,同时混合着口语元素,与佛经有着更为接近的相似性。在叙事内容上,二者也各有侧重,应验故事以正史这种颇具权威性且易于理解的格式来讲述对个体福祉或因果报应起决定作用的一些特殊事件,从而证实中国人信仰的有效性;但缘起故事却将故事的地点大多设置在了北印度的恒河平原,从印度信徒的视角出发讲述经历的因果事迹。在功能上,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应验故事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缘起故事则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了佛教的传播范围,它们都以教化故事的形式证实了佛教教义<sup>②</sup>。

叙事文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故事”,其由一系列事件按照逻辑与时间的原则组合而成,故事发生的地点、涉及的人物以及具体的情节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跨文类的叙事研究正是抓住了“故事”这一主线,分析比较了细节处的差异,为理解两类佛教故事的文学本质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角度。同样,在对比同属于半白话写成的表演性讲唱故事的变文与缘起故事时,史密德再次强调了二者都是“中国文学整体发展中的独立文类和批判性元素”<sup>③</sup>,即便具有高度相似的文体和主题特征,也因各自的表演语境而区别立显。在彼得·许恩等人看来,叙事性由“序列性”和“媒介性”构成,也就是说除了前文提到的按时间和逻辑顺序组合的事件以外,叙事还必须通过特定的媒介实现,所包含的两个基本成分就是媒介的使用者和视角,可将其进一步理解为“叙述”与“聚焦”的问题,即“谁说”(who speaks)和“谁看”(who sees)<sup>④</sup>。这一点也正是变文和缘起故事作为同一主题的叙事文本的根本区别所在,从一些非佛教材料的证据可知前者多由世俗伶人(通常是女性)在非官方场合口头表演,而后者则主要由法师或僧侣专门在俗讲场合进行<sup>⑤</sup>,明确此二者的不同也有助于更加透彻地理解文本性质与其表演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书写敦煌文学的过程中灵活运用了跨文类的叙事方法,使现有的叙事学理论研究方法突破了单一的小说叙事研究,进入到了传记叙事和讲唱文学等新的领域,对几种各具特点的文类也有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但是,该书的处理在一定程度上仍局限在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内部空间,并没有进一步对更广阔范围的敦煌文学作品进行综合性的跨文类比较研究,也没有完全做到如柴剑虹先生所说“将敦煌所出的各类文学作品与其他传世的文学作品一道,置于文学史的长河中做纵横比较,探究内在联系,进行文学史意义上的整体研究”<sup>⑥</sup>。这与郑阿财所期待的目标仍有一定距离,今后的文学史书写实践若能总结其中的经验,进一步提炼并发扬此种比较方法,或许能对文学作品本身产生新的理解。

① 谭君强:《诗歌叙事学:跨文类研究》,《思想战线》2015年第5期。

②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第1074—1076页。

③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第1088页。

④ 尚必武:《“跨文类”的叙事研究与诗歌叙事学的建构》,《国外文学》2012年第2期。

⑤ [美]梅维恒:《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全2卷)》,马小悟、张治、刘文楠译,第1092—1093页。

⑥ 柴剑虹:《转型期敦煌文学研究的新课题》,见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第70页。

#### 四、反思《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编纂

20世纪早期,敦煌文献的发现促进了英、法、德、俄、日等外国和本国学者对于中国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现代中国学术的转型也与域外研究热潮的刺激密切相关。“欧洲汉学家们和传统中国学者不一样的学术取向,像沙畹、伯希和、费卿、列维、马伯乐这些西洋学者对于中国以及周边的历史、语言、宗教的研究,当然包括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对西域和敦煌资料的开拓……都促成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sup>①</sup>近代中国学人在对海外汉学成果学习、借鉴与交流的过程中推动了研究方法的现代性转型。在今天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文明交流与互鉴更为便捷,互通有无、求同存异的思想市场可以激发更深刻的学术探索与相互理解,大量的海外中国文学史编纂成果提供了对话的知识平台。一方面,应该看到海外汉学在动机、视角、方法、旨趣等方面的他者意识;另一方面,也不可过于夸大他者问题意识的不可沟通性,回到历史语境与学术史进程是对话的前提。

长期以来西方文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在文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组织与编写时难免会受到学术理念与传统的影响,以至从他者角度书写中国文学时存在些许“水土不服”的问题。虽然主编梅维恒在一开始就认识到了旧文类范畴所存在的问题,但仍采取了借鉴自西方传统三分法的基础,并加以适当补充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这种主题分类方式既让被归于“诗歌”的骈文与赋,和单独成编的“注疏、批评和解释”显得重复且混乱,又使得包含了多样文类、文体作品的敦煌文学无处安放,不够贴合传统中国文学的固有形式。尽管本书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力求全面综合,考虑到了女性视角、少数民族以及海外汉学等多元话题,但依旧缺乏系统完整的中国文学史理论体系的指导,在几个重要问题上还需要多加思考。如确立中国文学史研究对象与范围的依据为何?书写中国文学史的深刻目的应当怎样实现?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好文学史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并将此方法进一步推广?上述问题也是当前我国书写中国文学史的实践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对国内学界而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话语体系,并书写真正内在于中国文学文化,而且融入世界潮流的中国文学史,需要不断探索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从而推动文学史理论与实践同步进行。

文学史书写应该体现中国性视角和价值。梅维恒认为:“已有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从来没有一本像《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比如很少有人会将中国的民间文学列入中国文学史。在此之前,我出版了《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将中国的小说、诗歌、戏剧、民间故事、悼文、信件、游记、批评和理论结合在一起,通过局部解析,突出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它一脉相承。”与上述思路相一致的实践是:“《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既包括中国文学史中的古典文学,也包括白话文学,既包括精英文学,也包括通俗文学或者民间文学,甚至包括少数民族文学。我希望这本书综合而全面,不只关于精英文学、经典文学。这样做是前所未有的,有革命性。”<sup>②</sup>无疑这一做法也体现在该书的敦煌文学书写。

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为代表的域外文学史书写实践表明,全球化的语境为各具特色的中西

① 朱天元:《葛兆光:建构神话与记录史实之间的历史学》,《经济观察报》2017年8月28日。

② 崔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主编:鲁迅是世界级的作家》,2016年8月1日,<http://cul.qq.com/a/20160801/025929.html>.

理论交流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应当立足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与立场,凸显中华民族的融合与互动。自觉推进中西理论互译互释,形成真正体现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产生与发展内在逻辑的中国文学史。既要实事求是地还原并探讨中国古代各种文学活动的全貌,而不依赖源自西方文学的三分法或是四分法来选择研究对象;又要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范畴出发,并借力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现状,充分展现中国文学的鲜明色彩与独特价值,推动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舞台。

## 结 语

综上所述,本论文抓住《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对于敦煌文学的独特叙述视野,从问题意识、书写进路、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分析了推动敦煌文献向文学本位回归的努力,总结跨学科视域与跨文类叙事方法这两种文学史书写的新的思路,为今后国内学界有关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与创新提供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的参照。从文学史观的角度来看,跨学科的广阔视野能够丰富文学的研究范畴,将多种人文学科的学术成果聚拢在统一框架之中,实现文学与不同学科的交汇贯通;就文学史方法论的层面来说,可从该书所采取的叙事研究中汲取经验,进一步将其发展成为跨越多种文类的研究方法,在对比中领略多彩中国文学世界的深刻内涵与文化价值。作为一部面向美国学生甚至更多非中文专业世界读者的启发性读物,《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众口难调,很难面面俱到,仍然存在很大的完善空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在国内外学界仍处于发展之中,不管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只有一种理解、一种模式、一种写法。以该书为例,分析、总结海外汉学的研究思路,期待能为今后中国文学史的编纂提供他山之石。

责任编辑:潘文竹

##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d Gross-Genre Narrative: Writing of Dunhuang Literature i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i Song Yang Zhiruo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Thought and Cul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overseas sinologists have started to compile books o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hich has matured and deepened since the 21st century.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in 2001, it has aroused extensive discussions in academic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issues related to the writing of Dunhuang literature in this book deserve attention. By elaborating on the reasons for selecting documents, the ideas for writ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turning to the literary standard, we can extract the research methods adopted by the author in writing Dunhuang literature, that i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d cross-genre narrative research. The literary history view and literary history methodology adopted in the book can provide a path reference for domestic writing practice.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re values of Chinese culture by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international dialogue and construct scientific literary history theories so as to write literary history works that are truly intrinsic to Chinese literary culture and integrate into world trends.

**Key words:**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Dunhuang literature; Victor H. Mair; Neil Schmid

# 论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论争与批判

——从许杰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一文说起

杨剑龙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3

**摘要:** 1957年8月,叶以群、孔罗荪、姚文元合作撰文《许杰在文艺上政治上的反动道路》,其中叶以群的《许杰的“小资产阶级文艺”之旗》,直接批判许杰1948年发表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1928年的革命文学倡导,开启了以阶级划分作家、以小资产阶级界定作家与创作的先声。在与梁实秋的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常常将他们归为小资产阶级文人,成为找不到政治出路动摇者的标签。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被确定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被突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常常以小资产阶级作为评判作家创作的不足和短处。在历次对于小资产阶级文人和创作的批判针砭过程中,将阶级斗争观念作为衡量作家衡量文学的标准,忽略与抛弃了人性与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将革命与否视作评判作家立场与情感的唯一标准,模糊与消弭文学与革命不同的视阈及文学的特性;将工农兵的立场和情感看作衡量作家和文学的标准,批评或否定了文学表达的多样性与先锋性。

**关键词:** 许杰;《小资产阶级与文艺》;小资产阶级;论争;批判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2-0118-18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许杰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方面,也有所建树:1928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明日的文学》、1929年上海明日书店出版《新兴文艺短论》、1945年立达书院出版《现代小说过眼录》、1945年战地图书出版社出版《文艺、批评与人生》、1945年战地图书出版社出版《蚊蛭集》、1948年新纪元出版社出版《冬至集文》、1951年上海泥土社出版《鲁迅小说讲话》、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野草〉诠释》等。许杰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中,有诸多独到的观照与见解。

但由于其文学创作的重要成就,许杰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建树几乎被忽略了。1948年,许杰发表题为《小资产阶级与文艺》的理论文章,却受到极大关注,甚至遭到了批判。在1920年代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后,文学界的小资产阶级就不断成为批评甚至批判的对象,小资产阶级文艺也成为不断引起论争遭到批判的话题。诸多文学史中对于诸多作家的评说中,也常常以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图像文献整理与研究”(16ZDA188)、上海高水平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创新团队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杨剑龙,男,上海人,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文化转型与现代中国创新团队成员,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作为批评评价的标尺。我们从许杰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观照中国文学界有关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论争与批判,反思与研究有关小资产阶级文艺论争的重要文学现象,对于梳理文学运动与文学论争中的偏颇,对于推进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1948年10月,文艺新辑社编辑的“文艺新辑”第一辑冠名为《论小资产阶级文艺》,由群益出版社出版,其中发表了史笃《略论小资产阶级文艺》、许杰《小资产阶级与文艺》等文章。许杰在回溯《文艺新辑》编辑时,谈到当时蔡仪、杨晦商议编辑此刊:“蔡仪同大家商议,他已经和群益出版社联系就绪,决定由我们编辑出版一个《文艺新辑》。《文艺新辑》由杨晦主持编务,而杨晦又把大部份的编务工作交给了我。”<sup>①</sup>许杰在回眸该刊时说:“《文艺新辑》第一辑《论小资产阶级文艺》发表的文章,主要有史笃《略论小资产阶级文艺》、许杰《论小资产阶级与文艺》、董秋斯《美国文学界的反动倾向》、蔡仪《论朱光潜》、许杰《论骆驼祥子》、夏康农《论海派北移》、广平《绍兴与鲁迅》、石午《寓言五则》、辛未艾《有余家的生活》以及我以‘士仁’笔名所写的《文艺时评》。史笃,即蒋天佐;石午,可能是冯雪峰;辛未艾,是包文棣;广平,即许广平。”<sup>②</sup>

《略论小资产阶级文艺》开篇即指出:“新文艺运动以来,小资产知识阶级的文艺问题,一直是运动里的中心问题。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其作品,也一直是革命文艺运动里的主力军,而这主力军也一直是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化思想的直接或间接的领导之下前进的。”文章分析“为什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可能担当这文艺先锋的任务呢”?“是由于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工这历史的因素。”“已经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物而事实上存在着的。”“由于小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的某种一致。”“除了批判现实主义之外,进步的小资产阶级文艺也往往采取自我表现主义的形式。”<sup>③</sup>文章充分肯定了小资产阶级文艺的重要性和先锋性。

《论小资产阶级与文艺》在“一、历史上动摇阶级的意识”这一部分,描绘了小资产阶级的摇摆特性。许杰认为,处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上,他是摇摆于统治者和被压迫的人民中间的。有的时候,他得到了统治者的余余,受到了他们思想的麻醉,他们会站在统治者方面,替统治者粉饰太平,递剥削书,向人民作无耻的说教。但在有些时候,他又会靠近人民这一方面,透露一些人民的要求,同情人民的疾苦,替人民大众,作着正义的呼吁。”在“二、新的时代召唤”这一部分,许杰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参加文艺运动的主力军。他指出:“可是,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政治的舞台,负起了民主革命运动思想文化改造这一环的重大任务。这是一个时代的感召,中国的市民阶级,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已经在这一运动中抬起头来。”“五四运动以后,从个人主义的恋爱文学,到革命文学,再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大众文学,后来,到了抗战爆发前后,我们又提出国防文学,(或民族解放战争的大众文学),在抗战期间,一直支

<sup>①</sup> 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52页。

<sup>②</sup> 许杰:《坎坷道路上的足迹》,第352页。

<sup>③</sup> 史笃:《略论小资产阶级文艺》,文艺新辑社编:《文艺新辑》,北京:群益出版社,1948年。

持着抗战,成为抗日战争重要支柱之一的,我们又有抗日文学。……不过,在这一长串文艺运动当中,我们可以不客气,毫无讳饰的说一句话:参加这些文艺运动的,大都是小资产阶级出生的知识分子。”在“三、现阶段文艺运动的主流”这一部分,许杰强调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文艺运动中的重要性。许杰指出:“新民主主义文艺,人民文艺,是这一时代文艺运动的主流。”但是,他又认为,“我们也不能忽略了都市的小市民,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这也不能算是革命的主导的工作,但同时也不能算是多余的闲事”。许杰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实际的社会变革的行程中,自然赶不上工农份子的积极,也赶不上工农份子所发生的力量,但在文化运动文艺运动这一领域当中,很显然的,这是他们有力的阵地。”在“四、作家的自我改造与积极任务”这一部分,许杰谈到了小资产阶级的改造:“不过,小资产阶级的参加革命,他的意识便得改造。他不能让原有的意识,任性的任它滋长起来,他不能让历史的传统和阶级的禀赋,当作不可动摇的宝典。他要从历史的发展中,认取历史发展的必然的法则,也要从社会变革的行程中,认取人民的力量和思想的武装。”在“五、错误的见解和不良的倾向”这一部分中,许杰提出:“可是,出生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禀有过去士大夫阶级传统的劣根性的文艺工作者,他们难免自身还有可怕的弱点。……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弱点,了解这一环境下的人们的弱点,而且要加以克服,加以纠正,至少不要等到新时代来了,还要在我们身上多费有用的精力才是。”在“六、此时此地的文艺工作”这一部分中,许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以农村的土地问题为主导工农大众为中心,但却并不忽略了都市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他提出,应该坚持文艺上的民主统一战线;应该倡导既批评,又团结;应该注重作家的自我改造;应该注重小市民生活的描写,把小市民的读者层从黄色趣味中争回来。同时,许杰呼吁:“我们在此时此地工作着,为新社会投下几块基石呵!如果没有更适宜于发挥自己更大力量的工作,而一时又无法变更环境的话,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不是没有前途的,小资产阶级文艺,在此时此地,也不是纯然浪费的。”许杰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和社会责任,宣告小资产阶级及其文艺的重要性。

《论小资产阶级与文艺》一文,比较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文艺运动中的角色担当、文艺运动的主流和支流、作家的自我改造、克服自身的阶级弱点、现阶段的文艺工作等,该文写得坦诚实在,在总体上是作家们走进新时代的宣言书。

## 二

在 1957 年 8 月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之后,许杰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会议上,叶以群、孔罗荪、姚文元三人合作作了题为《许杰在文艺上政治上的反动道路》的书面发言,后来发表在 1957 年 9 月 7 日的《解放日报》上。该文通过对于许杰的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想的分析,将许杰定性为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道路,后被收入《新华半月刊》1957 年第 20 号。文章开篇说:“许杰在‘鸣放’期间,忠实地执行了‘章罗联盟’的反党纲领,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可是他在八月十六日人代会预备会议的交代中还是狡猾地说什么:‘我投机,表面上装作进步,我骗了别人,也骗了我自己。’‘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立场是反动的。’‘我的这种反动思想是一

贯支配着的,只是我自己不知道就是。’……这完全是骗人的谎话。”<sup>①</sup>

叶以群《许杰的“小资产阶级文艺”之旗》,是叶以群、孔罗荪、姚文元三人合作发言稿《许杰在文艺上政治上的反动道路》的第3部分,后收入叶以群的论文集《在不平常的日子里》<sup>②</sup>。该文中,叶以群首先将许文发表的时代背景概括为:“1948年10月,一方面,人民解放军在东北、西北、河南、山东各线获得了重大胜利,解放战争进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淮海战役即将发动;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发出了逮捕爱国学生及其他民主人士的命令,在上海等大城市逮捕,枪杀了大批革命群众,实行了法西斯的恐怖镇压。就在这敌我斗争异常尖锐的时机,许杰发表了一篇‘小资产阶级与文艺’,打出了‘小资产阶级文艺’的旗帜。”显然认为许杰在这样重要的历史关头,发表《论小资产阶级与文艺》一文,是别有用心的。

针对许杰所说五四运动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政治的舞台”的观点,叶以群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观点批判道:“我们都知道,‘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起点,是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日子,是马克思主义者所领导的‘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诞生的时日。毛主席在1940年所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对这问题说得非常清楚。而许杰直到1948年10月,还要宣传‘五四’是市民阶级,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政治的舞台’,‘在这一个运动中抬起头来’,‘肩起了文艺运动的重任’。这不仅是对‘五四’的估价的歪曲,而且是公然对毛主席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的看法的对抗。”批判许杰歪曲对“五四”的估价、对抗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看法,显然罪莫大焉!

针对许杰所说的“在这一长串文艺运动当中,我们可以不客气,毫无讳饰的说一句话:参加这些文艺运动的,大都是小资产阶级出生的知识分子”,叶以群批判说:“在抗战期中,以延安为中心,在广大的敌后根据地里,培养了大批从工农兵大众中来的文艺家,并且改造了不少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工农兵大众的文艺队伍。而许杰却抹煞了这一切事实的存在,硬把文艺领域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独立王国。这完全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针对许杰所说的“在过去文艺发展的道路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乎是文艺运动的主力军”,叶以群批判道:“从这里所透露的,已经不仅仅是把过去的文艺运动当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占的阵地,而且还排斥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不许党的领导力量在文艺工作中插手。”这种上纲上线的批判,显然有一棍子打死的意味。

针对许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实际的社会变革的行程中,自然赶不上工农分子的积极,也赶不上工农分子所发生的力量,但在文化运动这一领域当中,很显然的,这是他们的有力的阵地”,叶以群批判道:“很明显,他是顽强地把文化运动当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占的阵地,把小资产阶级估计为文化运动的主力,而完全否定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对文化运动的领导,更否定了小资产阶级文化工作者需要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可见他今天完全否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其根源是很久远的。”在断章取义的批判中,认为许杰否定党对文化运动的领导,否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① 叶以群、孔罗荪、姚文元:《许杰在文艺上政治上的反动道路》,《解放日报》1957年9月7日。

② 叶以群:《许杰的“小资产阶级文艺”之旗》,详见叶以群:《在不平常的日子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37—40页。

在对许杰的批判中,叶以群概括说:“最重要的,是他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估计为一个整体,一种中间力量。”叶以群批判说,“但他们决不会成为一种中间力量,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中间阶级”,“他们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往往不是成为统治者的奴才,就是成为人民大众的战友,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提倡,实际上就是与当时的罗隆基、张君劢等的骗人的‘中间路线’相呼应”。叶以群概括说:“所以,许杰在1949年大军渡江之后还幻想‘和谈’,决不是偶然的;而到解放后的第八个年头,还会成为‘章罗联盟’反党阵线中的一员勇将,成为右派分子施蛰存的保护人,更绝不是偶然‘碰上’的。”“我们知道许杰的这些可耻的历史,并非从今天开始……然而,许杰从鸣放以来的言行,却给了我们相反的回答!今天,我们指出他的这些历史,只是为了揭露他的发展规律,他的政治本质,并证明他所说的‘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反动思想,完全是欺人之谈!”

叶以群以上纲上线的方式,逐条逐句批判了许杰《论小资产阶级与文艺》的观点,认为许杰抬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否定党对文化运动的领导,否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样的分析与批判,无疑将许杰定罪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面了。

1957年,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许杰在“倾听党外意见推进整风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背景中,给单位领导提意见。许杰回忆说:“因此,我就以积极的态度,领导师大中文系向党委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谁知一阵风来,我却立刻成了右派。”“我当时的教授头衔革除了,系主任的职务取消了,工资降低了三级。”<sup>①</sup>1957年6月4日,许杰写了《致华东师大党委的一封公开信》,给党委提意见。许杰还先后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民盟支部、中文系党总支组织的“鸣放会”。后来,这些都成为他反党的铁证。许杰在1957年8月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之后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 三

我们由许杰的《论小资产阶级与文艺》,回眸与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界有关小资产阶级文艺的论争与批判。

1928年,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发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引起了有关的研讨和论争。麦克昂将有小资产阶级根性的文学家一概归入反革命派:“我们的文学家假如有无产阶级的精神,那我们的文坛一定会有进步。……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太浓重了,所以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sup>②</sup>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郁达夫、茅盾等作家都遭到创造社、太阳社成员的批判,都将他们贬抑为小资产阶级。冯乃超以批判的眼光列出叶圣陶、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5个小资产阶级作家,并从阶级性、革命性的角度针砭批判道:“他们以敏感的感受性,圆滑的技巧,描写尽中国的悲哀,但是小资产阶级 Petit Bourgeois 的特性是可以倾向保守也可以倾向革命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没有真正的革命的认识时,他们只是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代言人。那么,他们的历史任

<sup>①</sup> 许杰口述,柯平凭撰写:《坎坷道路上的足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页。

<sup>②</sup> 麦克昂:《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1928年5月1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103页。

务,不外是一个忧愁的小丑(Pierotte)。”<sup>①</sup>成仿吾则将“语丝派”归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批评说:“这是以《语丝》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的玩意。他们打的标语是‘趣味’;我从前说过他们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sup>②</sup>李初梨将鲁迅贬抑为中国的堂吉诃德,评价说:“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在这阶级对立间,取了一个中立(?)的态度,也‘不革命’,也不‘反革命’,但他所‘喜欢’的,无论是谁,是动也不许动的。这种人谓之曰小有产者,这种要求,谓之曰小有产者的要求。”<sup>③</sup>钱杏邨将鲁迅的创作贬为描写了“死去的阿Q时代”,批判道:“鲁迅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完全暴露了出来,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我们是在在的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横在他面前的虽有很光明的出路,他要有所不乐意,他不愿去,既不甘于现实,在理想中又没有希望,结果只有徘徊歧途,彷徨于无地了!这是鲁迅没有出路的心理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害了他!”<sup>④</sup>他将鲁迅的落伍者归为是“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害了他”。鲁迅以调侃的语调,归纳了成仿吾对他“小资产阶级”的定性:“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sup>⑤</sup>

1928年,茅盾在回顾其小说创作时,谈到了革命文学的倡导。他说:“如果说小资产阶级都是不革命,所以对他们说话是徒劳,那便是很大的武断。中国革命是否竟可抛开小资产阶级,也还是一个费人研究的问题。我就觉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说这是落伍的思想,我也不愿多辩,将来的历史会有公道的证明。也是基于这一点,我以为现在的‘新作品’在题材方面太不顾到小资产阶级了。”<sup>⑥</sup>茅盾反对武断地否定小资产阶级,不满于文学创作忽略小资产阶级的题材。克兴发表《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的〈从牯岭到东京〉》,开篇说:“从‘语丝’派的鲁迅,郁达夫,甘人等发表些对于革命文艺的谩骂以来,反革命文艺的人们不但始终没有过一回正式的理论斗争,并且近来消沉下去了许多。他们坚决地秉着小资产阶级的根性,生死不承认别人讲的话是对的,自己既不能勇敢地变更自己徘徊,动摇,怯懦的生活,又怕别人骂他们反革命,做资产阶级底走狗。”他还以惊世骇俗哗众取宠的语言方式,批判茅盾“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说:“更进一步讲,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并不是革命化的下层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是将变为资产阶级的

① 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年1月15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第9页。

②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第20页。

③ 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文化批判》第4期,1928年4月15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第88页。

④ 钱杏邨:《死去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号,《我们月刊》创刊号,1928年5月,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第51页。

⑤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语丝》第4卷第11期,1928年3月12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第75页。

⑥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1928年10月10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第147页。

上层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他概括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就是先生的三大口号！第一个就是向读者叫道，革命幻灭了！第二个就是：大家动摇起来！第三个就是：小资产阶级大家追求自己阶级的利益哪！”“起首由茅先生所推崇的小资产阶级，因为阶级地位的关系，就要拍卖战友了。所以无领导者的联合战线的议论，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客们粉饰反动，蛊惑青年，豫备向资产阶级立功的计划，断谈不上是什么出路不出路。”<sup>①</sup>对此，茅盾在《读〈倪焕之〉》中予以回复：“《从牯岭到东京》这篇随笔里，我表示了应该以小资产阶级生活为描写的对象那样的意见。这句话平常得很，无非就是上文所说一个作者‘应该拣自己最熟习的事来描写’同样的意义。……实在当他们忿忿地痛骂我以前，他们对于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文艺已经抱着一种极不应该有的成见。他们对于描写小资产阶级生活的作品往往不问内容很武断地斥为‘落伍’。”<sup>②</sup>茅盾的观点，代表着当时诸多作家的见解，反对全然否定小资产阶级作家，反对全然否定有关小资产阶级生活的文学作品。1928年第3期的《无轨列车》，刊载了S.F.的诗歌《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这名词，/近来是屡次挂在我的嘴了。/我们无疑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这名词又带着怎样可耻的毒刺啊……/有一回，是喝了一杯白干之后，/不知为什么，我说J是小资产阶级了；/J即刻满脸通红着，/拍着桌子道：‘你侮辱了我了’；/而且虽经了百般的解释，/J还说，要不是我是他的最好的朋友，/他定是和我打架了——/这名词是带着怎样的毒刺呀。//我们无疑都是小资产阶级。/就这样，这可恶的，使人赧颜的名词，/是屡次挂在我的嘴上了。

1928年，小资产阶级就成为使人赧颜的名词。犹而太在《小资产阶级论》中说：“所以，反对与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是一回事，领导他们又是一回事；因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而排斥小资产阶级自身是不正常的，对于革命没有利益而反是打击革命。”<sup>③</sup>

1922年，瞿秋白在谈到鲁迅时提出，“五卅”以后，“新兴阶级的领导展开了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和僵尸，推翻流氓资本和地主官僚的新结合的远景。贫民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阶层，终于发见了他们反对剥削制度的朦胧的理想，只有同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前进，才能够实现，才能够在伟大的斗争的集体之中达到真正的‘个性解放’”<sup>④</sup>。瞿秋白评价说：“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

① 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的〈从牯岭到东京〉》，《创造月刊》第2卷第5期，1928年12月10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第152页。

② 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1929年7月合订本，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第180页。

③ 犹而太：《小资产阶级论》，《新思潮》1929年第1期，第15页。

④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见《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22年7月出版，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第277页。

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sup>①</sup>瞿秋白对于鲁迅的准确评价和深入分析,呈现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鲁迅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其实是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共同之路。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中,倡导者们以左倾的姿态夸大作家的使命和文艺的作用,将小资产阶级等同于反革命派,将鲁迅、茅盾等作家一概划入小资产阶级阵营中,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创作一概予以否定批判,开启了以阶级划分作家、以小资产阶级界定作家与创作的先声,也开启了文学界极左思潮的大潮。

## 四

在 1928 年 6 月 10 日发表的《文学与革命》一文中,梁实秋说:“近来的伤感的革命主义者,以及浅薄的人道主义者,对于大多数的民众有无限制的同情。这无限制的同情往往压倒了一切的对于文明应有的考虑。有一部分的文学家,也沾染了同样的无限制的同情,于是大声疾呼的要求‘大多数的文学’。他们觉得,民众在水深火热之中,有文学天才的人不能视若无睹,应该把鼻涕眼泪堆满在纸上,为民众诉苦呼冤,如此方是‘革命的文学’,如此方是‘不悖时代精神的文学’。假使这时候有人吟风弄月,有人写情诗,有人作恋爱的小说,有人谈论古代的艺术,‘贵族的’,‘小资产阶级’,‘不革命的’,‘反革命的’,等等的罪名便纷至沓来了。”<sup>②</sup>梁实秋不满文坛革命文学倡导中,以贵族、小资产阶级等罪名,强加于作家们身上。在 1929 年 9 月 10 日发表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中,梁实秋提出:“我的意思是:文学就没有阶级的区别,‘资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实际革命家造出来的口号标语,文学并没有这种的区别。近年来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据我考查,在理论上尚不能成立,在实际上也并未成功。”梁实秋还批评说:“无产文学家攻击资产文学的力量实在也是薄弱得很,因为他们只会用几个标语式口号式的名词来咒人,例如‘小资产阶级’,‘有闲阶级’,‘绅士阶级’,‘正人君子’,‘名流教授’,‘布尔乔亚’等等,他们从不确定,分析,辨别这些名词的涵意,只以为这些名词有辟邪的魔力,加在谁的头上谁就遭了打击。这实在是无聊的举动。”<sup>③</sup>鲁迅曾站在左翼作家的立场上,不赞同梁实秋否定文学的阶级性:“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sup>④</sup>高旭东在回溯梁实秋的人性论时说:“梁实秋集中地谈论人性,是在他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战的时期。可以说,人性论是梁实秋反对‘普罗文学’倡导的阶级论与阶级斗争的主要武器。”“应该说,梁实秋以人性论对‘普罗文学’

①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见《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 1922 年 7 月出版,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2 册,第 281 页。

② 梁实秋:《文学与革命》,《新月》第 1 卷第 4 期,1928 年 6 月 10 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3 册,第 14 页。

③ 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新月》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1929 年 9 月 10 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3 册,第 56 页。

④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萌芽月刊》1930 年 3 月 1 日第 1 卷第 3 期。

的唯阶级论以及将文学当作阶级斗争工具的批评,具有相当的合理性。”<sup>①</sup>

1931年12月15日,胡秋原在《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真理之檄》《阿狗文艺论》,宣称“我们是自由的知识阶层”,提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家虽然不是神圣,然而也决不是叭儿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sup>②</sup>。在1932年1月30日出版的《读书杂志》第2卷第1期上发表的《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之批判》中,胡秋原指出,钱杏邨基础理论之混乱、最庸俗的观念论者、非真实的批评、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胡秋原的这些观点,遭到了左翼作家的批判。但杜衡以苏汶为笔名,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新上的干涉主义》,以“第三种人”的面目,赞赏胡秋原的自由主义的创作理论。文中称:“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其实,我们单说左翼文坛是马克思主义者似乎还是不适当;我们应当说他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其间的分别就是在他们现在没工夫来讨论什么真理不真理,他们只看目前的需要。……你会不会称轻重?什么真理,什么文艺,假使比起整个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来,还称得出几斤几两?亭子间里的真理吧!小资产阶级狗男女的文艺吧!你假使真是一个前进的战士,你便不会再要真理,再要文艺了。”<sup>③</sup>胡秋原、苏汶都强调文学的自由,反对“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

瞿秋白以易嘉为笔名发表文章,批评说:“第三,新兴阶级站在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的立场上,所以能够真正估定艺术的价值,能够运用贵族资产阶级的文艺的遗产。他们决不是什么‘目前主义的功利论者’。他们在文艺战线上,一样是为着创造整个的新社会制度——整个的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而斗争的。一切统治阶级的,以至于小资产阶级的文艺,他们都要批判,都要分析。”<sup>④</sup>瞿秋白否认左翼文学家是“目前主义的功利论者”,认为左翼文学家应该批判分析统治阶级的文艺、小资产阶级文艺。苏汶撰文反驳说:“在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谁也摆脱不了阶级的牢笼,这是当然的,因此作家也便有意无意地露出了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学之有阶级性者,盖在于此。然而我们不能进一步说,泄露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包含一种有目的意识的斗争作用。意识形态是多方面的,有些方面是离阶级利益很远的,顾了这面会顾不了那面;因此即使是一部攻击资产阶级的作品,都很可能在自身上就泄露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与偏见(在十九世纪以后的文学上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这一定是一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作品。假定说,阶级性必然是那种有目的意识的斗争作用,那我便敢大胆地说,不是一切文学都是有阶级性的。”<sup>⑤</sup>丹人撰文评说苏汶:“苏汶先

① 高旭东:《梁实秋:在古典与浪漫之间》,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162、168页。

② 胡秋原:《阿狗文艺论》,《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

③ 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3册,第130页。

④ 易嘉(瞿秋白):《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3册,第146—147页。

⑤ 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论作家的不自由并答复易嘉先生》,《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3册,第165页。

生陷入历史上不知由一切非政治主义者,反干涉主义者,超阶级艺术论者,一切‘为文艺的文艺论者’反复过多次了的矛盾的观念论,丝毫不足偶然的。……现在,苏汶先生及其类似的知识分子,——就正处于他们所隶属的那阶级的矛盾中,在苦闷着政治的出路的问题。他们在目前经济危机的深入和革命危机的深入中,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在小资产阶级(主要地以小市民,中农,学生和知识分子构成的,介在地主资产阶级与工人雇农贫农兵士贫民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的剧烈的动摇分化下,已经不得不动摇着了,并且已经开始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了(虽然大抵是消极地)。然而,他们依然还不能真的有政治出路……”<sup>①</sup> 丹人将苏汶评说为在残酷阶级斗争中找不到政治出路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杨邨人甚至发文说:“我们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是要在文艺运动上,创造一些作品,给小资产的小市民和农民以一种乐观的,慰安的,以至于鼓励向前的精神上的力量。”<sup>②</sup> 韩侍桁亦撰文表示赞赏<sup>③</sup>。10年后,周扬在谈到胡秋原、苏汶时说:“十年以前出现的胡秋原苏汶就是这类小资产阶级中的极端分子的代表者,他们在反对左翼文学的时候也正是借用了托洛斯基的文学观点做自己理论的武器的。”<sup>④</sup>

1932年11月,张闻天以歌特为笔名发文,反省与讨论了当时的“右倾消极与左倾空谈”:“这种关门主义,第一,表现在‘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因为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显然还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上革命的统一战线”<sup>⑤</sup>。张闻天对于文艺战线上关门主义的反省与批评,对于文学的阶级性的分析,尤其对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的肯定,呈现出文艺界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正确思路。在与梁实秋的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中,集中在文学创作的自由与真实性问题、文学的阶级性等问题,左翼作家在与他们的论争中,常常将他们归为小资产阶级文人,成为找不到政治出路动摇者的标签。

## 五

1942年,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在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时,强调文艺家的思想改造,尤其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强调摆脱与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情感与思想。毛泽东说:“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

① 丹人:《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第2卷第3期,1933年1月,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3册,第191页。

② 杨邨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上海《现代》第2卷第4期,1933年2月。

③ 韩侍桁:《“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读书杂志》1933年第3卷第6期。

④ 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解放日报》1942年7月28—29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4册,第622页。

⑤ 歌特:《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斗争》第30期,1932年11月3日。

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sup>①</sup>毛泽东批评小资产阶级出生的知识分子,他们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创作,对于工农兵群众缺乏接近和了解。毛泽东将知识分子与工农作比较:“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sup>②</sup>毛泽东还将改造小资产阶级文艺家看作重要的政治任务:“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sup>③</sup>毛泽东认为,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如何摆脱与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和情感,将立场和情感转移到工农群众方面,思想改造是唯一的路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许多文艺家先后反省检讨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周扬在批判王实味时,强调王实味思想源于托洛斯基,强调其小资产阶级本性和幻想。他说:“许多人还不知道文艺上的托洛斯基主义是代表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似是而非的‘革命文学’的理论,一种貌似革命的实则完全反动的文学思想。托洛斯基以‘人类文化’的名义来曲解阶级的文化艺术,用明天的幻想来代替今天实际需要,以堂皇的革命词句来遮掩其反动的内容。托洛斯基的这些空谈主义的特色,正是反映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的。”<sup>④</sup>在谈到王实味的散文时,周扬批判说:“新的时代,新的生活要求着新的歌唱,然而日常工作日常生活的艰苦,革命现实的散文方面,在我们的心灵上投射了暗淡的影子。我们许多人心里原来窝藏着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在遇到困难时,就渐渐凸露了出来。在这种时候,我们会无端地感到寂寞,甚至觉得有些空虚。”<sup>⑤</sup>将小资产阶级本性与幻想概括王实味的反动本质,成为周扬对于王实味批判的关键。

1943年4月,周立波反省与检讨自身所走过的错误道路。他说:“过去,为什么走了这条旧的错误的路呢?我现在反省,这原因有三。第一,还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不愿意割掉,还爱惜知识分子的心情,不愿意抛除。譬如在乡下,我常常想到要回来,间或我还感到寂寞,这正是十足的旧的知识分子的坏脾气。参加生产和斗争的群众,不会感到寂寞的,恐怕连这个字眼也不大知道。为了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在边区,也是不会感到寂寞的,只有犯着偏向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们,

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4册,第527页。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4册,第522页。

③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4册,第537页。

④ 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解放日报》1942年7月28—29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4册,第621页。

⑤ 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解放日报》1942年7月28—29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4册,第639页。

才会有这样的病态的感觉。有着这感觉,就自然而然的和群众保持着距离,而且自然而然的退居于客人的地位,这是我的错误的头一个原因。”<sup>①</sup> 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病态,是周立波自我反省的根本。何其芳亦发文反省自我,强调改造。他说:“整风以后,才猛然惊醒,才知道自己原来像那种外国神话里的半人半马的怪物,一半是无产阶级,还有一半甚至一多半是小资产阶级。才知道一个共产主义者,只是读过一些书本,缺乏生产斗争知识与阶级斗争知识,是很可羞耻的事情。才知道自己急需改造。……其次,文艺工作者在今天还有一种改造艺术的责任。过去的文艺作品的毛病,一般地可以概括为两点:内容上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与形式上的欧化。总之,没有做到真正为工农兵。”<sup>②</sup> 何其芳将自己创作的毛病,归为“内容上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与形式上的欧化”,这大概成为批判小资产阶级文学的根本。

1943年4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去年五月党中央召集了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界开始向着新的方向转变。毛泽东同志的结论,为这运动提示了明确的方针。十个月来,经过了一些反省、讨论和实践尝试的过程,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归于一致。许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逐渐受到清算,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sup>③</sup> 清算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设定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新的方向。1943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其中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养下成长的文艺工作者,在其走向与人民群众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各种程度的脱离群众并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些偏向,不经过深刻的检讨反省与长期的实际斗争,不可能彻底克服,也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个真理已为各根据地的无数事实所证实。”<sup>④</sup> 提出深刻反省、彻底克服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具有脱离群众妨害群众斗争的偏向,必须深刻检讨与反省,必须彻底克服。

1944年1月,聂荣臻在谈到部队文艺工作时说:“我们知道,同志们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还没有经过长期的锻炼,如果这样过度的批评,就使人没法工作。我们的批评主要是采取善意的修正的方式,使同志们在工作中有所取舍,求得工作上的改进。如果开口就是‘政治问题’,闭口就是‘原则问题’,这将使许多文艺工作者战战兢兢,不敢动手了。”<sup>⑤</sup> 聂荣臻指出了在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批评时上纲上线的过度批评。1944年3月,周扬在反思中国革命文学运动时说:“中国革命文学运动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旺盛起来的,这个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破天荒的伟大运动,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有它一定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这个运动也有它严重的缺点。革命文学的许多作者都是‘被从实际工作排出’的青年,在他们身上,对于实际的疲惫情绪和革命的狂热幻想结合

① 立波:《后悔与前瞻》,《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第31页。

② 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第28页。

③ 《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社论),《解放日报》1943年4月25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第33页。

④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第39页。

⑤ 聂荣臻:《关于部队文艺工作诸问题》,《群众》第9卷第2期,1944年1月25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第49页。

在一起,他们没有放弃斗争,却离开了群众斗争的漩涡的中心,而在文学事业上找着了他们的斗争的门路。他们各方面都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但却错误地把这些思想情感认做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因此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意识的改造就没有提到日程上。这就形成了革命文艺运动的最大的最根本的缺点。”<sup>①</sup>周扬从文艺家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错认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强调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思想改造。

1944年9月,刘白羽在谈到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文艺大众化”时,指出:“能正确地反映时代,能正确地把群众生活表现出来,……可惜在从前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口头上承认‘文艺大众化’,实际上,在过去过多非群众的小资产阶级个人琐细与抒情挤占了文艺领域,这些曾经明显的表现在从前边区出版的文艺刊物,如中间文艺,谷雨,草叶……上面。文艺家不先深入到群众中去‘化’了自己,只停留在把大众看成‘落后’或‘空想人物’的观点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里有两种态度,显然区别着两种立场,一种是把大众按着小资产阶级面貌来化,一种是把小资产阶级的自己化为大众,然后再体现大众。因此从前倘有一些作品似乎接近了描写大众的边沿,但总括起来说还是用自己固有眼光看一切,结果只是把这些当作‘新奇’的物品展览给知识分子读者,与大众很少能贴近。”<sup>②</sup>刘白羽指出小资产阶级作家走向“文艺大众化”的两种立场,强调作家应该到群众中去“化”了自己。1944年9月,何其芳反省自我说:“既然大家都还是并未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过分强调说心里的话就会使一些不健全的思想情感得到肯定,而对于改造自己的重要反而忽视或甚至不认识。文学系的这些错误我个人是最应该负责任的。我当时还有这样的主张:‘写我们知识分子的经历也可以写出中国,写出中国必然发展的道路与前途。’这真是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喜欢顽强地宣传他们的主张,把写小资产阶级放在第一位,写工农兵放在第二位,而写小资产阶级又不是站在正确立场,却是当作自我表现。”<sup>③</sup>何其芳的这种反省,显然是刻骨铭心的。后来,何其芳还表述说自己“向无产阶级缴械”:“当时内心的活动自然未必有今天写的这样明确,但是朱总司令的话的确给了我以很大的认识与决心去甘愿向无产阶级缴械。这使我在以后的整风过程中减少了很多矛盾与苦恼。而且,当我缴了那些破破烂烂的小资产阶级的械之后,逐渐地我的手中就开始有了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械。”<sup>④</sup>何其芳把自己小资产阶级破烂的械缴了,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械。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以描写工农兵为主,成为文坛当时文学创作的重要问题,也普遍成为作家们创作的难题。1947年,周扬提出,作家创作不熟悉工农兵生活,他的创作就会“飞回到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去”:“一个文艺工作者,当然不熟悉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他的思想情感还没有与工农兵的思想情感打或一片的时候,那就不管他写什么,是真人真事也罢,不是也罢,他的想象的翅膀

① 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解放日报》1944年4月8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第74页。

② 刘白羽:《新的艺术,新的群众(节录)》,《群众》第9卷第18期,1944年9月30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第85—86页。

③ 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群众》第9卷第18期,1944年9月30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第100页。

④ 何其芳:《朱总司令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新华日报》1946年11月30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4册,第665页。

总是飞不起来的,要飞就会飞回到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去,结果除了迷失方向以外,再不会有别的。我的意思,并不是特别着重写真人真事,而只是一般地着重写新的人物和事实。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会描写新的人物。”<sup>①</sup>林默涵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表现小资产阶级的优点与缺点”的文艺,也可以是“为人民的文艺”:“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就应当以工农为描写和表现的主要对象,因为人民中间数量最多和力量最大的,正是工农。这不是说,除了工农以外的阶级,就不是我们文艺所应当表现的对象,而是说,工农应该是我们的文艺表现的主要对象。站在人民的立场,嘲笑没落阶级的腐烂,揭露反动势力的凶残,这是为人民的文艺,因为它加强了人民斗争的决心和信心,站在人民的立场,表现小资产阶级的优点与缺点,挣扎与动摇,并从而教育他们,引导他们走向人民的队伍,参与人民的斗争,这样的文艺,当然也是为人民的。所以,为人民的文艺,不一定就是写工农的文艺,而写工农的文艺,如果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去写的,那就依然是反人民的文艺。这是无须说得的。”<sup>②</sup>1948年3月,邵荃麟发表《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其中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斗争是更长期更艰苦的工作,必须团结更多的力量。在文化落后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将仍是文化战线上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将担负文化启蒙的责任。除开直接违反人民利益者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创作与出版自由权利,将被新社会所尊重,所保护。对于这些广泛的中间阶层作家,必须诚恳而坦白地互相批评,互相团结。戒骄戒躁,反对抹煞一切的过左倾向。我们一面要强调文艺的阶级意识,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教条公式,去机械运用,不考虑时间与空间以及对象等条件,把小资产阶级意识作为一顶帽子乱戴,甚至拒绝和人家合作,这将使新文艺运动的发展遭受巨大的损失。”<sup>③</sup>他提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文化战线上的重要力量,将担负文化启蒙的责任,他反对“把小资产阶级意识作为一顶帽子乱戴”。

在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语境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省与改造被屡屡提起。1948年,冯乃超说:“处在小资产阶级狭隘的生活圈子里,中国文艺工作者多半都处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对中国工农的痛苦生活虽然抱着满腔同情,但毕竟不懂得工人农民,不熟悉他们的生活。这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叹息生活圈子打不开。……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大半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并且在地主资本家阶级教养下长成的。他们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严重地妨碍他们真切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比如他们思想里面或多或少轻视工农大众的观点,使他们看不见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劳动大众所创造的,而不是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冯乃超直截了当地认为“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大半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思想里面或多或少轻视工农大众的观点”,必须进行思想改造。“所谓自我改造,就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从自己本身的阶级立场移到另一个进步的阶级立场上去的事情。就我们中国文艺工作者的情况来说,就是从小资产阶级移到革命工农的立场,在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逐渐

① 周扬:《谈文艺问题》,《晋察冀日报增刊》第7期,1947年5月10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第125页。

② 默涵:《关于人民文艺的几个问题》,《群众》(香港)第19期,1947年6月5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第271—272页。

③ 邵荃麟执笔:《大众文艺丛刊》同人《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3月1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第306页。

的移过来。”<sup>①</sup>在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中,茅盾说:“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们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属于被压迫阶级,所以有和劳动人民结合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活思想各方面和劳动人民是有距离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使他们在艺术上倾心于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也妨碍了他们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历史的现实。在过去十年来,文艺作品的题材,取之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占压倒的多数,而对于知识分子的短处则常常表示维护,即使批判了,也还是表示爱惜和原谅。”<sup>②</sup>茅盾对于国统区作家的情感与创作进行了反省和批评,尤其检讨了小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被确立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被确定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被突出了。小资产阶级几乎等同于工农兵的对立面,几乎等同于找不到政治出路,几乎等同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小资产阶级必须进行自我改造。1948年10月,许杰发表的《论小资产阶级与文艺》一文,在知识分子接受改造、小资产阶级被批判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走上了政治舞台,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参加文艺运动的主力军,倡导创作小市民生活的文学等,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 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于现代作家的评说时,常常以小资产阶级作为评判作家创作的不足和短处,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论争对于小资产阶级作家贬抑的观点。

在1953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王瑶评说冰心的创作:“冰心的文章的确是流利的,而她的生活趣味也很符合小资产阶级所谓优雅的幻想。她实在拥有过一些绅士式的读者和不少小资产阶级出生的少男少女。”评说戴望舒的诗歌创作:“就戴望舒的诗说,内容很朦胧难懂,多的是一些‘美丽’而酸辛的回忆,虚无的隐逸思想和寂寞厌倦的心境;正是一种脱离了社会实践而企图逃避于一个小天地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和幻想。”<sup>③</sup>在1957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刘绶松评说朱自清的创作:“《背影》集中的《背影》一文,向来被称为最好的散文,但其中显然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伤情调。”谈到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小说创作时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成为了作品题材的压倒的多数。字里行间往往流露出一种伤感低沉的调子。与作品的内容相适应,在语言和表现形式上也还缺少着生活的气息和民族的特色。”<sup>④</sup>唐弢主编、197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这样评说郁达夫:“但郁达夫的这种发展是十分曲折、时起时伏的。他始终仰慕光明,但并没有勇气真正参加革命,他不断地追求,然而结果往往是失望,甚至颓唐。这正代

① 冯乃超:《文艺工作者的改造——纪念文艺节》,《文艺生活》海外版新4卷第3、4期合刊,1948年5月15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第329、330页。

② 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1949年7月4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第671页。

③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91—92、201页。

④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下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82、115页。

表了那些要求进步但未能与工农群众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和弱点。”<sup>①</sup>这样评说巴金的创作：巴金“早期作品《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都描写一群知识青年在军阀统治的环境中从事的种种活动。……作者在描写中对他们采取了无批判的态度，事实上就是赞扬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极端的民主自由的思想。”<sup>②</sup>

在如上权威文学史的评说中，冰心、戴望舒、朱自清、郁达夫、巴金等，都被冠以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历数他们创作的缺憾和短处。其中诸多的评说，今天看来，显然属于不实之词。1951年，冯雪峰化名“读者李定中”发表《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对于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进行批判，将萧也牧定性为“最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敌对阶级”。冯雪峰说：“一切鸟儿到晚上都要回到窝里过夜，所以我们文艺上的一切缺点和不良倾向都归因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我想总不会错的。”<sup>③</sup>他把文艺上的一切缺点和不良倾向都归因于“小资产阶级”。如此这般的无端武断的批判与否定，酿成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的悲惨命运。1951年，由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引发了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批判。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展开了对于文艺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1957年反右斗争中，开始了对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肃清。1958年，开始了对于杨沫《青春之歌》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与“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的批判。这些不断在文艺界对于小资产阶级的批判，形成了文坛谈“小资”而色变的情形，文学创作的丰富性生动性被否定了，作品情感表达的细腻性委婉性被剔除了，文学在走向工农兵的过程中，变得粗糙了甚至粗俗了。

在历次对于小资产阶级文人和创作的批判针砭过程中，将阶级斗争观念作为衡量作家衡量文学的标准，忽略与抛弃了人性与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1932年，宋阳在谈到大众文艺时说：“现在，必须深刻的了解革命文艺的任务，是要看清了当前的每一次事变之中敌人用什么论调来迷惑群众，看清群众日常生活经常的受着什么样的反动意识的束缚，而去揭穿这些一切种种的假面具；是要去反映现实的革命斗争，要会表现现实的革命的英雄，尤其要表现‘群众的英雄’，这里，也要揭穿反动意识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犹豫，揭穿这些意识对于群众斗争的影响，要这样去赞助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生长，赞助革命斗争的发展。”<sup>④</sup>文艺被简单化地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自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始，阶级与阶级斗争常常成为衡量作家衡量文学的标准，将作家们归入小资产阶级行列，将作家们的创作归入小资产阶级文学的动摇与狂热、隐逸与感伤等，在将小资产阶级归入被改造阶级的行列中，将小资产阶级作家与工农大众的比照中，突出小资产阶级作家阶级地位的低下，从而将小资产阶级文学也归入小资产阶级自我表现的文学，归入“文艺上的一切缺点和不良倾向”的文学，从而将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文学置于否定和批判的境地。

在历次对于小资产阶级文人和创作的批判针砭过程中，将革命与否视作评判作家立场与情感的

①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00页。

②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63页。

③ 冯雪峰：《雪峰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67—468页。

④ 宋阳：《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创刊号，1932年6月10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397—398页。

唯一标准,模糊与消弭文学与革命不同的视阈及文学的特性。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提出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思想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极大危害:

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sup>①</sup>

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成为革命发展进程中的篡党的危险存在。在文学运动和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常常将文学运动等同于革命运动,以革命与否视作评判作家立场与情感的唯一标准,因此往往将表现知识者情感复杂、心理矛盾的作品,都以革命与否的标准打入另册,将文学看作是革命与否描写和表达的主要载体,将文学的丰富性细腻性等同于革命的暴力性摧残性,以至于消弭与抛弃了文学本身的特性。

在历次对于小资产阶级文人和创作的批判针砭过程中,将工农兵的立场和情感看作衡量作家和文学的标准,批评或否定了文学表达的多样性与先锋性。刘白羽在反省自己的创作时说:“小资产阶级艺术家是从历史及现社会中承受着大量的封建资产阶级艺术影响而形成的,实际它正向狭窄的一部分的小圈子,与广大的社会群众隔离开了,它在今天部分已成为苍白的(从内容到形式,由形象到语言都缺乏着什么,因为它都建筑在脱离劳动生产者群众之空乏的生活之上),它只有与群众结合成为群众的,才有了生命,正如一个社会,需要民主,人民动起来,才有其一番的生动活泼的景象是一样的。”<sup>②</sup>1948年,怀潮在谈到小资产阶级时说:“一般地,小资产阶级的性格的表现是如此:或者那种软弱性,动摇性,妥协性,虚伪性甚至疯狂性;或者那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超功利主义;或者那种享乐主义和颓废主义,犬儒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或者,领袖主义,行为主义,以及机会主义……”<sup>③</sup>小资产阶级的性格被定为在诸多负面评价中。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后,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成为文学创作唯一的正途,工农兵的立场和情感成为衡量作家及其创作的标杆,作家的思想改造也以工农兵的立场和情感为标准,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衡量中,其实突出了作家与文学的政治性,而忽略了、抛弃了文学的艺术性,文学表达的多样性、先锋性受批评遭否定,甚至将一切

<sup>①</sup>《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98页。

<sup>②</sup>刘白羽:《新的艺术,新的群众(节录)》,《群众》第9卷第18期,1944年9月30日,见北京大学等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第89页。

<sup>③</sup>怀潮:《论小资产阶级》,《泥土》1948年第7期。

具有先锋性的艺术表达方式打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艺术,而将直白的、粗糙的艺术表达,归入工农兵文学的范式。

许杰发表于 1948 年的《小资产阶级与文艺》,成为其右派言论的佐证,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虽然许杰也谈到了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改造和不良倾向,但是他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是文艺运动的主力军、坚持文艺上的民主统一战线等,都是颇有见地的观念。倘若当时对于许杰该文中的观点引起重视,改善或改变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歧视和批判,中国当代文坛的生态和作家心态会更加宽容更加和谐,中国当代文坛也会产生诸多伟大的文艺作品。

责任编辑: 潘文竹

## Controversy and Criticism of Petite Bourgeoisie Literature and Art: Based on Xu Jie's "Petty Bourgeoisie and Literature and Art"

Yang Jianl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In August 1957, Ye Yiqun, Kong Luosun and Yao Wenyuan co-wrote a paper entitled "Xu Jie's Reactionary Road i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Politics", and then Ye Yiqun's wrote "The Banner of Xu Jie's 'Petite Bourgeoisie Literature and Art'", which directly criticized Xu Jie's "Petty Bourgeoisie and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ed in 1948. In 1928,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took the first step of dividing writers by class and defining writers and creation by petite bourgeoisie. In the debates with Liang Shiqiu on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free man" and "the third kind of person", they were often classified as petite bourgeoisie men of letters, a label for vacillators who failed to find a political way out. After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in 1942,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was confirmed, and the self-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the petite bourgeoisie were highlighted.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petite bourgeoisie was often used to judge the shortcomings of writers' works. In the course of criticizing the petite bourgeoisie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the concept of class struggle was adopted as the standard to measure literature, ignoring and discarding the complexity and richness of human nature and literature; revolution was regarded as the only criterion to judge the writer's position and emotion, blurring and eliminating the different visual thresholds and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and the position and emotion of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were used as the standard to measure writers and literature, criticizing or negating the diversity and avant-garde character of literary expression.

**Key words:** Xu Jie; "Petty Bourgeoisie and Literature and Art"; petite bourgeoisie; controversy; criticism

#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百年汉籍收藏钩沉

张 云<sup>1</sup> [俄]马义德(Maiatckii Dmitri)<sup>2</sup>

1.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4; 2.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东方系,俄罗斯 圣彼得堡 199034

**摘要:**圣彼得堡大学的汉籍收藏始于1930年代,一直持续至20世纪中叶,百余年时间共收藏汉籍2200余部。这些汉籍是以王西里院士为代表的圣大东方系几代汉学家积累的遗产。通过对馆藏汉籍的调查,结合文献档案,梳理圣大汉籍收藏历史,重点探讨了西维洛夫、沃伊采霍夫斯基、王西里、米哈伊尔·赫拉波维茨基、柏百福等10余位汉学家的汉籍收藏及特点,进一步探清了圣大汉籍收藏相关问题。圣大所藏汉籍孕育了王西里学派,为俄罗斯汉学繁荣奠定了基础,考察其来源对俄国汉学与汉籍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圣彼得堡大学;汉籍;来源

**中图分类号:** G255.1; G25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2-0136-13

圣彼得堡自18至20世纪初一直是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俄罗斯汉学研究中心。历史上,大师辈出,比丘林、王西里、巴拉第等众多享有世界声誉的汉学家都曾聚集于此,创造了俄国汉学的辉煌,而圣彼得堡丰富的古代中国文献典藏为其汉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今天,这些中国古典文献主要集中在俄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大学(以下简称“圣大”)、俄国家图书馆3处。单就以汉籍为主的中文文献而言,1973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中国木刻本目录》<sup>①</sup>,收录汉籍刻本3665部;此外,还有近500种抄本尚未有公开目录<sup>②</sup>。1993年,雅洪托夫著《俄国家图书馆馆藏中文抄本与木刻本目录》<sup>③</sup>在圣彼得堡出版,共著录了364号包括古籍、图画册等在内的各种中文文献。而圣彼得堡大学的汉籍收藏,一直以来未有全面目录出版。

圣彼得堡大学的汉籍收藏全部集中在该校的东方系图书馆。东方系图书馆建立于1819年,正式名称为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科学图书馆东方部。经过200多年的积累,该图书馆共藏有30多万本东方文献资料。其现任部长米兰娜(Azarkina Milana, Азаркина Мила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女士提供的资料显示,该图书馆一共收藏大约3万册古代中文文献、1万册满蒙藏文文献,古代中文文献有明清时期的抄刻本、朝鲜抄刻本、和刻本以及地图、画册等多种类型。在对这些文献的揭示上,学者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圣彼得堡大学馆藏汉籍专题研究(19CTQ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云,男,山东枣庄人,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域外汉籍、文献学研究;马义德(Maiatckii Dmitri),男,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副教授,孔子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俄罗斯汉学研究。

① 鲍·鲍·巴赫金、伊·萨·古列维奇、尤·利·克罗尔:《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中国木刻本目录》,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73年。

② 数据来源于徐萧:《除了列藏本〈石头记〉,俄罗斯科学院还有哪些重要的中国文献》,2014年11月7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6364](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6364)。

③ 雅洪托夫:《俄罗斯国家图书馆馆藏中文抄本与木刻本目录》,圣彼得堡,1993年。

做了不少工作。1888年,东方系创始人王西里院士在《中国文学史资料》一书中,曾对馆藏652种汉籍进行过分类著录。2012年,东方系教师叶可嘉、马义德出版《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著录了王西里教学用书207种。此外,俄国汉学家李福清院士曾著录一些圣大藏俗文学文献<sup>①</sup>,俄国学者乌斯宾斯基曾发表过关于该馆藏科瓦列夫斯基蒙汉文献的文章<sup>②</sup>,中国学者李民曾对该馆藏中医汉籍信息进行著录<sup>③</sup>,笔者近年亦对该馆藏小说、戏曲、弹词等俗文献进行揭示<sup>④</sup>。在藏书来源上,研究俄国汉学史的学者多有讨论,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的相关章节更是参阅大量俄文文献,系统梳理了圣大收藏汉籍的历史,极具参考价值。

圣大东方系图书馆的汉籍主要集中在旧书藏库里面,索书号有“BY”“xyl”“xyl.F”“xyl.Q”“K”5种。“BY”指王西里教学用书,有200多种。“xyl”指木刻本,实际著录包括抄本等形态,是使用最多的索书号。据统计,此类编书序号自xyl.1至xyl.2754,其中近700条没有对应书籍,还有20多条重号。这样算来,“xyl”实则著录2000余部中文文献。“xyl.F”主要包括图册、抄本、朝鲜刻本等,属于汉籍的有20余部。以“xyl.Q”为索书号的,笔者所见有6部,全是佛经;以“K”为索书号的,有9部,皆是俗曲。有些书还带有“Md”“Plg”标志,表示满汉对照的意思。此外,还有几十部清代刊刻的书籍散落在近现代出版的图书之中,它们的索书号中带有“C”“O”字样,个别汉籍没有编号。我们将著录为不同索书号实则为一书的进行归并,将属于同一索书号但版本不同的书进行拆分,共统计出汉籍2200余部、朝鲜刻本37部、和刻本24部、汉俄字典等34部、报刊32种。这些以汉籍为主的文献资料是以王西里院士为代表的几代汉学家积累的遗产。今天考察他们的汉籍收藏活动,探寻这些汉籍流播海外的历史,一方面借助于档案资料记载,另一方面结合实物本身留下的信息。圣大的汉籍收藏始于1930年代,一直绵延至20世纪中期,王西里院士无疑是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为叙述方便,我们以王西里院士的汉籍收藏为界分,将圣大东方系图书馆的汉籍分为三部分,并分别加以梳理。

## 一、喀山大学时期的汉籍收藏

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的前身为喀山大学东方系。1833年,喀山大学蒙古语教研室成立;1937年,汉学教研室成立;1854年,喀山大学东方系迁至圣彼得堡。科瓦列夫斯基、西维洛夫、阿列克谢·索斯尼茨基、沃伊采霍夫斯基、王西里、杂哈罗夫等早期东方系教师,为东方系汉籍收藏打下了坚实基础。

1834年,时任喀山大学东方系蒙语教授的科瓦列夫斯基(Kovalevskiy Osip,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Осип

① 李福清(B. L. Riftin):《中国章回小说及俗文学补遗》,详见李明滨编选:《古典小说与传说》,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41—389页。

② Успенский В.Л., Коллекция О.М. Ковалевского в собрании восточных рукописей и ксилографов библиотек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 Монголовед О.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Биография и наследие. Казань: Алма-Лит, 2004. С. 231-250. (弗拉迪米尔·乌斯宾斯基:《圣彼得堡大学科瓦列夫斯基东方书籍收藏》,《蒙古学家科瓦列夫斯基:生平与遗产》,喀山,2004年,第231—250页。)

③ 李民:《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中医汉籍藏书》,《国际汉学》2016年第1期。

④ 张云、马义德:《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古典小说》,《明清小说研究》2021年第4期;《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所藏的中国传统俗曲目》,《戏曲与俗文学研究》第10辑,2021年。

Степанович, 1801—1878 年)发表了《沙皇喀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梵、蒙、藏、满、汉等文的印本与抄本目录》<sup>①</sup>,展示了其收藏的蒙、满、汉、藏、梵等文的 189 部书,其中包括 8 部汉籍以及一套乾隆帝的信函原件。1830 年至 1831 年,科瓦列夫斯基作为秘书随俄传教团到北京,这些汉籍当是科氏在此时期搜集的。在喀山大学时期即对此 8 部汉籍进行了编目,圣大东方系之后,其索书号一直没变,即《方舆类纂》(xyl. 51)、《黄帝内经素问》(xyl. 53)、《黄帝内经灵枢》(xyl. 54)、《御制避暑山庄诗》(xyl. 59)、《御制清汉资世宝训》(Md. 199, xyl. 82)、《钦定西域同文志》(Md. 70, xyl. Q.35)、《钦定新疆识略》(xyl. 14)、《钦定明鉴》(xyl. 58)。这些书基本都是清代早期即康熙、嘉庆年间的刻本,而那套乾隆帝的信函,则因为没有索书号,到 19 世纪下半叶就不知所终了。科瓦列夫斯基藏书虽然不多,但可以算是东方系汉籍收藏的开始。

1837 年,喀山大学的汉籍收藏已有 224 部之多。这些汉籍主要来自时任喀山大学汉语教研室教授的西韦洛夫(Сивилов Даниил, Sivillov Daniil, 1798—1871 年)。西韦洛夫于 1820 年参加第 10 届(1821—1830 年)俄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1831 年回国,1832 年至 1835 年担任莫斯科金口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1837 年至 1844 年,在喀山大学任教。喀山大学手稿部档案<sup>②</sup>记载,1837 年夏天,西韦洛夫以很低的价格出售了其所收藏的 216 部中文书和 175 部蒙、满、藏文书。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国立档案馆保存有《金口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达尼尔神父汉籍目录》<sup>③</sup>,记录了西韦洛夫藏书的书名。

西韦洛夫的藏书,通过封面标记可知,整体分为基督教文献与其他两部分,前者以“No+ 数字+A”表示,后者以“No+ 数字+B”表示。王西里认为“西韦洛夫的藏书多为诸子经典和哲学文献,其中耶稣会士著作占有重要地位。”<sup>④</sup>今核西韦洛夫所藏的基督教文献约有 70 部,王西里推测这些书借自北京的耶稣会图书馆。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一些书中尚能见到基督教的印章、标记。比如《推验正道论》(xyl.150)书中钤有红色带有十字架及“SHI”标记的圆章,而《善终引》(xyl.173)则是黑色的印章。这些书质量很高,其中刻本有 40 部,抄本约 30 部,刻本多为清早期刻本,有些则为明刻本,如明崇祯四年刻《口铎日抄》(xyl.116)、万历三十一年刻《天主实义》(xyl.122)、崇祯十二年刻《励修一鉴》(xyl.149)等。需要指出的是,学界所认为圣大所藏基督教文献主要是西韦洛夫的藏书<sup>⑤</sup>,这种说法单就喀山大学时期的藏书而言是合适的。但在经过 19 世纪后半期的积累之后,圣大馆藏汉籍得以成倍增加,其中天主教的作品达到了 150 多部,东正教作品则有近 50 部。这在数量上已远超西韦洛夫的收藏,但因为西氏所收皆是早期的经典作品,故在版本文献价值等方面,西韦洛夫收藏无疑是最大的。除了基督教文献之外,剩下的近 150 部书并非全如王西里所言,基本是四部皆有,像字典、

①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О.М., Каталог санскритским, монгольским, тибетским, маньчжур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книгам и рукописям в библиотек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Каз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хранящимся//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Каза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Казань, 1834. Кн. 2. С. 263-292. (科瓦列夫斯基:《沙皇喀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梵、蒙、藏、满、汉等文的印本与抄本目录》,《沙皇喀山大学学报》1834 年第 2 期,第 263—292 页。)

② Отдел рукописей Казан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ед. хр. 7729, л. 233. (喀山大学手稿部,纸夹 7729,第 233 页。)

③ Реестр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г Златоустовского монастыря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Даниила, Отдел рукописей Казан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ед. хр. 7800, л. 283. (喀山大学手稿部,纸夹 7800,第 283 页。)

④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72 页。

⑤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 546 页。

儒学、诗文集、小说戏曲类的书都占有一定比重。以俗文学为例,笔者所见的西韦洛夫收藏,就有《东西汉通俗演义》《三国演义》(两种)、《东周列国志》、《红楼梦》、《西游真诠》(两种)、《飞龙传》、《五虎平西珍珠旗演义狄青前传》、《南北宋包公狄青初传》、《石点头》、《镜花缘》、《灯月缘》等 15 部。

1837 年,阿列克谢·索斯尼茨基( Sosnitskiy Aleksey, Сосницкий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1792—1843 年)将 17 部书卖给喀山大学图书馆<sup>①</sup>。索斯尼茨基曾为第 10 届俄驻华传教团成员,回国后,先后在亚洲司、喀山大学任职。今所见索氏收藏,有 10 部为基督教作品,其余则有《红楼梦》《大清会典》《增订广舆记》《道光二年崇文门商税则例》等。索氏收藏虽不多,但有些汉籍颇为珍稀,如其所收《红楼梦》(xyl.327),据笔者考证,乃为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萃文书屋活字印本,即所谓的程甲本,为《红楼梦》最早的刻本<sup>②</sup>。《道光二年崇文门商税则例》(xyl.329)则详细记载了崇文门各种货物的征收科则,是研究道光年间社会经济的一手资料,仅“纸札”一项,就列有青红纸、榜纸、仿书纸、桑皮纸等 76 种不同名称和规格的纸张税则,对了解当时的造纸业颇有助益。

1847 年,沃伊采霍夫斯基( Voytsekhovskiy Josef, Войцеховский Иосиф Павлович, 1793—1850 年)捐给喀山大学 55 部汉籍<sup>③</sup>。沃伊采霍夫斯基精通医术,为第 10 届俄驻华传教团成员。1844 年,沃伊采霍夫斯基接替西韦洛夫,在喀山大学任教,直到 1850 年去世。在北京期间,沃伊采霍夫斯基因治愈礼亲王之弟全昌的瘰疬症而名声大噪,“1829 年(道光九年)11 月 14 日,全昌向他赠送了一块牌匾,上书‘长桑妙术’四个大字”<sup>④</sup>。今此匾的碑石原件尚存于俄国家图书馆手稿部<sup>⑤</sup>。沃氏藏书中有《日讲书经解义》(xyl.343)一书,上面钤印“檀尊藏本”“丰府藏书”,知是书曾为爱新觉罗·昭梿(1776—1830 年)的藏书。昭梿为礼亲王代善六世孙,清嘉庆七年(1802 年)袭礼亲王爵,二十年(1815 年)被废,而全龄为道光元年袭任(1821 年)礼亲王,其弟即全昌<sup>⑥</sup>。此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沃氏与宗室的亲密关系。因为是医生的缘故,沃伊采霍夫斯基的特别关注中医古籍,共收有 22 部之多(按:就此索书号而言,其中《薛氏医案》残本被编入 6 个不同索书号),包括《伤寒论》《太医院校注妇人良方》《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灵枢注证发微》《伤寒证治准绳》《类经》《针灸大成》等基本医学古籍。有些书籍正文有沃伊采霍夫斯基做的标注,在《景岳全书》(xyl.375)的封皮不仅有沃氏题名的识语,书中夹有一本小册子,乃沃氏学习中药配方的笔记,可见沃伊采霍夫斯基对中医曾有所研究。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圣大中医古籍主要源于沃伊采霍夫斯基的收藏,另外尚有 15 部医书则出自王西里等人所藏,它们或有与沃氏所藏相重的情况。其中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xyl.2594)值

①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архив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тарстан, фонд 997, описание Правление, дело 4220, л. 8-13. (鞑靼斯坦共和国国立档案馆,997 藏库,“治”部,纸夹 4220,第 8—13 页。)

② 张云、[俄]马义德:《论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所藏的〈红楼梦〉版本》,《红楼梦学刊》2017 年 5 期,第 27—30 页。按:文中将此《红楼梦》误认为是卡缅斯基的藏书,在此更正。

③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архив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тарстан, фонд 977, описание Совет, дело 2967, л. 1-2. (鞑靼斯坦共和国国立档案馆,977 藏库,委员会,纸夹 2967,第 1—2 页。)

④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 260 页。

⑤ 按:索书号为“OP, ф.1272, No2”,碑石为列昂季耶夫斯基收藏,原藏于北京俄罗斯馆内。据笔者考察,碑文正题“长桑妙术”,旁题:“昌婴瘰疾,医治罔效。敦请 / 魏测活福老先生讳义渥禧福为昌调治,乃获 / 愈焉。愧无以报,爰书额以传 / 芳名。和硕礼亲王之弟全昌拜赠。道光九年十一月谷旦立。”

⑥ 《清史稿》卷二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8980 页。

得注意,该书封皮钤有“秦缓”的墨色印,另有蓝色方形俄文印记“ИЗ БИБЛИОТЕКИ Мордукай-Волтовских”(意为:莫尔涂卡·沃尔托夫斯基家庭的私人藏书)。“秦缓”其人,清人何秋涛《朔方备乘》曾有记载:“高邮王寿同云:曩曾因子弟贝勒奕绘识俄罗斯官学生,在彼国不知何名,子弟贝勒因其精医,遂名之曰‘秦缓’。其人能为华言,每岁朝来贺,持名刺即用‘秦缓’字。”<sup>①</sup>据蔡鸿生先生考证,秦缓乃第11届俄驻北京传教团医生波·叶·基里洛夫(П.Е.К ириллов,1801—1864年)的汉文称号。圣大所藏《医学源流论》为“秦缓”其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与王西里同为第12届传教团成员的杂哈洛夫(Захаров Иван Ильич,1814—1885年)精通满汉语言。“1854年10月王西里提议聘请与他一同在驻北京传教团学习过的杂哈劳担任喀山大学的通讯员。他认为时任俄国驻伊犁领事的杂哈劳精通满汉语言,可以帮助喀山大学图书馆获得更多的汉满文书籍。”<sup>②</sup>在东方系图书馆封面上标出“Зах”字样的汉籍有十几部,可以确定为杂哈洛夫的收藏。杂哈洛夫的收藏主要为史部与字典。史书多有如《蒙古游牧记》《蒙古源流》《皇舆西域图记》等研究中国边疆的著作,这或与他曾任俄国驻伊犁领事有关;而《李氏音鉴》《经韵集字谱》《新纂五方元音全书》《音韵逢源》等韵书,还有题为“道光二十七年三月二十日熙光写讫”的满汉《字典》(xyl.1299),更体现了他的语言兴趣。

## 二、王西里的汉籍收藏

毫无疑问,喀山大学时期最大的汉籍收藏来源于王西里院士(В.П.Васильев,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1818—1900年)。1840年,王西里作为随班学生跟随第12届(1840—1850年)传教团来京。此行,他还作为沙皇政府的特派教师,受到资助,这包括500卢布的生活费,700卢布的教学、购书费<sup>③</sup>。除此之外,科学院还曾一次提供给他2200纸卢布的购书费<sup>④</sup>。据喀山大学档案资料记载,王西里此行共购买了800部汉、满、蒙、藏文的图书<sup>⑤</sup>,其中汉籍多达六百部。

王西里在北京搜集中国文献,有较为清楚的目标计划。一方面,他的导师科瓦列夫斯基曾在《给前往北京的王西里先生的指示》<sup>⑥</sup>中,列有一些需要搜集的图书。王西里经常和导师通信,交流寻书的经历。如1840年6月7日,刚到北京的王西里即给老师回复:“让我着急的是,您需要的书一部也未找到,只能尽最大努力买了一些类似的书。这些书已通过外交部的亚洲科寄到大学去了。”另一方

①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四十《俄罗斯丛记》,详见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4页。

②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263页。

③ Васильев В.П., Записк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книгах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летопись «Русского Вестника», 1857, т.11, с. 322. (王西里:《圣彼得堡大学东方文献札记》,《俄罗斯通报大事记》第11册,1857年,第322页。)

④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архив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тарстан, фонд 977,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акультет, дело 351, л. 1-3.(鞑靼斯坦共和国国立档案馆,977藏库,历史语文系,纸夹351,第1—3页。)

⑤ Отдел рукописей Казанского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ед. хр. 7292. (喀山大学手稿部,纸夹7292。)

⑥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архив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атарстан, фонд 92, опись 1, дело 4814, л. 22-28. (鞑靼斯坦共和国国立档案馆,92藏库,第“1”部,纸夹4814,第22—28页。)

面,也是更重要的,王西里自己有着明确的购书目标,就是尽可能全面搜集有关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图书,丰富喀山大学的馆藏。他的手里有喀山大学已有的古籍书目,在北京他就特别留意购置大学所没有的图书。1848年王西里给科瓦列夫斯基的信中言:“学生在尽一切机会购买合适的资料,尤其是汉籍,搜集的最多。所有重要的历史书,包括诸朝历史,都已购置。我没有忽略诗歌、散文、小说等书籍。佛教书,包括二百册中文《甘珠尔》与《丹珠尔》也都买了。”<sup>①</sup>1849年5月30日,王西里信中写道:“我的这些汉籍收藏是无价之宝。有些人可能责怪我为什么将箱子装满这些无用之书。……我关心的是图书馆藏书全面而丰富,并没有考虑自己,也没有只是考虑汉学教学。我认为,有些学者可能希望了解中国的诗歌,有些则希望接触一下地理,而另外一些学者则需要经书。”<sup>②</sup>

在北京的10年间,王西里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购书。在其《圣彼得堡大学东方文献札记》中记载不少在京期间的购书经历。他曾定期参观以琉璃厂为主的各种各样的书铺,寻觅新书;也曾雇人抄写一些不常见的书;而有些书则是他辗转委托从外地(比如西藏)购得,像《嘉兴藏》即是从浙江买来的。王西里的购书经验也在慢慢增加。初至北京,他发现书铺售卖的书一般是经史子类的书籍,而集部的书很少展示。有些书,他几乎很难见到,因为这些书往往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才重新出版。稀有的书一上市,就会被商人获得再进行转售。因此,王西里与很多书铺老板建立了良好关系,如果有急需用钱的士人去书铺售卖藏书时,他能及时获得消息。而对于抄书,刚开始抄手要一字一文的价格,后来他学会讨价还价,抄书的费用则降到了千字百文的标准。

笔者于东方系所藏的《古文渊鉴》(xyl.1997)书内发现两张单据,上面开列书名及用苏州马子标示的价格,认为这应是王西里当年在京购书的一个交接清单。书中列有78部书,为小说、戏曲、弹词,而这些书俱见于王西里收藏。以《红楼梦》为例,王西里没有收藏《红楼梦》原书任何版本,而只有六部续作,即《后红楼梦》30回(xyl.742)、《补红楼梦》48回(xyl.740)、《红楼复梦》100回(xyl.745)、《红楼梦传奇》2卷(xyl.800)、《红楼圆梦》31回(xyl.743)、《续红楼梦》30卷(xyl.741)。核查书单所列有《后红楼》《补红楼》《复红楼》《红楼传奇》《红楼圆梦》《续红楼》,与王氏收藏正相吻合。从字迹上看,此应该是书商所制,交割给王西里的一份清单。《古文渊鉴》不属于王西里早期购买的图书。1898年,在王西里去世前两年,他将其家中汉籍也捐赠给了东方系图书馆。这些书并未与王西里前期购书放在一起。尽管现在很难全部分清哪些是王西里晚年赠书,我们仍可以寻找一点线索信息,如抄本《大明三藏圣教目录》(xyl.1119),书末有识语:“《大明三藏圣教目录》一本,俄罗斯王西力叫写,大清(按:原作清)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我们推测《古文渊鉴》应属于王西里晚年赠书的一种,而这份夹在书中的清单则是王西里北京购书往事的珍贵资料。

1850年,回到喀山大学之后,王西里十分高兴,在他看来,图书馆拥有了中国很多代表性的书籍,如《钦定七经》《皇清经解》《百子类函》《书画谱》《农政全书》《授时通考》《康熙日讲》《性理大全》《性理精义》《五礼通考》《道德经》《道藏辑要》《云笈七签》《三藏》《续藏》《三通》《绎史》《通鉴纲目》

<sup>①</sup> СПбГУ, Отдел рукописей, фонд О.М.Ковалевского, ед. хр. 148, л. 253-254. (圣彼得堡大学,手稿部,科瓦列夫斯基藏库,储蓄单元148,第253—254页。)

<sup>②</sup> СПбГУ, Отдел рукописей, фонд О.М.Ковалевского, ед. хр. 155, л. 266-267. (圣彼得堡大学,手稿部,科瓦列夫斯基藏库,储蓄单元155,第266—267页。)

《通鉴辑览》《纪事本末》《新事谱》《册府元龟》《四库全书总目》《三才图会》《太平御览》《玉海》《渊鉴类函》《太平寰宇记》《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水道提纲》《行水金鉴》《西域图志》《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大清一统志表》《历代地理志韵编》《郡国利病》《承德府志》《古文渊鉴》《一百三家集》《唐诗纪事》《水浒传》《三国志》《西厢记》《红楼梦》等。

诚如王西里所言,其所收藏的汉籍最突出的特点是丰富全面。整体而言,四部常见的基本典籍,比如《十三经注疏》《康熙字典》《经籍纂诂》《钦定廿三史》《资治通鉴纲目》系列,九通与《十子全书》《御纂朱子全书》《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以及各种小说、文集,都出现在他的收藏里。单就某一类来看,也是如此。方志类,我们能看到雍正《畿辅通志》、乾隆《钦定热河志》、道光《承德府志》、《钦定盛京通志》、道光《苏州府志》、雍正《浙江通志》、道光《安徽通志》、乾隆《福建通志》《续志》、雍正《江西通志》、雍正《山东通志》、嘉庆《湖北通志》、乾隆《湖南通志》、道光《广东通志》、嘉庆《广西通志》、嘉庆《四川通志》、乾隆《贵州通志》、乾隆《云南通志》、雍正《陕西通志》、道光《陕西志辑要》、乾隆《甘肃通志》、乾隆《西宁府新志》、乾隆《回疆志》、乾隆《澳门纪略》等,几乎囊括了清朝各个行政区的志书。总集类,我们能看到《文选》《历代赋汇》《东汉文》《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全唐文》《唐诗别裁集引典备注》《宋诗钞初集》《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元诗选》《明诗综》《皇清文颖续编》《皇朝经世文编》等,萃聚了两汉至清的各个朝代的诗文集作品。

王氏收藏中,最被世人所关注的俗文学作品,充分展现了其收藏特色。王西里曾写道:“其他图书馆中很少收藏中国诗歌和短篇古文佳作,只有几部小说和戏剧”<sup>①</sup>,而他则对这些俗文学作品给予特别关注。据笔者统计,王西里共收集俗文学作品 127 部,其中有包括《聊斋志异》在内的文言小说 26 部、白话小说 64 部、戏曲类作品 38 部。白话小说中,演义讲史类小说包含了自三代神话至明代一个完整系列,有《开辟衍义》《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全志》《孙庞演义》《后七国乐田演义》《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三国演义》《东西两晋志传题评》《北史演义》《梁武帝西来演义》《禅真逸史》《禅真后史》《隋唐演义》《征西演义》《说唐演义》《粉妆楼全传》《后续大宋杨家将文武曲星包公狄青初传》《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后宋慈云太子逃难走国全传》《水浒传》《飞龙全传》《玉茗堂英烈全传》《忠烈全传》《檮杌闲评》《于少保萃忠全传》《新史奇观演义全传》等。戏曲类,仅弹词作品就有 27 部之多,有《灯月缘》《玉钏缘》《何必西厢》《锦上花》《天雨花》《再造天》《来生福》《金闺杰》《天赐福》《大金钱》《玉鸳鸯》《太阳灯》《绘真记》《风筝误》《义妖传》《四海珠·换珠梅》《采金桃》《三笑新编》《麒麟豹》《金如意》《大丝绦》《百花台》《十美图》《绣香囊》《一箭缘》《点默熙然》《阴阳镜》《再生缘》等。这些俗文学作品,再次印证了王西里收藏丰富而全面的特征。

相对于馆内其他收藏,王西里收藏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他特别留意收藏大部头总集、丛书、类书等。首先,除了上面提到的《皇清经解》《钦定廿三史》及各种文学总集之外,王西里还藏有《径山藏》《道藏辑要》两部佛、道汇集。其中的《径山藏》(xyl.431),为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至清乾隆年间五台山、嘉兴、径山等地刻本,即上文所言王氏于浙江购买的《嘉兴藏》。《径山藏》是收书最多的大藏经,其正、续、又续藏三部分共收录有典籍 2191 部。今核圣大所藏《径山藏》,含正藏 141 函 961 册、续藏 75 函 521 册,可见其有残缺,还有不少零册散见于他处。即便如此,圣大所藏《径山藏》也可为俄罗斯汉学家的佛学研究提供足够的参考资料。其中的《道藏辑要》(xyl.435),则为清嘉庆年间蒋

<sup>①</sup>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 272 页。

元庭所辑,现存12函102册,与国内典藏目录比对,有残缺。此套书在版本上颇具特点,有校对人按语及印刷时的夹签,是为试印本。其次,东方系图书馆的丛书基本都是来自王西里收藏,其中杂纂类丛书有12部之多,包括《古今说海》135种、《秘书》21种、《武英殿聚珍版书第一单》39种、《说铃》前集37种和后集16种、《知不足斋丛书》196种、《续知不足斋丛书》17种、《龙威秘书》196种、《唐代丛书》165种(残)、《守山阁丛书》120种、《岱南阁丛书》20种、《赐研堂丛书新编》40种、《得月簃丛书》20种。这充分体现了王西里有目的的搜藏意识。王西里曾不无自豪地说:“仅1851年我一次运回的图书,就使我校图书馆不仅可以和同行相媲美,而且在丰富性上有所超越。”<sup>①</sup>

在此,我们还要对与王西里相关的两部书略作讨论。1888年,王西里出版了他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资料》,书后附有汉籍目录<sup>②</sup>,每部书包括索书号、书名及简介。有些书列出不同的版本,总计有652种721部书。王西里将这些书分为15部分(按,此参用《俄国汉学史》的翻译):佛教经籍16种、道教经典5种、儒家汉籍46种、诸子百家28种、历史著作108种、地理著作108种、则例25种、辞书和书目24种、类书14种、医书与农书等57种、美文学作品(散文、诗歌)32种、图册与音乐和书画类书籍15种、中长短篇小说与戏剧131种、丛书19种、舆图25种。目录分类及著录反映了王西里对中国典籍的认识,值得进一步分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此即王西里藏书目录,实则不然。这份目录不仅有其所购买的图书,还包括科瓦列夫斯基、西维洛夫、索斯尼茨基、沃伊采霍夫斯基、杂哈罗夫等人的藏书。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反映喀山大学时期(1855年前)东方系基本汉籍馆藏的目录。

另外一种就是“王西里教学书籍”(Васильевский учебный)。为了满足教学的需求,王西里院士于东方系汉籍中专门分出270部建立此库藏,以“BY”为标志;但不久,他又将其中一些满汉对照的书籍转移至满文书籍专柜。2012年出版的《圣彼得堡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详细描述了BY1至BY270的207种书籍情况。考察可知,不少书籍印刷时间在王西里回国之后,也就是1850年之后;其中出版时间确定在1850年之后的,就有60种之多。更有甚者,其出版时间为王西里去世(1900年)之后,如BY247《古文观止》3种的刊刻时间分别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宣统三年(1911年)。很显然,这与事实不符。据《目录》的前言:“大多数‘王西里教学’书籍的封面上用铅笔加写的BY标志是1934年图书馆进行清点工作时完成的。”<sup>③</sup>也就是说,这些1900年之后著录的书,可能是在此次清点时而产生的错误。而BY21其中一部《红楼梦》上有收藏印,为彼得·康斯坦丁诺维奇·鲁达诺夫斯基藏的书籍,钤印时间为1913年4月5日,这也是误录条目。

除了这些误录的条目,其余为数不少的王西里院士教学书籍,我们认为并不是王西里北京之行购买的。王西里1850年回国之后,就一直在大学工作,1878年至1893年间一直担任东方系主任。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到大学的最新收藏,故而其教学目录中会出现1850年之后的书。王西里家藏

①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274页。

②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Лекции, читанные студентам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Пб., 1888. С. 217-387.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资料·圣彼得堡大学学生用的讲稿》,圣彼得堡,1888年,第217—387页。)

③ Завидовская Е.А., Маяцкий Д.И., Описание собра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книг академика В.П. Васильева в фондах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а Нау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Пб: НП-Принт, 2012. (叶可嘉、马懿德:《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图书馆收藏王西里院士中国书籍目录》,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大学孔子学院,2012年。)

图书乃其退休之后,于1898年方才捐赠给图书馆,因此也不可能进入教学用书之中。另外,从品相上来看,“王西里教学书籍”有不少有残缺,且副本较多,而王西里藏书基本都很完整。或许,王西里考虑到这些书主要是供学生学习之用,难免有损坏,故而选择一些品相一般的书用作教材。《目录》中所载一些书,或可佐证我们的推测。如BY7《圣武记》是19世纪后半叶圣彼得堡石印本, BY225《三字经》,乃1819年印刷于彼得堡,上有希林男爵(Shiling)印,书主人为伊万·沃兹涅森斯基(Ivan Voznesenski);而BY224《道光十年时宪书》,据书上识语,乃尼古拉·沃兹涅森斯基(Nikolai Voznesenski)的藏书。澄清这些疑惑,有利于我们清楚认识王西里藏书的基本情况。

### 三、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的汉籍收藏

19世纪下半叶,清朝政府内忧外患,西方列强纷沓而至,谋求在华利益。这一时期,俄罗斯驻华传教团积极配合沙皇政府,搜集各种中国情报,在外事活动出谋划策,一些人后来转而为俄驻华外交官、领事。而此时期,来华经营的各色商人也空前增多。这些人当中,不少亦官亦学、亦商亦学,十分注重学习中国文化,搜集中国文献,他们的收藏是圣大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汉籍的主要来源。

1860年,俄罗斯外交官米哈伊尔·赫拉波维茨基(Khrapovitskiy Mikhail, Храповицкий Михаил Данилович, 1816—1860年)去世,其个人收藏的150部汉籍被王西里收回,进入东方系馆藏。赫拉波维茨基曾为第13届(1850—1858年)俄驻华传教团成员,取汉文学名“晃明”。在华期间,参与了《中俄天津条约》等起草、签署。赫氏汉籍收藏集中在史部典籍,其中地理类著作有30多部,方志类则有73部之多。他的收藏颇多稀见之本,如抄本《铁冶志》(xyl.1235),为明傅浚所撰,该书全面介绍了明正德年间遵化铁冶的经营情况,梳理了有关冶铁历史、民俗资料,是我国第一部冶铁专著。该书在国内失传已久,是一部孤本。此外,《古今考》38卷(xyl.1101)、《历代帝王宅京记》20卷(xyl.1075)皆是《四库全书》底本。那么,赫拉波维茨基如何获得这么多的珍稀汉籍呢?

赫拉波维茨基的部分收藏有中国学者的藏书章,《函史》一书上钤有“桐城姚伯仰藏书记”等印,为清嘉庆时期学者姚元之藏书;《铁冶志》上面则有“姚氏藏书”“寒秀草堂”等印,为清道光时期学者姚衡藏书。这些特征,与汉学家K.A.斯卡奇科夫的汉籍很相似。斯卡奇科夫(K.A.Skachkov,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ио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 1821—1883年),中文名为“孔气”,与赫拉波维茨基同为第13届传教团成员,后期又先后担任俄驻新疆塔城领事、天津领事、中国各开放港口领事等职,在华居留超过25年的时间。在华期间,他利用各种条件,搜集了大量的中国图籍资料。1867年,赴天津上任之前,斯卡奇科夫寄存在彼得堡公共图书馆的中国文献已达1435种之多。这些文献包括“汉文著作1378种(刻本1115种,抄本263种),10912册;另有满文著作57种(刻本53种,抄本4种),785册,总计为著作1435种,11697册”<sup>①</sup>。1873年,他将这些文献通过商人购赠,捐给了位于莫斯科的鲁缅采夫博物馆(即今天的俄国家图书馆前身)。斯卡奇科夫曾言他在北京的购书经历:“1850—1856中国

<sup>①</sup> 出自斯卡奇科夫1873年写给鲁缅采夫博物馆馆长的信,详见李福清:《与众不同的俄罗斯汉学研究与收藏家K.A.斯卡奇科夫》,A.I.麦尔纳尔克斯尼斯著:《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张芳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发生大叛乱期间(笔者按:太平天国运动),贵胄之家纷纷愿意售书,我幸运地利用了这个机会。”<sup>①</sup> 姚伯印、姚衡等学者的藏书,即是在此段时间进入他的收藏之中。1974年,麦尔纳尔克斯尼斯整理的《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著录了斯卡奇科夫抄本333种。这其中,就包括姚氏家族的多部藏书,比如钤有姚伯印印记有《金史补》《钱塘遗事》《顺天府志》《大唐西域记》《天原发微》,而钤有“姚氏藏书”的则有《靖炎两朝闻见录》、“南宋及女真南侵史文集”等。此外,斯卡奇科夫收藏中还可见姚文田、姚晏、姚庆布等其他姚氏族人的藏印。可见,赫拉波维茨基所藏的《函史》《铁冶志》是和斯卡奇科夫收藏来源相同。进一步来看,我们发现二人的某些独特藏书也有较大相似性。斯卡奇科夫对中国古代科技十分感兴趣,并特意搜集此类图书。在其为所藏图书所分的22类中,有关水文地理的有“水文学”“水文图集”“水文图”3类,“讲述水利的文献共有67种,这在汉学文献中十分罕见”<sup>②</sup>。而赫拉波维茨基的地理类藏书中,有《水学赘言》《木龙成规》《海运考》《滇会城六河海口水利总说》《淮关统志》《湖山便览》《淮扬水利图书》《黄河河口古今图说》《历代河防类要》《六河总图说》《泾渠志》《河道总图》12部与水文地理相关的图书,可谓与斯卡奇科夫趣味相投。

赫拉波维茨基和斯卡奇科夫收藏的相似性,显然并不是偶然。二人曾同时居留北京,搜藏兴趣及购书机会完全可以共享,也就是说二人可以分别购置来自同一中国学者的藏书。当然,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斯卡奇科夫将其收集的部分藏书给了赫拉波维茨基。赫拉波维茨基和斯卡奇科夫不仅仅是汉学家,二人都曾在中俄外交史上留下活动的身影。对中国地理文献的关注,自然与其政治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二人的藏书有些如此相似的原因之一。

1889年9月5日,俄国驻汉口领事巴维尔·德米特列夫斯基(Dmitrevskiy Pavel, Дмитревский Павел Андреевич, 1851—1899年)捐给圣大图书馆《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这部书为清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图书集成铅印本。圣大藏有《古今图书集成》同版本书两部,但因为借阅缘故,有些类目有缺失,这也说明这部大类书为俄罗斯学者的汉学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

1903年,商人米哈伊尔·沙维列夫( Sheveliov Mikhail, Шевелёв Михаил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47—1903年)向东方系图书馆捐赠了一批图书<sup>③</sup>。沙维列夫于1863年至1866年在北京传教团学习,之后在汉口从事茶叶生意。1881年,他在俄罗斯远东开设了第一家轮船公司。直到1902年,该公司仍是唯一一家连接俄罗斯至中国海参崴、烟台、上海等地的轮渡公司。沙维列夫同时喜爱汉学,购买了不少汉籍。其捐赠给圣大的图书,多数钤有其俄文姓名蓝色赠书印。带有沙维列夫钤印的图书共有36部,这些书基本都是同光间刻本,其中有两部《商贾便览》,与其商人身份颇为契合,而有些则为朝鲜、日本刊刻的书籍,如《大明一统志》为朝鲜天顺万寿堂刻本,《显承述略》18卷为明治九年(1876年)刻本。这些书的获得,当与他海外经商的经历有关。

1904年,图书馆收到外交官彼得·鲁达诺夫斯基(Rudanovskiy Petr, Рудановский Петр

<sup>①</sup> 李福清:《与众不同的俄罗斯汉学研究与收藏家K.A.斯卡奇科夫》,A.I.麦尔纳尔克斯尼斯著:《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张芳译,第12页。

<sup>②</sup> A.I.麦尔纳尔克斯尼斯《序》,《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第51页。

<sup>③</sup> Хохлов А.Н., Михаил Шевелев и начало морского судоходства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7. № 9. С. 116—125. (A·霍赫洛夫:《米哈依尔·沙维列夫与中俄之间的海上行》,《历史问题》2007年第9期,第116—125页。)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71—1904 年)收藏的一些汉籍,包括《红楼梦》《钦定蒙古源流》《新约全书》等<sup>①</sup>。他的藏书钤有俄文印章,汉译为“彼得·康斯坦丁诺维奇·鲁达诺夫斯基藏的书籍。1913年4月5日。”

1911 年,图书馆收到俄国领事官格罗瑟( Grosse Viktor, Гrosse Виктор Федорович, 1869—1931 年)的一些赠书,包括《四书集注》《诗经集传》《禹贡正解》《四焉斋诗集》等。这些书上粘有赠书签,汉译为“驻上海总领事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罗瑟赠送的礼物,1911 年 11 月 15 日。”此年,正是格罗瑟就任上海总领事之职,或许职务变动的原因,他将自己的一些汉籍赠给了东方系图书馆。在东方系图书馆藏书中,有一部清嘉庆刻本《毛诗故训传》(xyl.2349)与格罗瑟当有关系。该书前护页上有名为朱午的识语:“庚子兵乱,书卷狼藉,市肆虽阙完不一,而精校善刊本遂在皆是。于时国破君亡,士大夫一筹莫展,方肆力叔拾古籍,价廉物美,旷代一时。朱午,一介布衣,亦逐尤而效之,即今视昔,倏一星终矣。前兹大俄留学中国之噶喇赐君,见又旅居北京。朱午复从事通译,暇辄详说厥国学攻我国经籍者亦大有人,彼都人事颇郑重之。朱午因出是书以相示,略道所由来,实不禁今昔盛衰之感。噶喇赐君亦为动容,卒从所请,因之献诸厥国学弟,不识有当与不。辛亥七月七日朱午弟一识。”识文中的“噶喇赐君”,当即格罗瑟的音译;辛亥年,即宣统三年(1911 年)。朱午,识语中言其在俄罗斯馆从事通译,可见其人通俄语。阎国栋曾记载,圣大东方系所聘教授中国教师中,有一位音译为“朱武”的人,1911 年上半年经伊凤阁推荐担任口语教师<sup>②</sup>。我们推测,圣大所聘的“朱武”即是朱午。从时间看,赠书之事应为朱午自俄返京之后,复在俄使馆工作的背景下发生的。朱午的识语展示了一位精通俄语的中国人眼中的时代巨变,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而这部《毛诗故训传》,则是汉籍流布域外的生动例子。

1912 年,图书馆收到原俄驻福州总领事尼古拉·波波夫( Popov Nikolay, Попов 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1850—1901 年)的藏书,包括《唐赐铁券考》《燕山外史》《杨文靖公全集》等 7 部,书中粘有赠书签,内容为“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波波夫,1912 年 5 月 10 日”。

巴维尔·波波夫( Popov Pavel, Попов Павел Степанович, 1842—1913 年)1913 年去世之后,其遗孀将其中国文献收藏全部赠给东方系图书馆。波波夫中文名为柏百福,又名茂林,毕业于圣大东方语言系,1870 年被派往俄国驻华公使馆工作,1886 年成为俄国驻北京总领事。1902 年回国,便开始在圣大东方系任教,直至去世。柏百福在华有 32 年之久,于中国学术深有研究,是王西里学派的中坚人物。蔡鸿生指出:“在沙俄‘中国通’两代人的交接中,院士王西里是把衣钵传给通讯院士柏百福的。”<sup>③</sup>在藏书的数量上,柏百福也成为继王西里之后的东方系图书馆第二大宗藏书。

柏百福的收藏多数都贴有赠书签,内容为:“此书为波波夫副教授所藏,由其遗孀于 1914 年 3 月 10 日赠予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有些书上还钤有“柏氏茂林”“柏百福”“PAUL POPOFF”的藏书印。这些藏品有 200 余部。除此,还有不少收藏没有藏书印记,比如一些俗曲,而柏百福尚有一些碑帖藏品则尚未来得及整理。柏百福收藏的汉籍四部皆有,和其他 19 世纪后半叶的收藏家一样,他所搜集

① Хохлов А.Н., Китаист Петр Рудановский (1871 – 1904): судьба дипломата // XXI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 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стран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0-12 апреля 2007 г.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СПб, 2007. С. 175-176. (A·霍赫洛夫:《彼得·卢达诺夫斯基:一位外交官的命运》,《第二十四届国际研讨会亚非国家的历史学与文献学》发言提纲,圣彼得堡:2007 年 4 月 10—12 日,第 175—176 页。)

②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 520、526 页。

③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第 134 页

的汉籍主要为清同治、光绪年间出版物。柏百福的收藏进一步丰富了东方系图书馆的汉籍品种。比如四书类,柏百福藏书中有《四书辑释大成》《聚珍堂四书》《增补四书精绣图像人物备考》《四书味根录》4部,这些圣大都无相同的版本。而这部日本文化十一年(1814年)刻的《四书辑释大成》原为清末藏书家杨守敬的藏书,上有“杨守敬印”“星吾海外访得祕笈”等印,此书每页都写满了批语,出自日人之手。柏百福曾经翻译过《论语》,他“选择了一种注释详尽的日本版《论语》作为翻译蓝本。令他感到庆幸的是,在这个版本上,有原日本主人所做的非常详细的夹批和心得,对其理解与阐发儒家思想有很大帮助”<sup>①</sup>。由此可知,《四书辑释大成》即是柏百福翻译所据之书。于小说,柏百福则搜集了《红楼梦》《草木春秋演义》《蜃楼志》等15部作品。在他的收藏中,还有一些为清末百本张的俗曲,比如《纵妻》《两口子变脸》《百计千方》《见天生闷气》《合钵》等,这些都是圣大所无,而为其关注。很明显,柏百福深受王西里院士广泛搜集各类图书的影响。

圣大东方系的汉籍收藏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据1955年制定圣大图书馆东方分馆第96号库存藏书档案记载,是年曾在圣大东方系任教的斯梅卡洛夫(Smikalov Georgiy, Смыкалов Георгий Феофанович, 1877—1955年)将其藏书卖给了图书馆<sup>②</sup>。图书馆支付斯梅卡洛夫23494卢布20戈比,其中包括周培春画册4部,共花230卢布。以此推测,斯梅卡洛夫的收藏应是东方系图书馆最后的一大宗汉籍收藏。

除了上面论及藏书家之外,我们还可以分出阿里克谢·波兹德涅耶夫(Pozdneev Aleksey, Позднеев Алексей Матвеевич, 1851—1920年)、德米特里·波兹德涅耶夫(Pozdneev Dmitri, Позднеев Дмитрий Матвеевич, 1865—1937年)、阿列克谢耶夫院士(Alekseev Vasiliy, Алексеев 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1—1951年)等人的私人收藏。他们都是王西里院士的弟子或后辈。像东方系所藏的清鲍廷博抄本《元朝秘史》(xyl1264)即是阿里克谢·波兹德涅耶夫在北京时应巴拉第之请带回俄国的<sup>③</sup>。阿里克谢院士的收藏《福音千字文》一书,上面钤有蓝色的藏书章,内容除了他俄文名字之外,尚有“不愠斋”汉字。而在王西里院士之前早期汉学家、传教团成员,比丘林、卡缅斯基、萨哈尔·列昂季耶夫斯基、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切斯特洛伊等,在东方系图书馆中也能找到他们零星的收藏。如图书馆藏有列昂季耶夫斯基(Leontevskiy Zakhar, Леонтьевский Захар, 1799—1874年)翻译的《罗西亚国史》两部,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Voznesensky Nikolay,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Николай, 1799—?年)收藏《大清道光十年岁次庚寅时宪书》(BY224)上面有其在北京所做俄文笔记、日记等具有历史价值的记载。

除了个人收藏,东方系图书馆的藏书还有一部分来源于国家购买或从其他机构调拨、赠送。1819年,俄罗斯政府命令科学院将部分东方语言书籍分给圣大。1857年,王西里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文献札记》中提到亚洲博物馆曾经向大学赠书,未言具体数量,包括《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书<sup>④</sup>。

①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466—467页。

② [俄]马义德:《斯梅卡洛夫收藏的北京风俗画》,详见冯骥才主编:《“原生态·新生代传统木版年画的当代传承”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第109—119页。

③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392页。

④ Васильев В.П., Записк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книгах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летопись «Русского Вестника», 1857, т.11, с. 325. (王西里:《圣彼得堡大学东方文献札记》,《俄罗斯通报大事记》第11册,1857年,第305—343页。)

直到20世纪,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其他藏书机构赠给东方系的汉籍,如馆藏《四书集注》(xyl.2444)一书,钤有“亚洲司图书馆”“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章,上有识语交待此书的来源:“来自于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的复本,1925年1月25日。”

圣彼得堡大学的汉籍收藏伴随着东方系发展,由一代一代的汉学家、学者逐渐积累起来的。这些汉籍为俄罗斯汉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其所孕育的王西里学派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汉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梳理清楚这些汉籍的来源,对俄国汉学与汉籍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启示我们一些俄藏汉籍的研究路径。笔者以为,我们要紧密结合收藏者的汉学研究来考察他们的汉籍收藏,如西韦洛夫的宗教热忱、沃伊采霍夫斯基的中医兴趣、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宗教研究等等,他们的个人收藏往往与其研究兴趣相一致。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将圣大所藏的汉籍收藏放在全俄汉籍收藏大环境中进行考察。不少汉学家的藏品分散在不同的藏书机构,如尼古拉·波波夫的藏书,除了圣大有藏外,亚洲博物馆也曾收到他藏书135部<sup>①</sup>;而赫拉波维茨基的汉籍收藏与莫斯科的斯卡奇科夫收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需要学者全面把握俄藏汉籍的收藏情况,尽量全的搜集相关资料。汉学家们凭借汉籍资料开展汉学研究,今天整理他们汉籍收藏进而反观其汉学研究,在双向互动中,拓宽了域外汉学与汉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责任编辑:潘文竹

##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Zhang Yun<sup>1</sup> Maiatckii Dmitri<sup>2</sup>

1. School of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Jinan 250024, China;

2.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St. Petersburg 199034, Russia

**Abstract:**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St. Petersburg University began in the 1830s and continued to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with a total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2,200 Chinese books. These Chinese books are the legacy accumulated by several generations of sinologists in the Oriental Studies Department of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represented by Academician V. P. Vasiliev.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with the help of literature archive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history of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in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mainly discusses the colle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re than ten sinologists such as Sivilov, Wojtsehovsky, Vasiliev, Mikhail Khrapovsky and Popov,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classics in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The Chinese books stored in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gave birth to the Vasiliev School,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sperity of Russian Sinology. Examining its origi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Russian Sinology and Chinese classics.

**Key words:** St. Petersburg University; Chinese classics; source

①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第545页。

# 福清本《香空宝忏》与回鹘本 《摩尼教徒忏悔词》同源说

俞伦伦<sup>1</sup> 杨富学<sup>2</sup>

1. 福建师范大学 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1; 2. 敦煌研究院 人文研究部,甘肃 兰州 730030

**摘要:**在福建福清市近期发现的摩尼教文献中,《香空宝忏》可谓福清摩尼教在功德道场中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文本,内容丰富,而且保存完好,内容完整,其中的15条忏悔文均与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能够一一对应。关于福建摩尼教的最早传播者,史书记载为呼禄法师。笔者此前推测“呼禄”为回鹘语“Qutluy”(吉祥)的音译,意在说明福建摩尼教由回鹘高僧传入,福清本《香空宝忏》中的15条忏悔内容竟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高度一致,可以证实福清摩尼教与唐代北方摩尼教一脉相承,是漠北回鹘摩尼教南迁的嫡传系。

**关键词:**《香空宝忏》;《摩尼教徒忏悔词》;呼禄法师;回鹘摩尼教;福建摩尼教

**中图分类号:** G256.22;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24)02-0149-08

## 一、福清本《香空宝忏》及其性质

摩尼教是3世纪在波斯兴起的一种宗教,因其创始人为摩尼而得名,于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摩尼教遭到禁绝。呼禄法师南遁福建,在民间秘密传播摩尼教,使摩尼教一脉未绝,在福建各地以变异了的形式传播至今天。2008年以后,在福建霞浦、屏南、福州、福清等地发现的与摩尼教相关的文物、文献、寺院遗址等,都属于华化摩尼教的遗存,被誉为吐鲁番、敦煌之后中国摩尼教文献第二次大发现<sup>①</sup>。本文所述《香空宝忏》(图1),亦称《灵皇忏》<sup>②</sup>,是福清摩尼教在功德道场中所使用的一个核心文本<sup>③</sup>,今存本子由俞经鑒抄录,现由俞云洵收藏。“香空”一词见于敦煌写本S.2659《下部赞·普启赞文》:“又启奇特妙香空,光明晖辉清净相,金剉宝地元堪誉,五种觉意庄严者。”<sup>④</sup>《香空宝忏》文本字数近7千字,15条忏文共分为上、中、下三卷,每卷五条,基本结构是开坛赞、序文、圣号、忏文、回坛偈,虽然在忏文开头结尾部分加入了佛教版本的赞词与往生咒,但与其他内容没有逻辑上的联系,很容易与其它文字识别,若将其去除也不影响全文的完整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敦煌多元文化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研究”(22VRC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俞伦伦,男,福建福清人,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古代宗教研究;杨富学,男,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北民族史、敦煌学、古代宗教史研究。

①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第4辑,2011年。  
② 《灵皇忏》可能是仿佛教《梁皇忏》而命名。  
③ 关于福清科仪本,请参见俞伦伦、杨富学:《福清科仪本所见东土摩尼教史事》,《历史研究》2024年第1期。  
④ 林悟殊:《〈下部赞〉释文》,《摩尼教及其东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43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6页。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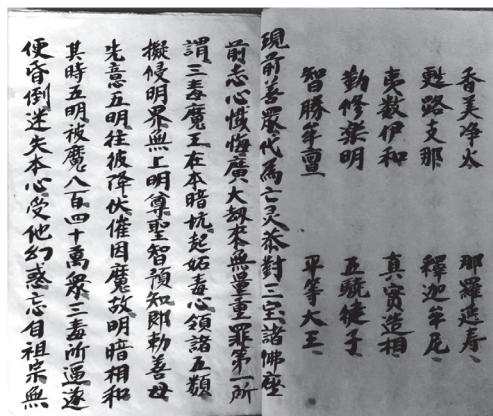


图 1: 福清摩尼教《香空宝忏》,俞伦伦摄

《香空宝忏》上卷序文中介绍了摩尼光佛因为怜悯男女听者,故而宣说 15 条忏文令人忏悔:

是故大尊,嗟法男女,所有愆殃,未解自悔。以怜悯故,为出一十五条真实忏文,令每莫日,对冥空诸圣,于佛法僧前,依此陈忏。

据此,灵皇当指摩尼光佛。这里提到听者在“莫日”<sup>①</sup>时进行忏悔,在敦煌《下部赞》中也有“此偈凡至莫日与诸听者忏悔愿文”<sup>②</sup>之语,那么《香空宝忏》应是摩尼教信徒在莫日(星期一)进行忏悔仪式时所依据的文本。

## 二、《香空宝忏》与《摩尼教徒忏悔词》忏悔内容的高度对应

在众多回鹘突厥语摩尼教文献中,以敦煌出土《摩尼教徒忏悔词》(图 2)最有代表性。该文献是 1907 年英国斯坦因(A. Stein)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用摩尼文字母书写回鹘语<sup>③</sup>,乃现存回鹘语《摩尼教徒忏悔词》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1908 年,俄国迪亚科夫(A. A. Дяков)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地区发现了另一件《摩尼教徒忏悔词》,用回鹘文书写<sup>④</sup>。保存这一文献残片更多的是柏林。现已发现的写本就已超过 20 件,有的用回鹘文书写,也有的用摩尼文书写<sup>⑤</sup>。各抄本字数各异,长短有别,可以互相补充所缺的内容。1963 年,苏联季米特里耶娃(L.W. Dmitriyeva)将其整理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

① 七曜历通过摩尼教传入我国,用以表示星期,汉字名称来自粟特语的音译,星期日为“密日”或“蜜日”(Mīr),星期一为“莫日”(Māx),星期二为“云汉”(Unxān),星期三为“哇”“滴”或“滴”(Tīr),星期四为“温没斯”(Urmazt),星期五为“那额”(Nāxid),星期六为“鸡缓”或“枳浣”(Kēwān)。参考 [法] 华澜(Alain Arrault):《敦煌历日探研》,李国强译,详见邓文宽主编:《出土文献研究》第 7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 214 页。

② 林悟殊:《〈下部赞〉释文》,《摩尼教及其东渐》,第 262 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第 418 页。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 4 卷,第 156 页。

③ A. von Le Coq, Dr. Stein's Turkish Khuastuanift from Tun-huang, Being a Confession-Prayer of the Manichaean Auditor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1: 277–314.

④ С. Е. М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Текст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Л., 1951, стр. 108-130.

⑤ A. von Le Coq, *Chuastuanift, ein Sündenbekenntnis der manichäischen Auditores*,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 – hist. Klasse, Berlin, 1910.

足本<sup>①</sup>。1965年,丹麦学者阿斯姆森(J. P. Asmussen)出版了《摩尼教忏悔词研究》<sup>②</sup>,芮传明依据该英译本整理出一份新的汉译本<sup>③</sup>。是后,美国学者克拉克(Larry Clark)又对现知的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词》进行了进一步系统的整理,既有转写,又有英译与详尽注释,足资参考<sup>④</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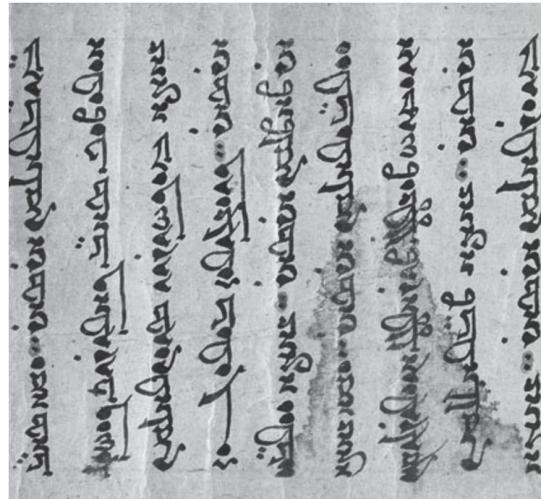


图2: 敦煌本摩尼文回鹘语《摩尼教徒忏悔词》

笔者发现,福清本《香空宝忏》中的15条忏悔文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能够一一对应,并且福清本保存下来的内容十分完整。兹据福清本《香空宝忏》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芮传明汉译)第1条内容进行比对:

福清本《香空宝忏》	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
第一所谓:三毒魔王,在本暗坑,起妬毒心,领诸五类,拟侵明界。无上明尊,圣智预知,即敕善母,先意五明,往彼降服。催囚魔故,明暗相合。其时五明,被魔八百四十万众,三毒所逼,遂便昏倒,迷失本心,受他幻惑,忘自祖宗。	奥尔木兹特神偕五明神一起降临,以率领一切诸神与魔战斗。他和具有恶业的兴奴以及五类魔作战。当时,神与魔,明与暗混合起来。霍尔木兹神之子五明神,即我们的灵魂,与魔鬼争斗了一段时间,受了伤;并与诸魔之首,贪得无厌的无耻贪魔的邪知以及一百四十万魔混合起来,他变得不明事理和意志薄弱。他全然忘却了自己所诞生和被创造的不朽神灵之境,从而脱离了光明诸神。
无上明尊,自是一切诸圣基址,亦是一切佛性根源。我缘和合,久染魔情。于是自他祖宗,都不分别。将明与暗,将命与死,将佛与魔,将善与恶,心思口说,总言不二,一体化生。常身真性,谤斥无常,及见无常,将非死灭。波旬之类,诚非魔徒,反却赞言,是佛兄弟。此之倒惑,迷犯无穷。今对三宝诸佛座前,披诚发露,忏悔深愆。愿降慈悲,恕我等,捨亡性。第一所忏之罪。哀愍救援,伏乞捨过。	我的明尊啊,从此之后,如果由于具有恶业的兴奴用邪恶行为诱惑我们的智力和思想,使得我们最终无知、无智;如果我们无意得罪了圣洁和光明的楚尔凡神,一切明性的本原,称他兼为明与暗、神与魔之宗;如果我们曾说“若有人赋予生命,即是明尊赋予生命;若有人杀害生灵,即是明尊杀害生灵”;或者我们曾说“明尊创造了一切善良与邪恶”;如果我们曾说“他是创造了不朽诸神的人”;或者我们曾说“霍尔木兹特神和兴奴是弟兄”;我的明尊啊,如果我们无意中欺骗了明尊,曾经使用了极度亵渎神灵的言辞,从而犯下了导致毁灭的罪过,那么,明尊啊,我,赖玛斯特(Rāimast Frazend),就忏悔,祈求解脱罪孽,宽恕我的罪过吧!
吻哪嚙哆啰嚙哩嗯	福佑之始!

① Л. В. Дмитриева, *Хуастунифт, 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Л., 1963.

② J. P. Asmussen, *Xuāstvānīft—Studies in Manichaeism* (Acta Theol. Danica. 7), Kopenhagen, 1965.

③ 芮传明:《摩尼教突厥语〈忏悔词〉新译和简释》,《史林》2009年第6期。

④ Larry Clark, *Uygur Manichaean Texts*, Turnout: Brepols, 2013.

福清本使用文言书写,四字成句,与回鹘本比起来详略不同,但基本上能对应。第1条忏文内容介绍初际明、暗二宗混合的因缘,由此导致了人类初祖“迷失本心”,而受到他魔诱惑,忘记了自己的明性根源。强调信徒要明确二元区别,不可将明性与魔情混淆,不可认为“波旬”(疑为“波旬”)与“佛”同源。在福清本中可看出,“明界”与“暗坑”相对,明界至尊神被称为“无上明尊”,暗坑首领则是“三毒魔王”。福清本在首句提到了三毒魔王试图侵略明界的背景,回鹘本无此句,直接从无上明尊率领诸神与五类魔战斗开始。回鹘本的第1段与福清本可以逐句对应,差别处在于回鹘本中的暗坑魔众为“一百四十万”,而福清本则是“八百四十万”。回鹘本第2段的“我的明尊啊”与福清本的“无上明尊”对应,词句顺序略有差异,不过回鹘本的语句看起来更为通俗易懂,可作福清本的参考。

此外,在每条忏文之下,福清本还加了一段4句七字偈,概括了所应忏悔的罪行,比如第1条,在福清本里将其概括为“忘本生缘罪”。每条罪行都有一个这样的概括性称呼,分别为忘本生缘罪、不敬二光罪、流浪五谷罪、轻慢三宝罪、杀害五类罪、心口意业罪、信邪倒见罪、不具四印罪、不持十戒罪、亏违礼忏罪、不行七施罪、不持斋戒罪、不求忏悔罪、亏违阎默罪、纵恣三业罪。这些名称在回鹘本中未见,可能是福清本新增的内容。福清本在保持15条忏文完整性的前提下,扩充了一些内容,这些内容的制作者显然充分了解摩尼教的教义,才能恰如其分地进行命名概括。

在《香空宝忏》每卷中还有敬拜摩尼教诸圣名号的内容,一共分为3段,分置于5条忏文之间,另外两卷也是同样做法。这份诸圣名单可以视为摩尼教的神谱,内容相当纯粹,没有杂入道教及民间信仰的成分。很多神名我们可以在《下部赞》《摩尼教残经》上找到,其中也有些神名并未出现在敦煌汉语摩尼教文献上,但从其名称上与其他外文记录能对应,应该来自早期汉语摩尼教文献。记载如下:

本师摩尼,无上明尊,净妙香空,涅槃诸圣,金刚宝地,日光大圣,善母如来,净风夷萨,五收圣使,七宝舡主,活命净气,精进净风,再甦净明,微妙净水,香美净火,那罗延寿,甦路支那,释迦牟尼,夷数伊和,真实造相,勤修乐明,五骁健子,智胜牟宣,平等大王。

持世如来,十天大王,降魔圣使,地藏夷萨,催明大圣,殊胜光王,圣化王子,骁勇明使,天乐诸圣,威力大圣,大慈夷数,神通电光,知惠善心,救苦观音,大悲势至,毗卢舍那,五妙相身,夷数伊桓,贞明法圣,清净法身,光明法身,大力法身,智慧法身,四寂法身。

广大心王,大惠心王,微妙法风,收採惠明,庄严法相,四寂法身,阎默大圣,净活思惟,吉祥圣使,西国法王,十二慕闍,七二哆诞,三百悉德。阿罗缓僧,月光夷数,常胜先意,神通电光,光明圣使,大宝舡主,净主法王,卢缚逸天王,弥诃逸天王,唃啰逸天王,娑啰逸天王。

上文中的殊胜光王、圣化王子、骁勇明使、天乐诸圣、威力大圣,似乎可以与拉丁语文献(英译)中的 The Keeper of Splendour (光辉卫士)、King of Honour (尊贵的王)、Adamas of Light (阿大姆斯)、King of Glory (荣耀之王)、Alas (持地者)相对应<sup>①</sup>,涵盖了由明尊历次召唤出来的诸神以及五大先知、四大天使等。《香空宝忏》最后一段中出现的慕闍、哆诞、悉德、阿罗缓僧,分别对应于《摩尼光佛教法

<sup>①</sup> 汉译名见马小鹤:《摩尼教的“光耀柱”和“卢舍那身”》,《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

仪略·五级仪第四》所说的四级师僧：慕闍、拂多诞、默奚悉德、阿罗缓<sup>①</sup>。四天王在霞浦文献中亦可以见到<sup>②</sup>。

### 三、《香空宝忏》与《摩尼教徒忏悔词》同出唐代母本说

福清本的最大价值是可以补充回鹘本使用略称而未展开说明的内容，比如“七施”与“十戒”，都是听者日常信仰生活所依据的重要法则。“七施”出现在福清本《香空宝忏》和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的第11条，“十戒”出现在第9条。我们现在所看到回鹘本译文并没有具体说明。敦煌本S.2659《下部赞·此偈你逾沙忏悔文》写道：“于七施、十戒、三印法门，若不具修，愿罪销灭。”<sup>③</sup>“七施”，顾名思义，乃是听者所要承担的七种布施义务，在回鹘本中并没有具体指明，《香空宝忏》则完整将七施内容一一罗列：

言七施者，一施法堂，安居善众；二施经图，于僧披展；三施男女，承奉正宗；四施饮食，以充斋供；五施衣服，串带师僧；六施迎送，运转移动；七施汤药，医疗病僧。如上七施，计合常为。

由于摩尼教师僧主要以修持礼拜等精神活动为主，所以需要听者提供建筑、经书、饮食、衣服、交通、医疗这些物质条件，并且还需要有信徒献身出家，以继承摩尼教法。

福清本《香空宝忏》对于摩尼教的教义、听者日常仪轨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十戒”是摩尼教徒的修持戒条，阿拉伯语著作《群书类述》转述了十戒的内容，即不拜偶像、不妄语、不贪欲、不杀生、不奸淫、不偷盗、不欺诈、不行巫术、不二见（怀疑宗教）、不怠惰<sup>④</sup>。此为学界广为参考的对象，但将其与回鹘本内容相比，二者迥然有别。回鹘本十戒内容：口三戒、心三戒、手三戒以及全身的一戒。再看福清本的说法：

言十戒者，第一真实，断之虚妄；第二善言，断诸恶语；第三美行，断诸咒誓，此三戒口。第四慈善，断诸杀害；第五廉慎，断诸偷窃；第六忠信，断诸舋舋，此三戒手。第七正实，断诸邪见；第八诸佛，断诸投魔；第九真僧，断之外道，此三戒心。第十真确，夫已有妇，妇已有夫，断诸邪行，此以戒身。

不难看出，福清本的“十戒”与回鹘文本所载基本一致，只是回鹘文本未具体阐述，不若福清本内容详

① 林悟殊：《〈摩尼光佛教法仪略〉释文》，《摩尼教及其东渐》，第232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第382页。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第225页。

② 马小鹤：《霞浦钞本明教“四天王”考辨》，详见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新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66—204页。

③ 林悟殊：《〈下部赞〉释文》，《摩尼教及其东渐》，第264页；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第419页。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4卷，第157页。

④ B. Dodge, *The Fihrist of Al-Nadim*, New York, 1970: 789.

尽。福清本与回鹘本排序相同,文义相符,当自同一母本而来。

关于摩尼教信徒(听者)持斋的时间,有两则资料提及。一是《宣和二年禁约》:“每年正月内,取历中密日,聚集侍者、听者、姑婆、斋姊等人,建设道场。”<sup>①</sup>二是《宿曜经》:“末摩尼常以密日持斋,亦事此日为大。”<sup>②</sup>如果此两则材料所言不误,可能是比较重大的节会斋日选择密日(星期天)举行。敦煌写本S. 2659《下部赞》中有“此偈凡莫日用为结愿”与“此偈凡至莫日与诸听者忏悔愿文”的记载,是见,听者凡常以莫日(星期一)结斋忏悔。福清本《香空宝忏》要求听者在每个莫日进行忏悔,销除“六日以来俗务之罪”,将每年50个星期的持斋称之为“五十旬斋”(第12条)。每年7次的双日斋,在福清本中称为“年七加斋”,斋月时间在腊月,被称为“戒月”(第14条)。忏文中还提到“四时礼赞”及“朝夕精勤”(第10条),说明了听者日常要进行4次早晚礼拜。

福清香空道场开忏时,坛场两侧张贴有“灵皇”与“斋坛”字样的两幅字联,二位法师依次宣诵忏文,代为亡过听者乞求赦罪,这一传统可追溯到唐代《下部赞》时代。《下部赞》中记载有“亡没沉沦诸听者”与“此偈为亡者受供结愿用之”,为亡过听者祈祷解脱,登上明船赴常乐世界,也是摩尼教十分重要的宗教仪式内容。《香空宝忏》在历史上的可能也实际运用于日常生活中,陆游在福建曾亲见:“至有士人宗子辈,众中自言:‘今日赴明教斋。’”<sup>③</sup>从陆游转述的“今日赴明教斋”一语来看,此应是日常行为,那么“明教斋”应是每周莫日进行忏悔的斋会,因忏悔内容都是针对信徒日常行为,所以采用的必不是音译本,而《香空宝忏》核心内容的“十五条忏悔文”,可能在宋代福建“明教斋”中就已被使用。在福建摩尼教文献未出之前,连立昌曾认为福建明教是摩尼教的异化,所使用的经文与摩尼教无涉,故而推测宋代“明教所习经文是摩尼经的可能性就很难存在”<sup>④</sup>。这一论断显然与事实不符。

840年,回鹘西迁,在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带先后形成高昌回鹘、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政权,摩尼教继续流行,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在吐鲁番、敦煌都有发现<sup>⑤</sup>。关于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成书年代,苏联学者马洛夫(С. Е. Малов)认为当属5世纪作品<sup>⑥</sup>;季米特里耶娃(Л. В. Дмитриева)不认同其说,认为“尚无证据说明属于5、6或7世纪”<sup>⑦</sup>。唐会昌年(841—845年)间,漠北摩尼教因回鹘失势而西迁,北方摩尼教因会昌法难而销声匿迹,呼禄法师带领僧团避难而来到福清,保存摩尼教至今,并流传下《香空宝忏》等文献。回鹘摩尼教西迁与北方摩尼教南迁之后,在高昌、沙州与福清之间相距万里,交通阻隔,教团交流可能因此中断,所以回鹘本《摩尼教徒忏悔词》与福清本《香空宝忏》发生关系,其时应在9世纪中期之前,可证这两部高度对应的摩尼教文献源自唐代母本。

关于福建摩尼教的来源,《闽书·方域志》有明确记载:

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今福建福清市),授侣三山(福州市),游方泉郡(泉州市),卒葬郡北山(泉州北郊清源山)下。<sup>⑧</sup>

①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534页。

② 不空译:《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卷下,《大正藏》第21册,第398a页。

③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5页。

④ 连立昌:《福建秘密社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页。

⑤ 杨富学:《回鹘摩尼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50—179页。

⑥ С. Е. Малов,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Текст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Л., 1951, стр. 108.

⑦ Л. В. Дмитриева, *Хуастуифт, Тюрк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Л., 1963, стр. 215.

⑧ 何乔远著,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史系古籍整理研究室《闽书》校点组校点:《闽书》卷七《方域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

由上述记载观之,开摩尼教于福建者当为呼禄法师。至于呼禄法师的身份,学术界有所考证。英国学者刘南强认为,“呼禄”就是中古波斯语 *xrōhxwān* (呼嘘唤:译云教道首,专知奖劝,身份为使唤僧) 的音译<sup>①</sup>。此说既出,便得到学术界广泛的支持<sup>②</sup>。此说不然。呼嘘唤作为使唤僧,地位不高,与“授偈三山”的法师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尤有进者,“呼嘘唤”既为法师称号,其后就不能叠床架屋,再加“法师”二字了。由此而可推定,“呼禄”当为人名,可能为回鹘语“Qutluγ”即“骨咄禄”之对音,意为“吉祥”。骨咄禄,又译“骨禄”“骨都”“胡禄”,而“Qutluγ”在回鹘又常被人格化为“保护神”,其用以对译“呼禄”无不妥之处<sup>③</sup>。

有幸的是,福清摩尼教科仪本《普度科仪·稽师科》中同样发现有“呼禄”之名,写作“呼禄慕阁”<sup>④</sup>。慕阁,回鹘语作 *možak*,来自粟特语 *mwž'k*<sup>⑤</sup>,为摩尼教五级教徒中最高阶的教职,阿罗缓(呼嘘唤)为第三级<sup>⑥</sup>。如果将“呼禄”解释为“呼嘘唤”,那么,“呼禄慕阁”岂不成了“呼嘘唤慕阁”?敢问“呼禄法师”在摩尼教中的级别到底应该是第一级还是第三级呢?自相矛盾之处显而易见。质言之,可以将“呼禄”解释为回鹘语“Qutluγ”(吉祥),将“呼禄法师”理解为回鹘“吉祥法师”是可以信从的,而解释为“呼嘘唤”则是根本行不通的<sup>⑦</sup>。

总上所述,可以看出,福清摩尼教从源头上可以追溯到唐会昌年间回鹘摩尼教高僧呼禄法师。呼禄法师入闽传教,主要活动于泉州灵源山、华表山,故摩尼教又被称作“灵源教”<sup>⑧</sup>。后经“灵源历代传教宗师”的嫡嫡相传,一脉不绝,以至于今,其中尤以北宋林瞪对摩尼教的发扬光大影响最巨<sup>⑨</sup>。从福建霞浦、屏南、福清保存下来的科仪本可以看出,虽历经千年,福建诸地的摩尼教虽已不同程度地佛化、道化或民间化了,但至今保持着独立的教派传承与仪式传统。大量的教内文献可以与敦煌、吐鲁番摩尼教文献相互印证,像《香空宝忏》如此完整、能够直接与回鹘文《摩尼教徒忏悔词》对应的福

① Samuel N. C. Lieu, "Precept and Practice in Manichaean Monasticism", *Journal of Theological Studies*, New Series 32, 1982: 163; *ibid*, *Manichaeism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and Medieval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Tübingen, 1992: 89, 264; *ibid*, "Polemics against Manichaeism as a Subversive Cult in Sung China",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 of Manchester* 1979/2, p. 138; *ibid*, *Manichaeism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Leiden–Boston–Köln, 1998: 86.

② Peter Bryder,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Manichaeism". A Study of Chinese Manichaean Terminology, Löberöd, 1985: 10; 吉田豊:「漢譯マニ教文獻における漢字音寫された中世イラン語について(上)」『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II (1986年号), 1987年, 註93;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 大阪: 大阪大学文学部, 1991年, 第61—62頁; 林悟殊:《宋代明教与唐代摩尼教》,《摩尼教及其东渐》, 第124頁。

③ 杨富学:《乐山堂神记》与福建摩尼教——霞浦与敦煌吐鲁番等摩尼教文献的比较研究》,《文史》2011年第4期; 杨富学:《回鹘僧开教福建补说》,《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

④ 关于福清本《普度科仪·稽师科》,请参见俞伦伦、杨富学:《福清科仪本所见东土摩尼教史事》,《历史研究》2024年第1期。

⑤ 吉田豊:「唐代におけるマニ教信仰—新出の霞浦資料から見えてくること—」『唐代史研究』第19号, 2016年, 第23頁。吉田氏认为:“‘慕阁’并非是安息语‘mw̄c'g’(ammōžāg)而是来源于摩尼教粟特语 *mwž'k* 的对应之意。”

⑥ 林悟殊:《摩尼光佛教法仪略》释文,《摩尼教及其东渐》,第232页; 芮传明:《东方摩尼教研究》,第382页。图版见《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5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4—225页。

⑦ 杨富学、熊一玮:《唐代开教福建摩尼僧呼禄法师族出回鹘新证》,《西域研究》2022年第2期。

⑧ 盖佳择、杨富学:《宋元以来霞浦世俗化之摩尼教非“灵源教”说》,《宗教学研究》2021年第1期。

⑨ 杨富学:《林瞪及其在中国摩尼教史上的地位》,《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清摩尼教文献更是首度发现,可以证实福清摩尼教与唐代北方摩尼教一脉相承,是漠北回鹘摩尼教南迁闽地后的嫡传。

补记:本稿曾在2020年10月9—13日在敦煌举办的“第二届敦煌与丝路文明专题论坛暨敦煌学视阈下的东北西北对话”上宣读,翌年9月18日又在敦煌研究院第74期“敦煌读书班”专题演讲。经过大幅度修改后投稿《历史研究》杂志,被录用,将刊于《历史研究》2024年第1期。但由于篇幅过长,我们遂将这一部分摘出另刊。近期,突然获知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张帆女史所撰《福清摩尼教文书〈香空宝忏〉与古突厥语〈忏悔词〉比较研究》作为《西域研究》的拟刊稿优先发表于中国知网(网络首发时间:2023-12-12 14:47:44),虽议题相近,但内容无雷同,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潘文竹

## On the Same Origin between the Fuqing Version of *The Xiang Kong Precious Repentance* and the Uighur Version of *The Manichean Confessions*

Yu Lunlun<sup>1</sup> Yang Fuxue<sup>2</sup>

1.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Fujian and Taiwa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Studies,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 Amid the Manichaean literature recently discovered in Fuqing, Fujian Province, *The Xiang Kong Precious Repentance* can be regarded as a core text used by the Manichaean religion at the punya ashrams. It is rich and complete in content and well preserved. Fifteen articles of the confessions correspond to the Uighur version of *The Manichean Confessions* found in Dunhuang and Turpan. The earliest propagator of Manichaeism in Fujian recorded in historical annals is Master Ulug. The author previously speculated that "Ulug" is the transliteration of the Uighur language "Qutluy" (good fortune), which is intended to show that the Manichaeism in Fujian was introduced by the Uighur monks,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fifteen articles of confessions in *The Xiang Kong Precious Repentance* in the Fuqing edition a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Manichean Confessions* in Uighur, which can confirm that Manichaeism in Fuqing and the northern Manichaeism in the Tang Dynasty are from the same line. It is a direct descendant of the Mobei Uighur Manichaeism that moved south.

**Key words:** *Xiang Kong Precious Repentance*; *The Manichean Confessions*; Master Ulug; Uighur Manichaeism; Fujian Manichaeism





胡海峰,男,1965年生,北京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学院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金融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届(2013—2017年)、第二届(2018—2022年)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位论文评审、学科建设和评估咨询评审专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大学、兰州大学、西南大学正高级职称校外评审专家,兰州财经大学甘肃省“飞天学者”特聘教授,河南大学讲座教授,河南大学金融发展与风险评估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比较金融制度、公司融资理论与政策、资产定价与企业价值评估、创业投资与私人股权投资等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课题多项。在《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统计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国际金融研究》《经济学动态》《财贸经济》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教材多部。



李松,男,1974年生,湖南湘乡人,文学博士,曾经从事哲学博士后研究,先后访学于哈佛大学东亚系与历史系、杜克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当代思想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文学》(台北)英文编审。

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海外汉学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戏曲的整理与改编研究(1949—196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评价机制研究”子课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中国十七年戏曲改革的史料整理与研究”、中国博士后基金会第四十二批博士后基金项目“中国美学的解释理论研究”、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重点项目等项目。著有《十七年文学批评史论》《红舞台的政治美学》等专著4部,合著《文学史哲学》《文学研究的知识论依据》等专著3部,主编《中国美学史学术档案》《陶冶:朱光潜谈美》等专著3部,并发表《交往对话、文化转型与平行比较:巴赫金理论的中国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危机:美国学界的论争及其反思》等学术论文170余篇。学术成果曾获湖北省文艺评论奖一等奖两次、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次。

学本人期

## 来稿须知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山东省教育厅主管、青岛大学主办、公开发行的社会科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我们将秉承学术办刊宗旨,立足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关注学科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注重学术创新。本刊开设了东方文化·中国智慧、新时代中国金融学等特色栏目,同时辟有政治学研究、文学研究、历史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研究等传统栏目。欢迎海内外学人惠赐佳作。

一、本刊面向国内外学者公开征稿,来稿应主题鲜明、内容详实、观点明确、资料翔实、论证充分、逻辑清晰、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创新,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字数 10000 字以上为宜。具体格式及参考文献注释规范见《东方论坛》官网(<http://dflt.qdu.edu.cn>)。

二、为便于匿名审稿,来稿请在正文中隐去作者姓名、单位等有关信息。投稿时请注明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作者简介包括:姓名、籍贯、所在单位、职称、学历、学位、主要研究方向、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和邮箱。同时附上中英文题目、中英文摘要(含关键词)。基金项目请注明项目级别、项目名称和编号。以上内容请单独放在一页,置于正文前面。

三、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通联费等任何名目的费用,一旦采用作者稿件,会支付相应的稿酬。

四、著作权使用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万方、维普、超星等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万方、维普、超星等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五、本刊实行严格的双向匿名同行专家审稿制度。

六、本刊审稿周期为 60 天,若作者投稿 60 天后未收到本刊编辑部的任何通知,可自行处理稿件。

七、作者文章一旦被录用发表,作者须拥有所投稿件的版权,并将其转让给本刊,版权包括本刊纸质出版、发行的权利,网络出版和文摘、转载和汇编的权利。

八、投稿方式:

本刊采用电子邮箱接受来稿。各责任编辑投稿邮箱为:

侯德彤(历史、法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社会学) dflt-houdetong@qdu.edu.cn

潘文竹(古代文学、文化研究、民俗研究) panwenzhu-dflet@qdu.edu.cn

朱晴晴(理论经济、应用经济、工商管理、旅游管理) zhuqingqing@qdu.edu.cn

编辑部电话: 0532-85953730

联系邮箱: dflt@qdu.edu.cn